

中国朝鲜族名人评传系列

# 朱德海评传

崔国哲 著  
陈雪鸿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 崔国哲

1962年8月17日出生。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延边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

已发表100余篇中短篇小说和120余篇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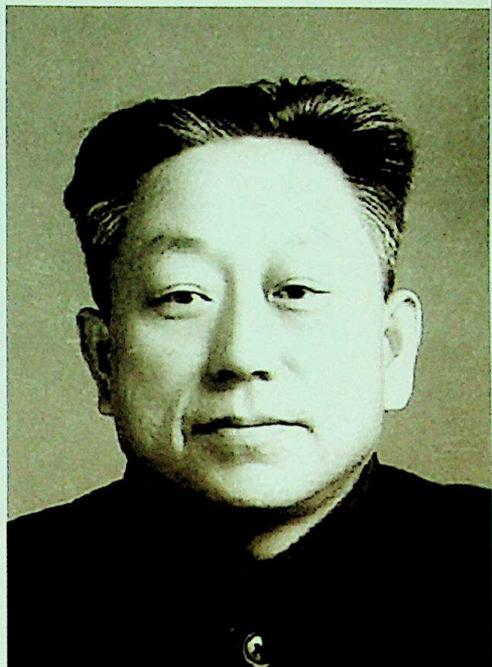
1999年出版长篇小说《间岛传说》和小说集《夏天是寒冷季节》，2010年出版长篇小说《光复的后裔们》。

小说《春天的葬礼》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新人文学奖。

荣获第三届、第五届“金达莱”文学奖，“天池”文学奖，“阿里郎”文学奖，“尹东柱”文学奖，“道拉吉”文学奖（2次），《延边日报》CJ文学奖，黑龙江“新春”文学奖，第3届朝鲜民族海外杰出青年奖，第一届图们江小说奖。



朱德海在做工作报告



朱德海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一任州长 朱德海



朱德海与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副主席董玉昆（左）、副主席崔采（右）合影



朱德海视察延边农村



朱德海与夫人金永顺和他们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



朱德海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大会上与集会群众一起翩翩起舞



朱德海给摔跤冠军颁奖，奖品是一头黄牛



朱德海与水稻育种专家崔竹松探讨育种技术



朱德海和农民在田间交谈

15827 = 73/26

中国朝鲜族名人评传系列

# 朱德海评传

崔国哲 著  
陈雪鸿 译



和龙市图书馆



DF00000639

延边人民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 前言

这是一篇恢弘深远的故事，一篇既平凡至极又志向远大的人间故事。

从去年年初开始，为了寻找为共和国的创立和为延边的发展和繁荣而奋斗一生的中国朝鲜族的民族领袖朱德海的足迹，笔者曾经几度行走在祖国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到延安的李家坪、南泥湾去探访，到西北重镇西安去调查，到北京、天津等地走访，还到了浓雾萦绕的长江沿岸地区湖北的五三农场进行实地踏查……在朔风呼啸的哈尔滨及周边多个县城，在延边的6市2县，笔者走遍了42700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在走访的过程中，笔者不断被朱德海的人格魅力所感动，为他的高风亮节而激动不已。

于是，笔者开始了重现朱德海及其同时代人们的历史的写作。同时，笔者也为再现朱德海那极其辉煌的一生而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可以说，这种感觉一直伴随了笔者的全部写作过程。

延边有许多人以为通过阅读、收视各种媒体，以及听到的一些故事，就对朱德海已经十分了解。然而，笔者现在敢说，这些人所了解的，只不过是凤毛麟角而已。如果说朱德海是一座雄伟的大山，那他们至多是来到山脚下浏览过，他们根本没有开始登

山！

笔者的写作过程，即是在登山。笔者不敢说已经登到了山顶，但笔者在登山的过程中，一直在用心关注这座大山的雄奇雄伟，并竭尽全力想把笔者看到和认识到的写出来。

当然，写作过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是非常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朱德海已经离开我们40年的情况下，在大部分朱德海的亲友、同事都已去世的情况下，在笔者对朱德海零了解的情况下，要写好这部书稿谈何容易！

笔者很想表现一个在延边这个特定地域的历史舞台上表演过喜怒哀乐和悲喜交集的朱德海。然而，现在依然健在的老同志，都会极为热心地对朱德海的丰功伟绩提供素材，但是对朱德海具体的生活细节却所知甚少。

显而易见，我们还没有从过分完美地表现共产主义者的倾向中完全摆脱出来。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从人的角度，从人性的角度去接近一个革命家，去写一个革命家的评传，心理上总会产生一些障碍。我们党从创建开始，就十分重视党员的品德。道德表述在表现一个革命家的时候往往高于其他表述。这可能束缚了写作者的手脚。这也是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时时提醒自己要注意的。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民众根据有无人性来评价一个执政党的时代。对政治家朱德海进行人性化地表达，也是笔者的一个追求。秉承这个追求，笔者挖掘出迄今为止尚不为人所知的朱德海的一些真实故事，以及这些故事所表现出的朱德海的真实品德和品格，那会使笔者感到十分欣慰。

假如能从朱德海身上看出延边这个特定地区和生活在这个特定地区的延边人的历史根源，假如通过朱德海能够看到为了共和国的创立和特定地区的建设发展奋斗一生的无数个“朱德海”，并能看到他们的精神世界，笔者会为此而感到满足。纵横交织的朱

德海人生历程，浓缩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及中国现代政治史、社会史和民族史中。这也是本书真正的含义所在。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朱德海执笔小组（原延边日报记者姜昌录、中国核工业部管理干部大学教授逸川、已故朱德海夫人金永顺、已故作家李根全）已经出版了《朱德海一生》，因此给予了撰著本书很多帮助。为此，特向姜昌录、逸川等执笔小组的老师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时，也向在物质和精神上为撰著本书予以关爱的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延边州委和州政府，原延边州委宣传部李兴国部长、魏亚利副部长，延边人民出版社李成权社长、民族出版社禹彬熙社长，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许惠淑主任，延边日报社、延边广播电视局、州图书馆，以及欣然接受采访的朱德海生前战友、各级领导和老师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 第一章 人生历程

|                  |    |
|------------------|----|
| 少年时期与青年时期        | 1  |
| “东方劳动者共产大学”和延安   | 5  |
| 岔路上              | 11 |
| 在延边(1949年~1967年) | 17 |
| 朱德海与民族教育         | 20 |
| 朱德海与农业           | 22 |
| 朱德海与民族工业         | 25 |
| 朱德海与文化           | 26 |
| 朱德海的落魄——“文化大革命”  | 28 |

## 第二章 圣地延安

|       |    |
|-------|----|
| 延安    | 31 |
| 宝塔山   | 36 |
| 参加八路军 | 45 |

|                     |    |
|---------------------|----|
| 重返延安 .....          | 50 |
| 罗家坪“朝鲜革命军政学校” ..... | 56 |
| 光复 .....            | 71 |
| 日本投降和进军东北 .....     | 75 |

### 第三章 在北满大地上

|                 |     |
|-----------------|-----|
| 新的战争 .....      | 81  |
| 与李相朝见面 .....    | 90  |
| “延安的8公里” .....  | 95  |
| 肃清土匪 .....      | 99  |
| 土改运动 .....      | 109 |
| 艰苦奋斗 .....      | 122 |
| 北方的天空下 .....    | 133 |
| 民族事务处 .....     | 151 |
| 朱德海结婚 .....     | 158 |
| 离开哈尔滨的日子里 ..... | 169 |

### 第四章 延边的天地（1949年～1967年）

|                   |     |
|-------------------|-----|
| 朱德海的天空 .....      | 176 |
| “9·3”旗帜 .....     | 184 |
| 延边大学 .....        | 191 |
| “发展基础教育很重要” ..... | 198 |
| 战争的日子里 .....      | 203 |

### 第五章 在故乡的山野上

|                |     |
|----------------|-----|
| 堤坝下喜闻牛叫声 ..... | 212 |
| 马川子镇五二村 .....  | 224 |

|                   |     |
|-------------------|-----|
| 五月盛开的苹果梨花 .....   | 230 |
| 栽种“花红树” .....     | 236 |
| 朱德海和农业技术工作者 ..... | 247 |
| 心中流淌的河 .....      | 255 |
| 啊，桦集岭 .....       | 261 |
| 刻印在江河的足迹 .....    | 266 |
| 海鸥在江河上飞翔 .....    | 270 |
| 平顶山青年农场 .....     | 280 |
| 朱德海和金时龙 .....     | 294 |
| 李玉今讲的故事 .....     | 305 |
| 去东方第一村 .....      | 309 |

## 第6章 民族工业

|                  |     |
|------------------|-----|
| “胶鞋的诞生” .....    | 321 |
| 延边的纤维纸浆 .....    | 325 |
| “实事求是”不是口号 ..... | 329 |

## 第7章 朱德海和文化

|                       |     |
|-----------------------|-----|
| 朱德海的文化年表 .....        | 337 |
| 朝鲜语文 .....            | 346 |
| “我们是朝鲜（民）族” .....     | 354 |
| 延边医院和卢博士 .....        | 363 |
| “反右”斗争和“地方民族主义” ..... | 371 |
| 东西南北的故事 .....         | 384 |
| 好人的后光 .....           | 392 |

## 第8章 令人寒心的“文化大革命”

|               |     |
|---------------|-----|
| “打倒朱德海” ..... | 401 |
| 在北京的日子 .....  | 412 |
| 湖北五三农场 .....  | 422 |

## 第9章 英灵返回延边

|                   |     |
|-------------------|-----|
| “我要回吉林（延边）” ..... | 435 |
|-------------------|-----|

|             |     |
|-------------|-----|
| 朱德海年谱 ..... | 441 |
|-------------|-----|

|            |     |
|------------|-----|
| 参考文献 ..... | 444 |
|------------|-----|

|            |     |
|------------|-----|
| 参考文章 ..... | 448 |
|------------|-----|

## 第一章 人生历程

### 少年时期与青年时期

朱德海原名吴基燮，1911年3月5日（农历）出生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个偏僻乡村。

1920年3月起，朱德海在吉林省和龙县水洞村（今龙井市光新乡胜地村）度过了少年时期。青年时期，他先后在黑龙江省的东宁、东京城、林口、密山……等北满<sup>1)</sup>一带投身抗日，并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在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五家屯担任共青团特支书记，在密山县全村担任党支部书记；1933年8月，担任西大林子党支部书记；1935年2月，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抗联）第3军新编2团留守处党支部书记，从而获得了抗联出身的光荣经历。

1936年，朱德海在第三共产国际（Comintern）于苏联首都莫

---

1) 北满，哈尔滨、牡丹江、北安、佳木斯等地区。另外，敦化、安图、延吉、珲春等延边地区为东满；丹东、通化、临江、清原，以及沈阳西南部的辽中等地区为南满；齐齐哈尔、开鲁、阜新、扶余、双辽等地区为西满。

斯科开办的“东方劳动者共产大学（又称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并于1939年开始了从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到东北的哈尔滨再到延边地区的辉煌人生远征。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却一落千丈，最后在武汉这个异乡土地上结束了不幸的一生。这无疑给光辉的一生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显示了命运悲惨的一面。朱德海是特定时期昂首挺立的革命家、政治家、教育家、民族领袖，其悲惨结局反衬出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真实。

朱德海的人生历程浓缩起来看，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从吴基燮的原名蜕变成为朱德海（1934年起）的战士、人杰、革命家。在这几个阶段中，朱德海的政治思想、信念和对民族的热爱不断得到升华，从而使作为中国人的朱德海和共产主义者朱德海得以重生。这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特定时期中国革命的实践产生了无数的朱德海，培育了无数品德高尚的人杰。为此，必须从中国革命历史和民族地区的大画幅中寻求朱德海作为人杰的成长和完成。

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1922年到1936年4月的少年时期与青年时期。在这个时期一般叫做吴基燮。上小学的时候，在龙井，从金光镇<sup>2)</sup>那里接受了初期共产主义思想。该过程成为他人人生历程中第一个转折点。1917年的俄罗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使中国和朝鲜民众觉醒的巨大事件。1920年初开始，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和朝鲜，也传播到了延边地区。这样的社会运动最先由媒体作为先锋队。《共产党宣言》手抄本，以及《俄

---

2) 金光镇，又名金根、金玄，1903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庆兴郡雄基邑，1923年加入高丽共产党人组织的反帝爱国团体青年会，1924年任和龙县北长洞小学校长，1925年任汪清县满洞小学校长，1926年任大先洞小学校长，1928年任龙井大成中学教员，后来组织“铁血团”，试图暗杀日本军政要人、特务及亲日走狗等。193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抗联第1师政治部主任、第8军第3师政治部主任，同年12月3日，在怒斥第8军第3师警卫连的两个叛变者时，不幸惨遭杀害。

罗斯共产党纲》、《我们无产阶级的前进道路》、《巴黎公社》等书籍和《共产》、《曙光》、《新世界》等报刊杂志，在龙井一带流传。其中，最先流入的是接受先进思想最为迅速的大成中学、东兴中学、私立明东中学等学校。

当时，龙井一带是朝鲜共产主义者们活动的舞台。1926年，朝鲜共产党成立以后，火曜派逐渐掌握大局，ML派<sup>3)</sup>是与之相对应而组成的派别。在一段时期里，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ML派、火曜派和西上派等三派之争。延边地区一般是ML派和火曜派进行活动。ML派的主要人物有金根、安光天、杨明、韩委建、高京钦等。朝鲜共产党解散后，ML派为重新在满洲开展活动和重新建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ML派共产主义者在龙井一带的活动最为活跃。其中，金光镇、黄基范<sup>4)</sup>、吴元叙（朱德海的叔叔）三人，据说是在朱德海通过启蒙而接受初期共产主义思想阶段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导师”。1927年，16岁的吴基燮小学毕业，有幸遇到了金光镇。当时，金光镇在兴办学校的同时，大量接受了反日爱国思想。他曾经在金若渊<sup>5)</sup>创办的私立明东中学学习。明东中学培养了许多反日民族独立运动家和社会主义运动家。“金光镇与诗人尹东柱、电影演员罗云奎等都是有名的反日爱国主义者。”（《中国抗日战争与朝鲜民族》第120页）金光镇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后来参加抗联，据说是对朱德海最具决定性影响力的人。金光镇又曾化名金根、金玄，在

---

3) ML派，马克思列宁主义派的略称，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派。由首尔派和高丽共青满洲总局的一部分人士，以及伊尔库茨克派和一月会的成员们，于1926年4月在首尔组成。

4) 黄基范，全国毛主席著作学习模范、乡村女秀才黄顺玉的父亲，抗联战士。1930年11月13日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

5) 金若渊，1868～1942，出生于朝鲜会宁，1899年移居明东村。他曾经就读于朝鲜平壤新学校，是明东学校的创办者之一。1910年，明东学校增设中学部，以排日独立思想来培养学生。

龙井一带广为人知，并加入了高丽共产党人组织的反帝爱国团体青年会，成长为一名反日民族教育家。1928年，金光镇在龙井大成中学担任教员。从这一时期开始，他与朱德海是亲密的师生关系，朱德海通过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当时，金光镇联系了七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织“铁血团”，偷偷地准备了武器，打算暗杀日本的军政要人、特务和亲日走狗。那时，金光镇已经与中共宁安县委有联系，并了解到北满地区日本警察与宪兵的力量比较薄弱，有利于组织和建立抗日武装。于是，他让朱德海等六名青年组成假的“家庭”，去宁安县华兰沟居住。通过金光镇，朱德海开始了北满之行。对他来说，这条道路是越来越激烈的抗日之路。

再来说说黄基范。他接受中共满洲省委的直接领导，是“红五月斗争行动委员会”指挥部的骨干。几年后，他到北满担任了抗联政委，成为朱德海的直接上级。

再有就是朱德海的叔叔吴元叙。“……吴元叙在交通方便，容易避开敌人耳目的胜地村（当时和龙县勇新水洞沟东梁口），以自己亲戚的名字租了一间房子，让伪装成夫妻的头道沟方面暴动指挥崔亨益与车贞淑（亲戚关系）居住，混淆别人的视线。那是一间稍微远离胜地村的独立房子，有利于进行地下活动。因此，那里成了当时延边特别支部和‘红五月斗争’指挥部成员们的秘密据点。1930年4月24日，在胜地村吴元世（吴元叙）家里，召开了为执行关于‘5·1’工作决议派到延边来的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朴润瑞和马俊，中共延边特别支部书记王景（又名李完龙）、支委伊福海，朝鲜共产党（ML派）东满道负责人金根，原朝鲜共产党员金哲，ML派系列的高丽青年会东满道负责干部等参加的联席会议。”（《了解我们的历史》金哲浩）黄基范参加了这次会议，吴基燮的叔叔吴元叙没有参加。

通过这样的生活环境，可以了解朱德海的少年时期和成长时

期所受到的周边人物的影响力。后来，经过在东宁和密山的生活，朱德海逐渐成长为觉醒的革命青年。就像当时因为地下抗日斗争的需要，反日战士们都会更换名字那样，吴基燮把名字改为朱德海。不久以后，根据第三共产国际（Comintern）的决定，朝鲜共产党解散。根据一国一党原则，朱德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地下抗日活动。

朱德海的青年时期最为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抗日和抗战。朱德海把青年时期的生活贡献给了北满这个空间，以抗日的实践述说了斗争的真理。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参加中国革命的同时，还承担着完成朝鲜革命的双重使命。

后来，朱德海因为这个时期的一段历史，导致“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诬陷为“叛徒”。同样，正是因为这段历史，在他人生的第一章刻下了抗联战士的烙印，从而被划分为抗联系列。为此，在延安出身、朝鲜义勇军前面加上了抗联出身的注解。当时，在中国的朝鲜人革命家们的出身成分大致相似，但是，朱德海既不属于黄埔系，也不属于太行山（义勇军）出身。朱德海一生中的这个过程，是他个人的思想和信念得以形成的最具有转折性质的过程，也是他成长为中国朝鲜族领袖、政治家、革命家、教育家的政治生活基础。

## “东方劳动者共产大学”和延安

接着就是苏联（俄罗斯）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大学”时期（1937年1月～1939年3月）。1936年6月，中共勃利县委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派遣朱德海前往苏联。中共中央与第三国际党（Comintern，又称共产主义第三国际）驻中共代表团把优秀的抗日

干部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大学”，培养了大批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和干部。东北也推荐了许多优秀的青年革命家，并培养和训练了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游击干部。朱德海为其中一员。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大学”在第三国际共产党的支持下，于1921年10月21日成立，培养对象是居住在极东的苏联人和亚洲人，宗旨是培养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该大学又被称为“莫斯科共产大学”、“极东共产大学”、“东方劳动大学”。这所大学为中国、朝鲜等许多亚洲国家及中东、欧洲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成长，给予了许多影响，还培养了许多政治人物。名义上是俄罗斯国立大学，实际上，学校的经费、学生的选拔和学校的运营等一切方面，都要接受第三共产国际的指示。学校设立几年后，分为俄罗斯国内学生东方部和国际部。国际部包括朝鲜语、中国语、日语、土耳其语、法语等7个语言班。朝鲜语开设于1928年，原延边大学副校长林民镐<sup>6)</sup>和朴宪永的妻子朱世竹等都在那里学习过。

去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原则上需要相关国家的共产党推荐。朱德海等东北出身的学员，是由中共满洲省委推荐的。1936年6月，朱德海一行先在俄罗斯远东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国际革命家救援会”，等候前往莫斯科的下一步指示。该机构的俄语名称为“卯布尔”，是一个援助全世界革命家的团体。他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候出发的消息，却迟迟得不到任何信息。根据组织上的指示，他们不能随便外出。为了严守秘密，也避免与外人接触，他们耐心等待着来自中国东北的其他人员。

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主宰东方”，是俄罗斯东海沿岸最大

---

6) 林民镐，延边大学第一任副校长。上世纪20年代初参加革命，早期东满地区青年运动领导者之一。1926年加入朝鲜共产党，担任东满地区委员会青年部长。1928年被组织上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敦化县副县长、《吉林省报》副主编、《延边日报》主编等职。延边大学主要创始人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于1970年不幸去世。

的港口城市和军港，是连接北极海和太平洋的北冰洋航道的终点，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1903年，西伯利亚铁路完全开通，并与莫斯科相连接。朱德海的故乡就在俄罗斯的极东地区，离此地不远的杜蓓亚村。因此，对他来说，这里并非是陌生的异国他乡。听着噼啪噼啪敲打海岸的波涛声，朱德海痛苦地回忆起牵着母亲的手，光着脚前往朝鲜的情景。失去父亲后，他重新前往朝鲜。凄惨的汽笛声中，尾随而来的海鸥和波涛声，给他留下了最痛苦的记忆。

朱德海与李春根等人在美丽的海滨城市等候了半年时间，又熬过近一个月的行程，直到第二年1937年1月，才在“卯布尔”的引领下，横跨广袤的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直接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大学”学习。

这的确令人十分激动。十月革命成功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引领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悠久的宫殿和红场，美丽的城市和生活充裕、欢快的苏联人民……苏联是热烈的共产主义者们向往的圣地，成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巍然而立。无数西欧进步知识分子和东方共产主义者纷纷来到莫斯科，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在本国根本无法见到的社会理念和价值观。在赶走了地主的集体农场里，农民们成为堂堂正正的国家主人，让人深受感动。尤其是对在北风呼啸的北满大地上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朱德海这样的热血青年来说，这里无疑是令人激动的国家，是自由的“解放区的天”。不仅是朱德海这样的朝鲜青年，对每一个革命家来说，这里都是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乐园。

事实上，莫斯科全心全意地发挥着世界革命摇篮的作用，不仅接受来自越南、朝鲜、印度等殖民地的反帝运动家，同时还接受来自中国、日本、中东……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并予以特别的礼遇。

东方劳动大学为了确保优秀的共产党员入学，大量吸收素质出众的先进人物。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和高丽共产青年会的推荐下，大批朝鲜人前来学习，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东方劳动大学先后培养了150余名朝鲜人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成为活跃在国内或朝鲜的朝鲜共产党的主力。除此以外，该学校还先后培养了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乌兰夫、蔡畅、贺子珍、叶挺等一大批中国革命的伟大人物。1928年另设了朝鲜班，据说，林民镐是最早入学的朝鲜人。

在东方大学先后学习的朝鲜人有林民镐、曹峰岩、朱世竹、许贞淑、朱德海、方虎山、李林（光复后前往朝鲜，任朝鲜人民军干部部长）、李汉武（光复后前往朝鲜，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朱春吉（朝鲜独立同盟执行委员）、金一<sup>7)</sup>、全宇、陈般洙、陈玉、金三等。苏德战争爆发前夕的1938年，东方劳动大学停办，朱德海成为最后一批毕业生。该校许多毕业生后来又在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里重新相聚。

朱德海刚进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时，曾因肺病复发在莫斯科某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好转后重新回到学校。朱德海早在两年前（1935年3月）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1师时就患上了肺病，曾在密山疗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复发，直到此时重新复发。他做梦也没想到该病会成为危及自己生命的疾病，治愈后重新回到学校学习。

朱德海最初被编入中国班。但是，东方大学校方考虑到朱德海等中国来的朝鲜学员难以听懂中国语讲课，就把他们从8号楼

---

7) 金一，光复后前往朝鲜，历任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平北党秘书、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委兼政委、第1师文化副师长、人民军司令部文化副司令官、民族保卫省副相、内务省政治局长、前线司令部军事委员、平南道委员会委员长。1953年6月后，历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副委员长、内阁副首相兼农业相、内阁第1副首相。1984年去世，享年75岁。

转到了12号楼的朝鲜班。当时，朱德海的汉语表达能力比较差。朝鲜班一共有来自朝鲜和中国、满洲等地的学生20余名，其中有方虎山<sup>8)</sup>、张福（林海）、李林、全宇<sup>9)</sup>、朱春吉、李权武、陈般洙、柳京龙、陈玉、金一、金相（到朝鲜以后任平壤市卫戍司令官）等。大部分学生的成分复杂，既有直接来自朝鲜的学生，也有国内推荐的学员。但是，身份和所属，以及背景等人事情况都没有进行核对，一切都是秘密。学生们都根据党的指示严守纪律。

朱德海一行来到学校时，校名已经改为“莫斯科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利益研究学院”。学校名称如此复杂，学员们的身份和所属国家自然也十分复杂。“……学校设置了8个分院，中国班、朝鲜班、越南班、菲律宾班、日本班，另外还有一部分中东国家班。学生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语言、肤色、生活等都有很大的差异，对政治、社会、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理解的角度和层次也不尽相同……”（《朱德海的故事》）中国班和朝鲜班归属于第8分院，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朱德海在高级班，即第一班学习。这是一座以培养革命家为目的的大学，而不是以传授基础知识为目的。因此，初级班是由那些文化程度较差的学员组成。不过，第三共产国际十分重视国际学生们的待遇，为这些准革命者提供了一切便利。

“……他们学习了苏联共产党史、世界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

---

8) 方虎山，原名李天富，1913年出生于咸镜道。满洲事变后，在黑龙江省密山地区参加了共产党抗日游击队。1936年经共产党满洲省委推荐，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39年经由新疆到达延安，在东北干部训练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接受教育，并在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学习。日本投降后，任东北朝鲜义勇军第1支队（李红光支队）政委，后任独立4师、166师政委，参加了国内革命战争。1949年7月率领166师前往朝鲜，任朝鲜人民军第6步兵师长，获共和国英雄称号。

9) 全宇，隶属于第5支队前往延边，后来编入朝鲜人占大多数的独立6师。1948年重新编入156师任副师长，遵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领4500余名朝鲜人干部和战士，转移到朝鲜平安北道定州。1950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15师师长，到朝鲜以后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7师和12师，任12师师长。

学、社会发展史等，军事学科目主要学习游击战术。当时，中国班和朝鲜班接受第三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又称中国支部）的领导。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有王明、康生、洛浦、王稼祥、陈云等。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康生曾经在学校里生活过一段时期……”（《朱德海的故事》）

1923年，孙中山认为，再依靠秘密组织或军阀是无法取得中国革命成功的，于是，为了宣传国民党的革命意识，提出了与共产党和苏联进行合作。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此积极响应，于1925年10月在莫斯科设立了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孙中山大学”（又称孙逸仙大学或中山大学）。这首先由斯大林提议，同时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孙中山大学”创建以后，东方劳动大学的部分师生转学到了“中山大学”。尽管当时苏联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依然对“东方劳动者共产大学”和“中山大学”倾注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档案记载，当时支援两座大学的费用高达1千万卢布，另外还不惜动用当时高价的外汇，用以学员们放假时探家往返的经费。中山大学里的中国共产党伟大人物有，邓小平、王平、博古、张闻天、叶挺、王若飞、蔡畅（李富春的夫人）、贺子珍（毛泽东的夫人）、杨尚昆等。

1930年，“中山大学”停办。东方大学重新设置了中国班。1937年，东方劳动大学重新分为只招收苏联国内学生的东方大学和只招收外国学生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1938年，全部停办。朱德海在四年制的东方劳动大学里学习了两年。

在“东方劳动者共产大学”学习期间，朱德海用心了解并熟悉了成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进而能够以国际视野更大范围地看待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因此，东方劳动大学是朱德海成长为革命家、政治家、教育行政家的重要“启蒙教育基地”。

接着是1939年到1945年的延安时期。当时的延安是中国革命家们的圣地。只要是延安出身，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朱德海曾经在宝塔山下的延河边高唱“……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朝鲜的青年们在前进……”，并在延安了解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树立了必胜的信念，确信了中国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革命中的必然性，逐渐成为成熟的革命家。朱德海在八路军359旅718团的某特务连担任过指导员，并在8团供给处担任指导员，又在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当过管理处长，经历了成长为特定时期民族领导者和领袖的过程和考验。

朱德海既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是抗联出身，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和接受能力较强，于是开始了升华自己，探讨自身所在的民族与中国命运的共同点。他在延安的朝鲜革命军政学校里，与抗日斗士们和义勇队出身的人们汇合，重新在延安的革命氛围中实践革命的过程，摸索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的连带关系和特殊模式，在积极投身中国革命的同时，促进朝鲜革命的成功。朱德海对双重使命的认识，必然会产生对自己民族的政治地位和所属国家深感苦闷的心理。

## 岔路上

从1945年下半年到1949年2月，朱德海的这些苦闷在哈尔滨担任第3支队政委的工作实践中一一得到了解决。在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处所属民族事务处处长期间，他的民族性格逐渐成熟。

前往朝鲜的计划落空，可以说是最早的事件。在延安接受朱德的6号命令后，为了前往朝鲜，朱德海到达了沈阳。但是遇到大国们轻率设置的坚壁——“波茨坦宣言”，导致前往朝鲜的计划

落空。这个事件无疑“贬低”了“朝鲜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抗日战争中国际纵队先锋队”（1940年7月6日《新华日报》登载的内容，《抗日战争3年来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金哲洙）的政治性质。

对朱德海来说，这个事件成为他摆脱对民族共同体生路和所属的苦闷进一步走向成熟的契机。前往朝鲜的计划落空，对朱德海来说也是一种宣言。从这个时期起，朱德海认识到了中国抗日出身的民族干部不能仅仅把自己所属的民族（朝鲜人）群体移居到朝鲜作为唯一生存的手段，也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永远定居中国，转变为中国公民。这其实也就是承认民族群体属于中国，并且必须确保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的社会地位。

在担任第3支队政委的工作中，在投入民运工作（土改工作）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在亲眼目睹民族群体的生活实践中，朱德海的这一认识愈加明确。据金贞顺<sup>10)</sup>回忆，在哈尔滨第3支队工作期间，金贞顺等许多教导大队队员曾对居住在哈尔滨市及周边方正县、榆树县、诸河（尚志）县等地的朝鲜人的实际生活进行过调查。据推测，光复前居住在东北的朝鲜人移居朝鲜的实际人数为50万人。如果说光复前是第一次移居的话，光复后的第二次移居达到了高峰。光复前后移居的人数大约为百万人左右。朱德海亲眼目睹了民族大转移。特别是北满，相对来说与安定的东满（延边地区）不同，这个时期的移居潮一浪高过一浪。

朱德海十分熟悉北满大地，意识到改善民族生活环境是决定民族共同体命运的重要因素。根据我党在北满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纲”和民族成员们的生活实际，朱德海认为，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民族共同体能够在中国定居，能够以中国公民身份占有一席之地，

---

10) 金贞顺，1926年出生，曾参加第3支队，居住于延吉。

并能够为此倾注实际的努力。生活在中国的朝鲜人，习惯性地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生活在异国的侨民。土改时期，围绕能否分配土地，朝鲜民族是朝鲜侨民，还是中国公民的问题，朱德海作了非常清楚的说明。

原延边电视台台长金熙宽<sup>11)</sup>说：“我父亲（金文宝）生前最敬佩朱德海书记，以生命担保朱德海书记的清白，极力为朱德海书记辩护，并强调朱德海书记在民族问题上的功劳，倾注全力确保民族的政治地位是最大的功劳。……朱德海书记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成立朝鲜（民）族自治区（州）的成果。由此看来，确保朝鲜族的政治地位在这里得以完成。……有一次，我曾经写过回忆母亲的文章。母亲生前最早听到的演说是1946年从尚志河东来的朱德海书记的演说。朱德海书记在演说中强调，并非盲目地前往朝鲜才是唯一的生存之路，在无偿分给土地的中国生活，反而是更加现实的民族生存之路。……当时，对于不愿前往朝鲜的母亲来说，朱德海书记的演说听起来是那么的入耳。母亲这样的回忆并非只是她个人的记忆，应该说是当时居住在东北并依然留在中国的全体朝鲜民族的共同感受。”

朱德海到了哈尔滨以后，不断向民众宣传自己的民族观：“……我们是特定时期的移民。不过，因为是移民就应该重新返回朝鲜的主张是片面的。东北的大多数朝鲜人是为了种地才来到这里的。因此，这里就成了我们（民族）生活的根基。忘记这样的根本，否认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那么，有什么资格获得所分的土地呢？……另外，胜利的果实需要我们自己拿起枪来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应该堂堂正正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这也是国家赋予主人权利。”

---

11) 金熙宽，1941年出生，1966年参加工作，先后担任延边州文化局局长、延边电视台台长。

“朝鲜人（民族）在中国已经居住了半个多世纪，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一起，在这片土地上开荒造田，艰苦地打下生活的基础。我是这片土地主人公的意识和姿态是最为重要的。只有相信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朝鲜民族的繁荣和发展应该以这样的姿态作为基础。”

当时，朱德海倾注心血最多的工作是朝鲜族（人）的国籍问题。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朝鲜民族国籍的观点。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依然有人提出“无产阶级的祖国是苏联，民族的祖国是朝鲜，现实的祖国是中国”的“多祖国论”。初听像是安于现实的“祖国论”，但是，这一提法本身是使特定群体（朝鲜民族）丧失所属感的危险想法。朱德海以展望未来的观点驳斥了“多祖国论”。

“朝鲜人（朝鲜民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开垦了广袤的北满、东满、南满等地区，与各民族人民一起展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贡献出了共同体的力量。谁也否认不了我们民族的光荣历史。朝鲜人（民族）是堂堂正正的中华民族成员。”

朝鲜（族）人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岁月，共同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共同拥有政治、经济及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各种文化内容，成为中国国内共同拥有集体归属感情的文化共同体。

朱德海认为应该称呼居住在中国的朝鲜人为朝鲜（族）民族，并主张应该享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少数民族同等的权利。这也是当时居住在中国的200万朝鲜民族的共同愿望。

1948年，朱德海任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政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在同年4月被任命为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处处长。从那时起，朱德海深入研究了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及特殊原理，正视生活在中国的朝鲜人的历史和现实，尽力寻求民族问题中的正确答案。这个时期，是朱德海完成民族问题上过渡期思想的时期。1948年12月，他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

民族区域自治的方案，得到了政府的认定。

1948年12月，朱德海参加了吉林省省长周保中<sup>12)</sup>主持的民族工作座谈会。由东北军政委员会委托吉林省委召开的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延边及东北其他地区的朝鲜人问题。主持会议的周保中在两年前（1946年）的吉林省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过“朝鲜民族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一员”的演说，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他在调任云南省工作之前，曾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建议“……首先在延吉地区实现民族自治。”（摘自1989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周保中》）除了朱德海以外，延边地区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林春秋<sup>13)</sup>和林民镐等民族领袖。

在这次会议上，朱德海第一次见到了当时延边的民族领袖林民镐及来自延边、吉林、沈阳等地区的民族领袖。林民镐是比朱德海早8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前辈学友，很早就龙井地区进行反日活动。在这次会议上，围绕朝鲜民族的归属问题，提出了3种不同的意见。以林春秋为代表的一方主张，延边归属朝鲜才能根本解决民族问题；林民镐一方认为，依照苏联的联邦方式逐渐把延边建成自治共和国。朱德海对这两种意见都不赞同。因为这两种意见都没有立足于生活在延边境内的朝鲜民族的历史和现实，都是以主观角度出发，因而都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无

---

12) 周保中，1902年出生，云南大理人，白族，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抗联第5军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兼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东满军区司令员、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副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员。解放后，历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法部主任兼民政部长。1964年2月22日在北京逝世。

13) 林春秋，1912年3月8日～1988年4月27日。1930年初开始追随金日成将军，并在东北抗联和俄罗斯极东军第88国际旅担任军医。光复后，在延边为建立延边大学和成立自治州等积极工作，后来历任朝鲜劳动党平安道第2秘书、江原道党委员长、驻保加利亚大使等职。1983年被任命为朝鲜国家副主席，曾著有回忆录《回顾抗日武装斗争时期》（1959年）、长篇小说《青年政委》等。

法实现的空谈。是否归属朝鲜是国家之间的问题，不具备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性质，建立自治共和国的想法既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利于民族自身的发展。

朱德海强调，在中国的土地上，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的一个民族而生存的大前提下实行区域自治，才是最佳的选择。区域自治的提案得到了周保中省长的大力支持。朱德海明确指出：“从文化上来说，朝鲜人（民族）自开垦这片土地那个时期起，就是在中国这个特定区域内持续共有生活资源的民族。正是这样的特性成为了使朝鲜人得以保持强烈民族本体意识的背景要因，使得初期移民保持的民族群体性的无形习惯成为稳固的所属群体的文化现象。这不是排他性和家族式习惯，应该看作是开拓他乡土地的小团体同质性的确保和对本体性的不断确认。也就是说，朝鲜人的所属根据从在中国开垦土地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因此，只有区域自治才适应中国现实体制，才能维持生存，才能确保我们民族的政治地位。”

分析来看，朝鲜民族的本体性是在不断适应中国特定环境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新的政治体制和国家的诞生，必然会产生新的规范和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政治权利的要求。中国的朝鲜民族大部分都是以小群体或大群体的形式组成村落，或者聚居在某个特定区域。特别是在东北广大农村地区，大部分朝鲜民族都是组成共同体而生活。延边是朝鲜民族聚居的地区，有必要实施区域自治。这是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风土中使朝鲜民族保持同质性，提高民族意识的基本要因和前提条件。

这次民族会议也成了让朱德海到延边来的决定性的契机。3个月后，1949年3月20日，为了加强延边地区的领导力量和对东北朝鲜民族的统一领导，东北行政委员会根据吉林省委的要求，决定派朱德海前往延边。

## 在延边（1949年～1967年）

1949年3月20日，中共吉林省委派朱德海到延边。同年5月22日，朱德海、王禄、文正一、崔采、林民镐等9人组成中共延边地委，朱德海被任命为中共吉林省委委员、中共延边地委书记。

两个月后的7月13日，文正一调任东北局农林部副秘书长，朱德海被任命为延边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州政府前身）专员。1956年8月设立全国政协延边委员会，一共组成了四届委员会，由朱德海连任主席。从朱德海被派到延边那时起，就集延边党政工作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党政一把手，从而为实现他心中早已规划好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宏伟蓝图奠定了政治基础。

共和国成立前夕，朱德在1949年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解放全中国进入了倒计时。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政协筹备委员会在北平（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地区等23个地方（地区）134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各省、市、地区和与会人员，起草了政协条例和共同纲领、政府方案和宣言，还制定了新中国国旗、国歌、国徽的图案。

朱德海是134名代表中的一员，去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筹备会议。这既是北京对朱德海本人的政治“裁定”，也是中共中央对以朱德海为代表的朝鲜民族的认可。朱德海还参加了9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180名全国委员，朱德海当选为其中一员。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因此必须妥善制定合理、先进的民族政策体系，并以此作为国策，才能进行长久的国家运营。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中央就作出了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决定。在制定《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以及深入的讨论研究后，决定实施区域民族自治。

1951年，朱德海去北京参加庆祝建国两周年的活动。当时，朱德海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向中央反映了“延边已经具备了能够建立朝鲜族自治区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希望中央政府批准我们的要求”。他回到延边以后，设立了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州）筹委会，开始加快筹备工作。

根据我国固有民族理论，民族是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中国的民族识别（确定）工作，前后经历了30年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主要在进行调查的同时第一次确定了民族成分。其中除了已经确定的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以外，这个阶段还确定了朝鲜（民）族、壮族、白族、傣族、傈僳族、鄂伦春族等38个民族。经朱德海的努力，朝鲜民族确定了朝鲜民族（1955年以后改称为朝鲜族）的族名。

1952年8月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后，8月29日召开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宣布成立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并决定把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日作为自治区成立的日子。朱德海在会上代表中共延边地委提出了“关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

朱德海指出：“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延边朝鲜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是一级地方政权机关，根据共同纲领和上级民政部的决议、指示、法令，遵照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规定，在自治区内行使自治权利，进行工作。延边朝

鲜民族自治区人民代表会议和即将成立的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任务是关注民族特征，通过民族形式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团结各民族人民，系统有序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在这次会议上，朱德海当选为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第一任主席。从成立自治区（州）之日起，进一步确立了朝鲜民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这是与朱德海的功劳不能分开的部分。

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的成立是体现我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缩影，得到了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广大朝鲜民族的支持。

如果说自治区的成立是“栽树”的话，那么，培养自治区干部的问题就是“管树”。朱德海认为，民族干部的文化素质问题是执行民族政策的主要环节，因此在干部选用和干部培养工作中以身作则。朱德海认为，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关键是争取自治区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里的政治、经济平等，从而把延边建设成各民族间和谐共处、民族团结的自治区。因此要求宏观地选用民族干部，无论是民族干部比例等政策性方面，还是细节方面，都要做到滴水不漏，彻底执行。他本人总是率先垂范，把汉族干部和汉族知识分子请到延边来，多方照顾。特别是对果树技术员、养蚕技术员等农业人才更是积极挽留。在朱德海的提议下，从1954年起，每年9月被定为民族团结宣传月，检查民族政策贯彻情况，表彰民族团结模范。迄今为止，政府行政机关一直保持着这一传统。

朱德海强调，要使各民族团结得好，首先要加强州委领导成员的团结，做出好的榜样。朱德海与田仁永、姚昕等汉族干部之间结下的同志般友谊，至今成为民族干部们效仿的典范。

为了促进民族间的团结，朱德海灵活执行了中央的指示。三年困难时期，国务院根据朱德海的要求，为了照顾朝鲜民族的生活习惯，下达了对朝鲜族每人多供应3斤大米的指示。朱德海把

国务院的照顾平均分配给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州内各个民族。州内60岁以上的老人和3岁以下的孩子,不分民族全部供应大米。另外,特定时期多给朝鲜族的3尺布票,有一半也分配给了其他民族。

## 朱德海与民族教育

《中国朝鲜民族史料集》(2卷)第354页中,把《回忆朱德海》一书作为史料,介绍了朱德海办夜校的史实。

“1935年春天,朱德海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团留守处工作。5月,部队转移到勃利县,朱德海因患病(肺炎)没有跟部队一起转移,留在勃利县所辖的小石乡水前村治病。那年7月,他住在水前村农民太昌洙家里,秘密从事游击队的组织工作,并把太昌洙的家作为教室,办起了抗日夜校。”

朱德海在北满办夜校,与当时崔庸健在宝清县办的“军政讲习所”、赵尚志在巴郎河谷办的“第3军司令部全新学校”、许亨植在方正县办的“短期训练班”等初期教育设施一样,被作为日帝强占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教育基础设施而记入史册。

朱德海早在哈尔滨第3支队期间,就在北满土地上创办过著名的“尚志中学”。来到延边以后,又作为延边大学创建者之一,先后创办了延边农学院、延边医学院、延边第一高级中学、延边第二高级中学、延边汉语师范学校、延边卫生学校、延边财贸学校、延边艺术学校等高等学府和中等专业学校,并对培养各个领域的民族干部和专业人才进行了政策性的支持。

延边大学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最早设立的民族大学。早在1948年,经延边专员公署林春秋和朱德海的提议开始创建,朱德海还担任了第二任校长(关于第一任校长和第二任校长的详细内

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另行讲述)。《中国朝鲜民族教育史料集》第2卷中收录了有关延边大学创建经过的原始资料，延边大学创立经过报告书、创立宣言、筹委会等一切史料，收录得十分齐全。其中创立经过中有以下段落，是当时最为如实反映的原始记录：

“……于是，因当今社会的需要及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及林（春秋）专员、朱（德海）政委两位首长的竭诚努力和全东北人民的声援，在东北朝鲜人民的热烈欢呼声中得以创立。”

延边大学的创立宣言，也是整个延边民族教育的创立宣言。因此，延边大学可以说是延边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缩影。

“民族文化发展中，无论是第一位还是第二位，都必须是教育先行。”这是朱德海一贯的教育思想。朱德海从担任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政委的1946年开始，就在北满朝鲜人聚居地区，村村设立小学，并在牡丹江、哈尔滨等大地区建立民办中学。但是，当时正处在中国内战时期，民办学校不能正常运营。根据这样的情况，朱德海果断地把分散的民办中学集中起来，采取了建立公办学校的措施。于是，1946年末，哈尔滨朝鲜中学等五所中学合并，在朝鲜族比较集中的尚志县河东村设立了“松江省立第一朝鲜人中学”。

黑龙江省尚志市朝鲜族中学原副校长金振峰说：“朱德海同志在我们第3支队负责所做的第一件大的工作，就是最先抓了教育。我们民族在中国的辽阔土地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时，最先要做的就是抓教育。在那艰苦的情况下，最先在东北建立第一所共产党领导的公办朝鲜中学，非常不容易，而且感受颇深。”

延边大学原校长朴文一说：“朱德海书记兼延边大学校长，他代表中共吉林省委向全校宣布，延边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分为四所大学（学院），实施独立分院制。传达完以后，朱德海校长亲自把事先准备好的牌子分别给各个学院挂上。历史证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阶段，延边大学分离为四所大学（学院），在这个地区

大学教育发展中是一件具有巨大意义的事情。”

到延边赴任以后，朱德海还抓了基础教育。延边确立和健全了从幼儿园教育到大学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为开发智能、培养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解放初期，延边的教育虽然拥有一定的基础，但是没有统一的布局，构成也不合理，而且缺乏教员，没有一所高级中学，资金也极其困难。尽管如此，不能退缩。

朱德海召开了州委专门会议，指示建立高级中学。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终于创建了延边高中。该学校就是今天的“延边第一高级中学”。1952年，创建了“延边第二高级中学”。这样一来，延边朝鲜族和汉族教育的构成比例相当，从而得以平行发展。

1952年2月，延边地区普及了朝鲜族小学教育。1958年，延边地区普及了朝鲜族初中教育，成为全国教育最发达地区之一。到了1965年，小学校 and 初中分别增加到1274所和276所。延边成为全国最早没有文盲的地区。

半个多世纪以来，延边大学和延边的中小学校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迎来了“教育太平盛世”。朱德海打下的民族教育基础，在岁月的长河中经历了不断的改革和发展。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等教育设施链环越发牢固，并以互动的效果形成了健全的教育体系。

## 朱德海与农业

新中国的农业历史经历了土地改革，以及解放后的初级社、高级社、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的洗礼，使得农业各个领域依然处于落后状态或保持原地踏步。

在这样人为的恶劣条件下，延边的农业同样因“极左”倾向

的影响而受阻。农业发展不是靠空喊口号就能达到目的的。农业本身有科学的发展模式，首先最为必要的条件是起基础作用的硬件设施。延边的各项农业设施几乎是空白，城乡之间的差异十分严重，农业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大跃进留下了特大灾祸。

面对每亩产量不足 100 公斤的延边农业现实，到底该从何处入手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时期，朱德海从实际出发，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在第一线指挥农业生产。朱德海要求干部们不要光坐在办公室里说大话，要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制定符合当地实情的具体对策。朱德海认为，要在延边农业的现实中发展农业，首先需要建设农业基础硬件设施，尤其从水利方面入手是关键，而且还需要解决农村的动力问题。

曾经担任朱德海秘书的孙仲仕回忆说：“众所周知，朱德海书记重点抓了农业。他去中央和省里开会回来，总是把党务工作完全委托给姚昕等副书记们，把政府工作完全委托给田仁永等副州长们，而自己利用大部分时间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在现场指导工作。一年里有近一半的时间在农村度过。”

朱德海的长女吴英彩（1949 年出生，现居住在长春）十分动情地说：“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就几乎没有和父亲在一起亲热的时候。很少有像父亲那样整天待在农村的干部。……平时很少见到父亲，有时候几个月也见不到父亲。这都已经成了习惯，要是哪一天父亲在家，反而觉得很新奇。……当时年龄尚小的我和弟弟妹妹们，对父亲在武汉五三农场时期作为一名普通场员的记忆，要远比他在延边时的记忆更深。在五三农场，父亲是一个被遗弃的平民，与在延边的时候完全不同。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父亲是一家之主。”

被称为“天下之大本”的农业，只剩下了黄牛和犁杖。延边是个平原少山地多的地方，若要建设水利设施，实现农业机械化，

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朱德海认为，对于依靠原始耕作方法发展农业生产来说，黄牛是主要的运输力和动力。

1960年11月，党中央发表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其中有一项对家畜饲养管理作了专门规定。经过大跃进时期和三年自然灾害，延边黄牛从共和国成立初期的85 000余头锐减到了15 000余头。为了改变这样的恶劣局面，从1961年起，朱德海先后组织工作人员前往延吉市依兰公社（镇）柳采大队（村）住了两个多月，对养牛管理进行了调查工作；后来又到珲春县马川子公社（镇）五二大队（村）制定了黄牛发展蓝图。

在延边的农业发展中，朱德海领导修建了龙井万亩果园、大苏果树农场，以及古洞河引水工程等大型水利设施，还圆满地完成了珲春水稻耕作、延边黄牛发展等工作。

延边的水稻生产地区主要分布在海兰江、布尔哈通河、嘎呀河、珲春河、图们江等流域。由于河水流量少，经常受到干旱的威胁。朱德海踏看了和龙县元峰平原之后，派州县联合测量组进行了测量，并于1956年10月开始了元峰堰堤工程。经过两年的工程，于1958年9月竣工。元峰水利工程完成后，接着开始了古洞河水利工程。那是在和龙县桦集岭上开凿引水隧洞，把古洞河水引入海兰江的大型水利工程。该工程于1959年9月18日竣工，使水源更加充足。后来，安图水库、和龙县亚东水库、石国水库等工程相继开工。

朱德海还尽力引进和培养农业人才。延边的“米丘林”崔昌浩、苹果专家关致升、农业干部金时龙、水稻育种专家崔竹松，还有其他育种专家柳昌银、吕根泽等，都是搭乘“朱德海号”在延边的农业海洋中奋力搏击的著名农业旗手。朱德海倾注在农民身上的关心，充满了人情味，在高唱和谐社会的今天依然是榜样和典范。

## 朱德海与民族工业

延边的工业非常落后。解放初期，除了石岘造纸厂、开山屯造纸厂，以及天宝山矿和老头沟煤矿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工业。1951年召开全国第一届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以后，延边各个小城市都成立了手工业合作社。1953年一共有33个手工业合作社，到了1956年已经发展到143个，参加合作社的人数达到手工业者总数的93.6%。其中规模较大的21个合作社并入地方国营企业，由此，基本实现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着，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圆满结束。延边工业经历了温和的过渡期。后来，延边经济建设又经历了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195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年～1962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3年～1967年），使能源、冶金、机械、化学、森林、建材、纺织、食品等工业得以全面恢复，或者得以新的亮相，显示了边远地区工业发展的可能性，摸索出民族地区工业发展的途径。

朱德海说：“我国的工业领域里有许多部门。一般的工业产品可以从内地输入，但是，民族产品需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从恢复时期到第一、第二、第三个国家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时期，延边的党政领导与工业同呼吸共命运，为延边工业建设奠定基础做出了贡献。

朱德海加快步子，动员在沈阳的“工农橡胶厂”搬迁到延边的老头沟，专门生产和供应朝鲜族穿的胶鞋，后来规模扩大，改名为延边橡胶厂。

延边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基地化，与朱德海的功劳不能分开。1962年，周总理来延边视察时，朱德海汇报说：“朝鲜族女性喜欢穿绸缎服饰，用丝绸做的衣服和绸缎被褥是朝鲜族姑娘们出嫁时

必须携带的物品。孩子们在过1周岁生日时，经常会穿七色彩缎上衣，而在延边内部无法解决。”除了汇报以外，他还请周总理帮助解决。后来经周总理批准，创建了“延边民族丝绸厂”。除此以外，还先后建立了“民族针织厂”、“民族铝厂”、“民族陶瓷厂”、“民族橡胶厂”、“民族乐器厂”等民族系列工厂。延边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民族工业体系。

朱德海根据延边的“民族特点、边疆特点、山区特点、资源多人口少的特点、面积大耕地少的特点”，以一贯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农业生产中大幅提高机械化、水利化、林业、畜牧业、科学营农等水平，在工业生产中大力发展以民族工业为中心的纸浆造纸等工业。

为此，在延边北风呼啸的山地江河上，留下了朱德海清晰的足迹，在锤声叮当作响的厂区内也留下了朱德海鲜明的身影。

## 朱德海与文化

延边的文化主要指朝鲜移民越江时带来的无形的民族习惯、民族同质性和传统性，以及民族群体生活的运营机制等，也就是文化性的表现。因此，这样的文化中必然完整无缺地融入了开垦他乡的移民们的同质性和本体性。可以通过这样的侧面来考察初期的朝鲜族农村文化传统。

朱德海十分了解当时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族）的生活现实，因此在强调传统民族文化为基础的同时，十分重视文化宣传工作。他在延安的时候，与郑律成是好朋友，他非常关心文艺创作。进驻哈尔滨以后，他创办了《战斗报》，1948年又创办了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民族事务处机关报《民主日报》。来到延边后，

他创建了符合特定地区民族特色的报纸、广播、出版等正规机构，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延边文化特色。

第3支队出身的原延边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金三镇<sup>14)</sup>指出：“第3支队刚成立时，朱德海政委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组织了部队宣传队。这也是在他心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化工作体系中的一部分。后来他在民族事务处工作时，我们部队开往前线，他留在哈尔滨。当时，他打算成立文工团，利用去沈阳的机会，从部队要来文艺人才成立了文工团。很少有像朱德海政委那样在从事政治工作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文化工作的干部。”

张万连<sup>15)</sup>回忆说：“……根据朱德海政委的指示，第3支队于1946年组织了宣传队，从下半年开始，宣传队在北满各个地区进行巡回文艺演出和宣传，受到农村地区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样的文化宣传队被称为现在的文化艺术的母体也不为过。到延边赴任以后，朱德海很快创建了延边歌舞团。共和国初创时期，延边歌舞团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的大城市和民族地区进行巡回演出，生机勃勃地展示了民族文化艺术的精髓。事实上，朝鲜族前往关内是从文化艺术团体开始的，并以此来宣传朝鲜族的存在。

朱德海特别关心和重视培养文化人才。赵得贤是著名的舞蹈家，朱德海在第3支队时，他也曾在宣传队工作过，后来又在民族事务处文工团里工作，并同朱德海一起来到延边。后来，他去朝鲜治病，因朝鲜战争爆发而失去了联系。朱德海说：“舞蹈家赵得贤与100个交响乐团也不能进行交换”，并派人前往朝鲜寻找赵

---

14) 金三镇，历任第3支队独立11师宣传队乐队班长、延边文工团音乐队班长、州委宣传部干事、州新华书店经理、州委宣传部科长、延边话剧团团长、延边艺术学院院长等职务。

15) 张万连，历任第3支队驻哈中队事务长、宣传队文艺组长、师政治部记者、呼兰师范学校副校长、五常师范学校副校长等职务。

得贤。赵得贤到延边以后，担任了延边歌舞团副团长，为延边的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57年，“延边艺术学校”创立，同样与朱德海的功劳不能分开。当时，“延边艺术学校”是全国地区一级建立的唯一的艺术学校。“延边艺术学校”每年为延边歌舞团和州内各县市，以及东北三省的艺术团体培养了大量人才。

原延边大学校长朴文一评价说：“可以说，延边成为歌舞之乡的基础和框架是由朱德海打下的。”

延边的文化艺术工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示了沿边地区文化艺术发展的无限可能性，而且还具备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平台，使得自身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表现得越来越鲜明。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朱德海打下的基础才成为可能的事情。

朱德海在延边工作的17年里，在完成政治归属的同时，还引导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建设进入了正常的轨道。事实上，这17年是延边这个特定地区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也是朱德海个人传说中最主要的时期。

朱德海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人，永远保存在延边人民的记忆之中。

### 朱德海的落魄——“文化大革命”

朱德海在民族地区规划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民族社会发展，生活得十分充实。延边广袤的天空、山河全都向他敞开了胸怀。

然而，进入特定年代以后，朱德海也没能摆脱悲惨的命运。“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阻断人性向善进化，纵容人性向善退步的特大人祸。那个时期，由于那些无耻之徒的胡作非为，搅乱了整个社会，

把中国社会推进了深渊。“文化大革命”在延边的天地间毁灭了朱德海的存在价值，否定了人性的普遍存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德海被加上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特务”、“卖国贼”、“叛徒”等各种听起来都感到稀奇古怪的罪名。直到今天，许多延边人都忘不了朱德海在延边二中操场上，被幼稚无知的红卫兵们生拉硬扯，受尽非人般折磨的悲惨情景。

对朱德海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让他深感心寒和悲哀的“革命”。在朱德海功德昭然的自治州内，他没能享受到自己在人世间的实际存在，而是沦落为在延边外围徒有虚名而实际已经结束政治生涯的人。在赵南起政委的关心下，朱德海在安图县一个小小的山间车站乘车离开延边，而后被抛弃在湖北某个集体农场的荒野里，开始了无依无靠的悲惨命运，成为难以复返的“海牙密使”般的人物。

中国的朝鲜族从越过图们江那时起，其生活本身就是一段不断适应新环境的历史，尤其在共和国成立后，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的特殊地位，给朝鲜族每个成员带来了进入具有政治保障的社会舞台的机会。为此，个人之间利害关系的矛盾主要发生在民族内部。朝鲜族的群体地位与自治州的性质相符，但是也成为了造成朝鲜族之间产生派别和猜疑的主要原因。也就是所谓的地位意识和民族局限性。朱德海就是地位意识冲突的受害者，甚至在反右斗争时期差点儿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者”。其实，从那个时期开始，朱德海的头上已经出现了背运的预兆。

迄今为止，朱德海的落魄和悲惨命运都被归咎于“四人帮”、毛远新和“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从文化角度来观察朱德海的悲惨命运，一部分也能从我们民族自身共有的局限性中找到问题。这一点同样不能予以忽视。中国的民族干部最需要引起警觉的是

所谓“地方民族主义者”的帽子。我们民族自身更不能忘记带头想给朱德海戴上这顶帽子的事实，也不能忘记即使不是出于本意也跟着高喊“打到朱德海”的事实。因此，在朱德海的落魄和背运中，我们民族应该感到痛悔。民族的发展往往需要通过这样的自我反省来实现。

朱德海生前是第八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吉林省副省长、中共延边州委第一书记兼自治州州长、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成立“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州）”后，是使全面工作走上正常轨道，打下坚实基础的最主要的功劳者之一。延边人民忘不了他为延边的所有水利设施、延边的水田、延边的苹果和苹果梨、延边的黄牛，以及延边大学、延边医院、延边体育、延边教育、延边歌舞团、帽儿山松林、延吉公园、延边的新闻出版广播事业……这些今天朝鲜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所有工作打下基石的功劳。

经过上述的几个阶段，我们见证了朱德海确立政治思想和信念的过程，同时了解到真正共产主义者性格形成的契机。在接触朱德海为人品德的同时，也接触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个地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大概过程和轮廓。通过最大的画幅领略了能够突出完美的民族干部朱德海形象的实践性契机。

朱德海是在激情年代生活得最为充实的民族领袖，尤其在人生的结局中命途多舛，更加升华了他的品格，最终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家、革命家、教育行政家及完善之人。

## 第二章 圣地延安

### 延安

这里是延安。延安到了。

延安虽然是黄河文明的发祥地，但是从直观来看并不算什么美丽的地方。

延安既不是山林葱郁的地方，也不是平原或草原。那些令人窒息般延伸的沟壑，好似陕北大地上泰然栖息的山羊的肠子。延安就位于那些沟壑纵横的黄色等高线下面。延安又是一座位于数千个无法估量始于何处终于何处的山湾之中的小城镇。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几千年以来，世世代代顽强地生活在黄土飞扬的高原上的人们，创造了高原文明中最为辉煌的黄河文明。

朱德海一行从西安到达延安的时期大约在1939年9月末。这是根据1939年3月他们从苏联（俄罗斯）莫斯科东方大学出发后到达地处西域的新疆乌鲁木齐，在招待所滞留了近半年时间而推断出来的。

对于朱德海来说，往来苏联之行是一件激动和疲劳的事情。从北满出发时，他在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无聊地听着海鸥的啼叫声，住在“卯布尔”焦急地等候赴莫斯科的消息，一等就是半年时间。这次回国同样经历了很大的曲折，在完全陌生的西域大地上冒着令人厌恶的风沙，又是滞留了6个月的时间。对他来说，往来苏联之行只在中国东北和西北就浪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朱德海一行十人终于到达延安。除了朱德海以外，还有李天富（又名方虎山）、张福、全宇<sup>1)</sup>、朱春吉、陈般洙、柳京龙、陈玉、李林、李权武<sup>2)</sup>等人。

当天晚上，他们在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准备好的窑洞里就寝。从西安来的途中，他们已经住过这样的窑洞，因此对陕北的窑洞也不感到陌生。在八路军总部的接待站里，他们以“国际主义战士”、“朝鲜人”的身份度过了到达延安后的第一夜。

窑洞和窑洞之间的墙壁上挖了一个洞，在洞里放上一盏油灯后能同时照亮两个窑洞。像这样分为两间的窑洞中央，还设有一条坑道般的通道。当时，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居住的窑洞，也是这样的构造。尽管他们一行已经走了整整一天，依然不觉得困倦，毫无睡意。

他们一行人梦幻般地告别了寒冷的冬天和春寒料峭的三月，经由莫斯科、阿拉木图、伊犁、新疆、兰州、西安办事处，最后步行到达目的地延安。他们不仅松了一口气，而且沉浸在梦一般的兴奋之中。

从中国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大学”的时候，根据中

---

1) 全宇，1936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39年在延安参加八路军，在朝鲜革命军政大学学习。朝鲜战争时期任朝鲜人民军12师师长。

2) 李权武，1936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39年在延安参加八路军，在朝鲜革命军政大学学习，回到朝鲜后任朝鲜人民军4师师长，少将。

国共产党的指示，学员们都对自己的身份予以保密，杜绝一切不利于革命事业的行为。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在三年学习生活中结下的深厚友情。朱德海与方虎山、全宇、李权武等同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朱德海说话缓慢、性格忠厚、为人宽容，获得了同学们的绝对信任。紧挨着朱德海睡觉的是方虎山，虽然都不言语，但是都眺望着在窑洞拱形天棚上晃动的油灯的光芒，静静地倾听着陕北夜空下延安简陋的住处发出的各种声音。

“这里离我们满洲有多远呢？”出生在咸镜北道的方虎山使用的口音与朱德海一样，都是比较粗犷的咸北口音。

“怎么？想家了？”朱德海比方虎山年长两岁。他知道方虎山其实是明知故问。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时候，方虎山在军事科目的学习中，成绩一直十分优秀。从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那天起，他就在边区绘制的地图上用比例尺计算过延安到北满的距离。

“晚上听协理员的介绍说，朝鲜义勇军就在太行山一带。太行山离这里有多远呢？明天到总部去还得查一下地图。”

“刚到延安就听到了好消息，太让人高兴了……听说为《延安颂》和《八路军进行曲》作曲而轰动整个延安和八路军的人就在这里。他还是个朝鲜人呢。”

当时，他们还不认识《八路军进行曲》的作曲家郑律成<sup>3)</sup>。

“我也听说了。原以为我们是最先来延安的，没想到许多朝鲜人早就来了……太了不起了。”

---

3) 郑律成，1918年出生于韩国全罗南道光州。1933年在南京和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上海专门研究声乐。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为《延安颂》、《延水谣》、《八路军进行曲》（后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等歌曲作曲。光复后前往朝鲜，先后担任朝鲜黄海道党委宣传部长、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创立了朝鲜人民军协奏团。1951年被中国召回，先后在北京艺术剧场、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任专业作曲家。一生创作了360余首歌曲，1976年12月7日逝世。

“是了不起。光是到这里来就……等有时间的话，咱们一定要去找找看。”朱德海回答得慢条斯理。

他们停留在西安办事处的时候，听说了华北青年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消息，感到十分兴奋。但是，听说朝鲜人已经来到延安，只是感到惊异而已。外面传来风吹过的呼呼声。在家乡的时候，出门就是山，山上和山脚下茂密的树林迎风而立，唰唰唰地与风强烈抗争。风在这里却没有受到任何抵抗，松松垮垮地就吹过去了。

“我们从莫斯科来到延安，那么，朝鲜义勇队（军）是不是在什么时候也会到延安来呢？”

“这很有可能。”朱德海的回答声音很轻，含糊不清。

其实，红军出身的杨林<sup>4)</sup>和武亭已率先到达延安。后来还有唯一参加“西安事变”的朝鲜人、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敌工训练班主任的徐辉<sup>5)</sup>、抗日军政大学教员崔昌益、在抗日军政大学医务室协助工作的许贞淑。当时，许贞淑是抗大学生，因身体瘦弱，暂时在医务室协助工作。另外还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音乐教员的郑律成、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陈光华（太行山五月大扫荡时牺牲）。除此以外，还有抗日军政大学第5期2大队第8连学员李庾民、李宏炎、金雄（王子仁）、许今山、韩×、洪仁、宋云山、李哲忠、金兰英、张京莲，以及抗大1大队第7连学员申亿（韩清）等17

4) 杨林，1898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原名金勋。1931年“9·18”事变后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翌年赴上海，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补充师师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任中央军委直属红色干部团参谋长，在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的亲自指挥下保卫党中央和军委机关。1936年2月任15军75师参谋长，随中央军委东进，强渡黄河，掩护党中央领导机关和15军渡河，在东进途中的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5) 徐辉，又名李辉，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参加了“西安事变”，时任张学良司令部警卫营第1连指导员，亲自率领连队参加了袭击蒋介石教导团军营的战斗。1937年1月接受组织的秘密指示离开西安，到达延安以南运城的彭德怀部队。七七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随即在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工作，后任延安西北青年第1届救国代表大会执行委员、抗大敌工训练班主任。

人在延安。（《追随革命真理走上长征路》韩清）

不过，当时刚到延安的朱德海一行并不了解这些情况。

朱德海和方虎山两人暂时谁也没有说话，只是躺在那里翻来覆去。陕北高原干燥的秋夜，没有一点湿气，显得那么清朗，栖息其中的各种昆虫发出令人心烦的啾唧声。延安的第一个夜晚漫长得有些不通人情。

“想什么呢？想满洲家乡了？”方虎山低声问道。

“家乡怎么能忘呢？我在回忆咱们从苏联到延安的行程。”朱德海转过身来回答。

“尽管吃了不少苦，回想起来还像是做梦一样。”

“是啊，做梦也做了个好梦啊。”

“咱们明天去一趟宝塔山，再到党中央所在的王家坪去看看好吗？”看来方虎山丝毫没有睡意。

“好的。”朱德海的睡意也消失得一干二净。

在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卯布尔”住了半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大学”学习了两年，回国后在西域新疆又是半年……接着，经由兰州、西安，到达延安。回首这一历程，也可以说是一场绕地球转了半圈的伟大远征。延安既是远征的终点，也是朝鲜革命家们的政治归宿。

1939年3月，朱德海一行开始回国。他们本应该在大学里学习四年，但是1938年东方大学停办，所以才勉强学习两年，最终踏上归国之路。他们一行在莫斯科车站坐火车到达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然后转乘汽车越过中苏边境，进入新疆境内。

1937年到1941年，在新疆境内有两条国际交通线。南方交通线从喀什经过吐鲁番、哈密地区，通往兰州；北方交通线又分为两条，一条通过霍尔果斯，另一条通过巴克图，而且都经过哈萨克斯坦在新疆的乌苏地区汇合，然后经由迪化（乌鲁木齐），通往

吐鲁番、哈密地区。南北交通线都在吐鲁番汇合后通往哈密。

尽管是风沙弥漫的西域地区，但毕竟进入了中国境内，朱德海一行十分激动。在这里看不到日本军队，见到的只有中国军队。但是，那只是暂时的激动。朱德海一行到达乌鲁木齐以后，才发现通往内地的路已经被阻断。他们接到了行动保密的指示。虽然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但是，当地的国民党军队依然严密监视着从苏联回国的中国共产党工作人员。他们被护送到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管辖的特别招待所，在那里等候飞往兰州的俄罗斯飞机。谁知这一等就是半年时间，整天闷坐在招待所里打发无聊的日子。在新疆的生活，唯有在焦躁岁月里的焦急等待而已。他们在招待所里度过了春天和夏天，直到9月份才坐上飞往兰州的飞机前往西安。（《朱德海的故事》）

1939年是中国不确定的一年。当时，日本已经在东亚把朝鲜和台湾作为殖民地，同时入侵中国东北，建立了傀儡政府满洲国。虽然国际联盟打算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但是，日本与国际联盟断绝了关系。在与国际联盟断绝关系的同时，日本与英国、法国等既有列强们产生了正式的矛盾，于是发动了中日战争，并与德国、意大利缔结反共协定，从而加入了轴心国。日本的陆军省野心勃勃，极力主张北进，先后在珲春一带的张鼓峰和蒙古边境与苏联军队发生了试探性的武装冲突。可是，在这两个战场上都以失败告终。

在朱德海一行离开西安前往延安的9月份，日苏两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 宝塔山

第二天，延河边响起雄壮的起床号声，迎来了新的一天。这

是八路军的延安迎来的新的一天。在嘹亮的号声中，延安的清晨格外地秋高气爽。战争年代的延安是个真正的总司令部，呈现出一派军事化的紧张节奏。

朱德海一行接到通知，让他们休息几天，等候组织的工作安排。早晨吃完高粱米饭和用韭菜做的汤，朱德海和方虎山请了假，沿着延河边朝宝塔山走去。从现在起，他们要用心去了解延安的一切。

朱德海和方虎山走出桥沟（延安城里的地名），刚走上马车道，就听见身后传来呼唤声：“你们去哪儿？咱们一起去。”

全宇、李权武、张福等人挥着手跑过来。听说朱德海和方虎山要去宝塔山，他们齐声叫好。因为有山挡着，在桥沟看不见宝塔山，但是，距离并不算太远。

“早看出你们俩整天待在一起……难道说这么好的地方，你俩就打算自己去吗？”全宇似乎有些不高兴。

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时期，全宇就像个军事干部那样性情豁达。

“我们真的这样打算了吗？”朱德海和方虎山对视了一眼，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作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有着特殊的同质性，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他们在战场上，在不同的国度，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相逢和离别。他们一起回忆着东方劳动大学期间和延安期间的往事，诉说着难舍的依恋，使友情不断加深。

朱德海和方虎山的友情，更是成了后人们的榜样。原地委（州委）书记处书记金文宝曾经是朱德海的秘书，十分了解朱德海的为人。其长子、原延边电视台台长金熙宽对笔者说：“共和国创立那年3月，朱德海书记来到延边，连一辆好一点的专用车也没有。当时的地委书记、延边专员公署专员，相当于现在的州委书记、州长。但是，当时还是战争时期，衣食住行的条件很差……因此，

朱德海书记没有配备专用车。1950年下半年，总算有了一辆美式吉普车。不过，那不是组织上给他配备的，是当时朝鲜战争中任朝鲜人民军第6师师长的方虎山将军委派自己的部下，将在战场上缴获的美式吉普车直接开过图们江大桥送来的。这件事情保密了很长时间，只有作为朱德海秘书的我父亲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从把朝鲜战场上缴获的吉普车送到延边来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朱德海书记与方虎山将军的友情有多么深厚。”

除此以外，他们之间还有很多交往，为了便于叙述，推延至以下章节。

时令已是9月末，秋天萧条的阳光软塌塌地跌落下来，是陕北高原上典型的凉爽天气。空气中没有丝毫水分，干燥得划一根火柴就会立即冒出火苗。延河在两座山坡之间流淌。在朱德海一行的眼里，山坡上挖的窑洞看上去如同城市里的楼房。

相比山坡上的窑洞来说，位于延河岸边的平房和老式建筑物已经被日军的飞机炸毁，成了一片废墟。文正一在回忆录《激情岁月》中提到第一次到延安时，延安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已经成了一堆灰烬。

抗日战争前，延安只不过是个拥有几千人口的小镇。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后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时，也只有约一万左右人口。然而，延安不仅是中国，还是世界瞩目的抗日战争堡垒，革命的中心。在这一带集结着数千数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无数热血青年为了投身革命，每天都从全国各地络绎不绝地投奔此地。

在这个时期来过延安的一个外国人作了如下记述，由于是客观真实的叙述，故引用于此：

“据资料来看，共产党（延安）军队从一开始，其规模就相对弱小，武器装备也十分破旧。但是，军队体系却是正常运行，军人

的训练也处于良好状态……他们在实际战场上通过身体接触来熟悉战斗技术，提高对战略的认识。首先，1934年10月开始了从中国南方到延安的大长征。……另外，通过几年来与日军的战斗，为了生存度过了漫长的痛苦时期。凭借这样的经验，共产党最大程度发挥了自身的长处，明白了能够弥补弱点的战斗方式。他们的战斗技术相当出色，大大压倒了日军。他们充分利用灵活机动的小规模游击队，只有自身在数量上确实占有优势时才发起进攻。如果敌人的规模增大或战斗力增强，就像烟雾似地消失。”外国人的这番评价强调了真实。其实，这样的战略出自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朝鲜战争时期经常被运用的战略战术。

“看见了吗？那些正在挖窑洞的人，真是了不起。”朱德海环顾那些排列得像是在山腰间围绕起一条带子一样的窑洞，感叹万分。

“我从昨天见到这些窝棚……不，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应该叫窑洞。我看到挖在如此险峻的山坡上的窑洞时，真切而具体地认识到了什么是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什么是黄河文明的发祥地……”

“是啊，这就是他们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传统居住文化习惯。”走在最前面的朱德海回过头来对众人说。

“看见了没有？这里与我们过去生活的东北完全不一样，气候干燥，雨量稀少，土地硬得都像石块，而且哪里也没有一块能够盖房形成村落的平地。即使有平地，也没有木材，盖房是很吃力的……因此，只好利用自然形成的硬地来盖房，创造了山坡窑洞的居住文化。”

他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政治、军事知识的同时，不知不觉间了解了许多生活知识。另外，朱德海更是有了渊博的农村知识。

他们一行昨天刚到延安，对一切都觉得十分新奇。

公元607年，隋朝在这里设立延安郡，延安因此而得名。这里是丘陵地带，逶迤蜿蜒无数相差无几的等高线。这里也是在山腰间和丘陵上挖洞而居的地方。因此，生活用水只能靠双肩和扁担来搬运。居住条件虽然恶劣，但是在文化上却具有陕北土地的特色。

“我很怀疑在那么高的地方挖的窑洞怎么把水挑上去呢？”

“说得对，挑水是最最吃力的活儿。快看，那边不正有人挑着水往上走吗？原来就是这样把水挑上去的。”

“啊呀，空身走这么陡的上坡路已经够吃力的了，还要挑着水……大概要想活下去就会产生一定的习惯。否则的话，怎么活下去呢？”

“瞧你们，真是愣小子生怕老婆后背受凉——瞎操心。呵呵，咱们原先生活在东北，所以会觉得惊讶。可是，这里的人子子孙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已经领悟到，命运注定他们只能这样生活。”

听了朱德海这番话，其他人都点头表示赞同。

然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共和国成立后，那些历史学家会把延安的窑洞与中国革命的胜利理所当然地联系起来。他们也不知道陕北人在黄河岸边，把沾满泥垢的毛巾扎在头上，把红色腰鼓绑在腰间使劲击打，以战马般剧烈的动作，扬起黄色尘土跳的秧歌舞，以及回荡在丘陵地带的清亮的陕北民歌，原来是带来黄河文明的近代文化产物。

位于黄河岸边的延安，从夏朝开始，经历了战国时期和元、明、清等朝代，巩固了作为文化中心的位置，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与附近的轩辕黄帝陵、黄河壶口瀑布、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等有着地理和空间的关联。延安是国务院指定的第一届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延河和南川河在此汇合，城市周围被宝塔山、凤凰山、清

凉山等环绕，自古以来就是陕北的战略要塞。

“西安事变”以后，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原由东北军驻守的延安，交由中国共产党接管。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搬迁到延安。从那以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和总后方基地，也是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进京之前中国革命最高首脑机关的所在地。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革命的红色史册上记载的八路军、杨家岭、王家坪、枣园、“瓦窑堡会议”、“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新华书店、南泥湾和大生产运动、宝塔山、清凉山、窑洞、罗家坪等，都是与延安不能分离的历史性地名、事件和景观。特别是罗家坪，更是朝鲜民族的战斗遗址……

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健步如飞，大约走了半个钟头后，已经能看见高耸在嘉岭山上的宝塔。那就是昨天来的时候见到的宝塔。宝塔所在的嘉岭山比较陡峭，但不是很高。他们一行人一口气登上了嘉岭山。

“上山前在山底下看宝塔以为很小，没想到会有这么大。”他们来到宝塔底下，围着宝塔转了一圈，个个露出惊异的表情。

“本来在山下或远处看任何东西，都会觉得很小，高山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山上怎么建有如此雄壮的宝塔呢？”

朱德海一行围着宝塔看了又看，各自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这座宝塔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建筑，几经损毁，现在所看到的宝塔是在明朝时期复原的。这是一座高达44公尺的八角形宝塔，一共九层。由于是用砖砌成的楼阁模样，因此可以沿着塔内的木梯拾级而上。他们一行人开始登塔。在塔顶上眺望的延安全景，与在山下看到的有天壤之别。在经过清凉山上的解放军报、新华社通讯社，通往王家坪和杨家岭的公路上，身穿灰色军装的八路军

队伍高唱着革命歌曲来来往往。宝塔山东北面的山上建有烽火台，但是他们并不了解烽火台起什么作用。

“只有在这里才能看清延安的全貌……”

在朱德海的性格发展中，延安这个特定地区是使他人品得以提高，从而成为革命家、国际主义战士的特殊学校。

从那时起 72 年以后，笔者登上宝塔山，试图寻找与当年朱德海一行共同的感受。尽管笔者也可以想象出类似“他们亲眼目睹了延安的一切，心中充满了激动。朱德海俯视着宝塔山下的延河和南川河，更加坚定了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必胜的信念”那样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感受，但是再一想，这些感受太像是空虚的创作。还不如写他们思念家中的妻儿，口中唱着思乡曲，似乎更加接近感情和生活的真实化。不过，这样的念头最后也打消了。笔者突然产生了资历欠缺的惭愧感，与其寻找共有的感受，还不如弄清楚他们当时所在的延安的形势，这才是第一位的。

尽管笔者乘坐的是相当于音速的现代化飞机，但前往延安依然花费了两天时间。而在当时连汽车也不太多的情况下，朱德海一行是怎么一步步走到陕北高原的呢？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

延安虽然是地级城市，但是地处极其狭窄的峡谷，因此比其他城市更加具有提高空间使用率意识，高层建筑特别多。总体上来说，延安的地理形状如同英文字母 Y 形，延河和南川河沿着 Y 的两侧流淌，在中心部位汇合后继续向东流淌。沿着延河和南川河狭窄的河岸，盖满了密密麻麻的房屋。现在，Y 的下面有火车站和汽车站。顺着南川河来到延河和南川河汇合的中心部位附近，右面就是宝塔山。

经过两条河流汇合的中心，沿着 Y 右侧走二三里路，再右转后越过延河，就来到罗家坪“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遗址。离开遗址再往上走二十几分钟，左侧是桥沟，其后面是延安鲁迅艺术

学院。从那里继续往下走，就能到达机场。延河和南川河的汇合处是延安的中心地。从那里沿着Y左侧走，能到达有着新华社、新华书店、解放军报等遗址的清凉山。过了清凉山，就来到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中央所在地革命遗址。中国没有第二个地方像延安这样集中了如此多的红色遗址。如果说这是现在的延安，那么，过去的延安又是什么样子呢？

总之，对朱德海一行来说，肯定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延安。在莫斯科期间让他们朝思暮想的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和指挥部，没想到其硬环境竟会如此低调，作为集中国革命的全部于一身的地方，实在是太过狭小和偏僻了。这里真的是延安吗？

然而，延安是与狭小的地形地物毫无关系的某种信念和胜利的象征。

文正一<sup>6)</sup>在《激情岁月——文正一生平传记》中是这样描写延安的：“……革命圣地延安周边被山环抱，在狭窄的平原上流淌着延河。延安原是一座县城，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成了一片废墟。我们八路军住在两侧山坡上搭建的窝棚里。到了晚上，山坡上的窝棚里亮起灯火，仿佛是海边的别墅区……”

朱德海一行在嘉岭山上瞻仰宝塔的同时，开始了他们的延安生活。

不久以后，朱德海第一次见到了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担任音乐教员的作曲家郑律成。他们的交往一直延续到朱德海担任延边

---

6) 文正一，原名李云龙，1914年出生于吉林省珲春县。1937年以朝鲜民族革命党党员的身份进入国民党中央军校，在特训班第6期步兵科学习。1941年在八路军太行山前线总部工作，并兼任朝鲜独立同盟秘书处处长。1943年任朝鲜独立同盟西北分盟主任、晋绥边区政府参事。1945年后，先后担任朝鲜义勇军延边地区办事处主任、中国共产党延吉县委副书记、延吉县县长、延边地区副专员、专员等职务。1950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1953年后，先后任国家民委财经司副司长、中央纪检委委员兼国家民委纪检组组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2003年逝世。

党政首长的时期。朱德海十分尊重郑律成作为音乐家的音乐感受和炽热的艺术热情。郑律成则非常尊重朱德海宽容的品德和优秀的组织能力，以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王震上将曾为郑律成生平传记《作曲家郑律成》写了题为“怀念郑律成同志”的文章作为序文。其中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王震率部队进入南泥湾前，接到了毛泽东的传唤。他是毛泽东最为爱惜的军人之一。

“鲁迅艺术学院有一名叫郑律成的年轻有为的作曲家。他是从朝鲜来的。你认识他吗？”

“我没有直接见过，但听说过他的名字。”

听了王震的回答后，毛泽东建议道：

“那你与他见一次面，让他与新来的朝鲜同志们交谈一下怎么样？”

后来，王震依照毛泽东的指示与郑律成见了面，并与从苏联来到延安后分配到359旅作战部队的朝鲜人革命家们（朱德海等一行）见面，进行了交谈。见面以后，王震还领着郑律成到朱德总司令的家里吃饭。

这个故事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对《延安颂》和《八路军进行曲》的作曲家寄予了多么大的信任。这也表明了郑律成在当时的延安有多么高的威信。在毛泽东和王震将军的安排下，朱德海与郑律成见了面，并从此结下深厚的友情。除此以外，朱德海在那个时候还见到了抗日军政大学第5期学员尹功钦、金英淑、卢敏、徐辉、金雄<sup>7)</sup>、李相朝（金泽明）等朝鲜革命家。5月入学的这30余

7) 金雄，又名王信虎、王子仁，1912年出生于庆尚北道金川。1934年2月分别在洛阳军官学校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到延安后参加八路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任南满第1支队支队长。1946年返回朝鲜，任保安干部学校副校长、劳动党中央委员。1950年6月任第1团长（中将）参加朝鲜战争，翌年任民族保卫省副相。1968年任亚非团结委员会委员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委员长；

名朝鲜学员组成了一个排，刚毕业就按照义勇队（军）总部的指示前往河南、太行山一带。朱德海在这个时候认识了李相朝。不过，他当时根本没想到，光复后在北满任第3支队政委时，会与时任支队长的李相朝共同领导第3支队。

对于革命气节高尚的人来说，总会有路相通。尽管分成一条条岔路，最终还会达到同一个归宿。延安就是怀有远大抱负和高尚气节的朝鲜青年们必然的集结地。

从这个时期起，朱德海担任了“朝鲜独立同盟延安分盟”的主任。

## 参加八路军

抗日军政大学的全称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1936年6月1日创建于陕北瓦窑堡。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迁至延安后，抗大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最高学府。1939年7月，学校总部转移至华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重新返回陕北，1945年10月搬迁至东北，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抗大自创建以来，曾在晋察冀、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建立了13个分校及6个附中，培养了20余万名抗日军政干部。

朱德海是在到达延安的第二年（1940年）进入该校学习的。当时，学校总部已经迁走，只有第3分校还留在原处。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属的东北工作委员会，组织从莫斯科回国的少数民族学员进行了任职前的培训，并根据出身地和民族进行编班。朱德海

---

1973年任驻南也门大使。

被编入延安抗大干训队东北干训班。东北干训班里有朱德海、方虎山、金昌德（李德山）、李权武、张福、朱春吉（光复后返回朝鲜，上个世纪50年代出任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陈玉（抗战时期在北京西郊逝世）、全宇等学员。来自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员们又聚集在一起。东北出身的张松担任干训班的政治指导员，李延录（建国后，历任黑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为干训班班长。东北干训班的大部分学员都是东北出身。其中的李德山后来与朱德海一起到哈尔滨工作，担任第3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该干训班的目标是培养派往东北的干部，其形式为短期训练班，一般被称为抗大6期班。可是，他们没能前往东北。也许是因为战争时期，人事任命和军事命令往往是朝令夕改，存在着很大的可变性。经常是早晨下达的命令，到了晚上就会发生变更。1945年光复后，原先代替罗荣桓被派往山东的林彪一行，还没等到达目的地，中途接到中央的命令，重新返回东北。这是最为典型的人事任命变更事例。

当时，东北的关东军增强了兵力，是讨伐最为厉害的时期。东北抗联大部分撤退到了苏联，正在酝酿组建新的部队（88国际联团），准备踏上新的征程。当时，国际上连续爆发重大事件。同年4月9日，德国占领了丹麦，向挪威发起侵略，并开始对法国全域发起攻击（也称为黄色作战），先后侵占了卢森堡、荷兰、比利时、挪威、法国等国家。德国还与意大利、日本缔结为轴心国，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日本缔结为轴心国，对中国来说是巨大的军事压力。

在这样的形势下，干训班的学员们很难再被派往东北，于是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延安地区的各个军事作战部队。朱德海和方虎山、全宇、朱春吉、陈玉等人，各自下到八路军作战部队，参加对日战斗。

这个时期，国民党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融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建立了“反共委员会”，并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加强了“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的活动，镇压共产党和进步组织，拘禁和逮捕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同年11月，国民党又召开了五届六中全会，制定了“以军事制约共产党为主，政治为辅”的方针，并以延安为中心，对陕甘宁边区，包括陕西省北部、甘肃省东部和一部分热河省的三省结合地带的中共政权发起进攻。

朱德海被分配到八路军第359旅第718团担任特务连指导员。特务连包括通讯排、警卫排、侦察排。后来，朱德海的工作岗位曾经发生变动，被调任第8团供给处处长。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任359旅旅长的王震上将，在长春南湖宾馆接见朱德海的夫人金英顺及子女时说：“朱德海同志是党中央高度信任的少数民族干部，早在延安时期就身负重任，工作非常出色。359旅特务连其实就是中央警卫连，作为朝鲜人(族)干部，特别是警卫连指导员，在国共内战时期负责中央保卫工作，充分说明了党对朱德海同志的信任。”

延安时期，359旅虽然是八路军120师属下的一支军事作战部队，但更是在中国革命最艰苦时期大生产的象征性代表。由陈伯钧旅长、王震副旅长率领的717团和718团，共有5000余人。1937年9月，该旅兵分两路投入战斗。718团和旅部直属营的一部分留在陕甘宁边区，后来归属于八路军留守兵团编制。王震率领的717团和旅部直属营的一部分共2000余人，保持了359旅的番号，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后来，部队扩充，建立了根据地，并参加了太原作战。同年10月，王震担任旅长兼政委。第二年，部队恢复了718团和719团编制，人员扩充到12000余名。朱德海一行到达延安之前的1939年5月，359旅从晋察冀边区转移到陕甘宁边区，

接受了从宋家川到葭县（今佳县）之间的黄河河防任务，旅部同时还兼绥德警备司令部。1941年3月，部队进驻南泥湾（摘自《中国共产党90年风云史》），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开展大生产运动。关于进驻南泥湾的时间，各种说法存在着一些差异。有的资料上说是1940年末，有的资料上称是1941年初。为此，特以位于南泥湾的“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展出的图片资料和统计资料为准。

过去把军队从事生产称之为屯田。不过，中共中央为了对抗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的经济封锁战术而采取的屯田策略是极其悲壮的。朱德最先提出了军队应该进行生产运动的“屯田军垦”，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从而拉开了大生产的序幕。从开垦南泥湾的第二年起，359旅连续三年向边区政府缴纳了一万石公粮，先后创办了纺织、造纸、皮革等13个工厂。另外，还探索了盐业、土产业、运输业、饭店、军人合作社等多层次的经济发展模式，被命名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红旗。

在359旅进驻南泥湾的同时，朱德海所属的第718团也进驻了金盆湾。他们原先驻军在米脂县，当胡宗南部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第1次进攻时，转移到绥德地区，而这次则把步枪换成镐头，参加了大生产运动。359旅在南泥湾开垦的26万亩耕地中，也有朱德海所属的第718团的一份功劳。朱德海任指导员的特务连作为警卫连，本应在延安执行特殊任务。但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全都带头投入大生产运动，因此在这样的特殊时期，特务连也必须到金盆湾去带头参加大生产运动。

金盆湾是延安地区无数个湾中的一个小小的湾，也是属于南泥湾的一个小湾。从南泥湾经过池坊、马坊、金庄等小的自然行政村，就到了金盆湾，距离南泥湾几十里。金盆湾位于延安通往黄河壶口瀑布的路口，现在是南泥湾管辖的14个行政村中的一个，尽管已经没有原先的村名，但是老人们至今依然称之为金盆湾。

南泥湾作为广义的形象，不分村落，是一个代表其周边的名称。也就是说，以南泥湾为中心，象征了那一带大生产运动的全部村落。当时，毛泽东发出了为后人们所熟知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其本人也穿着打有补丁的裤子，过着简朴的生活。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也谈到了“边区老百姓中间爆发了不满，为什么雷公不把毛泽东抓走？分析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粮食征购过重。为此而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由此可见，大生产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挽起袖子，亲自种菜、织布。在杨家岭窑洞下方的山沟里，毛泽东还象征性地开荒种地，并在地里种了菜，一有时间就去浇水、拔草，颇下了一番工夫。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在中央直属机关的纺线大会上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

1941年，朱德海率领特务连，在金盆湾的山坡上挖窑洞，并在像弓背那样弯着向山坡下延伸的山谷里开垦荒地，栽种高粱和小米。虽然在黄土地上产量比较低，但万幸的是谷物无病无灾地安然成长。另外，还饲养了猪、牛、羊等牲畜，在自力更生解决衣食住的同时缴纳公粮。

就在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下艰苦奋斗的时候，1941年6月22日上午4点45分，苏德战争爆发。包括意大利、罗马尼亚及其他同盟国士兵在内的300万名德国军队，越过国境线进攻苏联。没过多久，延安《解放军报》就报道了这一消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指挥中心的苏联，被卷入战争的硝烟。

朱德海听到这一不幸消息后，对意外卷入战争的莫斯科十分担心。朱德海与方虎山、李权武互相传递着消息，非常担忧苏联的战事。作为曾经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大学”的学员，他们各自表示了出自内心的声援。金学铁老先生的《太行山录》中有一篇题为“友情”的文章，记录了当时太行山上一名义勇队员

的心声：

“……我们进入太行山根据地还不到两个月，就听到了晴天霹雳般的惊人消息。即希特勒发动了德苏战争。黄吉成（主人公的名字）的心里开始沸腾起来。他为自己不能去德苏战争第一线参战而深感难过，脸上明显地露出了对苏联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法西斯强盗的无比憎恶……”这不仅是一个名叫黄吉成的义勇队员的自画像，也是当时留在延安和太行山地区的全体朝鲜义勇队员的集体肖像画，也是朱德海的肖像画。

国内外形势发生着严峻的变化，但是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气势反而日益冲天。歌曲《南泥湾》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南泥湾》有着陕北民谣特有的柔情和豪放的节奏，至今依然唱遍神州大地，显示出歌曲旺盛的生命力。1943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学生们到359旅驻扎的南泥湾进行慰问演出，以秧歌舞插曲的形式演唱了《南泥湾》，立即传遍了陕北的各个角落。事实也是如此。凡是延安出身的人没有不会唱《南泥湾》的。朱德海就非常喜欢唱这首歌。

大生产运动的成果是，陕甘宁边区每年所需的3900万公斤粮谷中，有1500万公斤是自己生产的，而经费则全部由自己解决。

## 重返延安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者在延安的分布情况，形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时，为了加强与国际上统一战线的联系，决定设立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这与第三共产国际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这不是朱德海指导员吗？真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

“你还是老样子。”

“呵呵，一点没错。看来从苏联东方大学那时起，咱们就命中注定将睡在同一条炕上。”

1942年初，朱德海与方虎山、李德山、李权武等下到作战部队，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的同学们，重新相聚在王家坪。另外，张福、陈般洙等人也调回来了。他们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高兴得打闹起来。延安这个地方是同类人的向心点，尤其对人数较少的朝鲜人来说，更是具有特别强烈的共同体意识。

朱德海他们接到了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下达的“海外研究班”入学通知，先后返回延安。朱德海离开金盆湾，经过南泥湾，回到延安。海外研究班设在王家坪。经过位于清凉山的新华社、解放军报驻地，再往西北方向走不多远就是王家坪。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司令部就坐落在王家坪北面的山脚下。

武汉保卫战和后来的“五月扫荡”中，有石亭<sup>8)</sup>、陈光华<sup>9)</sup>、张文海、林平等11名优秀的朝鲜军人光荣牺牲。八路军司令部发扬鲜明的国际主义精神，依照党中央的指示，为了保证朝鲜革命的胜利和保存朝鲜革命的有生力量，把朝鲜义勇军排除在实战之外，代之以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学习，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八路军司令部非常清楚，保障朝鲜义勇军的生命安全与朝鲜革命的胜利有着密切的关联。

抗日战争时期，朝鲜义勇军从各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政府和八路军那里得到武器、粮食、军服、经费等供给而进行抗日活动。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制定并宣布了对到抗日根据地来的朝鲜人的优

8) 有石亭，出生于韩国庆尚道，暗杀日本军政要员的计划被发觉后遭到逮捕，出狱后加入朝鲜民族革命党，担任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政治教官。

9) 陈光华，出生于朝鲜平安道平壤市，中共党员，广东国立中山大学毕业。1937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在晋东南担任宣传剧团团长、北方局党校组织科长、朝鲜青年联合会晋冀鲁豫分会会长。

待条例。比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团结援助朝鲜革命人士案》、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朝鲜人优待规定》、晋西北行政公署的《朝鲜侨民协助抗日10项方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的《优待朝鲜人的规则》、晋察冀边区北安镇党委的《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决定》等。（摘自金应三《我的一生》）

“……朱德被任命为第一任主任，侨胞业务委员会和党务研究室所属的海外研究组被分配在海外工作委员会。于是，研究班自然也就所属于海外工委会。领导班子里除了朱德主任以外，其他人员还有日本共产党负责人冈野铃三、菲律宾共产党负责人任忠，以及王代载、李初黎等4人。冈野铃三和任忠还兼任研究班的指导员。研究班里一共有30余名学员，并根据学员的国籍分为几个小组。朝鲜组5人，缅甸组2人，另外还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台湾、越南、泰国及华侨等小组。朱德海与方虎山、陈般洙、李权武、张福等人属于朝鲜组。”（《朱德海的故事》）

他们重新相遇后，早夕相处在一起，除了学习之外，还参加大生产运动。朝鲜组着重研究朝鲜革命问题，研究世界革命史与朝鲜革命和独立的有机联系。到了晚上，他们以了解苏联战争形势为主。不过，在情报途径闭塞的陕北腹地，要想了解有关德苏战争的消息实在是困难。对他们来说，东方劳动大学所在的莫斯科就是他们的第二政治故乡。

“据我看，苏联战争形势似乎不怎么乐观。凡听到的都是些令人担忧的消息。”

“就连新华社和解放军报也没有太详细的报道，看来你的判断差不多。”

“纳粹德国的战斗力看来一定很强，就连那么强大的苏联也节节败退。”

“咱们只能等着瞧……不过，苏联一定会发起反攻的。”

“从德苏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看，苏联一定会赢下这场战争。”

国内通讯传达通道十分落后，国际通讯又被断绝，使得朱德海和方虎山等人无法了解德苏战争的局势，也无法了解军事对峙和趋势。不仅如此，延安接受的通讯也是极其有限的。战争爆发的几小时内，在德国空军的攻击下，苏联66个空军基地里，至少有1200余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地面上被击毁，完全丧失了制空权。在后来的1个月里，苏军损失了几十万，接连不断地败退。德军从3个方面发动进攻，就像沙漠旋风般地席卷着苏联辽阔的国土。苏联不仅丧失了大批国土，还损失了庞大的兵力。苏联在战争初期败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斯大林对军内将领们的大肃清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遭到斯拉夫人极度憎恶的希特勒扩充军备，增强兵力的时候，斯大林反而在军内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里的大规模肃清工作。特别对军部的肃清更是达到了空前的残忍。清除的将领中包括5名最高司令官中的3名、16名陆军司令员中的15名、67名军团司令官中的60名、199名师团长中的136名。斯大林在军内开展的肃清运动，最终导致苏联的军事防御体系崩溃瓦解，同时给德国造成了进攻的机会。

在这样不稳定的局势下，国际班学习了《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自己所属国家），以及实践方法论。朱德海在莫斯科已经系统地学习过《世界革命史》，并打下了能够指导实践的一定的理论基础。他们还研究了中国革命的形势与朝鲜革命的关联性，并对朝鲜共产主义者肩负的双重任务进行了实践性的思考。双重任务也可以看作是双重性，在参加并完成中国革命的同时，还必须完成朝鲜民族的解放。这也是中共中央对朝鲜义勇军提出的任务。海外班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分析自己所属国家的革命形势，并提出发展的模式。

朱德海本身是越过图们江来到中国的移民，因此对居住在延边（东满）地区的朝鲜人和生活在哈尔滨地区的北满朝鲜人，以及住在鸭绿江一带的南满朝鲜人的移民史和生活现状，有着较深的了解。他也十分了解朝鲜民族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虽然他在北满担任第3支队政委时才真正理清了关于双重性的相对性，但是，早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开始研究和实践朝鲜民族在中国生存，与其他民族共生等问题和方法。

晚上，他们在窑洞的油灯下热烈争论共产主义者的双重性问题。白天，他们利用工作和学习之余务农或纺线。在他们中间，朱德海是公认的大哥。在生活中，他们也都对朱德海言听计从。不管做什么事情，朱德海总是行动先于言语，在经济规划方面也都是提前做出安排，总之，就是组织能力很强。

“不管住在哪里，为人都应该勤快。我叔叔曾经说过，人如果聪明勤快，即使去庙里也能找到肉吃。”于是，在朱德海的提议下，他们还养了羊。朱德海想起了母亲曾经使用过的纺车，就和同伴们一起设计制造出了纺线的纺车。国际形势紧张，延安持续遭到经济封锁，但是延安的夜生活并不枯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创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接纳作家、艺术家，还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延安夜文化。夜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节目就是舞会。高层领导们率先示范，驻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也跟着频繁举办夜间舞会。每逢星期六晚上，研究班的学员也去参加舞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高层领导在舞会上热情都很高，这也进一步提高了舞会的格调。延安的夜间舞会以其正统性在建国后继续举行，而且成为因战争而错过婚姻的军队高级干部们准备与姑娘们喜结良缘的“异性交流场所”。

朱德海也在这个时期学会了跳舞。当时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因为缺盐而背着盐口袋行军打仗，足以说明生活之艰苦。然而，

延安的业余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

朱德海在海外训练班学习时期，经在鲁迅艺术学院执教的郑律成介绍，于1948年8月第一次认识了武亭<sup>10)</sup>。红军出身的武亭是朝鲜人中间与杨林一起最早来到陕北的人，与郑律成十分亲密。武亭于1937年来到延安，比朱德海早来两年。朱德海到延安以后，见到了许多朝鲜人，却始终没能见到在陕北朝鲜军人中威名远扬的最高首长武亭。朱德海到达延安的1939年，武亭作为炮兵指挥员，依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正在晋东南前线作战。虽然武亭参加了1941年10月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但是，朱德海当时正担任连队指导员，在金盆湾参加大生产运动，还是没能见面。1942年8月，党中央把武亭召回延安，派他作为朝鲜义勇军司令员前往太行山根据地。当时，武亭来到延安。那个时期，郑律成跟着武亭前往太行山，暂时与朱德海分开了。

朱德海在担任朝鲜独立同盟延安分盟主任期间，接触了许多朝鲜人，积累了一定的人脉。1943年1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题为“加强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延安分盟组织建设和教育的决定”的消息。从消息中可以大体看出，当时朱德海任主任的延安分盟的工作情况。

“本报消息：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延安分盟第3次大会日前在文化区体育会馆举行。30余名盟员参加了本次大会。会议第一天(10日)正好是分盟创建2周年的纪念日。全体盟员怀着无限兴奋和欢喜迎来了这个日子。会议一开始，根据主席团金百渊(金科奉)

---

10) 武亭，原名金武亭，1905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镜城。1919年参加“3·1”运动，1923年来到中国，1924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炮兵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任八路军总司令部作战科长和中国第一支炮兵部队八路军炮兵团团长，1942年任朝鲜义勇军总司令官。日本投降后回到朝鲜，1950年朝鲜战争时期任第2军团长(中将)和平壤防卫司令官。后来因病情恶化来中国治疗，1952年返回朝鲜后逝世。

等领导人的提议，向 30 余年来为朝鲜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的抗战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们默哀三分钟。接着，朝鲜独立同盟总会的中央委员王智延传达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及决议的基本内容。下午，分盟负责人朱德海对一年来的工作作了详细的总结报告。第二天和第三天上午，对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检讨，并讨论了今后的工作方案和团结问题。全体盟员以整风精神总结了过去的经验，以诚恳坦率的态度吸取了教训。讨论结束后，第三天下午通过了对主席团提案的决议（草案）。决议强调了加强组织生活和宣传工作，特别提出了立即进行有关朝鲜历史和革命运动的必要的政治教育。接着，大会当场选出了王外（朴日佑）等 5 名干事，并决定以大会的名义向朝鲜义勇军发去贺电。”

### 罗家坪“朝鲜革命军政学校”

为了写这部评传，笔者今年去延安期间，曾经 4 次前往罗家坪参观。从延河与南川河汇合处附近的宝塔山下，朝机场方向行走大约半个小时，再沿着往右转弯的道路朝前走，就会见到延河横亘在眼前。经过横跨在延河上的水泥桥，就到了延安市宝塔区桥头镇罗家坪村。罗家坪村村口左侧倾斜弯曲的地方，能看到一块蒙上了一层厚土、毫不起眼的小纪念碑。这块纪念碑就是立在“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旧址上的“朝鲜革命军政学校遗址纪念碑”。这块没人关注、完全被遗弃的石碑周围堆着一些石头。石堆上面散落着摆摊的小贩们随意扔掉的褪了色的包装纸盒。一幅极其凌乱不堪的风景。

纪念碑上用汉文作了这样的介绍：

“朝鲜革命军政学校 1942 年 11 月成立于华北太行山区。1944

年1月，学校机关离开太行山区，经过3个月的行军，4月7日到达延安川口村，并于9月份搬迁到此地新建的校舍。学校于12月10日竣工。1945年2月5日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等出席了开学典礼并表示祝贺。白渊（金科奉）任校长，朴一禹任副校长。学校的宗旨是培养干部和为了朝鲜民族的解放事业。学校设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学、日本问题、朝鲜问题等科目。朴一禹应邀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代表大会，并在5月21日的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演说。1945年8月下旬，学校机关离开延安，搬迁到朝鲜北部。如今，学校的遗址上还保留着四间石头垒的窑洞和一部分普通窑洞。”遗址纪念碑上还表明“1996年7月1日延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立”。

纪念碑肮脏不堪，好不容易才看出字迹来。想到这里曾经是朝鲜革命军政学校，不能不让人觉得后人们对先人们，对建立了丰功伟绩的革命家们的漠视和忘却，实在是太过怠慢和无视。而且与红色延安所拥有的地位和革命传统太不相称。也就是说，对待曾经流血牺牲的先人们实在是太过轻慢了。很难让人相信，难道这里真的是日夜思念的延安罗家坪？真的是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遗址吗？

茫然地环顾四周，更是满目荒凉，只有杂乱无章地往来于非柏油路上的各种车辆尾部扬起的黄色尘埃。笔者努力想象67年前我们的主人公们在延河岸边推着小车，挖建窑洞，唱着“阿里郎”、“锄头歌”建设军政学校的场景，然而始终无法把眼前的现实回幻成历史。

不过，想要了解“朝鲜革命军政学校”，首先需要常识性地了解一下作为军政学校主力学员的朝鲜义勇队（军）。这样才有助于对“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总体理解。

“……我们要唤起不愿做殖民地奴隶的朝鲜同胞们，团结在

朝鲜义勇队的旗帜下，联合法西斯日本侵略者压迫下的一切民众，打倒我们真正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实现东亚的永久和平。我们在光荣的中国国庆节双十节高举朝鲜义勇队的旗帜，与中国兄弟们肩并肩，以必胜的信念，勇敢地冲向抗日前线。为了完成这神圣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奋斗到最后一刻。”这是1938年10月10日，在远处传来隆隆炮声的武汉成立朝鲜义勇队时发表的创立宣言中的一部分。

朝鲜义勇队是拥有双重性质和双重任务的部队。这也说明了它的特殊性。朝鲜义勇队是拥有朝鲜人的外国人性质和在中国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战斗的国际主义性质的部队，也是为了中华民族完全解放和朝鲜独立而平行战斗的部队。这是与初期为了复辟王朝、争取独立而战斗的朝鲜独立军的差异，归根结底是政治纲领的不同。

朝鲜义勇队队长是朝鲜民族革命党总书记金元凤<sup>11)</sup>，总部设有机要组、总务组，下属2个区队。第1区队长是朴孝三<sup>12)</sup>，下属4个分队。第2区队长是李益盛（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3期，任小队长），下属3个分队。从此，朝鲜独立联盟拥有了自己的军队。义勇队结束成立活动后，立即投入了武汉保卫战。

---

11) 金元凤，金若山，1898年阴历8月13日出生，黄埔军校毕业后任国民党军官，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北伐）。后来为了培养军事人才，积极鼓励朝鲜人进入南京军官学校学习，是军事组织朝鲜义勇队组织者之一，参加抗日战争。1935年与金奎植等人一起创建朝鲜民族革命党，1946年2月回归朝鲜。朝鲜建国后，历任国家稽查省相、劳动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务。

12) 朴孝三，1903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南道，1926年1月黄埔军校第4期学员，1936年左右加入朝鲜民族革命党。以中国军队现役大校的身份任1938年10月在武汉成立的朝鲜义勇队第1支队（76人）支队长，并率领第1支队在中国第9战区与日军战斗了两年，指挥了胡家庄战斗（1941年12月）和反扫荡战斗（1942年5月）。日本投降后返回朝鲜，组织朝鲜新民党任中央委员、中央训练所所长，还担任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司令官。1955年11月任商业省粮政局局长，1969年11月任朝鲜劳动党咸兴市委秘书。

朝鲜义勇队成立后，崔昌益<sup>13)</sup>等许多朝鲜革命家纷纷来到延安。从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上半年，有30余名朝鲜学员到抗大学习。1938年第4期有画家张镇光和李明等，1939年第5期有韩青、李相朝<sup>14)</sup>、卢敏、金荣淑、金雄、徐辉、尹功钦<sup>15)</sup>、李极、李根山、李庾民、韩景、韩乐山、许金山、洪林、李铁重等人。

1943年6月10日，第三共产国际解散，其所拥有的国际互助关系随之丧失，各国共产党的联系响起了黄色警报。然而，从当年下半年起，国际形势却迎来了转折点。7月10日，美英联军登陆西西里岛。同月，苏联红军在库尔斯克战斗中取得胜利，使得强大的德军第一次丧失了东部战线的主动权。这也是德军失败的信号。8月，美英在魁北克结成了第二战线。9月，3大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向联军投降。特别令人鼓舞的是11月26日，美英中三国举行“开罗会谈”，并达成了朝鲜独立的决议。11月28日，美英苏举行德黑兰会谈，讨论了苏联的对日参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鲜独立联盟和朝鲜义勇军对这样的国际形势迅速作出了反应，决定把各地的朝鲜义勇军队员和各学校学员集结到更为安全的延安，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若

---

13) 崔昌益，1896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1957年去世。抗日义勇队出身，独立家，共产主义者。与金元凤等一起在中国进行抗日活动，后来因不满其路线，前往华北与武亭、金科奉等参加朝鲜独立同盟的活动。解放后返回朝鲜，参加了朝鲜建国。

14) 李相朝，黄埔军校时期使用胡日华的名字，在哈尔滨期间还使用过金泽明的名字。1915年出生，1996年逝世。朝鲜人民军军人，政治人，釜山东莱郡技匠出身。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3期，加入朝鲜独立同盟，进入延安抗大学习。1945年在东北哈尔滨任第3支队支队长；1946年返回朝鲜，参与创建朝鲜人民军。朝鲜战争爆发后任驻中国联络官，并以人民军中将军衔担任侦察局长、副总参谋长等职。参与了1953年的停战谈判，并给时任UN军方代表的白善焯写了一张“美国走狗还不如丧家之犬”的纸条。后来离开军界成为外交官，1955年出任驻旧苏联大使。

15) 尹功钦，日本强占时期，在中国华北地区参加金科奉、崔昌益、武亭等创建的华北朝鲜独立同盟。抗大毕业，光复后返回朝鲜，朝鲜政治人。

要达到朝鲜解放，就必须扩充军队力量，需要更多的军政干部。

朝鲜义勇军从创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培养军政干部。比如，陈光华曾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太行山上建立“华北朝鲜人民干部训练班”，后来，武亭建立了“华北朝鲜青年革命学校”（1944年3月12日，延安解放军报登载的新华社太行9日发的通讯报道中，改称为华北朝鲜革命军事学校）。这也反映出了极为重视教育伦理的民族习惯。

1941年6月为止，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开展抗日活动的绝大部分朝鲜义勇队队员纷纷来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已经准备好了学习的条件。据1941年7月9日延安《解放军报》报道，1941年7月8日，在陕甘宁边区召开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陕甘宁边区支会成立大会。会上，最初提出了在延安建立“朝鲜青年革命学校（朝鲜军政干部学校）”的方案，获得了与会者们的一致通过。可是，由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方案成了一纸空文。虽然在延安设立军政学校的想法泡了汤，但是从当年8月开始，举办了朝鲜义勇军干部训练班。一开始只有一个班的学员，到了1942年末，已经有了200余名的学员和干部。于是，决定正式建立“华北朝鲜青年革命学校”。经过筹备工作后，于1942年12月1日在七原村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由武亭任校长，金学武任教务部主任。

“华北朝鲜青年干部学校”主要培养朝鲜革命军事干部，但在政治、地理等方面的条件依然很差，很难跟上形势的发展。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看清了这一点以后，第二年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延安建立“朝鲜青年革命学校”，并把华北朝鲜青年革命学校的大多数教员和学员转移到延安，作为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骨干。

“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时任朝鲜独立同盟延安分盟主任的朱德海，从干部训练班调到延安朝

鲜革命军政学校，被任命为筹建委员会管理科长，负责具体业务。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前阶段的筹备工作全部由朱德海负责。当时，文正一也被临时抽调来做学员们的政审工作，由朴一禹总负责，朱渊、李洛、文正一等三人负责具体审查。他们对学校全部人员的历史进行审查，整理成材料，上报给学校党委，在此基础上决定学员们的入学资格。

校址最初定在川口，因此新学员们从前方陆续来到川口。川口的学校规模太小，无法接纳全部学员。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把学校搬迁到距延安城内 10 里远的罗家坪。

此时，太行山朝鲜青年革命学校的 200 余名学员在朴孝三的率领下离开太行山根据地，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行军征程。为了冲破国民党军队的 3 道封锁线，他们分成几伙，日夜兼程。他们经过 3 个月 2000 里的艰难行军，终于在 1944 年 4 月初到达延安。李华林<sup>16)</sup>曾经回忆到达延安后的情景：“1944 年 4 月 7 日，我们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老远就看到了宝塔山，还看到了军民们正在山梁和山坡上热火朝天地干农活儿。马群和羊群正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远处传来公鸡啼鸣的声音，使得温暖的春天里和平的气氛更加浓烈。……我们经过新修建的机场，前往边区政府安排的住地。头一次见到的机场看上去是那么的宽阔。……在延安头一次吃到黄色的小米饭，实在是太好吃了，现在想起来还让人直咽口水。……此时，不知从何处隐隐传来《延安颂》的歌声。……宝塔山山头上红霞似火，延河水水波上月光粼粼。……来到心中日夜思念的故乡，初次踏上这片光荣的土地，富有意义的日子里，能够与作曲家郑律成一起倾听《延安颂》，不禁让人无限感慨。”

16) 李华林，女，1904 年出生于朝鲜平壤。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参加朝鲜义勇军，抗战胜利后在延安医科大学学习。后来在抗美援朝前线任军医、所长、技术科长等职。1956 年起先后担任延边自治州卫生处长、卫生局长、卫生学校校长、计划生育办主任等职。1999 年 2 月 4 日逝世。

朱德海与郑律成沿着延河下来迎接他们。那天晚上，郑律成还领着新来延安的太行山战友们登上了宝塔山。

罗家坪是一条朝南延伸的小山沟，不停地走上20几分钟，就到了山沟的尽头，来到3面环山的山脚下。校址就选定在山沟里潺潺流淌的溪水与延河汇合的地方。朱德海身为管理科长，工作相当繁忙，最先要做的是盖建校舍和宿舍。朱德海把全部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在他的率领下，义勇军战友们全都积极响应。由朴孝三带来的太行山义勇军战友们是其中的主力。朱德海首先选好工地，带领大家亲手制作铁锹和镐头，编扎箩筐，并向当地老百姓学习了挖凿窑洞的技术。从1944年9月开始，动员全体学员挖凿学校使用的窑洞，经过半年时间的艰苦奋斗，挖了20多个窑洞，其中包括用作食堂和教室兼礼堂的宽敞的窑洞。开学前夕，朝鲜青年革命学校决定改名为朝鲜革命军政学校。

延安《解放军报》1945年2月10日版登载了题为《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开学》的报道。报道副题为“朱总司令勉励朝鲜同志们学习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下面是该报道中的部分内容：

“……1945年2月5日，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在罗家坪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和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等陕甘宁边区负责同志参加了此次盛会。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主要干部为校长金科奉、副校长兼书记朴一禹（王外）、副校长兼军事队长朴孝三，以及教育科负责人朱春吉、姜镇世、郑律成，总务科长朱德海等。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校、延安大学、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词。全体高唱郑律成作曲的《朝鲜义勇军进行曲》后，主持典礼的朴一禹副校长宣布典礼开始。金科奉校长说明了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宗旨和任务。接着，朱德总司令强调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好好学习军事政治。林伯渠和吴玉章

在高度赞扬朝鲜革命家们的英雄革命精神后指出，只要做好实现朝鲜革命大业的准备，朝鲜独立运动一定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当天，徐特立、黄重光，以及日本解放同盟的代表也发了言。”

“朝鲜革命军政学校”主要设置了政治课和军事课。政治课专门学习“社会发展史”、“时事”、“政治经济学”、“朝鲜历史”、“朝鲜革命运动史”、“新民主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联共产党史”等课程，军事课的学习内容包括队列基本动作、班排连营的战术，以及步兵武器原理、利用地形地物等。军政学校学员们的学习和训练非常紧张。朴孝三和李权武，以及各区队区队长负责抓军事课。韩彬、崔昌益、许贞淑<sup>17)</sup>等讲授政治课。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有280余名学员，“……学校编为4个区队、15个分队。除此以外，还有2个女子分队。当时，金科奉的小女儿金海焯也在延安上中学。”（金应三《我的一生》）

当时，副司令员朴一禹的夫人因难产濒危，军政学校的学员们用担架抬着产妇前往鲁迅艺术学院旁边的医院。那孩子后来在进军东北时坐在骡子背上的箱笼（放在马背上运货的箱子或箩筐）里到达沈阳。

武亭早在青年联合会（朝鲜独立同盟的前身）的行动纲领中就已经指出了干部培养问题，朝鲜革命团体的组织和统一问题，华北20万朝鲜人的团结和抗日斗争方向，与成立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宗旨相符合。军政学校是出身和成分完全不同的抗日团体及个人的集结地。武亭是红军出身的有资历的八路军军人，朴一禹也是中国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军人，而金科奉、朴孝三、李春岩、杨敏山等人则是朝鲜民族革命党。崔昌益、韩彬、金汉武等人是

17) 许贞淑，原名贞子，1908年出生于朝鲜平壤。1930年起在中国延安投身抗日运动，光复后返回朝鲜。历任文化宣传相、司法相、最高稽查所所长、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副议长、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秘书、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议长、最高人民会议第8届代议员、祖国统一相等职。1991年逝世。

朝鲜青年前卫同盟的成员，朱德海、方虎山、朱春吉、李权武等人都是东北出身，来自苏联东方大学。其中朱德海、方虎山、朱春吉等还是东北抗联出身。另外，来自朝鲜和中国华北、华中地区的朝鲜革命家们的成分更是多达好几派。“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是一个使理念和思想达到和谐统一的学校，也是一个为了朝鲜的独立和解放力求达到派别和小集团的团结和友爱的大熔炉。这就是军政学校的象征意义。

某些学者认为，军政学校的建立说明朝鲜义勇军的政治纲领发生了变化。比如，在1944年10月，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山东分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金武亭的肖像代替了孙中山、蒋介石、金九、金元凤等民族领袖们的画像，而且采纳了1940年1月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纲领。

军政学校的教室设置在礼堂里。实际上，说是礼堂是不够格的，最多是挖得稍微宽敞一些的窑洞罢了。金科奉、崔昌益、武亭、韩彬等分别讲授历史、经济学、中共党史、哲学……金泰均讲授的是朝鲜反日斗争。窑洞里摆放着小板凳，紧挨着坐在那里听课、记笔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幸亏窑洞里冬暖夏凉。即便如此，学习依然是很苦的事情。学员们最喜欢的科目是军事课。因为那往往是野外训练。

由朝鲜革命的先驱者们和中国军官学校出身的教官们组成的强大教员队伍是该校最大的骄傲。特别是延安具有特殊的政治地理上的地位，学员们能够直接听到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革命元老、军人们的演说和讲课。先后由朱德总司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周扬、刘伯承等讲授了朝鲜民族的统一战线问题、朝鲜革命者的修养问题、民主政权问题、学习方法问题、革命内部的团结问题、中国战争形势的发展与朝鲜革命胜利问题、东北抗联军事等广泛的知识。除此以外，学员们还能涉猎国际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凡是延安出身的干部大都成了“大干部”。不但是军政学校的教官，还有那些学员们，都是老革命家，其中还有不少学者。

1945年初春，被击伤的美军飞机突然降落在太行山根据地，美军航空技术员前来修理后，飞机将飞往延安。此时，朝鲜义勇军司令员武亭接到中央指示，就随美军飞机一起来到延安。武亭在晋东南八路军前方司令部指挥敌占区的军事作战。当时，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总部和军政学校在一起。同盟主席金科奉，副主席崔昌益、韩彬也在军政学校工作，同时兼任同盟的工作。

朝鲜独立同盟延安分盟主任朱德海与同盟领导成员和军政学校领导成员一起，为武亭举行了欢迎会。朱德海以延安分盟主任、军政学校常务委员、总务科长的身份参加了欢迎会。武亭身材结实，扁圆形的大脸盘，性格刚强。他在军政学校作了题为“当前形势与朝鲜义勇军的使命”的演讲。从那时起，武亭作为义勇军司令员常驻延安，并在光复后率领义勇军进军东北。

“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学员们在紧张学习的同时，还在朱德海的率领下参加了“大生产运动”。金盆湾期间，朱德海曾任八路军作战部队的连指导员，学到了许多生产方法和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此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工作作风和能力。

校长金科奉<sup>18)</sup>十分信任朱德海，非常喜爱这个少说多干、品行端正的部下。金科奉当时56岁，比朱德海年长24岁。作为父

---

18) 金科奉，1889年2月16日出生于庆尚南道机张郡，号白渊、帛连，外号太行山虎，3·1运动后亡命中国。日帝占领时期编著了朝鲜语词典《朝鲜语本》和《朝鲜语本补充》，还是《语言汇》共著者之一。1935年与金奎植、金元凤等一起创建民族革命党，任黄埔军校教官；1940年以后在华北任朝鲜独立同盟主席，光复后返回朝鲜；1946年10月至1948年9月任金日成综合大学首任校长。参与了1948年4月的南北协商，还担任了人民委员会常任委员长等职。其表侄女朴且贞是药山金元凤的第一位夫人。

辈的金科奉与武亭一样，是延安朝鲜人中备受尊敬的人之一。也许是因为在长期革命工作中过度辛劳，金科奉校长的身体不是很好，因此在1942年4月从重庆前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时，几乎是由朝鲜义勇队的队员们背着翻山过河的。

朱德海担任学校党委委员、教务委员兼总务科长，不仅负责学校的后勤工作，还负责一切管理工作。

1945年2月21日，延安《解放军报》登载了题为“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大生产运动”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为了减轻中国抗日人民的负担，培养朝鲜革命家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下定决心投入大生产运动。……在实际参加生产的过程中，最先遇到的困难是缺乏农田、资金和生产工具。但是，我们得到了朱总司令、边区政府和抗大的帮助，很快就克服了这些困难，建起了农场、砖瓦厂、饴糖厂等，架设了几十台纺车，还有了自己的菜地。召开生产运动动员大会后，同志们纷纷走上劳动生产的第一线。农场生产队有40余人，在队长和指导员的率领下到甘泉县境内的山里去开垦荒地。砖瓦厂的15人在主任的带领下去了桥沟。另外，蔬菜组、木工组、纺纱组（由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组成）留在学校原址的川口。饴糖厂的同志们去了东关。……经过半年的辛勤劳动，我们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有了窑洞和房子，有了粮食和蔬菜，还有了少量的零花钱。

“我们学校农场去年开垦了500亩荒地，收获了8100斤粮谷。另外，还烧了11000斤木炭，锯了65张木板。建筑队挖了17个窑洞，盖了18间房子，节约了800余元。蔬菜组生产了10000斤蔬菜，砖瓦厂烧了50000块砖和40000张瓦，取得了50万元的利润。纺纱组生产了48斤棉纱、40斤粗毛线（内部用），还编织了166套毛衣（内部用），节约了10万余元。在全校同志们的努力下，罗家坪新校舍于12月10日竣工。新校舍建成以后，学员们又连续参加

了搬运粮食和煤炭、捡粪等劳动。我们还自制了雪橇，到二三十里远的地方去，沿着冰冻的延河搬运了20 000多斤的煤炭。”

这不是记者写的报道文章，而是刚刚建立的罗家坪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写的总结报告。准确地说，不是军政学校期间，而是从第二年川口时节起的生产总结。朱德海就处在学校生产运动的中心。

军政学校成立的时候，延安的经济情况比大生产运动刚开始时稍有好转，不过，依然需要自给自足。学校依靠开垦荒地来解决口粮，依靠冬天挖煤、进山烧炭来解决窑洞的取暖问题。另外，建立砖厂和糖厂来解决学校运营的资金。学校的糖厂是延安唯一的糖厂，生产的朝鲜饴糖和糖果远近闻名。朱德海派尹载德等学员在延安城内开了个商店，出售学校生产的朝鲜饴糖和西红柿等蔬菜。朝鲜饴糖是延安销售得最好的商品，十分出名，鲁迅艺术学院的许多学生都是商店的老主顾。

当时，朱德海属于贺龙的120师，经常与太原市从事地下工作的崔采联系。朱德海通过崔采与敌占区开展贸易，采购衣服、药品、军用电池等必需物质。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学校运营的必要经费和物质。朱德海就是这样认识了崔采，后来经过哈尔滨、延边期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

作为总务科长，朱德海无疑是个出色的“当家人”。当时，文正一来延安亲眼目睹了朱德海作为总务科长的工作后，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朱德海很会做生意，从来不会亏本。”种地、种菜、烧炭、编筐等任何事情，朱德海都是一把好手。这也是他后来成为延边党政最高首长的充分的实习过程。

无论再忙，朱德海总是协助食堂管理员为伙食操心，尽全力提高饭菜的质量。他动员炊事班利用萝卜、白菜等腌制咸菜，深受学员们的欢迎。学员中出现患者时，就单独给患者用小米熬米糊。每个星期六，还给全体学员打一次牙祭。在延安打牙祭，就是吃

一顿小米饭。李华林曾经回忆在延安头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小米饭，说明延安的粮谷是不足的。延安的茄子也不像东北的茄子那样细长，而是像拳头那样圆鼓鼓的。全体学员上顿下顿总是吃茄子吃得都恶心了。

经济情况的困难在吃和穿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学员们穿的都是边区织布后缝制的灰色军服，可以不用太担心，但是穿鞋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学员们在军事课时经常进行野外训练，因此非常费鞋。他们经常翘起破得不成样子的鞋让朱德海看，好像是在问，总务科长同志，有什么办法没有？

作为总务科长，朱德海感到很心痛。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吗？军服破了，可以交由女学员们大致缝补一下，可鞋子却无法缝补。而且又不能像陕北的女人们那样用麻线来纳鞋底，做成结实的鞋子。即使想做那样的布鞋，也没有布料和技术。有不少学员干脆光着脚上学，光着脚下地干活儿。

有了，真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朱德海终于想出了编织草鞋的办法。他从小就是凑着油灯，鼻孔被熏得黑黑的，编织着草鞋长大的。可是，延安没有编织草鞋的稻草。怎么办呢？朱德海向延安的老百姓打听后，动员大家自己编织草鞋穿，从而解决了穿鞋问题。小米、步枪、草鞋是我军的传家宝。另外，学员们还用羊毛纺成线来编织袜子和毛衣，解决了穿着问题。尹载德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受朱德海的指令，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向女同志们学习了纺棉线的技术。后来在朱德海办的‘3·1’商店里当店员的时候还放过羊。”据他的回忆，多亏有了朱德海管理军政学校的全部生活，才大大减轻了许多不便。

包括八路军在内的军人们都住在山坡上挖的窑洞里，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也不例外。到了晚上，山坡上的窑洞里灯火闪烁，讲述着陕北神秘的童话传说。

朝鲜义勇军总部设在桥沟对面罗家坪的干部休养所，只有两座老百姓的房子，全都住在窑洞里。从罗家坪越过延河走两里路左右，就是鲁迅艺术学院所在的桥沟。凡是有什么活动或举行联欢，都会去桥沟。延安的生活条件虽然很艰苦，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有时候，也会去王家坪军委大礼堂观看图片展览或演出。

饭菜已煮熟 / 东山千里 / 升起的太阳 / 已经快到 / 中午时分  
哎啦哎啦 / 哎啦锄锄头呀 / 锄头锄头 / 扛在肩上……

这是在甘泉开荒、栽种黄米和荞麦时创作的歌曲，也是朱德海最喜欢唱的歌曲之一。他还喜欢唱郑律成作曲的《朝鲜义勇军进行曲》和民谣《阿里郎》等歌曲。他的嗓音天生低弱、粗哑，并不适合唱歌，唱歌也的确不受人恭维。可是，他非常热爱艺术。这也许是受了好朋友、音乐家郑律成的影响。方虎山、全宇、李德山等战友见了朱德海，就会嬉笑着唱起：“……哎啦锄锄头呀……锄头锄头……扛在肩上……”

1944年，郑律成与丁雪松结婚，朱德海等许多朝鲜革命家和军人参加了婚礼，饱吃了一顿郑律成准备好的羊肉。郑律成与丁雪松的婚事，武亭起了搭桥的作用。由此可见，武亭与郑律成的感情很深。武亭非常了解郑律成的家庭来历，自愿担当他的政治担保人。婚礼在鲁迅艺术学院进行，周扬担任证婚人。武亭也参加了婚礼。

朱德海与郑律成在延安时期就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成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原延边州人大主任曹龙浩接受笔者采访，谈到朱德海的人际关系时，提供了朱德海与郑律成之间有趣的小故事：

“在我的记忆中，自治州成立后，郑律成曾经来过延边好几次，每次都要见朱德海书记。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最后一次来延边

的时候。当时，朱德海书记指示我去接郑律成，所以更让我记忆犹新。”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朱德海书记吩咐曹龙浩去延吉市长白公社新丰大队接郑律成。远在北京的郑律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新丰大队呢？虽然曹龙浩觉得奇怪，但没有多问，而是把这件事情委托给了当时在文联工作的崔亨东。当时正好到延边来的崔采也提出去见郑律成。崔采时任吉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吉林省民委主任。既然崔采要去，曹龙浩也只好一起去。当时，郑律成到延边来体验生活，住在长白公社（镇）新丰大队（村）全国劳动模范崔竹松的家里。崔竹松与朱德海书记的关系十分亲密，郑律成也是通过朱德海书记认识了崔竹松，所以才毫无拘束地住在崔竹松的家里。郑律成并没有告知朱德海书记，而是悄悄地来到延边，原先想住在宾馆里，因为被服务员傲慢的态度激怒了，才径直来到崔竹松家里。崔竹松把郑律成的消息告诉了朱德海。就在曹龙浩一行急急忙忙坐车赶到新丰七队时，郑律成正和延边话剧团的一个演员一起在水田的田埂边，哗啦哗啦地淌着水用抄网在抓鱼。看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曲家裤腿上沾着泥水，用抄网抓鱼的情景，大家不由得笑出声来。郑律成见到崔采，很高兴地打招呼。崔采问他：“为什么不告诉一声，悄悄地躲在这里抓鱼？”郑律成说，“到这里来体验生活，没有必要惊动大家”。接着，他又笑着说：“看来有人把我来的消息告诉了朱德海，他才派你们来的吧。”经崔采主任和曹龙浩的一再劝说，郑律成才恋恋不舍地收起抄网，跟着他们一起上了车。他们一行刚进到延边宾馆的院子里，就受到了朱德海书记和姚昕副书记的热情欢迎。“伟大的作曲家同志既然到了延边，也不来见见我朱德海，到底去了哪里？新丰的小水沟里有的是鱼，你不会用抄网在抓鱼吧？”朱德海书记握着郑律成的手，半责备

似地开起了玩笑。郑律成也诙谐地答道：“还真让你猜到了。我不愿意与官方的同志们打交道，才没有通报。”

那时候正是8月份，朱德海等延边党政负责人正在忙着州庆前的准备工作。尽管如此，对郑律成的接待依然热情周到。郑律成在延边期间，朱德海书记安排他实地考察了延边的各个县市，还在家里招待了他。

## 光复

1945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对朝鲜人来说则是光复之年。当年4月22日，苏联红军经过华沙，以破竹之势攻入柏林。4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服毒自尽。5月8日，德军向苏联红军全面投降。如果说西欧前线以苏军势不可挡的突破使战争终结的话，那么，在东部东南亚及太平洋区域同样因为同盟军的长驱直入而打垮了日军。

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军东北。为了配合被后世称之为代号“8月风暴”的对日作战，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至11日18个小时内连续发布了7个命令。11日8点和9点连续发布的2号和3号命令，命令八路军出兵东北，协同苏军对日作战。6号命令12点发布，是关于朝鲜义勇军进军东北的作战命令。

### 延安总部命令第6号

为了配合进军中国和朝鲜境内作战的苏军，解放朝鲜人民，我现在命令正在华北战场对日作战的朝鲜义勇军司令员武亭、副司令员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率领所属部队，与八路军和原东北军某部队一起进攻东

北，在消灭日帝和傀儡军的同时，组织东北的朝鲜人民完成解放朝鲜的任务。

总司令 朱德

1945年8月11日12时

接到命令以后，司令员武亭和副司令员朴孝三、朴一禹向朝鲜义勇军各部队下达了进军东北的命令，在通知会合地点的同时，还向驻延安的朝鲜义勇军和军政学校发布命令，将学员们编入作战部队。3天后的15日，延安“解放军报”登载了题为“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学员们做好一切准备等候命令”的报道。

就在这篇报道发表的当天晚上，陕北高原空旷的夜空万籁俱寂，星光灿烂。延安的夜晚，散发着8月的凉爽气息。此时，突然响起谁的喊叫声：

“鬼子投降啦！”

“日本投降啦！”

这难道是真的？

那是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工作的金昌日呼喊的声音。据抗日老战士李华林回忆，当时与她同寝室的战友们都已进入梦乡，只有她还在蓖麻油灯下整理当天的笔记。她马上叫醒了正在酣睡的战友们：“赶快起来，鬼子投降啦！”正在梦乡中漫游的战友们急急忙忙爬起身，七嘴八舌地问道：“你说什么？这是真的吗？”当他们听清了这一消息后，纷纷欢呼着跑出门去。

鬼子投降了？朱德海也猛地跳起身。他虽然担任军政学校的总务科长，但已经搬到总部来住，因此还不知道这一消息。这是真的？

也许是因为消息还没有得到确认，就连义勇军司令员武亭，独立同盟负责人金科奉等人也露出了疑惑的神情。凡是“解放军报”登载的消息，八路军总部肯定会事先知道。关于东北战争的消息，作为领导成员，肯定会先于下级了解，而且对苏联红军的进军路线和战场消息也十分清楚。但是，谁也没想到像鬼子投降这样的消息竟然会来得如此突然。以那个时期为素材的中国电视剧里曾经有过这样的画面：新四军某军分区的司令员也是从电话里听到鬼子投降的消息，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那是令人充满同感的画面。同样，武亭和金科奉一开始也十分怀疑自己的耳朵。

不仅是八路军总部，包括正在准备进军东北的义勇军司令部和朱德海等军政学校的师生们，做梦也没想到日本会宣布投降。

此时，值班参谋把八路军总部的通知告诉了武亭：“据总部的消息，日本已经投降！”

延安迎来了欢乐和兴奋的一夜，而且立即达到了高潮。到处燃起了篝火，延河岸边和南川河畔欢呼声震天动地。鼓声咚咚，锣声锵锵。过了一会儿，也不知是谁带的头，学员们纷纷拆开被褥的棉花，蘸上食油做成火炬，高举着跳起了秧歌舞和腰鼓舞。跳舞的队伍像火龙般沿着延河两岸蠕动。

军政学校所在地罗家坪也成了欢乐的海洋。

“解放军报、新华社的消息，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无条件投降。”

“朝鲜独立万岁！”

“我们胜利啦！”

虽然没有任何人统一指挥，大家还是争先恐后地聚集到礼堂里。灯笼把礼堂照得亮如白昼。大家在这里正式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全体师生一起站起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喊声：“朝鲜义勇军万岁！朝鲜独立同盟万岁！朝鲜独立万岁！”兴奋的师生们跑到外面，互相手牵手高唱起《快基纳庆庆那内》、《阿里郎》、

《锄头歌》等民谣，激动得手舞足蹈。半夜开始的庆祝活动，一直延续到第二天上午。全体朝鲜义勇军战士在学校操场上跳舞的场面极为壮观。

朱德海也流着激动的眼泪，和学员们一起振臂高呼。作曲家郑律成在这个时期作词作曲创作了朝鲜义勇军进行曲《向着祖国前进》。他们抱着保卫朝鲜疆土、解放祖国的唯一心愿，从朝鲜、满洲、苏联等火热的地方来到最为幽深的黄土高原腹地。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他们兴奋之极，互相拥抱着热烈庆祝。日帝已经投降，马上可以返回祖国，让他们尽其囊中所有买来了酒，又到地里摘来尚未成熟的甜瓜、西瓜和西红柿等，又唱又跳地尽情庆祝胜利。

美国在8月6日和8日先后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苏联在8月8日向日本宣战，开始了“8月风暴”战役。苏军在东北与中国共产党部队联合解放了东北，并越过图们江发起进攻，占领了朝鲜东北部的罗津、雄基等城市，强行登陆清津，从而解放了朝鲜。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帝在投降书上签字，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根据剧变的形势，延安的各个机关和八路军总部开始紧张地行动起来。朝鲜义勇军司令部加快了进军东北的准备。军政学校的学员们也开始忙碌起来。朱德海不再担任学校总务科长，被调到作战部队任供给处长，动员部队加紧做好进军东北的准备。根据武亭的命令，在大生产运动中创办的糖厂、商店等必须全都移交地方。朱德海把这些工作处理得干净利落。

“这形势发展得也太紧迫了。”

“是啊，根本没有时间磨蹭。”

“朱处长做这些扫尾工作也太吃力了。”

学员们见了朱德海，早已忘了嬉笑着唱什么“锄头扛在肩上

……”，全都急急忙忙地打个招呼擦身而过。大家都处于紧张忙碌的状态。

全体义勇军官兵进军东北进入倒计时。

## 日本投降和进军东北

1944年9月末，苏军最高统帅下达了远东兵力集结及后勤保障的命令，苏军开始在远东集结。随着苏德战场转移至德国本土，德军的失败已经既成事实。1945年4月，苏联红军远东总部成立。同年7月30日，斯大林任命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苏军远东总司令，从而完成了战争准备。

1945年8月7日16点30分，最高统帅部向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下达命令，命令正在待命的远东军各方面军于8月9日0点10分发起总攻。过了一天后的8月8日下午5点，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突然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宣读了8月9日对日宣战通告。

在中苏、中蒙、中朝边境（东、西、北）4000公里的前线，苏联157万远东军分3个方向、7路兵力，以天崩地裂之势对驻扎在中国和朝鲜的日军发动进攻。苏军没有使用以炮火压制敌人的战术，而是以奇袭的方式从前线突破。远东军所属3个方面军（野战军）11个集团军（步兵集团军），外加2个海军舰队、1个坦克集团军、3个航空兵（伞兵）集团军和1个战役集团军，共计80个师。另外还有4个坦克机械化军和6个步兵旅，总兵力达到了1 577 000人。

中国共产党方面集结了八路军、东北抗联、苏联远东军所属周保中、李兆麟的国际旅团。在占领东北57个战略要地的战斗中，

熟悉当地地理的东北抗联和国际旅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远东军第1方面军在司令员梅列茨科夫元帅的指挥下，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兴凯湖一带的滨海地区以哈尔滨、吉林为目标向西进军。远东军第2方面军在普尔卡耶夫上将的指挥下，从哈巴罗夫斯克、海兰泡等地以哈尔滨、齐齐哈尔为目标向南进军。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与蒙古骑兵一起从蒙古南部分成两路向南面的长春、沈阳、赤峰、张家口等地进攻。

1945年8月16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全面投降。8月19日晚上，身居长春的日本关东军最高总司令兼伪满洲国总理山田乙三在投降书上签字。当天晚上，关东军司令部大楼降下日本国旗，升起了苏联国旗。苏联的伞兵部队占领了铁路沿线和银行、邮局、广播、情报局等机构。第二天，关东军放下武器撤出长春，坦克第6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开进长春，收复了伪满洲国的朝廷和关东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苏联红军与中国抗日联军、八路军一起消灭日军84 000余名，俘虏600 000余名。另外，还击沉50余艘军舰，杀伤32 000余名日军。除此以外，还击落925架飞机，击毁369辆坦克，缴获2500门各种野战炮。此外还俘虏了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和参谋长秦彦三郎等148名关东军高级将校。爱新觉罗·溥仪在自传体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这个时期时，讲述了张景惠等“伪满洲国大臣”们被苏军俘虏时的情景，表现手法十分诙谐，让人忍俊不禁。苏联红军有8200人死亡，22 000余人负伤。

1945年9月2日，朝鲜义勇军离开延安，踏上了进军东北的征途。

进军东北前夕，义勇军司令部对进军部队进行了重编，任命

武亭为总司令，朴一禹为副司令兼政委，朴孝三为副司令兼参谋长，还设立了参谋处、供给处、管理处等部门。朱德海任供给处长，还配备了黄载渊、崔亚立、河镇东等骨干人员。进军东北时，朱德海由军政学校总务科长被调任义勇军司令部供给处长。

9月的陕北高原，晴空万里。进军东北的义勇军队伍里有许多驴马、骡子等牲口，背上驮着沉重的箱笼，铃铛声叮当作响。在牲口背上的大箩筐里还坐着武亭将军的两个孩子、郑律成的女儿（郑小提）、朴一禹副司令的孩子们。驴马背上的箱笼里还装载着八路军司令部配给的无线电收发报机。

陕甘宁边区间隔一定的距离都设有兵站，给行军带来很多便利。另外，山西省和河北省已经没有了封锁线，因此，义勇军行军一个多月就越过了万里长城。他们经过延川、清化坪、绥德，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省，沿着（大）同包（头）线经过永山、平型关，到达张家口。那时已是秋风簌簌的10月初了。在张家口稍作休整后重新出发那天，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八路军代副参谋长滕代远、晋察冀军区副司令肖克等，到张家口火车站来送行。欢送仪式上，武亭代表独立同盟和义勇军总部表示感谢。

他们日夜兼程，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军，于11月4日到达沈阳。在关内各地活动的朝鲜义勇军部队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如此多的战士聚在一起还是头一次。不过，他们对从沈阳进军朝鲜的路已被阻断却全然不知。

1945年10月中旬，韩青率领的义勇军最先到达沈阳，并与朱延率领的义勇军合编为义勇军纵队。此时，驻扎在沈阳的苏联红军宪兵司令部派人来告知：“国民党军队正向东北的各个城市发动进攻，八路军部队立即撤退到离开城市80里以远的地方去”，并一再督促义勇军立即离开沈阳市。韩青与朱延等领导成员研究后，制定了进军安（丹）东、桓仁、通化一带朝鲜人集居地区的计划，

然后率领部队向安东进发。

他们到达安东后，与驻扎在朝鲜平安北道的苏军司令部取得联系，打算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部队到达新义州后停留了20多天，苏军司令部根据“波茨坦宣言”，不承认朝鲜义勇军部队为联军，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韩青与苏军第5军团参谋长进行了交涉，经允许后重新武装了部队，并于11月初离开新义州返回沈阳。

就在此时，朝鲜独立同盟领导成员和朝鲜义勇军总部到达沈阳。听取韩青和朱延的汇报后，独立同盟领导和义勇军司令部研究了对策。

当时，到达沈阳的义勇军部队有来自延安的300余人、来自冀东地区的100余人、来自太行山地区的300余人、来自中原地区的80余人、来自山东地区的20余人。另外再加上韩青、朱延的部队，总兵力达到了近2000余人。

1945年5月，德国战败后，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波茨坦协商了远东问题，决定苏联参加对日宣战，苏美两军以朝鲜半岛“38”线为界出兵，另外还规定了武亭部队不能进入朝鲜。

1945年11月初，在沈阳召开了朝鲜独立同盟执行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新设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召开的，也是在中国的朝鲜独立同盟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分析了波茨坦宣言和朝鲜形势，作出了全体义勇军战士完全没有想到的决定。决定作为政治团体的朝鲜独立同盟回国，作为武装团体的朝鲜义勇军暂时留在中国，同时扩充部队，做好进军朝鲜的准备。做出这个决定的独立同盟和义勇军司令部也是出于不得已，既有《波茨坦宣言》的坚决阻挡，也因为朝鲜的情况太过复杂。

1945年11月7日，在沈阳火车站的广场上，举行了苏联红军解放沈阳纪念塔揭幕仪式。朝鲜义勇军与东北人民自治军、苏联红军一起参加了阅兵式，并听取了苏军司令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

辽宁省主席张学思的讲话。仪式结束后，朝鲜义勇军在沈阳的大街上举行了武装游行。

三天后的11月10日，朝鲜义勇军在现在的沈阳市于洪区大兴朝鲜族乡吴家荒朝鲜族小学原址，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独立同盟的干部和集结在沈阳的朝鲜义勇军全体军人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是朝鲜义勇军第一次全体军人大会，也是延安军政学校总校和各分校的毕业典礼。（内容摘自崔强的《义勇军史》）会议上，武亭首先分析了中国和朝鲜的形势，然后宣布把全军编成3个支队，即第1支队、第3支队、第5支队。第1支队赴南满，第3支队赴北满，第5支队赴东满，进行分散活动，同时要求第1支队扩军建立第2支队，第3支队扩军建立第4支队，第5支队扩军建立第6支队。另外，还任命了各支队的负责干部。任命第1支队支队长王子仁（金雄），政委方虎山，参谋长韩景，政治处主任洪林；第3支队支队长李相朝（当时在哈尔滨），政委朱德海，参谋长金焱，政治处主任李根山；第5支队支队长李益盛，政委朴训一，参谋长曹烈光，政治处主任全宇。另外，命令韩青带领由1个排的兵力和延安来的6名干部组成的朝鲜义勇军独立大队，到辽东地区去扩充队伍。

第3支队以1942年朝鲜独立同盟派往北满的李相朝组织的当地朝鲜青年为基础而组成。为此，只派了朱德海等19名领导干部赴北满完成重编第3支队的任务。除此以外，朱德海还担任朝鲜独立同盟北满工委会主任，方虎山担任朝鲜独立同盟南满工委会主任。

从那时起，朝鲜义勇军所属的官兵们的命运发生了变化。武亭、金科奉、崔昌益、许贞淑（崔昌益的夫人）、韩彬、朴佑庸、高奉基、金岷山、陈般洙、朴武、洪淳官、河央天、张镇光、金英淑（武亭的夫人）、张秀莲（朴孝三的夫人）、朴孝三、金昌万（李得

山)、李春岩、朱春吉、柳建、金瑞光、孙达、杨继、李林、金汉中、李志刚、李哲忠、张中光、张志敏、张志福、朱赫、陈九华、崔奉录、崔永、河镇东、王连、金哲元、丰中天等少数独立同盟干部和义勇军司令部一部分人员率先返回朝鲜。朱德海、李相朝、朴一禹、金雄(王子仁或王信虎)、李益盛等暂时留在中国,带领各支队继续在东北参加战斗。义勇军各支队在朝鲜人集居地区引导许多朝鲜青年参加革命,扩充了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解放东北和中国全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朴一禹、蔡国范、李益盛、金雄、李相朝、方虎山、李得山等先后返回朝鲜,他们所领导的队伍,比如方虎山的南满第1支队(李红光支队)和延边第5支队的武装部队,也陆续前往朝鲜。

虽然朱德海和方虎山分别被任命为北满和南满分盟的主任,后来在北满地区和南满地区朝鲜人民民主联盟(延边地区名为延边人民代同盟)的活动也十分活跃,但是,相比延安时期和太行山时期,已经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当时(1946年),留在中国的大部分朝鲜义勇军指挥员和战士们开始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德海在来到哈尔滨的第二年,1946年7月组建了“北满地区朝鲜人民联盟”,制定了政纲,开展了活动,但是在朱德海担任民族事务处处长的1948年4月被解散。

## 第三章 在北满大地上

### 新的战争

从词典解释的含义来看，战争是指互相对立的国家或者与之对应的集团之间，欲使用军事力量来强制对方意志的行为或状态。文化上的解释虽然比较文雅，但是，战争本身是极其残忍和悲惨的，是绝对不能反复或持续的，是人类毁灭性行为。

圣艾修伯里曾留下了“战争不是冒险而是疾病”的至理名言。为此，研究战争的学者们在研究人类战争史的时候，将掠夺女人和财物看成是战争的根源。尽管这样的解释比较单纯，但是，自古以来，战争的确就是强占女人和掠夺财物的人类毁灭性行为。因此，如果爱情是人世间永恒的主题，那么，战争就是遭到谴责却依然难以割舍的话题。这话题是从赞扬参加正义战争的先人们的不朽功绩开始的。为此，战争话题永远是火热的素材。后人们为了创造今天的和平时代，才热烈赞扬和高声讴歌先人们流血牺牲的丰功伟绩。

“8·15”光复后，东北在一段时间里处于无政府真空状态。

大中城市暂由苏联红军控制，但是大部分农村和山区却持续混乱，不断爆发抢夺日军留下的大量军用物资的冲突。社会秩序日益混乱，日伪残余势力继续保持着武装力量。“东北先遣队”、“中央先遣军”、“东北救国军”等十分活跃，再加上一部分驻扎在东北的苏联红军军纪松懈，抢劫、强奸等各种不光彩的事情屡屡发生。曾经在那个时期生活过的许多老人说，苏联红军在中国期间日子最难过。

东北本来是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日本在败退前夕，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破坏。东北的工业、铁路、交通等各项工业基础设施没能幸免。从1949年9月起，苏军开始把东北的军事设备和物资、工业设备、交通设备（北安到黑河的铁路）等搬移到苏联国内，夺走了价值为8亿5800万美元的财物。因此，全部重建费用高达20亿美元，从而导致东北经济开始崩溃。

10月12日下午，熊式辉、东北9省（松江省、合江省、牡丹江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嫩江省、辽北省、安东省、辽宁省）主席兼长春市长赵君迈、沈阳市长董文琦、哈尔滨市长杨绰庵等10余人到达长春，根据中苏协定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讨论东北接收问题，并且向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派遣接收官员，与傀儡满洲国的残余分子、土匪等反动势力相勾结，组织政治土匪。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在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支援下，已经有两个军的兵力在秦皇岛登陆，开始向锦州和沈阳发起进攻。为此，国共内战在东北地区已呈不可避免的态势。

当时，东北地区（包括热河省和内蒙古东北部）的总面积达13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500万名。“8·15”光复后，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升格。东北地区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工业基地。据抗战后期的统计，铁矿煤炭的生产量位居全国首位，工业生产占全国的80%。铁路、公路各

占全国总长度的一半，在全国名列前茅。另外，东北地区还有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生产 50 余种农作物，因此是中国存粮最多的地区。中共要是控制东北的话，等于是获得了可靠的后方供给基地，也等于是获得了与华北各解放区和全国联系的巩固的战略要地。在东北的归属问题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十分激烈，这是直接关系到双方成败的重大问题。

中共进军东北后，在辽东、辽宁、辽西、辽北、吉林、松江、嫩江、北安、三江等地建立了 10 个军区，总兵力达 27 万人。另外，还有能够安排在 100 个团编制中的 2 万余名党政军干部也到达了东北，其中还包括了林彪、彭真、陈云、罗荣桓、李富春、张闻天、高岗、林枫、陶铸、黄克诚、吕正操、王稼祥等高级干部。

1945 年 9 月 15 日早晨，中央要求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等组成东北中央局（东北局），立即在东北开展工作。

本来林彪、肖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接受中共中央的命令，打算去山东根据地代替被派往东北的罗荣桓，8 月 24 日乘坐美军运输机从延安直飞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下飞机后，林彪一行准备马上奔赴山东，不料，9 月 19 日在河南阜阳接到了党中央的急电，命令他们立即前往东北，便又重新赶赴东北。

林彪一行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 10 月上旬越过山海关到达沈阳。10 月 31 日，东北人民自治军<sup>1)</sup>司令部成立，林彪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在这之前的 1945 年 9 月，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成立。

当时，进入沈阳的义勇军司令部设在曾由日本人经营的“料理屋”附近的大酒店里。

---

1) 东北人民自治军，1945 年 10 月 30 日起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 年 1 月 14 日称为东北民主联军，1948 年 1 月 1 日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 年 8 月 14 日称为东北野战军，1949 年 3 月 28 日改称为第 4 野战军。

朱德海接到司令部派通讯兵送来的通知，到达司令部时已经是傍晚时分。时值11月中旬，沈阳傍晚的天气已经是凉飕飕的了。

总部临时设在大餐厅里，摆放着一排排长凳子。尽管已经是晚上，武亭司令员、朴一禹副司令员等总部领导和工作人员依然在忙碌地工作。当时，文正一担任司令部秘书长，去抚顺市委书记吴黎明那里要来了从日军手里缴获的200支步枪和弹药，补充义勇军不足的武器，受到了司令部的表扬。

“德海同志，你终于来了。快请坐。哈尔滨已经派人来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从哈尔滨来接你们一行人的元日宇同志。这位是前去担任第3支队政委的朱德海同志。”

朴一禹副司令员站起身，介绍了身穿北方汉族服装、戴一副眼镜的元日宇。

“元日宇同志是哈尔滨独立联盟特委和吉黑保安队大队长李相朝同志亲自派来接你们一行的，刚由八路军沈阳办事处介绍到这里来。你先听一下元日宇同志介绍哈尔滨的详细情况，然后再插手工作。”

朴一禹副司令员把元日宇带来的信件递给朱德海。

“朱德海同志，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

武亭司令员正在看参谋长递过来的文件，过了一会儿朝朱德海走过来。

“虽然因为去不了朝鲜还有些抵触情绪，不过，我认为这只是个过程。他们都是延安出身的义勇军战士，我相信他们的觉悟。”

“你说得对，延安是座特殊的学校。我们在那里学会了如何宣传，如何与战士们沟通。现在应该是显示这些本事的时候了。这次你领着去的18名同志都是革命的种子。不能因为人少就觉得不好办。别忘了他们都是干部。这18名干部将会培养出百倍、万倍于自己的革命战士来。”

11月10日会议之后，去不了朝鲜的义勇军战士们存在着一定的抵触情绪。他们在延安，在太行山一直向往着祖国，如今在中途路被阻断，无法回到朝鲜，情绪自然出现低落。

“德海同志，你去哈尔滨的命令不再另外颁发。你去哈尔滨的时间根据火车时间自己定吧。”

武亭司令员紧紧握住朱德海的手说：

“你将去赴任的第3支队是先前离开延安的金泽明（李相朝）花了很大工夫组建的朝鲜人军队。你也知道，虽然泽明比你年轻，但是个性格刚强、资历深厚的革命同志。他这次在北满的扩军工作做得相当好，现在拥有了一支全东北人数最多的朝鲜人军队。这是用金子也换不来的宝贵资源。你去了以后，两人要齐心协力，把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北满的朝鲜人数虽然比东满或南满少，但是也生活着几十万朝鲜人，因此要做好对他们的保护工作。你有很好的品德，又有丰富的组织工作经历，一定能把工作做好。”

武亭的声音洪亮而略带嘶哑：

“要记住，无论是留在中国，还是回到朝鲜……革命在实践过程中，离开了枪炮和军队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次之所以把部队主要配备在东满和南满，是因为考虑到东满和南满的地理位置，还考虑到那里生活着许多朝鲜人，有助于扩军工作。北满是艰苦的地方，这次派你到北满去，就是考虑到你的工作能力。希望你去了以后一定要做好扩军工作。”

“司令员同志，我明白了。”

武亭讲完后，朴一禹副司令员又叮嘱道：

“从今天开始，元日宇同志就编入你的队伍。你这次去哈尔滨，泽明几年来花工夫建立的军队将成为以后扩充军队力量的基础。再说，北满不正是你抗日过的地方吗？你要和泽明同志携起手来把北满的工作抓好。等到第1支队扩建第2支队，你们第3

支队扩建第4支队，开赴东满的第5支队做好扩军工作的话，那么，我们朝鲜人部队在东北的规模就会壮大，战斗力就会提高。你身处作战部队应该清楚，支队长和政委是水和鱼的关系。你人缘广，包容能力强，相信你一定会处理好关系。这次派你到那里去，也是因为你具有刚柔并举的组织能力。希望你在北满获得巨大成果，也希望咱们在朝鲜再见。”

朴一禹副司令员讲完以后，朴孝三参谋长把武亭签名的第3支队人事任命书交给朱德海。

“相信你会像个延安出身的干部那样，到北满去也能把工作做好。”

对朱德海来说，那天的相会是最后一次。后来，他再也没有见过武亭、朴一禹、朴孝三等义勇军司令部的领导成员。

从那天起，朱德海就与分配到第3支队的人员同吃共住。日本投降后，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持续遭到外围势力的进攻。城市陷入恐慌的状态，治安更是一团糟，到处是土匪横行霸道。那些政治土匪更是挑起民族矛盾，不仅是城市功能，就连通往城市的铁路、公路等，全都处于瘫痪状态。

“什么时候能离开呢？”

在朱德海住的宿舍里，他与方虎山见了面，并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起走到外面。沈阳的秋夜非常寒冷。天空中传来大雁南飞时发出的鸣叫声。

“既然目的地已经明确，就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必须马上离开。第1支队什么时候出发？”朱德海首先问道。

“冬天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大概也会马上出发，先去通化，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行程。”

也许是因为返回朝鲜的路被阻断，方虎山的神情显得有些沉郁。从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时到现在，方虎山与朱德海一直是好

朋友，从来没有分开过。他们在相同的时期里参加了密山地区的共产党抗日游击队，并且一起被满洲省委推荐去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又一起回国。到了延安以后，又一起在东北干部训练班和中共中央海外工委会接受教育，在朝鲜革命军政学校里一起工作。后来，方虎山和朱德海在沈阳分别被任命为第1支队政委和第3支队政委。为此，这次他们将分开，各自奔赴南满和北满。

“我们也马上就要离开。哈尔滨方面，李相朝已经派人来接我们了。那里是我战斗过几年的地方，不那么陌生。这次派我到北满去，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真所谓风尘岁月啊！虽然局面如此混乱，通信应该还是可以的吧。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尽量互通音讯（消息）吧。”朱德海说得很乐观。

“好的。虽然分为南满北满，但还是在同一个部队，总会有见面的日子。哥，你不用担心，还是好好照料自己的身体，不要让肺炎再复发。到了寒冷的北满，真不知道你的身体能否适应。只有身体健康，才能做好革命工作嘛。”方虎山总是很亲密地称呼朱德海为哥哥。

“哥，这次去哈尔滨，不管再忙，你也一定要找到在白区分离的嫂子……”朱德海与方虎山对个人的秘密互相共有，足以看出友情之深厚。

此时，李林和陈般洙来了。他俩这次不是以军人的身份，而是以独立同盟成员的身份返回朝鲜。方虎山见了他们，没有再往下说。

“你什么时候去哈尔滨？”李林和陈般洙向朱德海询问。

“傍晚我已经去过司令部，已经跟大家告了别。现在得了解一下去哈尔滨的火车时间，尽量争取早点走。”朱德海与他们一一握手。

“无论如何咱们要在朝鲜再见。”

“北方的寒风太厉害，朱处长你一定要照顾好身体，别像在东方劳动大学时那样再生病。咱们再见面时，很想看到朱处长还像现在这样健康的样子。对了，现在你已经是团级干部，应该称呼朱政委才对。”

“是啊，再见面时都想看到健康的样子。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朱德海笑呵呵地说道。

沈阳的夜空烟雾笼罩，星星也失去了光彩，纷纷躲藏在云雾后面。

“要是有钱的话，真该去喝一杯离别酒。现在口袋里空空如也，怎么办呢？”

“哈哈，朱政委当过总务科长和供给处长，竟然说没有钱，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就算有喝酒的钱，在如此混乱的沈阳城里去哪儿喝呢？还是以后再说吧。”

“下次见面时，朱政委你得请客啊。”

那天晚上，他们笑呵呵地互相开着玩笑轻松分了手。他们就像平时那样分了手，脸上还挂着几天后或者几个月后又重新见面似的轻快表情。

然而，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面。当时，他们做梦也没想到那竟然是永远的离别。

几天以后，朱德海带着一行人收拾好行装来到车站，准备做火车前往哈尔滨。不料，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去哈尔滨的火车。于是，他们吃住在候车室一个冰凉的角落里，一等就是好几天。一行人中包括朱德海、李德山、金延、李根山、关建<sup>2)</sup>等干部，其

2) 关建，原名黄载然，1910年7月18日出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1期骑兵科。1938年起先后担任朝鲜义勇军、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供给员、副大队长，以及第3支队供给处长、参谋长，后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11师2团团团长。回到朝鲜后，担任平壤卫戍司令、铁道师师长、俘虏收容所所长。1952年任延边州法院副院长、州司法处处长、州人委办公室副主任；1965年12月任副

余的队员有李根山的夫人金华顺，还有王辉、柳登（柳东浩）、金鹤龙、崔庶华、柳昌烈、李旭成、朴根泽及夫人朴莲玉、全光一、高永禄、韩龙城、李明一、孔晓等。这19人全都来自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朱德海一行全都穿着褪色的青灰色八路军军服。

沈阳火车站到处乱作一团，难民如潮水般涌进来，又像退潮般毫无秩序地流出去，其中有许多朝鲜人。人人都穿着褴褛，皮包骨头。为了躲避土匪的抢掠，年轻女人和老人、孩子们的脸上都涂着煤末子，扶老携幼，慌慌张张地等候着开往南满和东满的火车。其中大多数是急着返回家乡的穷苦朝鲜人。

虽然已经光复，但是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里聚集着许许多多风餐露宿的难民。那个时期，伪满残余势力和土匪们利用还没建立人民政权的真空时期，利用日帝作为统治手段留下的民族矛盾，威胁着朝鲜人的生命和财产。当时，许多恶劣的民族歧视更加明显，朝鲜人不得不过着四处流浪的避难生活。那时候，越过图们江和鸭绿江返回朝鲜的行列昼夜不停地增加。国民党政府把关内地区的朝鲜人与日本人一样对待，集中到一些大城市里，没收财产后利用美国船舶送回朝鲜。另外，还制定了“东北韩侨处理规则”，把朝鲜人分类为“临时居住者”、“限时移送者”等，加以特别管理。在这样的形势下，失去生命、遭到拘禁、财产被劫、惨遭强奸的朝鲜人受害者不计其数。这是弱小民族的悲剧。

“太让人伤心了。”朱德海不知不觉中长叹了一口气。

“明明已经光复了，朝鲜人依然惊慌失措地挣扎着，没能找到出路。”李德山和金延也是满脸茫然。

“真是悲剧。这样的现象必须马上改变。到东北以后，每次看到这样的情形，就会觉得肩头沉重。今后在北满，在东北，需要

---

州长、州政协副主席。1983年3月28日病逝。

我们去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朱德海的脸上神色沉重。

“像这样四处流浪着返回朝鲜，并不是唯一的生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快确保他们在这里的合法地位，保护他们的利益和生命财产。”

朱德海想起了10年前在密山进行抗日工作时的情形。那里也有许多朝鲜人，现在是不是也像这里的朝鲜人这样背着包袱，扶老携幼地前往朝鲜呢？

光复前后，朝鲜人接连回国，人数大约为50万至100万。

北满不同于东满，朝鲜人集体居住地没有形成一定的密度，导致力量比较微弱。所以，必须尽快把他们团结起来，让他们站立起来。

### 与李相朝见面

“同志们，听元日宇同志的介绍，去哈尔滨的火车没有准确的时刻表，随时都可能发车。因此，我们必须吃住在候车室里。沈阳目前的社会治安复杂，关系混乱，必须停止一切个人行动。”

遵照朱德海的指示，大家吃住在火车站寒气逼人的水泥地上。那是真正的风餐露宿。到沈阳来接他们的元日宇后来回忆道：“……他们在出生入死与敌人战斗的革命道路上历经千辛万苦，身上有着与常人完全不同的勃勃生气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尽管生活如此艰苦，他们还是时而举行联欢会，用激昂的声音高唱革命歌曲和朗诵诗歌，有时候还跳舞，演唱苏联的抒情歌曲。我被他们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深深感动。他们还用独唱或合唱的形式演唱俄罗斯歌曲《喀秋莎》。40年后的今天，他们的歌声依然回响在我的耳边，他们的模样依然在我眼前栩栩如生。特别是现在，似乎能听到柳

登洪亮的声音。不过，朱德海政委经常是坐在一旁沉思不语……”这段回忆生动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他们在火车站等了几天以后，终于坐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那是一列装满了煤的货车。这列货车上拉载了许多从关内来的八路军战士。他们全身蒙上了一层被风刮起的煤尘，不停地高唱着《八路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这的确是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列车在第二天晚上才到达哈尔滨。朱德海一行走下火车，由元日宇领着前往松江军区司令部。在那里，他们又被介绍前往曾经是伪满军管区所在的大楼（现在的哈尔滨3中）。大楼门口站着哨兵，是个朝鲜人战士。当天夜里，他们一行住宿在大楼里。第二天一早刚起床，李相朝（金泽明）支队长就来见朱德海。

“朱政委，你老远过来，一路辛苦了。昨天晚上本来应该去车站接你们，不料被松江军区叫去了。这里的情况本来就很紧张，所以没能及时来见你。”

李相朝紧紧握住朱德海的手。他个头儿不高，身体很结实，性格看上去很刚强。

“我们从元日宇同志那里大概了解了一下这里的情况。虽然咱们在延安时就认识，没想到会在这里见面并一起工作，真是太好了。你先来做了很多工作，今后还希望你能多多帮助。”

“你太客气了。你是资历深厚的老革命家，今后还希望你能多多帮助我呢。”李相朝显得很谦虚。

“这次分为1、3、5支队，看来我是来到基础最为牢固的地方了。这与你的功劳是分不开的。没想到你已经把部队扩充了这么多人员。”

“吃完早饭后咱们就走吧。战士们都在等着你呢。”

朱德海叫来李德山、金延、黄载然等主要干部与李相朝见面。

朱德海与李相朝都是延安出身。朱德海年长4岁，两人互相尊重。李相朝是1939年抗大总校第5期学员，朱德海1940年曾在抗大延安分校国际班学习。所以，两人也可以说是同学。后来，李相朝去了晋东南，又被朝鲜独立同盟派到北满工作。朱德海直接来自于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据韩青<sup>3)</sup>在回忆录《追求革命真理的万里征途》中介绍，李相朝也曾经在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学习过，并列举了257名军政学校学员的名字。但是从时间上推算，他从抗大毕业后到晋东南工作，然后被朝鲜独立同盟派到北满的事实更加可信。哈尔滨第3支队出身的赵庆衡和金明在回忆录《为了迎接解放的曙光》中写道：“……1942年，深受党组织和朝鲜独立同盟信任的金泽明（李相朝）在‘东干班’（派往东北的地下工作者培训所）接受培训后，当年年末被派往东北。”李相朝很早就在广州中山大学学习，是朝鲜青年联合会（朝鲜独立同盟的前身）的骨干成员。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于1942年7月11日，派了许多干部前往华北、东北等地。李相朝就是在那个时期被派到东北来做地下工作的。

李相朝到了东北以后，以滨江省巴彦县一带为中心，秘密进行地下工作。他建立了“朝鲜独立同盟第12支部”，并在“8·15”以后，以哈尔滨为中心，派同盟干部前往延寿、五常、阿城、巴彦等北满地区，在保护朝鲜人利益的同时做好扩军工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300余名朝鲜人青年到哈尔滨来加入队伍。当时，李相朝去见苏联国际88旅出身的中共滨江省工委会负责人李兆麟将军。李兆麟将军答应李相朝的要求，从武器库里取出接受日军投降时缴获的武器弹药，装了两卡车给他们送去。9月25日，哈尔

---

3) 韩青，1931年从朝鲜来到东北，1938年参加朝鲜义勇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革命军政学校学习，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冤屈，受到迫害，恢复名誉后逝世。

滨保安总队朝鲜独立大队正式成立，由李相朝担任队长兼政委。

李相朝的朝鲜独立大队就这样成了第3支队的前身。朝鲜义勇军之所以只派了19人作为第3支队的成员，也是因为考虑到了这样牢固的组织基础。北满地区朝鲜人的参军热情相当高涨。朱德海率领干部队伍到达哈尔滨时，部队已经由600多人扩充到了1000余人。

李相朝后来还出现在中国朝鲜族文学巨匠金学铁的文章中。另外，白善焯在讲述朝鲜战争的回忆录《我要是后退就朝我开枪》中，提到了出现在板门店停战谈判现场的李相朝，毫无保留地突出了李相朝的刚强性格。

“……冗长的会谈（停战谈判）持续进行的某一天，李相朝正在纸上刷刷地写着什么。他突然把写好字的纸举起来让我看。纸上写着‘美国走狗还不如丧家之犬’。……还有一件事情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正在进行会谈，飞来一只大苍蝇。苍蝇正好落在正坐在那里狠狠地盯着我的李相朝的脸上。……苍蝇还在李相朝的脸上爬来爬去。那是一只躯体粗壮的苍蝇，爬来爬去肯定会引起脸部难忍的瘙痒。可是，李相朝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依然狠狠地盯着我。……那天会谈结束后返回和平村，李相朝和苍蝇的议论成了绝对的话题。……后来，李相朝在UN方代表中间获得了一个多少有些长的外号：‘苍蝇落在脸上纹丝不动的家伙’。”

白善焯特意用这样的形象来主观评价共产主义者的形象，无疑是出于非常刻意的想法，认为共产主义者是一群理念僵化、远离自然的人。其实，如果把停战谈判中的这个小插曲，作为升华李相朝性格和个性特征加以利用的话，肯定会大大提高文章的品位。

吃完早饭，朱德海就在李相朝的陪同下前往朝鲜独立大队。独立大队设在位于道里区的日本人“樱花”学校，那里驻扎着大

约一个大队的人员，而志愿参军的青年们依然络绎不绝。当天下午，来自五常县的几百名年轻人排着队走进独立大队驻地。

赵庆衡<sup>4)</sup>在《尊敬的朱德海政委》中，对那个时期作了如下回忆：

“……我最初见到朱德海同志是在1945年11月20日前后，那是朱德海同志率领从延安一起来的18名同志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当时，我们哈尔滨市保安总队朝鲜独立大队驻扎在伪满时的‘樱花’学校。那天早上，朱德海同志在金泽明（李相朝）的陪同下，来到独立大队指挥部。我们早就在等待着‘延安干部’，因此显得特别高兴。听了金泽明的介绍后，朱德海同志热情地握住我的手。他看上去30出头，身材也不像我想像中的那么魁梧，与我差不多的中等个头儿。他的身体非常瘦弱，尤其是瘦削的脸庞更是显得微黑粗糙。不过，他看上去很有毅力，两只眼睛更是炯炯有神。我第一眼就看出了眼前这位老干部多年经历过的艰辛。我向朱德海同志详细报告了建立朝鲜独立大队的过程，以及目前的人员编制、干部配备情况和装备状况等。听了我的汇报后，他露出十分满意的神情，说了一句‘你们辛苦了’。后来经常感觉到他说话总是很短。不管是什么事情，他总是很耐心地听完下级的汇报，然后简单明了地提出必须去做的实际工作。我认为，这一定是他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固有的习惯。”

朱德海在李相朝的陪同下在部队转了一圈后，立即交换了一下意见，开始忙着做撤退的准备。由于复杂的政治利害关系，哈尔滨的形势十分纠结。当时哈尔滨刚刚获得解放，局势就像春天那样多变和难料。政治、经济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可变性，甚至达到了朝令夕改的程度。

4) 赵庆衡，光复前任朝鲜独立同盟第12支部支部书记，光复后任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政治处股长。后来历任东北朝鲜人民书店经理、延边出版社社长、延边自治州工业处副处长等职务。

根据与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与进军东北的苏联红军司令部签订的协议，国民党于1946年11月16日以接收哈尔滨市的名义，用飞机把新编27军运到了哈尔滨。当时，美国从空中和地上大力支援国民党，将中国西北部地区的50万国民党军队转移到东北和华北地区。美国某军官指出，当时的转移“……一定会被记录为全世界历史上利用航空器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军队转移”。实际上，美国向中国的东北部地区派遣了5万余名海军陆战队员守卫驻军基地，直到国民党军队到达。受到美国如此支援的蒋介石军队，不仅接受了约120万日军的投降，还占有了日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另外，根据与苏联的协议，还暂时取得了在东北的合法指挥权。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松江省委和松江军区领导机关意识到，与国民党的摩擦会连带引起与苏联红军的摩擦。于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决定于11月20日主动撤离哈尔滨，搬迁到宾县。为此，第3支队也将离开哈尔滨。

根据朱德海和李相朝的命令，郑京浩、金庸震、金仁焕（后来任石岷造纸厂厂长）等独立同盟北满特委的骨干，被派到各县进行扩军工作，而第3支队将在当天离开哈尔滨。在金延的指挥下，第3支队全部人员被临时编为3个大队（每个大队配备2个中队），分别在第1大队的王辉、第2大队的柳登、第3大队的金学龙率领下离开哈尔滨。

### “延安的8公里”

第3支队初期仓促组建了3个大队，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部队的战斗力是综合素质的结晶，是以艰苦的军事训练、严格的

军纪、能够进行战斗的实战心理及战斗力磨练、目标的确立、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及义务等为基础而形成的，需要经过在一定期间的特殊教育才能完成。不过，在特定年代里，这样的教育过程往往被忽视了。

第3支队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第1大队可以说大致具备了这样的基础，第2大队和第3大队都是刚入伍的农村青年，甚至连最基本的口令也听不懂。另外，背在身后的背包也是胡乱捆扎起来的。有些战士带来了家里盖的被子，宿营时还能对付，可是有许多战士干脆连一条毯子也没有。发给每个战士的1支步枪和15发子弹，由于没有子弹带，只好把子弹随随便便地放在口袋里。

朱德海在行军途中叫来了各大队的大队长，嘱咐他们在抓好新战士基础教育的同时，还要细心地注意他们的生活问题。他还数次对自己带来的延安干部们强调：“从现在开始，你们都是部队的干部。你们作为大队长和临时中队长、小队长，在行军中要带好自己负责的中队和小队，尽量少发生问题。特别要对还没有经过射击训练的新战士加强管理，严禁他们玩枪以免发生走火。”

出发时，原来的中队长和小队长都被集中到干部教导队，临时由朱德海带来的延安干部们担任中队长、小队长和分队长。他们别说对战士们的了解，互相连脸都不熟悉。

出发时，新战士们七嘴八舌地询问部队去哪里？是否进行长途行军？当时担任第2大队大队长的柳东浩随口回答说，行军路程为8公里。部队从道里经过南岗，还没有经过马家沟，北方的夕阳就像个血红的火球燃烧了一阵后，匆匆掉了下去。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新战士们，仅仅经过这短短的急行军就已经疲惫不堪。然而，比这更困难的事情是对撤出哈尔滨是否进行了合理的解释，这合理的解释又是否已经被战士们完整地接受了。当时，许多战士都打算在哈尔滨接受短期的军事训练后，拿着枪回去保卫家乡。

现在突然撤离哈尔滨，他们在心理上一下子接受不了。在战士们中间不平不满之声毫无顾忌地流传开来。第3支队的战士们就这样开始了革命。

“延安干部们说的8公里怎么这么远？”

“8公里到底是从哪里到哪里呢？”

“这不是把我们当作什么也不懂的傻子了吗？为什么要离开哈尔滨受这样的苦呢？”

部队连晚饭也没有吃上，直到天黑才到达阿什河边，过河以后就是作为第一兵站基地的宿营地。在向战士们详细说明群众纪律后，部队过河进入村庄。

朱德海又紧急召唤干部们，再次叮嘱要在驻地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的问题，并指示三名大队长安排哨兵，按时进行检查。那天夜里，朱德海领着大队长在驻地巡视，检查是否违反群众纪律和出现不必要的口角，一直巡视到清晨，凡发现问题都一一过问。然而，清晨突然响起了杂乱的枪声，使朱德海大吃一惊：

“发生什么事情了？”

枪声分散在各处，并不是互相对射。经过核查，原来是新战士们第一次分到枪，手上发痒，就在清晨胡乱放起了空枪。

这就是第3支队钢铁般的战士们初期的基本军事素质。战争和特殊年代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他们培养成了钢铁般的战士。第3支队经过这样的过程，最后经由香坊等地，到达宾县的蜚克图。

1945年11月25日，在宾县蜚克图酿酒厂召开了朝鲜独立大队全体军人大会。尽管是刚过立冬，小雪才开始的季节，但是北方干冷的天气早已送来了严冬的寒意。大会由李相朝主持，首先介绍了朱德海等延安来的干部，接着由政委朱德海宣读了朝鲜独立同盟和义勇军司令部的命令。

哈尔滨保安总队朝鲜独立大队改编为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的

命令宣布后，又宣读了第3支队指挥员的人事名单，分别为支队长李相朝、政委朱德海、副支队长李德山、参谋长金延、政治部主任李根山、供给处长黄载然。第二年，李德山代替李相朝出任支队长，后来还参加了朝鲜战争。参谋长金延是中国军官学校出身，朝鲜义勇队成员，曾经担任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第4区队副区队长。李根山毕业于延安抗大，曾是朝鲜民族革命党和朝鲜独立同盟中央委员，朝鲜独立同盟的主要成员。

第3支队编为4个大队，分别由王辉任第1大队大队长，柳登任第2大队大队长，金学龙任第3大队大队长，高永龙任教导大队大队长。4个大队由6个中队组成，再加上警卫队、卫生队，总兵力达1000余人。

第3支队指挥部成员都是长期参加抗日战争和朝鲜独立运动的革命家，各大队的大队长和中队长也大部分是延安朝鲜军政学校出身。赵庆衡是这样回忆这个时期的：

“……在宣布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成立的大会上，我们第一次听到了朱德海同志的演讲。他指出了中国革命中东北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指示精神。接着，他又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和革命力量，配合兄弟部队打倒反动势力，肃清土匪，创立牢固的后方根据地等支队当前的任务。朱德海同志的这次演讲成为后来第3支队的行动方针。”

朱德海一生中，再没有像在第3支队时那样资料齐全的时期。这是因为第3支队出身的老革命家们陆续出版了传记和回忆录，不仅具有生动的史料性价值，而且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资料。其中，原哈尔滨民委副主任徐明勋<sup>5)</sup>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所

5) 徐明勋，1931年12月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1948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6月毕业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政治

著的《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的诞生和活动》成为了解第3支队全部活动的指南。

## 肃清土匪

历史证明，东北清算日本走狗和肃清土匪斗争，从农民单纯的经济利益斗争最终升格为政治斗争。

在涉及东北的肃清土匪斗争时，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是不能被忽视的。那就是无论在东满、北满，还是南满，都是由朝鲜民族自发的武装队伍率先打响肃清土匪第一枪的。在镇压延边的“田富兴武装叛乱”、通化的“2月暴乱”、牡丹江的“5·15叛乱”、五常的土匪暴乱等日满残余势力和土匪的反革命暴乱的战斗中，朝鲜民族武装队伍立下了不朽功勋。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展开大规模的作战，大举消灭东北境内的土匪时，民主联军内的朝鲜民族健儿也显示了无比的勇敢和智慧。

1945年8月19日，苏联红军进入哈尔滨，成立了苏军卫戍司令部，对哈尔滨市实施了军事管制。苏联红军任命原东北抗联领导人、在88国际旅工作的李兆麟将军为滨江省副省长。李兆麟将军成立了“抗联哈尔滨办事处”，开展革命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东北局派了钟子云、王建中等20余名干部来到哈尔滨。钟子云到哈尔滨以后，与李兆麟携手在当年10月中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滨江地区工委会”，由钟子云任书记。

---

系，1946年至1952年12月担任牡丹江市政府教育科科长、民政科民族股股长、松江省民政厅民族事务科科长等。后来担任哈尔滨市委统战部民族处副处长、哈尔滨市民委处长、哈尔滨市民委副主任、哈尔滨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等职务。出版了《恶魔的饱餐》3部（合著），担任《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主编，《黑龙江省朝鲜民族》副主编，发表《朝鲜民主联盟北满特委》等数十篇论文。

然而，哈尔滨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除了哈尔滨、佳木斯等大城市有苏联红军驻扎以外，其他县城如方正、木兰等城镇，以及山势险峻的要冲，都被形形色色的政治武装和土匪所占据，做尽了暗杀共产党军政要员、杀人、放火、抢劫等各种坏事。李兆麟将军就是在这个时期遭到了暗杀。特别是政治土匪还挑起民族矛盾，大肆排斥朝鲜人。这样的政治土匪在当时的东北多达9万余名，其战斗力也十分强大。谢文东、李华堂等国民党正规军将领在后面操纵着这些土匪。政治土匪是由当地的地主、警察等特权势力组成的武装组织，经常使用“地下军”、“先遣军”、“挺进军”等各色各样的番号和名称，成为国民党在东北的社会基础。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就是以当时在北满和东满密林中开展肃清土匪斗争为素材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土匪们经常袭击共产党建立的县区民主政府，破坏公路和铁路，扰乱政权组织和社会治安。东北局和自治军认识到，想要建设强大的东北根据地，首先需要打击这些政治土匪和武装土匪，以消除后患，于是下达动员令尽快肃清土匪。

1946年2月，第3支队集结在延寿县柳河屯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参加肃清土匪的战斗。

第3支队指挥部在柳河屯的一户农民家里召开了第一次作战会议，会议由朱德海主持。

“北满分局和松江军分区已经下达了命令。命令第3支队与兄弟部队配合，首先解放木兰县城。形势紧迫，下面由李支队长下达作战命令。”

朱德海刚说完，李相朝就站起身来环视了一下与会者，然后铿锵有力地说道：

“我已经和朱政委讨论过，各大队和支队总部将根据下面的作战方案行动。柳登的第2大队2中队与金学龙的第3大队，由我

和金延参谋长率领，占领木兰通往东兴的大路，切断敌人的退路，阻击外来的增援兵力。第1大队和第2大队的1中队和3中队由朱政委率领，与359旅主力部队配合作战。359旅在延安时期就是有名的作战部队，也是带头进行大生产运动的部队。因此，该部队从指挥员到战士有着丰富的指挥经验和作战经验。这次朱政委与他们一起行动，是因为朱政委在延安时期曾经担任过359旅作战部队特务连的指导员，因此在各个方面都比较方便。经过与朱政委的讨论后，才作出了这样的安排。”

该作战方案的目的是为了把集结在木兰、通河、东兴等县城的土匪完全孤立起来，然后一一歼灭。第3支队建立后的第一次战斗就是肃清土匪，一般被称为木兰战斗。第3支队的李原宇<sup>6)</sup>和吴相运对当时的战斗作了如下回忆：

“木兰县城位于哈尔滨以北的松花江北岸，是水陆交通的要冲，盘踞着2000余名武装土匪，与东面的东兴、延寿，东北面的通河，西面的巴彦、海伦，南面的呼兰等地区的土匪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呼应，并以此作为国民党‘中央军’进军东北的内应。土匪在木兰县城周围修建了许多碉堡，配置了重机关枪、轻机关枪等武器。土匪们还强行动员了县城内不情愿的居民们向土城里灌水，将整座县城建成了难以攻破的冰冻要塞。”

吴相运<sup>7)</sup>副班长所属的第2大队2中队（中队长为柳昌烈）和第3大队，在李相朝支队长和金延参谋长的指挥下，一早开始急行军进入指定的战斗区域。那是离木兰以东15里的大路边。金延参谋长说明了占领木兰通往东兴和通河的大路，切断敌人退路，阻击外来援兵的任务。他们刚越过大路，就发现了乘坐汽车而来

---

6) 李原宇，曾任第3支队小队长、副中队长，后来历任中学教员、教导主任、校长等职务。

7) 吴相运，第3支队副分队长、护路军连长，后来任哈尔滨市民主乡副乡长。

的土匪部队。木兰战斗以一场遭遇战拉开了序幕。战斗处于对峙状态，进行了很长时间。土匪们被火力压制，一连死了好几人，不得不仓皇败走。在战斗中，第3支队第2大队2中队队长柳昌烈胸口受伤，1小队队长李永九肩膀受了重伤。

第二天，李原宇小队长（战斗前被任命为副中队长）所属的第1大队2中队（中队长为崔瑞华）在朱德海的率领下，离支队总部，与主力部队359旅一起行动。当时，2中队与第2大队的1中队也有着一定的距离。参加战斗时，根据朱德海的命令，2中队留下通讯班和炊事班，轻装投入战斗。

率先到达的部队一连两次攻打县城，都没能攻破。土匪的火力十分猛烈，而且冰墙后面是没有任何隐蔽物的平原地带，很容易用火力压制我军的进攻。不过，他们的“冰冻坦克”并没有起到盾牌的作用，因为朱德海率领的第3支队2中队已经抢先攻入城内。木兰县城就此得以解放，时间是1946年2月20日。

木兰县城解放后，由第2大队1中队保卫县民主政府和县城。第3支队各大队分成几路，转战于东兴、通河、延寿、尚志等地，继续打击土匪。木兰县城的解放，大大挫败了北满一带的土匪气焰。第3支队所到之处，首先保卫县和地方民主政权的建设，同时深入朝鲜民族群众中间，开展宣传活动和爱民工作，继续进行扩军工作，壮大部队力量。第3支队属于松江军区，第1大队留在宾县担任松江军区司令部的警卫工作。

作为第3支队的政委，要做的工作堆积如山。自从第3支队成立后，朱德海就始终没有放松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部队的整顿和军事训练。大部分战士都是赤手空拳盲目地从农村来的年轻人。不仅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而且还要从队列训练和“立正”“稍息”等最简单的规定动作开始重新学习。我军的官兵一致是从红军时期开始倡导的部队建设新模式，而且经过延

安时期，进一步继承发扬为共产党军队的传统。朱德海认为，干部在政治工作中不仅要讲理论，更应该发挥亲和力，给战士们传达温暖的人情，并在此基础上拓宽与战士们的沟通关系，从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把部队的全部工作都放在这个大框架里进行。这既是官兵一致的基础，也意味着战斗力。朱德海尽量挤出时间深入战士们中间，倾听他们的要求，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

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4月28日12点，苏联红军根据协议撤离哈尔滨市。第3支队与兄弟部队一起包围了哈尔滨市，做好了苏联红军撤离后发起进攻的一切准备。当时，第3支队的前线指挥部设在沙满屯，由朱德海亲自指挥战斗。当时在哈尔滨市内有一支属于国民党系统称为“韩国进修队”的武装部队的一个中队。4月29日民主联军发起总攻的前一天，他们携带武器举行起义，投奔第3支队。朱德海指示柳东浩把这支部队编入第3大队。第3支队配合民主联军，很快就攻入了哈尔滨市内。当时，哈尔滨市内虽然布有三四千人的国民党军队，但是在民主联军的强攻下节节败退。

支队总部进入哈尔滨市内后，与第1大队一起驻扎在位于南岗的原日本领事馆。第3支队的主要军事任务是保卫哈尔滨市。第1大队在道里区和道外区，第2大队在太平桥区和三棵树一带，第3大队在南岗、香坊区一带，各自负责当地的治安工作。

这个时期，支队长李相朝返回朝鲜，副支队长李德山尚未接任支队长，由朱德海统辖第3支队的全部军政业务。当时，第3支队的兵力有3000余人。支队从哈尔滨撤离时，根据朱德海和李相朝的指示留下坚持地下斗争的郑京浩、金庸震、许锡九、金仁焕等独立同盟北满特委的骨干们，一直通过各县的独立同盟组织，继续进行扩军工作。另外，五常、尚志、巴彦、宾县、方正等县里，由朝鲜青年们组成武装大队或中队，参加保卫家乡、肃清土匪的

战斗。他们的指挥员和军事干部都是在第3支队教导队接受过训练的朝鲜人，都是由朱德海亲自调拨的。

进驻哈尔滨后的某一天，一位老人到设在领事馆的支队总部来找朱德海。

“我就是朱德海。请问您老人家有什么事情？”

“我听说哈尔滨有我们的军队，就找来了。”

老人自我介绍是五常县独立同盟的负责干部，并且详细地讲述了五常县的情况。听了老人的介绍，才知道发生了新的情况。五常县原先有支朝鲜人青年组建的县大队（约600余人）。虽说是武装队伍，却只有几十支长枪而已。于是，许多队员只好携带军刀或长矛保卫县民主政府，守护县城。可是，春节前几天，遭到了2000余名土匪的突然袭击。朝鲜青年武装队与更具优势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许多街道都落到了敌人手里。但是，保卫县民主政府的队员们寸土不让，继续进行艰苦的战斗。

幸亏当时民主联军（八路军359旅）运载武器和春节物资的几辆卡车前往长春时路过五常，利用车上装备的机关枪一阵猛烈的扫射，才迫使土匪们仓皇逃走。359旅的白司令员十分赞赏朝鲜人军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和县政府主要干部商议后，从该大队中带走了一半人员（30几人），（这一半人员组成的中队后来成了有名的钢8连）而五常县朝鲜人大队只剩下了一部分人员，既没有武器，更缺乏指挥员。

朱德海从老人那里了解了详细情况后，让李德山物色去五常担任部队指挥员的人选。经过考虑，现任第3大队队长的金学龙<sup>8)</sup>被认为是合适的人选。朱德海把金学龙叫到支队指挥部。

---

8) 金学龙，1939年加入朝鲜义勇军，历任第3支队第3大队队长、五常独立团副团长、东北民主联军铁路护路军第1团副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12纵队近卫团副团长、哈尔滨河运学校办公室主任、东宁县副县长等职务。

“学龙同志，你马上做好大队长移交工作，跟着这位老人立即到五常去。那里本来有大队长，因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负伤再度复发，无法指挥部队。现在派你去指挥部队，并且要依靠五常县民主政府，进行独立作战。”

金学龙接受朱德海的指示后，一到五常，就在中共五常县委的全力支持和协助下，首先从扩充县大队的工作着手，并改称为“独立4大队”，意为所属于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他把全体队员编为3个中队，又考虑到地方工作的必要性，组织了1个女子小队。他们千方百计补充武器弹药，还到拉林河去打捞了日军败亡时扔在河里的数百支枪和成箱的子弹，还在那里打了一场记载在第3支队历史上的山河屯保卫战。这个时期，还有许多第3支队干部，像金学龙这样受朱德海派遣，下到哈尔滨附近的县城。

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以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松江省委、松江军区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搬迁到哈尔滨市。

第3支队担任哈尔滨市的卫戍任务，守卫东北局等省市的主要党政机关，负责保护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东北局副局长兼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松江省委书记张秀山、松江军区司令员聂鹤亭、省委副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等许多中央和省市领导同志。另外，第3支队还负责守备武器、弹药、粮食、药品、服装等军需仓库，以及松花江铁桥、发电站、大型厂矿企业等；同时还守卫监狱，参加执法队，维护市内治安，并派遣一部分兵力到郊区去保护民运工作和土改运动。徐明勋先生在执笔《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的诞生和活动》时，采访了当时任松江公安总队政委的肖燕波，据肖燕波回忆道：

“朱德海和金泽明（李相朝）率领的朝鲜部队有着很强的艰苦奋斗精神和组织纪律性，战斗力也很强，无条件执行上级下达的

任务和命令。当时虽然武器不足，但是在守护武器仓库时，从不私自挪用一支枪和一颗子弹。尽管吃穿的情形很差，但是没有一句埋怨，宁肯冻着手脚保卫好党政机关和首长们。当时，军区内共有 56 个团，而第 3 支队是最受信任的部队，为哈尔滨的卫戍和治安立下了极大的功劳。……那时候，首长们非常关心第 3 支队。陈云同志曾经指示过我：‘朝鲜人的武装队伍全部交给朱德海同志领导，而我们要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和支持他们。一切方面都要同等对待，特殊的问题要特别解决。’聂鹤亭同志也经常指示要给他们‘创造好的条件’。第 3 支队虽然是团级编制，但是，上级根据他们的功劳，给予旅级待遇，不仅给指挥员们配备了手枪，还给了他们 30 匹马作为交通之用。”

第 3 支队进驻哈尔滨以后，严格遵守纪律，出色地完成了卫戍任务，受到了东北局和松江省委的绝对信任。时任松江省委副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的钟子云，曾在纪念哈尔滨解放 40 周年写的题为《革命、战斗、胜利》的文章中写道，哈尔滨解放后，“朝鲜义勇军第 3 支队是哈尔滨警卫部队的骨干”。

朱德海在部队严格遵守“生活上多加关心、纪律上严格要求”的原则，一旦战士们忽视或违反群众纪律，必定严加处理。去农村执行肃清土匪任务的一部分战士中间，曾经发生过搜查汉族农民的家，焚烧房子的事情。朱德海听了汇报以后，立即把该战士所属中队集中起来，详细听取了事情的经过，并对粗暴的工作作风提出了批评：

“在肃清土匪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绝对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但是，绝不能因为出现了牺牲，受到了损失，就不加区别地焚烧农民的房子，那和土匪还有什么两样呢？再说，那个农民是汉族农民，那个村子也是汉族集中的村子。进入这样的村子，以藏匿土匪为由随意搜查，放火烧房，认为只有狠很地教训一顿，以后就不会

包庇土匪了。这样的认识和行为虽然能发泄一时的愤怒，却很容易造成远离群众的后果。今后绝不容许出现违背我党群众工作原则的行为。”

以这一事件作为典型，朱德海对部队进行了一次严肃的教育，并在干部会议上指出：

“问题不在于烧毁一户农家，那户农家的成分和对那个村子造成的后果才是大问题。由于日本人推行的民族离间政策，造成现在北满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正在散布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在这样的时期发生这样的事情，必然会让这些人大声叫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事实的真相，大肆宣扬朝鲜人军队去汉族村庄烧毁民屋。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因此，今天在座的各位指挥员，要把这件事情作为教训，对自己的战士更好地说明深刻的利害关系，坚持不懈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在朱德海严明纪律和全体战士的努力下，第3支队的群众纪律大有好转，每到一个地方，就积极开展帮助贫困户家庭解决困难等热情的爱民活动，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朝鲜人八路军”。

在肃清土匪的战斗中，第3支队在北满大地上获得了赫赫战果，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1946年9月初，驻扎在香坊的第7中队从当时的香坊区委那里接到了沙里屯一带有一帮土匪正在作恶的情报。中队长李永泽，副中队长朴万根与区委武装委员一起，率领1个小队立即向沙里屯出击。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在敌人逃跑之前迅速地加以消灭。没想到却遭遇了敌人的伏击，在地形极为不利的西沟里，小队战士们英勇抵抗，却因为寡不敌众，导致中队长李永泽在内的21名战士壮烈牺牲。

听了一名身负重伤跑回来的战士报告后，朱德海命令大部队火速增援，但为时已晚，敌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9月6日，在机

场巨大的飞机库里举行了追悼仪式，有 3000 多名战士和群众参加。朱德海、郑京浩、崔采等第 3 支队的首长们主持了追悼仪式。

当天参加追悼仪式的金贞顺作为延边地区唯一的幸存者（长春地区有曹贞子幸存下来），回忆了追悼仪式的情形：

“这是第 3 支队头一次遭遇到的最大人员伤亡。当时朱德海政委向我们女子中队下达命令，让 21 名女战士换上白衣，捧着 21 名烈士的神主牌位。当时我也穿上白衣，手捧神主牌位。追悼仪式由我的入党介绍人郑京浩主任主持，朱政委（朱德海）作了追悼演讲。朱政委讲话时充满了悲愤，连声音也微微发颤。直到今天，我的记忆还十分清晰。朱政委从不摆架子，有很强的亲和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朱政委发火生气或责骂过谁。那天，朱政委的讲话和气色都非常悲壮。”

烈士们的遗体被安葬在某个公墓（有着苏军墓地和纪念碑的地方）。现在，“二十一烈士之墓”纪念碑矗立在哈尔滨市烈士陵园里，碑文中写道：“1946 年 9 月在阿城县沙里屯附近讨伐匪敌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东北民主联军 8 团（原朝鲜支队）21 名朝鲜族战斗员永垂不朽！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 1957 年清明节”。尽管碑文写得十分简略，但还是包含了纪念 21 名烈士的深情。碑文中提到的“原朝鲜支队”就是指第 3 支队。第 3 支队虽然拥有松花江第 3 支队、民主联军第 3 支队等比较混杂的名称，但全都是指朝鲜义勇军第 3 支队。在这个革命烈士陵园里还能见到陈翰章将军及汪雅臣将军的陵墓。

1950 年，陈云在北京就第 3 支队活动时期向延边人民表示了感谢：“我在东北局工作期间，真正理解了朝鲜民族。朝鲜民族真的是值得信赖的民族。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朝鲜族人民作战勇敢，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向朝鲜族人民表示深深的感谢。”

1946年6月，支队长李相朝、参谋长金延、政治处主任李根山等3名支队领导返回朝鲜后，第3支队的领导机构也发生了变动。朱德海依然担任政委，另外任命李德山为支队长，关健为参谋长，郑京浩为政治处主任。

## 土改运动

日本的投降给东北大地带来了相应的剧变。第一个剧变是原先隶属于日帝的东北迎来了光复。第二个剧变是日本投降后处于真空状态的东北，出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统治集团，并使用枪炮进行着大规模的较量。这场较量的前哨战就是土地改革。那是一场衡量双方政纲、政策孰优孰劣的根本性战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1946年7月，中国共产党派遣土改工作团进驻农村。中共东北局和民主联军在全东北派遣人数达到12000名的土改工作队进驻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打下了土改运动的基础。1947年10月，中央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进一步废止了历代以来持续维持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土地私有制。原先一直维持的既得利益阶层的灭亡，意味着新的阶层的诞生。

在这之前，国民党蒋介石早在1930年南京政府期间就曾通过和发布租税不能超过37.5%减租减息法令。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又发布了“特天字第70号密令”，明确了与共产党土地政策的竞争关系。不过，蒋介石依靠的是既得利益阶层，而毛泽东依靠的是人民大众，从而确保了支持的基础。

1945年秋天，除了贫穷的陕北、中原、东北的一部分城市，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控制了中国的主要城市和作为主要基础的产

业基地及设施，以及中国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军事方面也以美国支援的最新式武器来武装。然而，与之相对抗的共产党的战斗力还不到国民党军队的一半，装备仅仅是毛泽东所承认的“小米加步枪”。

可是，当时了解中国内情的国内外人士一致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只不过是外强中干的虚像而已，很快就会像沙塔那样土崩瓦解。之所以作出这种判断，首要原因是因为腐败已经蔓延到了高层范围内。从两万五千里长征时期到延安最困难的“八路军”时期，常驻中国的外国军事家们始终认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共产党拥有更加稳定的指挥体系，而且政治正统性也更强。他们还认为，如果真的发生内战，不管有没有苏联的帮助，“延安政权（共产党阵营）”取得最后胜利的几率极高。

蒋介石和国民党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尽管美国以军事援助的名义给了国民党巨大的资金，但是大部分都被极少数人所独占。前陆军参谋总长乔治·马歇尔五星上将受杜鲁门总统的特命来到中国，对蒋介石提出严重警告，绝对不能把脚踏进包括延安在内的共产党根据地。依马歇尔看来，毛泽东和共产党军队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进行着一场与蒋介石完全不同层次的特殊战争。不过，蒋介石并没有听取马歇尔的警告。

这个时期，共产党虽然十分贫穷，但是充满了自信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无数劳苦大众形成了紧密的联系，拥有毫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如同马歇尔所见，毛泽东和共产党军队正在准备打一场全新概念战争。那就是从一开始就依靠武力，同时确保普通民众支持的人民战争。土改运动其实就是一场争取最终胜利的基础战争。

已经去世的张逸民（曾任自治州文化处处长、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在回忆录《参加土改工作队》中对第3支队时期作了这样

的回忆：

“我下定决心，在1946年春天去见独立同盟五常县盟负责人和县大队大队长金学龙同志（朱德海派来的原第3支队第3大队大队长），表示了参军的意愿，却没有如愿。后来，我听说从延安来的朱德海同志是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的政委，于是就和在一起当教员的安钟元同志到哈尔滨去见朱德海同志。当时我们俩还约定，这次还不能如愿的话，不再马上回家，即使耍赖也要达到目的。……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指挥部，首先请求接待室的同志，让我们见一下朱德海同志。……后来，我们被领到朱德海同志的办公室。我们刚进去，朱德海同志就请我们坐下，亲切地问我们有什么事情。我认为时机到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说明了来意：‘朱政委，我们在五常地区某学校教书。我们作为年轻人，不愿待在后方。我们想参军到前方去打仗。因为县联盟和县大队都没有同意我们的请求，我们感到很伤心。希望您一定要批准我们的请求。’朱政委听完我们的话以后说：‘我明白你们的心意，想参军的热情也很好。但是，你们应该明白现在从事的教育工作也相当重要。如果你们学校谁都想参军的话，学校由谁来办呢？另外，独立同盟、建国青年会的工作由谁来做呢？你们还应该明白，五常联盟之所以不同意一部分同志参军，因为这正是我们支队的意思。你们另有要做的工作，所以先回去把学校办好，以稳定民心。’这样一来，我们的愿望又成了泡影。”

后来，张逸民接到五常县独立同盟的通知去第3支队教导队学习，前往哈尔滨市香坊机场。教导队教导员是崔采。教导队分为军事队和地方队，为培养民族干部和民运工作队经常组织学习班。张逸民领着爱人一起被编入地方队参加学习。开学第一天，朱德海在崔采和大队长高永禄的陪同下来到学习班，而且最先走上讲台演讲。

“他看上去 30 多岁，身体非常瘦弱，脸颊虽然很瘦，但是看上去很刚毅。说话高低不甚明显，缓慢而有条理。那天，他讲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特别详细地讲述了摆在地方队面前的任务。讲话的具体内容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但是讲话中对民族问题的解释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摘自张逸民回忆录《参加土改工作队》）

客观来说，朱德海的口才确实不太好，汉语表达能力也比较弱。用现在的话来说，不是一位能说会道的人，而且说话比较缓慢。对此，许多老干部，特别是对朱德海十分了解的老干部们更是一致予以确认。接受采访的许多老干部还证实，朱德海抽烟抽得非常凶，喜欢边卷着土烟边演讲。他往往深深地吸一口烟，暂时中断演讲，闭上眼睛，然后把烟灰弹在烟灰缸里。但是，朱德海在演讲中并不是讲上一大堆抽象的理论，而是讲得十分通俗，让听众们容易理解。

金贞顺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朱德海：“我在教导队学习期间，第一次听到朱德海政委的演讲。一开始我有些担心，延安来的大干部假如专讲一些难以理解的理论怎么办？不料，他不仅讲得很有耐心，而且很容易听懂……从那以后，我们女子中队的女战士们都非常喜欢听朱政委演讲。当时，第 3 支队的战士们都来自于农村，文化水平不高，有许多人还是文盲。这些人对中国发展史和苏联共产党史那样的讲课实在难以理解，根本听不懂。但是，朱德海政委的讲课却十分容易听懂。后来朱政委到延安担任州委书记和州长，在工人文化宫等场所演讲时，在公园里面面对数千人演讲时，讲得都让大家容易听懂……”

特定时期特定场所中，行动和通俗的东西比理论更容易被迅速接受，符合听众水平的激情演说，往往能够达到最大的沟通效果。

“你们都是我们革命队伍中金子般的宝贵骨干。你们知道为什

么说是金子一般吗？因为革命需要像你们这样作好了准备的干部，没有干部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成功。但是，干部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像你们这样坐下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学习，才会逐渐成为优秀的干部。所以才另外组建了教导大队。等到学习结束返回社会，有许多工作需要你们去做。因此，你们要好好学习和训练，尽快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你们必须相信自己。在座的某些同志存在着自己识不了几个字，光靠学习能提高思想水平吗？农民出身的人经过学习能成为干部吗？等等有许多顾虑。其实，我也是农民出身，我们第3支队的指挥员大部分也都是农民出身。你们大概也听说过，我们从延安时期起就深刻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在那么艰苦的岁月里还建立了军政学校。现在北满许多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都经历了向你们这样的学习过程才逐渐成长起来的。所以说，干部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首先应该相信自己。”

原以为朱德海是个来自延安的大干部不好接近，但是，当看清了这位支队政委是个为人潇洒、毫无架子、品德优秀的人之后，谁有了困难都会找上门去。朱德海被看作是第3支队的核心。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朝鲜人集居地区，朱德海被认为是个传奇般的人物。金明汉<sup>9)</sup>在回忆那个时期时说：

“我至今依然记得朱德海同志的演讲曾让我心潮澎湃。那是在我参军前夕的1946年5月中旬。朝鲜义勇军在哈尔滨市道里区‘胜利电影院’召开大会，朱德海同志作了关于朝鲜人民前途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回顾了白衣同胞难以忍受日帝的折磨，背着简陋的

---

9) 金明汉，出生于1922年11月27日，第3支队出身。194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起先后历任和龙县委组织部部长、延边党校副教务长、州委组织部科长、延吉县委书记、州委副书记等职务。“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8月至1968年8月接受审查，1968年8月起先后担任延边州革委会副主任、州委副书记、延边州委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吉林省委常委、吉林省委农委会副主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吉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行李，举家来到东北，却依然呻吟在日帝蹂躏下的血泪往事，又谈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帝英勇战斗的历程。他还铿锵有力地指出，为了朝鲜的独立和朝鲜人民的彻底解放，朝鲜人民必须团结一心，才会有光明的前途。我被朱德海同志的演讲深深感动，觉得浑身涌动起新的力量。为朝鲜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斗的信念，成了我以后克服一切困难做好工作的强大精神力量。”

金明汉的感受也是当时第3支队全体战士的共同感受。

在第3支队堆积如山的工作中，朱德海首先把心血倾注在培养农村工作干部上。他把战士们组成民运工作队派到农村去，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我记得那时大概在道里区的一个旧电影院里……在那里召开了农村工作队动员大会，朱德海政委作了动员报告。当时，第3支队的干部和战士，以及教导大队队员们都参加了大会……”金贞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动员大会的情形。她的记忆没有错，朱德海的确作了动员报告：

“同志们，中共中央东北局在1946年3月20日发布了‘关于处理日本侵略者和傀儡政权土地的指示’。也就是说，东北的全部土地原来掌握在‘东洋拓殖会社’、‘东亚劝业会社’、‘满洲拓殖会社’等日帝及傀儡满洲国的经济掠夺机构和亲日走狗、大地主等少数人的手中，还有就是拓荒地、国有地、军用地等‘共有地’。我们要把这些土地全部无代价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还要开展清算走狗、减租减息的运动，组织和发动农民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说到这里，朱德海环视一下电影院里坐得满满的战士们，稍微停顿了一下，习惯地把手伸进衣兜里掏烟包。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报告，便立即打消抽烟的念头，继续往下说：

“刚才，我简单地讲了东北的形势。归结起来就是干部要带头

执行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也就是在座的地方队、教导大队的同志们要带头执行。今后，中央将继续下达有关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到时候，我们就要带头下到农村去。”

朱德海凭借对政治的敏感认识到，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只是前奏，因此期待着尽快发布有关土地的法令。没过多久，朱德海的政治预见就得到了证实。

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同年12月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补充方法》。该补充方法中规定，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都能分配到土地，都能拥有土地所有权。中共中央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政策，使得朝鲜族农民成了堂堂正正的主人公，成了土地的主人。当时，东北境内的解放区正在开展土改运动。朱德海培养的第3支队教导大队队员和朝鲜独立同盟北满特委组织的民运工作队（土改工作队）大举深入农村，开始了北满朝鲜人集居地区的农村土改工作。

当时，中共东北局把三分之二以上的干部编入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土改工作的成功，也使共和国成立后每当在中国广阔大地上成为转折点的历史时期，都会反复使用向基层派遣工作队的工作模式，从而建立起庞大的组织实施系统。当时的工作队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主导土改运动的权力象征。这又是中国特色的工作模式。

朱德海抽出很多时间来讲课，以通俗的语言讲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社会发展史、居住在中国的朝鲜人的移民史和生活史、永远居住中国的理由和合理性。后来还对周保中“朝鲜人(族)是中华民族堂堂的一员”的讲话进行了解释。这是周保中在1946年12月吉林省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据朱德海的解释，不仅是东满，包括南满和北满的朝鲜人，与中国共产党齐心协力进行抗

日战争，开拓东北的广阔土地，而且有共产党群众基础的地方几乎都是朝鲜人的聚居地。他还特别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延边地区的开拓史，使许多战士和队员逐渐了解东满，了解了东满大地是朝鲜人的聚居中心。

只要有空闲时间，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朱德海都会深入教导大队和地方队的宿舍。

有一个星期天，张逸民和李仁顺（后来成为延边歌舞团独唱演员）听说朱德海来到教导队，就去邀请他到班里来。朱德海微笑着摸了摸李仁顺的头说：“你这小鬼有什么好事情来找我？是不是想家了？”当时李仁顺只有12岁，年龄最小。张逸民则是班里的班长。

“你们大家平时都说，有许多话要对朱政委说。今天根据大家的要求把朱政委请来了，千万别错过机会畅所欲言吧。”

二十几名队员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言，几乎是异口同声。有的队员问学习什么时候结束，有的问是否真的要作为民运工作队去农村，有的问什么时候能去朝鲜，有的问依然住在中国可不可以……

“哈哈，不要急嘛，一个一个提问。”朱德海笑着坐在队员们拉过来的长凳子上，开始卷起烟来。他烟瘾很大，微微闭上眼避开时而在眼前升腾的烟雾。

“关于去朝鲜的问题，无法用一句漂亮的话来决定行还是不行，因为那不是能够自由成行的问题。这次李相朝支队长和金延参谋长等虽然去了朝鲜，但那是根据朝鲜的形势需要，经朝鲜要求，而且如果是中国共产党员的话，还需经过上级党组织的批准。关于去朝鲜的问题，还需要再等等看。不过，依我来看，在这里要做的事情也很多。换句话说，我们怎么能抛弃自己开拓的土地到别的地方去呢？在你们中间现在想去朝鲜的请举手。”

朱德海看了大家一眼，笑了笑接着说：

“瞧瞧，不是一个人也没有吗？扔下父母妻儿离家出走，确实是不现实的。因此，就只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有许许多多的朝鲜人住在中国，尤其在延边那里生活着比这里多得多的朝鲜人。”

此时，张逸民又提出了参军的要求：

“虽然我哪里也不去，但是有一个要求。要不现在就把我调到军队去，要不学习结束后把我调到部队去。”

“其实你借着全班同志的名义来请我时，我已经猜到了你会提出什么要求。你以为自己现在只不过是个学员，其实严格地说现在你是战士。不一定拿枪的就是战士，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你们大家绝不能忘了自己是一名战士。”

朱德海神情严肃地对张逸民说：

“春天你就提出过参军的要求，今天又提出要求参军。做什么样的工作，本人的要求固然重要，但还应该懂得服从组织的安排。这是革命者应遵守的纪律。这次学习结束后，北满各地都在盼望着你们的到来。这项工作比参军更为重要。”

即将面临更为重要的工作，朱德海耐心说服队员们尽量做好思想准备。

后来，朱德海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把第3支队教导大队培养的地方干部组成民运工作队派往各地。其中大多数是第3支队教导队第1期学员和朝鲜人干部训练队的学员。他们在第3支队政治部和中共哈尔滨市委民运部的统一领导下，积极指导市郊朝鲜人农村的土改运动。土改运动开始后，从农村乡镇和青冈、北安、德都等地逃难到哈尔滨市区来的150多户难民，被安排在香坊区幸福乡，把100多间房屋和200多公顷土地无偿分配给朝鲜人农民。深入到北满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朝鲜人集居地区的朝鲜人民运工作队，把土地、农具、牲口、口粮等分配给了当地

农民。

1946年5月23日之前，苏联红军完全撤出东北。同年10月，哈尔滨的形势又紧张起来。在美国海军运输船和空中运输机的帮助下，蒋介石向东北派遣了大量用美制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不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就不断进行挑衅，还敢于对延安和共产党根据地发起进攻。其实，中共中央早就估计到蒋介石和国民党会采取这样的方式。中共中央针对东北战场变化无常的状况，实施了一切必要的措施。在蒋介石的优势兵力面前，放弃了必须把根据地和阵地建立在大城市、中心城市和县城的战略。也就是说，让出大路和城市。再加上美军大规模的支援持续不断，国民党军队统治和布阵的范围暂时扩大了不少。不过，那只是短暂的。蒋介石的统治政局不久就陷入不可挽救的混乱，完全丧失了民心。

针对这一时期，美国的一位新闻专栏作家写道：“蒋介石军队完全按照共产党所写的台本发动了战争。”也就是说，共产党在对抗规模庞大、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时，并不是按照国民党的主观动机，而是根据自己的战略和战术来进行战争。

1946年秋天，国民党军队强占沈阳、四平、长春，并做好了以大规模兵力侵占哈尔滨的准备。哈尔滨的形势变得十分紧迫，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指挥部出于对教导大队等非战斗部门人员的安全考虑，作出了进行第2次（第1次撤离哈尔滨是1945年10月）疏散的决定。朱德海与支队长李德山和政治部主任郑京浩一起到教导队召开了紧急大会。朱德海在大会上讲道：

“同志们，教导大队暂时不能继续在这里安全地学习了，因为国民党不想让我们坐在这里学习。因为我们在战略上必须让出大路和哈尔滨，所以教导队的同志们将被疏散，撤退到后方的方正县去。”

朱德海暂时停了一下，看了一眼与会的战士们和地方队学员

们。学员们听说又要撤离哈尔滨，带着紧张的表情交头接耳。

“好了，大家静一下。尽管要撤离，丝毫用不着紧张。这次的撤离同样是战略性撤离，是为了明天重新收复的暂时性行动。哈尔滨很快就会回到我们手里。不过，暂时性的撤离同样会产生许多困难。哈尔滨市内的一切机关都要搬走，我们也要搬迁。另外，撤离之后，一定会更加担心留在敌后的家乡，也会非常担心家庭和父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打算尊重你们的意见。如果非要回家的人也可以回家，回去好好照看父母，等到我们重新回到哈尔滨后再回来。”

尽管朱德海作了这样的动员，大部分学员还是坚决表示自愿留在部队。10月下旬，第3支队和教导大队乘船离开哈尔滨前往方正县。北方的10月下旬，南飞的大雁们留下的凄厉鸣叫早已消失，山野上被时令剥得只剩下裸身的树木，寒冷的大地吹来西伯利亚凛冽的风。他们离开那天，松花江码头拥挤不堪。

在方正县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到了11月份，朱德海在对地方队进行思想整顿工作的同时，把条件成熟的学员秘密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员发展工作告一段落后，地方队大部分学员按照支队部的安排，都以民运工作队的身份被分派到朝鲜人集居的五常、尚志、绥化、延寿、木兰、阿城等地。

“1946年12月中旬，我第一次担任一个工作队的负责人，并于1947年1月经由五常和阿城，到达绥化县，负责全县朝鲜族地区的土改工作和政权建设工作。我前往绥化的时候，去向朱德海同志告别。他鼓励我说：‘我知道你被派到绥化去。去了以后，一定要注意身体，把工作做好。你不用担心明子（张逸民的妻子），她被安排在哈尔滨市工作队工作……’当时做民运工作十分艰难，北满地区朝鲜民族的情况和土改中出现的问题非常复杂。因此，对刚到陌生地区工作的队员们来说，那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

情。再加上他们又缺乏群众工作的经验，不知道工作该从何处如何着手……工作队根据下乡之前朱德海同志的指示，先从土改的重点出发，把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这在当时东北农村是首屈一指的工作，也是建设东北根据地，争取民众支持和协作的头等大事。朝鲜人集居地区的土改工作，主要由朱德海同志领导的独立同盟北满特委具体指导，具体业务由政治部主任郑京浩负责。土改工作队同时还接受当地县委的领导。”（摘自《张逸民的回忆录》）

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的农村地区土改工作和北满各地区地方政权的建设工作，都由朱德海同志担任前线指挥，进展情况和工作中遇到的大问题及与政策有关的问题，都由朱德海同志加以解决。1947年4月，在支队指挥部二楼会议室（后来为《民主日报》编辑部所使用）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上，朱德海一一列举了民运工作队遇到的难题后予以解释。会议提出了“傍青”、“自主经营”等问题，朱德海是这样解释的：

“你们应该明白，刚才提到的傍青、自主经营等问题，是只有在北满地区朝鲜人农村中才有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说，既有手无寸土的贫农，也有占有别人土地、剥削长工的地主，另外还有人利用自己的权势强占地主或开拓农场的大量土地后再租借给农民进行剥削。对于这样的人，要与占有土地剥削农民的地主分子加以区别。为此，已经把朝鲜人集居地区或农村存在的这些特殊情况反映给了省民运工作部。你们回去后，要把这样的情况向当地县委汇报，加强沟通，事先注意在土改工作中尽量不出现偏差。”

接着，朱德海听取了五常县的工作汇报，然后强调说：

“执行土地政策必须稳妥。这是必须铁一般遵守的规范。酒桌上说的话可以不兑现，但是执行中央的政策没有丝毫余地。而且在执行的过程中，既不能出现左的偏向，也不能盲目地模仿别人。

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具体处理。我们支队派遣的民运工作队下到农村以后，在进行土改运动，清算走狗，组织贫雇农团清算地主富农的土地、不动产等工作中，一定要纠正偏向，巩固土改成果。”

为了防止土改工作中容易出现的偏“左”倾向，朱德海再三嘱咐一定要特别注意。当时在北满一部分地区初期土改工作中，曾经出现过任意打骂地主及其家属，进行人身攻击的事件。可是，第3支队派遣的民运工作队却从来没有犯过这样的“左倾”错误。

朱德海还要求民运工作队在推动土改工作的同时，一定要对当地的教育工作给予更大的关注。1948年下半年，土改运动基本结束，北满的各县区及朝鲜人聚居的兴化、四方台、张裕、沿安等乡村，都配备了朝鲜人干部。按照朱德海的嘱咐，他们在当地兴办学校，加强学校领导和教员队伍的建设。针对在绥化地区建立朝鲜人中学的问题，朱德海与当地政府多次协商后，在绥化县所在地建立了朝鲜人中学，成为土改工作的一大成果。

土改运动是在中国农村推翻封建生产关系的天翻地覆的革命。中共中央1947年10月发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中国各民族农民都拥有获取土地的平等权利。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法，是各民族农民成为土地主人的法律依据。东北境内的朝鲜民族是中国的公民，成为一个少数民族，也成为了土地的主人。

东北的根据地就是在肃清土匪、进行土改运动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并且成为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最主要后方基地。

1946年2月3日，国民党勾结日军残余势力发动了“2·3”反革命暴乱。金雄和方虎山率领的朝鲜义勇军第1支队成了镇压这次暴乱的主力，消灭了3000余名日本暴徒，保卫了南满根据地。2月10日，东北局听取了关于“2·3”反革命暴乱始末的汇报，并决定更改朝鲜义勇军的称号。1946年6月起，朝鲜义勇军第1

支队改名为“李红光支队”，第3支队改名为“松江军区独立8团”（对内依然保留第3支队的名称），第5支队改名为“吉东保安军”第1团和第2团。1946年6月，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独立8团”。同时，朱德海负责的北满地区朝鲜独立同盟也改名为“朝鲜人民民主联盟”。

名称的改变也预示着原朝鲜义勇军各支队性质的变位和变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后来，“李红光支队”被编入独立4师和中国人民解放军166师，“松江军区独立团”先后被改编为独立11师和中国人民解放军164师。“吉东保安军”第1团和第2团经历了数次变化，被编入10纵队等部队。

解放战争时期，许许多多朝鲜人投身中国革命。这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员加入和发展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也是逐渐发展为朝鲜族的主要阶段。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包括朱德海在内的朝鲜人（族）革命家和民众共同努力的成果。

## 艰苦奋斗

从1945年到蒋介石败退到台湾的1949年，5年的时间里，美国一共支援了总数达25亿美元的军需品。这不仅是十分巨大的军事援助，更让人感兴趣的是美国还从印度冒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来运输军用装备。因此，国民党军队无疑是非常富足的。而得不到外界帮助的共产党军队则极其穷困。尽管共产党军队不断地从国民党军队那里夺取军用装备和日用品，但依然是杯水车薪。

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的兵力没过多久就从建立初期的1000余人扩充到了3000余人，而部队后勤部门的担子也相应增加了。尽管吃饭的人口增加了，但是“粮食、饭桌、筷子”等相当奇缺，

衣服和鞋子等日用品更是毫无着落，整个供给体系完全处于空白状态。

金贞顺对那个时期作了如下回忆：

“我刚加入教导大队女子中队时，教导大队驻扎在哈尔滨香坊机场，住在空荡荡的一排平房里。光复后，机场被破坏得很厉害，附近的农民把机场里的东西全都搬空了，连一扇门都没留下。我们就在这样的房子里，把捡来的旧木板或破草垫铺在灰尘飞扬的地面上睡觉。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会相信我们当时的生活环境，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所谓吃苦需要先有对比，只有娇生惯养才懂得什么是吃苦。我们当时的处境就是如此，因此也就不以为然了……当时大家穿的衣服都很破烂，也就没有什么可笑的了，只是吃不饱肚子才真的十分难熬。教导大队除了我们女子中队以外，还有3个男子中队，他们更是饥饿难忍。对于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怎么会不饥肠辘辘呢……那时候，因为饥饿确实吃了不少苦。”

金贞顺的回忆记述了当时第3支队真实的生活情况。

第3支队成立初期，部队的后方供给几乎一无所有，物质生活实在是一贫如洗。不仅是第3支队如此，凡进军东北的部队全都一样。战士们大多来自穷得只剩一身灰尘的家庭，可没想到现在的情形更不像样。在零下30度的松花江上，战士们虽然被冻得瑟瑟发抖，但还是要与土匪们进行战斗。生活基础很差，条件十分恶劣。初期参军的战士们动机都十分单纯，以为到部队来接受基本训练后，扛着枪回到村子里保护自己父母兄弟的安全。他们的想法既现实又单纯。保护自己和父母妻儿的安全是他们最原始和最基础的愿望。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单纯的动机与新的信念和思想发生了冲突，所以很容易产生动摇。

这是第3支队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这样的现象不是马

上就能解决的问题。可是，当时紧迫的形势并没有给第3支队留有时间的余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德海加强了部队内的思想工作，通过对战士们亲和力及动员外部的支援来解决实际问题。朱德海借助于谈话、会议等各种形式，亲自向干部和战士们列举了当年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事例，人性化地向他们说明了只要在暂时的困难面前不退缩，坚持到底，就一定能战胜任何困难的信念和生活道理。

朱德海激励战士们说：“贫困的根源是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只有彻底清除这样的根源，困难才能得以解决。眼下我们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艰苦时期。这也是我们革命者必须解决的课题。因此，我们在困难面前不能退缩，而是要知难而上去战斗。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尽管当时朱德海的演讲不甚流畅，但是插入了许多生动的事例和比喻，不仅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能让人很快就理解。

朱德海在肃清土匪、派遣民运工作队深入农村的同时，还通过朝鲜独立同盟北满特委，发动朝鲜人地区的群众支援工作。各地的朝鲜人积极支援自己的队伍。哈尔滨市南岗区盟员金正洙支援了100万元红军币的巨资。独立同盟巴彦支部也送来了大量的资金和粮食。

“我们军队离开了人民大众就无法生存。无论有多么样的困难，只要依靠人民大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不过，目前人民大众无法承担太多的负担。因此，延安精神是永远行之有效的。”朱德海召集支队总部的领导成员，举行了好几次讨论如何打开生活上困难局面的会议。先后担任支队长的李相朝和李德山，以及参谋长金延和关键同样是延安出身，非常了解朱德海的工作能力，积极支持和响应朱德海关于后方基地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

“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以及解决后勤问题、生活问题的措施等，都由朱政委全权负责。朱政委在延安时期就在管理处、总务处、供给处等部门工作，这方面的能力早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所以，朱政委就下令怎么做吧。”

为了打开困难局面，必须重现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朱德海带领部队实施了以现实为基础的自力更生。尽管哈尔滨市的治安、部队内的“3查活动”、建党工作、民运工作等各方面的工作都十分繁忙，朱德海还是给予供给处干部们具体的指导，作出了关于生产自给活动的各项指示。

“我们是为人民而战斗的人民军队，不能加重人民大众的负担。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摆脱困难的处境。对于想做事的人、积极做事的人来说，出路总会有的。”

朱德海采纳了供给处干部们在“诸葛亮会议”上提出的好建议，指示他们立即付诸于行动。经过仔细查访，把在汽车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朝鲜人技术人员和技能工人组织起来，并从1945年11月末起，开始修理日军败退时抛弃在哈尔滨市的旧汽车，一开始是五六辆，后来逐渐增加到了十几辆。运输队成立后，不仅完成部队的运输任务，而且还包下了外面的运输活儿，逐渐增加了收入。当时没有汽油，汽车都使用木炭。为此，供给处在绥化县山区投资10万元建立了烧炭厂。

供给处还根据朱德海的指示，派曹钟锡<sup>10)</sup>和李秀正两人接收了哈尔滨市南岗的“东方啤酒厂”，并派申德冠担任啤酒厂负责人。一开始很担心部队能不能办这样的工厂，但是他们却具有“延安大生产的经济概念”。除了原有的工人以外，还安排了第3支队的军人家属，由100多名工人生产啤酒供应市场。如果说延安时期

---

10) 曹钟锡，离休干部，曾任第3支队供给处生产科长、第3支队管理委员。复员后，先后担任开山屯纸浆厂管理员、州招待所所长、客车修理厂供销科科长等职务。

曾经办过饴糖厂的话，那么，在哈尔滨时期又兴办了啤酒厂、被服厂。他们还买来羊毛纺线生产编织物。另外，还给部队战士们每人织了一件毛外套。他们又收集铝制废品制成食具供给部队。不仅如此，供给处还把金虎林、金益洙等派到狩猎队去猎取孢子、山猪等野兽来改善部队的伙食。

后来，在朱德海的倡议下，成立了名为“复兴公司”的经济活动中心，更加活跃地推进了各项生产活动。1946年秋天，根据朱德海的具体指示，“复兴公司”正式成立，不仅补充了部队所需的一部分经费，还为部队战士们筹措和提供了肥皂、毛巾、牙膏、牙刷、洗澡费等生活用品和费用。

早在青年时期，朱德海就在北满大地上投身抗日工作，非常了解民众对军费补充的不满历史。他十分清楚，许多朝鲜人部队曾经很早就进入中国开展独立军活动，在独立斗争的前期曾失去民众支持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越来越巨额的军费筹措和民众难以承受的军费负担。毛泽东在延安开展大生产的原因中，陕北民众对超负荷缴纳公粮的不满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自己动手艰苦创业，自行解决衣食住，不仅适用于部队，也是适用于群众团体、个人的生活原则。在朱德海的领导下，第3支队的干部战士一手握枪，一手拿镐，积极投身到声势浩大的开垦荒地的运动中去。

朱德海号召部队“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克服难关。加重民众的负担是犯罪。让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开垦荒地，生产粮食。”朱德海又从部队抽调干部，从1947年春天开始兴办军队农场。他还从部队内部选拔有农活儿经验的战士参与农场建设，动员军人及其家属投入农业生产。

1947年，哈尔滨郊外的古巷屯和方正县的南天门先后办起了大型农场。1946年9月，根据当时局势的变化，第3支队的非战

斗部门供给处、教导队、宣传队、卫生队、运输队等曾经转移到方正县境内，而在1947年1月重新回到哈尔滨。此时，根据朱德海的指示，一部分人员留在当地建设南天门农场。供给处把指导生产的任务交给了曹钟锡、金虎林、赵勇京等干部，另外还以120名军人和60余名军人家属组成农业生产队投入农场建设。

在建设农场的过程中，他们用镐头挖开解冻前残雪覆盖的冻土，修水池开水沟。接着在解冻之后，用军马翻耕荒地，并在300公顷的水田里播下了种子。当时的水田都使用散种的方法。当时种水稻的方法是先把水田耙平，再放入浅浅的一层水，撒下已经发过芽的稻种后，用水的深度来杀除稗子和杂草。那时候，种水稻是朝鲜人的专有权。当年天时很好，获得了喜人的收成。秋收的时候人手不足，朱德海派来了柳东浩指挥的第3大队来帮忙。水稻长势很好，每公顷生产了6000斤左右。另外，利用部队汽车的发动机来碾米，并把大量的大米供给了部队。

1947年2月，朱德海通过供给处任命郑炳山和徐炳勋为负责人，并安排40余名军人办起了古巷屯农场。他们也在早春来到白雪覆盖的原野，用镐头挖开冻土，挖通水沟。当年两个农场都取得了丰收，大大改善了第3支队的生活。一年农活儿结束以后，朱德海召开了南天门和古巷屯两个农场的全体生产队员大会，总结了一年的农业生产，表彰了徐炳勋等十几名先进生产者，每人奖励一只怀表。

进入1948年以后，东北解放战争发展到了总反攻的决定性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第3支队紧张地执行着保管武器弹药和保护运输等军事任务。不过，指挥部继续抓紧部队的农业生产，又在阿城县境内的石兆和哈尔滨郊外的天利两个地方建立了新农场。朱德海制定了宏伟的长远规划，十分重视天利农场的建设。“今后再要扩充战斗部队，就需要建设相应的后勤部门。”朱德海经常来

到供给处，把干部们召集起来，具体落实各项工作。柳重根担起了农场建设的重任，并在李旭成教导员的指挥下，动员了包括教导队队员在内的200多名部队人员，还购买了150匹马，翻耕了180多公顷的土地播下种子。根据指挥部的长远规划，开始添加了一些必要的设施。

石兆农场和天利农场的播种快要结束时，第3支队接到了参加辽沈战役的紧急命令。部队不得不放弃农业生产，把石兆农场交给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处，把天利农场交由农民（28户）管理。

第3支队继承延安的传统，在广阔的区域开创革命根据地，并在这个过程中，把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生活基础的新方法传授给广大民众。

曹敬衡在《艰难的创业》中这样回忆道：

“若要坚持长期战争，就必须创建能够保证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的革命根据地。这是朱德海同志说过的话，也是支队指挥部坚定不移的方针。……部队转移到方正县后，朱德海特别强调了创建后方根据地的必要性。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在过去以弱小的兵力与强敌的长期战斗中获得胜利，就是因为有了牢固的后方根据地，并从根据地得到了人力、物力、财力上源源不断的支援。今天，我们要消灭闯入东北的强敌，彻底解放东北，同样需要建立牢固的革命根据地，得到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强大支援。这是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获得的宝贵经验。为此，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创建后方根据地。”

朱德海带领供给处的干部们，亲自到汤原县香兰一带去踏勘后，决定在那里建立后方根据地。汤原县距离后方城市佳木斯不远，交通方便，还有茫茫草原和良好的土地条件。1946年10月，支队指挥部决定由金善基、姜东浩等十几名干部组成党支部委员

会和生产管理委员会。另外，派了许多军人家属，还动员了巴彦县、宾县、阿城县、五常县、尚志县、延寿县等地的贫雇农搬迁到那里去。他们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让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变成了牢固的后方根据地，变成了富饶的沃野。香兰根据地还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汤原县香兰平原空旷辽阔，土质十分肥沃。伪满时期，日本人开拓团强占了这片平原，强行规定不许任何人在周边开垦，同时开始建设一部分灌溉设施，后来因为日本投降，仓皇出逃，留下了这片尚未开拓的处女地。那里具备了地形相当平坦、土质肥沃、有一定的水利工程基础、水源丰富等有利条件。另外，那里离后方城市佳木斯不远，位于铁路沿线，南面是松花江，水陆交通十分方便。

朱德海的原则性很强，首先派支队长李德山<sup>11)</sup>去佳木斯，向当时的合江省省长李延禄汇报了第3支队开垦香兰平原的打算，得到了确切的答复，从而把香兰平原确定为第3支队的后方根据地，迅速开展了全部的准备工作。首先由政治处对即将挑起建设根据地重任的领导成员金善基、姜东浩等可靠的十几名干部进行审查，批准入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成立了由金善基任支部书记兼主任的香兰农场管理委员会。在朱德海的直接领导下，他们不计任何报酬地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后来，又从教导队选拔了安宏济、南明深等三十几名干部来到农场，加强了领导力量。尽管物质生活相当困难，朱德海还是在各个方面支持他们建设农场。为了防备土匪们的扰乱、破坏、抢劫，朱德海还给他们配备了30支枪，加强了农场的自卫力量。农场的党组织和管委会从成立那天起，就开展了紧张的工作。他们从1947年二三月开始接受来自各地的移民。尽管在寒冷的季节里连住的地方也没有，还是有巴

---

11) 李德山，又名金昌德，曾任第3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164师师长。1949年7月回到朝鲜，任朝鲜人民军第5师团长。

彦县的300户、宾县的300户集体移居，总共有1000多户的5000多名农民搬迁到这片荒地上来。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军人家属。他们盖起简陋的窝棚度过寒冬后，从第二年开始开垦荒地。他们经历了超人的艰辛，开垦荒地，建成水田。

“太了不起了。在没有房子的情况下，住窝棚度过了寒冬，又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把荒地开垦成水田。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朱德海经常派供给处的干部到香兰农场去，在现场听取和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朱德海还委托曹敬衡向香兰管委会的干部们传达说：“他们所经历的考验之大肯定是难以形容的。根据地建设是我军获取胜利的重要前提，绝对不能放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改进将人的力量当作机械力量而盲目推进的工作方法。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在这个世界上人也是最重要的。所以，一定要避免负伤和不必要的牺牲。”

1947年春天，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出乎意料地下达命令，派第3支队的全部船只到松花湖去，移交给包围吉林市的我军部队。也就是说，解放吉林市的战斗中需要用船。第3支队供给处不太情愿把自己亲手制作的船只交出去。我们不正是乘坐这些船只安全转移到方正县的吗？而且，第3支队现在也正有许多事情需要用船呢。供给处刚把这样的想法反映给朱德海，朱德海就十分严肃地断然说道：“对于上级的命令不能附加任何条件，必须绝对服从。”接着，他又做出指示：“我们把自己制作的船只送到前线去派上用场，这将是我们对解放战争做出的贡献。因此，不要坚持自己小集团的利益，立即无条件把船只送去。”在原则面前，朱德海从来没有动摇过。

那个时期，朱德海的生活与战士们一样朴素。他有时候在军服外穿一件黑色的汉族服装，小腿上像战士们那样打着绑腿。不

管到什么地方，他从来不摆支队政委的架子，十分简朴。当时，朱德海十分瘦弱，还经常咳嗽。曾经在朱德海身边担任第3支队供给处股长、处长的申德冠<sup>12)</sup>在回忆第3支队时期时说，朱德海是位原则性很强的“生硬政委”。

“1946年10月，在朱德海同志的领导下，我们第3支队设立了‘复兴公司’，开展了各项经济活动。公司一方面与朝鲜进行贸易（把几车小米、大米、牛肉送往朝鲜，从朝鲜换回盐、纸等货物），另一方面开始了汽车（经过修理的旧汽车）运输业和汽车修理业，又接收了啤酒厂生产啤酒。通过这样的经济活动，补充了支队的经费。不仅是第3支队的军事活动，还包括生产活动和财务工作等，都由朱德海同志亲自管理。在管理上，他把‘复兴公司’和供给处严加区别。我们供给处除了按照规定从松江军区供给部那里领取一些日用品和若干经费以外，全都接受‘复兴公司’的补给。像这样接受补给的物资和经费，我们在事先都要制定预算计划，提出申请，然后再要由朱德海同志予以批准。不经过他的批准，我们连一分钱都拿不到。袜子、肥皂、牙刷、牙膏、毛巾、洗澡费等生活用品和费用都不能超过规定的限度。朱德海同志还坚持‘经济民主’，定期召集支队干部、‘复兴公司’工作人员、供给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听取经济工作情况和问题的汇报，公开经费使用账本，同时开展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充分发表各种意见。朱德海同志在经济活动中采取民主方法来教育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在调节和改善上下级关系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效果。参加这样的会议，使我受到了很多教育，学到了如何做经济工作。与此同时，朱德海同志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每月一次亲自查看经费收支传票（一般在30张以上），然

---

12) 申德冠，曾任延边橡胶厂厂长、自治州工业处科长、安图纺织厂厂长，为发展民族工业作过贡献。

后签字盖章。当时，我并不理解他如此‘生硬’的做法，不禁在心里产生了怀疑，这到底是关心供给处工作，还是不相信下级人员的工作呢。当时，朱德海同志没有专用车，一般徒步或乘坐电车上班。后来有一天早晨，我特意找到了正在等候电车上班的朱德海同志，心想他总不会在这样的路口查看传票吧，肯定会推到以后再看，或者直接盖上章。电车很快就要到了，我拿出预算传票和收支传票请朱德海同志检查。不料，他二话没说，接过传票后蹲在路边的墙根下一张一张查看起来，然后拿出章来盖上。我彻底服气了，同时还醒悟到自己怀着私心特意找到这路口来的做法实在是太荒唐了。后来我还看到过有些部门因为领导干部不重视，在经济上发生了不少问题，甚至还有陷入混乱状态的现象发生。可是，在我们第3支队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从那以后，我更加深刻认识到以往的想法是错误的。朱德海同志如此‘生硬’的做法，绝不是什么对下级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而是为了使下级工作人员更好地执行经济制度，预防可能产生的错误，坚持经济工作中的正确方向。这也是对党和人民，对经济工作的健全和发展，对自己同志负责的精神。我从一个农村青年成长为革命战士，主要是因为有了朱德海同志和第3支队党组织和革命前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育。

“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件朱德海同志到延边来领导专员公署时的事情。1949年7月，我接受朱德海同志的指示，去沈阳工农橡胶厂（由延边专员公署经营）工作。我的任务是尽快修复工厂，生产朝鲜人的传统胶鞋。朱德海同志结束了第3支队的经济工作和生产活动，把剩下的40亿元（东北通用券）交给我们，并嘱咐我们把这笔钱作为修复工厂和生产的资金。我们也正是用这笔钱修复工厂并开展了生产经营活动。”

1948年4月，第3支队为了参加辽沈战役进驻到吉林省烟筒

山一带，同时还把支队开垦的各个农场全部无偿移交给了地方。

## 北方的天空下

“8·15”解放，为朝鲜民族能够享受政治、经济平等和文化地位展现了无限前景。

第3支队不仅是一支拿枪在前方进行灵活机动战斗的部队，也是在后方保卫驻在哈尔滨的东北委员会首长们的安全，支持和帮助哈尔滨地区朝鲜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政治部队。

朝鲜民族历来拥有“卖牛供孩子读书”的传统，移居东北以后，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好学热情和求知欲望。1905年《乙巳条约》签订以后的第二年，亡命东北的李相离等爱国志士主张通过民族教育来恢复国权，并推动在各地设立学校。延边的“瑞甸书塾”就是第一个设立的学堂，也是民族教育的象征性场所。

当时，北满与东满一样，在朝鲜人聚居的地区全都建立了学堂。学堂是朝鲜时期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民众教育机构，也是实行新教育之前一直存在的普通教育机构，不用经过国家相关机关的批准，兴办和停办都十分自由。

朱德海从北满的实际出发，认为要追求美好的未来，首先需要建立比学堂更加正规的学校，而且要办好这样的学校，首先需要培养教育人才。为此，他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和努力。

1946年5月5日松江省政府成立时，朱德海以第3支队和朝鲜独立同盟北满特委的名义提出在省民政厅设置朝鲜人科。松江省政府采纳了这个提议，并让朝鲜独立同盟北满特委书记兼第3支队支队长李相朝负责，另外还任命北满特委委员玄正敏为教育

股长。

教育股的主要业务是建设运营朝鲜人中小学校、训练朝鲜人教员、实施民众教育、充实朝鲜人教育的革命内容、制定和指导新的教育制度等。省政府设置朝鲜民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在全东北还是头一次。在当时的形势下，该机构存在了不长时间。不过，这是朱德海教育思想的一次反映和实践。

1948年下半年，朱德海又以民族事务处的名义，通过东北行政委员会向松江省政府提出了设立民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建议。1948年10月，松江省教育厅设置了民族教育科，任命权宁河为第一任科长。松江省民族教育的指导和管理纳入了政府的规范化管理，教育思想也进入了正常轨道，在北满教育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进驻哈尔滨以后，朱德海在肃清土匪的紧张日子里，为了迅速恢复北满地区的民族教育，设立了“朝鲜人北满教育委员会”，指导各县的独立同盟组织，恢复因形势的影响而停办的朝鲜人学校，创办新的学校。

哈尔滨朝鲜人北满教育委员会接收了伪满大都关国民高等学校，并在1945年9月2日建立了哈尔滨第五中学，也是哈尔滨市第一次建立的使用朝鲜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朝鲜民族中学，500多名学生全部是男生。1946年8月20日，“哈尔滨韩国女子中学”与哈尔滨第五中学合并，改称为“哈尔滨市朝鲜人中学”。

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地区许多县里掀起了光复后北满地区新的教育热潮，创办了许多学校，使大量朝鲜人学生从小学开始学习。1946年初，尚志县河东朝鲜人建立了河东“东北学院(中学)”，阿城县朝鲜人建立了“兆麟中学”，延寿县朝鲜人建立了“东明学院”等。除此以外，在五常县、绥化县等许多地方也陆续建立起了朝鲜民族民营中学，开创了北满地区正规学校教育的新纪元。

1946年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沈阳、长春等地，并打算进犯哈尔滨。第3支队第二次从哈尔滨撤退到方正县。朱德海发出指示，为了保存好民族教育场所，把哈尔滨市朝鲜人中学搬迁到处于后方的尚志县河东地区。搬迁到河东以后，又改名为“松江省立朝鲜人中学”，并于1947年3月正式开学。与此同时，朱德海召集了北满地区朝鲜人教育工作座谈会，并与松江省教育厅商量后，决定把分散的朝鲜人中学集中起来成立公立学校。1947年3月15日，哈尔滨朝鲜人中学、阿城的兆麟中学、延寿的东明学院、尚志的东北学院等4座私立学校，在尚志县河东区中央村合并，创办了“松江省立朝鲜人中学”，任命朴元赫为校长、权宁河为政治教导员兼副校长后宣布开学。当时，学校有10名教员、1名职员、391名学生。东北第一所朝鲜人公立中学就这样诞生了。（摘自徐明勋《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的诞生和活动》）

在学校的运营方针中，朱德海摒弃旧的教育制度，肃清日帝时期奴化教育的残余，建立民族、大众、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加强基础教育。新教育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吸取了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和抗大的经验加以实践，逐渐摸索管理学校的方法。

初创时期，学校里一无所有，只有1000多平方公尺的建筑物和7个教室及8间学生宿舍。1947年末，经朱德海与松江省政府交涉后，解决了1450元东北币和6万斤玉米，以及教职员的冬季服装。除了河东地区老百姓们捐助的150石水稻以外，学校的一切都处于初期阶段。一切都要靠学校自行解决。朱德海对学校运营作了具体指示，学习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来补充学校的运营经费。于是，学校新开垦了20公顷水田和12公顷旱地，种植了水稻、玉米、大豆等农作物，从而全部解决了教职员和寄宿生的口粮。另外还饲养了猪、鸡等家畜，做到了副食品全部自给。

可是，这种生产方式有点像拆东墙来补西墙的样子，在传授

基础教育的正规学校里是难以持续的工作。朱德海经常到学校来视察，认为必须尽快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1947年下半年，朱德海委派全凤来<sup>13)</sup>、朴东植等人组成松江省朝鲜人中等教育后援会，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援民族学校。

1948年5月6日，松江省朝鲜人中等教育后援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尚志县河东区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把学校从河东中央村搬迁到县城，并于1948年7月15日搬到了县城。当时，学校前面有湖水，周围是伪满时期的军营。于是，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用脸盆和篮子搬来沙土填平湖水，又推倒伪满军住过的旧房子，解决盖房子需要的砖瓦木头等材料。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学校用地面积扩大到了40 000多平方公尺，校舍面积也扩大到了5000多平方公尺。

这所学校成为北满地区朝鲜人青年学生中最有人气的学校。1948年下半年，来自22个县市的学生达到了977名。朱德海与第3支队花费极大心血创办的“松江省立朝鲜人中学”，成为了北满地区民族教育的根据地，从那时起，一直坚持了民族传统。当时由任音乐教员的白浩渊作词作曲的“松江省立朝鲜人中学校歌”，明显体现了当年的风格。

1948年11月，松江省文教厅把学校命名为“松江省立第一朝鲜人初级中学”，1950年1月又改称为“松江省立尚志初级朝鲜中学”。当时，学校教育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要科目，以解决政治方向和阶级立场问题为重点。上课以讨论为主，讲课为辅。

---

13) 全凤来，1907年1月5日出生于朝鲜吉州郡。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开始先后担任中共南湖头区委书记、中共穆稜区委书记、中共绥芬特别支部书记，在这个时期介绍朱德海入党。后来脱离革命，直到8·15光复后才重新参加革命。1946年11月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朱德海先后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民族事务处组织科长、延吉县人民政府县长、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卫生处处长。1973年11月7日逝世。

该学校培养的许多教员和学生，或被推荐担任大部分朝鲜族中学的校长或领导干部，或成为地方上的党政军或企业界、科技界、新闻出版界、教育界、文艺界的骨干。其中有郑判龙、林成极、全松林（全凤来之子）等3名毕业生，经过半年的复习就考入了延边大学，并在大学毕业后留校成为了教授。1985年6月，根据尚志县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为了纪念抗日战争时期在尚志县战斗过的抗日将领金策<sup>14)</sup>，尚志县朝鲜族中学改名为尚志县金策中学。

权宁河（曾任延边自治州教育处副处长）在题为《新的教育工作》的文章中，无限感慨地回忆了那个时期：

“松江省立朝鲜人中学是朱德海同志花费心血创办的学校，也是北满地区民族教育的典范。学校从创立开始，就一直在朱德海同志的指挥下。1948年5月6日，在尚志县河东区召开了松江省朝鲜人中等教育后援会第二次代表会议。朱德海同志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尚志县的全凤来、延寿县的李道永、李相远、方正县的高景柱、阿城县的徐恩顺、洛林县的李凤东、松江省立朝鲜人中学校长朴永浩等27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朱德海同志在会议上就民族教育问题作了重要的演说。”

在这次会议上，朱德海讲述了东北的形势和财政方针，强调要树立依靠大众办教育的思想。他还提出了扩大中学朝鲜人学生的数量，民族学校统一管理等问题。朱德海在演说中分析了当时北满地区民族教育的现状，指出了民族教育今后的发展方向。朱德海的演说结束后，代表们集中讨论了演说的精神。

朱德海不仅仅关注正规学校的教育，还极其重视符合农村教育现实的夜校教育，其要点是以成人为对象的识字教育。这个时

---

14) 领金策，1903年8月14日出生于咸镜北道鹤城郡，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东北抗联，并在苏联远东88旅工作。光复后回到朝鲜，任平壤政治军事学院院长、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曾任前线司令官，后来历任第一届产业相、副首相等职务。1951年1月30日因病逝世。

期的北满，夜校教育正在扩大到整个农村地区。其教育内容以识字教育为主，还学习革命歌曲，讲解政治形势等，由村干部、学校教员或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担任讲课的教员。

尚志县朝鲜人农村里组织了东学委员会，选出主席、总务、讲课、文化娱乐等负责人。每天晚上5点到7点学习两个小时，每两周进行1次考试，并把成绩公布在壁报栏里，表彰成绩优秀的学生。教材使用延边出版的大众读本、小学中学读本，算术(数学)和时事使用上级提供的资料，歌曲都是当时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

据资料记载，妇女们在做饭时也学习，有的人还在雪地上练习写字。这样的夜校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团结民族成员，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扫除文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据统计，当时在尚志县有207个朝鲜人夜校，600多个班级，248名教员，3170名学生。仅从一个县的统计资料来看，就能想象出整个北满的教育情况。

1948年春天，朱德海从第3支队政委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处工作，在创刊《民主日报》的同时，还创刊了指导民族教育的刊物《教育通讯》，大力促进了北满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后来，朱德海来到延边，把《民主日报》和《教育通讯》都带到了延边。

朱德海在教育、文化、宣传等方面进行“并行作战”，直到今天，依然有许多事情如同传说般地被人们津津乐道。其中就有引进文化人才、指导宣传、培养干部等许多生动的事例。

当时，朱德海到教导队来向学员们演说时，总是首先把培养干部问题和学习问题结合起来强调说：

“我们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有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革命事业中干部是最为宝贵的本钱，也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要素之一。干部就如同大梁和立柱，是展开社会主义蓝图中不可或缺的材料。这是我在延安时期最先学到的我党的实践活动之一。”

在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成立的同时，朱德海就建立了培养干部的教导队。他还从全支队内选拔优秀战士送到教导队去学习。他们在那里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接受军事训练。学习结束后，根据他们的才能安排到部队内的各个部门担任干部。

从1946年下半年起，第3支队招收了许多地方干部和女干部在教导队学习。根据需要，朱德海还通过政治处举办地方干部短期训练班，在他们中间开展建党工作，把许多品质好、觉悟高的学员增补进干部队伍，以发挥他们的能力。朱德海来延边时，由他培养的干部和他亲自选拔的干部大量来到延边，其中包括他的政治伙伴崔采<sup>15)</sup>。在已故的朝鲜族作家柳燃山写的《不灭的英灵——崔采》中，曾经提到了崔采第一次与朱德海相见的日子：

1946年8月，崔采到达哈尔滨，被安排在干部招待所。他刚放下行装，躺在床上消除旅途疲劳，突然耳边传来熟悉而嘹亮的《朝鲜义勇军进行军》歌声：

中国辽阔的大地上  
朝鲜的年轻人在前进  
迈开整齐的步伐向前方  
……

这首歌是在太行山战斗的朝鲜义勇军勇士们最爱唱的战歌。……他感到很吃惊，绝对没想到哈尔滨会有朝鲜义勇军，会听到有人唱朝鲜义勇军的战歌。因为他听说朝鲜义勇军都去了朝鲜，已经不在中国了。

---

15) 崔采，1914年1月出生于朝鲜黄海道，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8月担任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教导大队教导员，1947年3月任吉东军分区独立3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来又先后担任延边日报社社长、中共延边地委宣传部长、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延边州委副书记、中共吉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吉林省民委主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4月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崔采站起身，顺着歌声走下楼梯。歌声是从干部招待所一楼会议室里传出来的。他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轻轻推开门，看见有100多名身穿八路军军服的军人正在放声高唱。……崔采向那个连长模样的负责人说了自己的名字，又询问部队负责人是谁。连长回答说：“我们支队政委也是从延安来的，名叫朱德海。”“是在延安朝鲜军政学校担任教务处长的朱德海同志吗？”对于崔采的询问，连长作了肯定的回答。崔采又说：“我叫崔采，与你们朱政委相当熟悉。请马上给我联系一下。”连长拨通了电话

朱德海闻讯后，立即来看崔采。这就是崔采与朱德海的第一次相见。

朱德海在担任延安朝鲜军政学校教务处长时，曾经派人与贺龙任师长的129师在晋西北的地下工作者崔采取得过联系，并通过这一途径，用学校生产的物品换取服装、药品等必需品，从而间接地建立起了友情。

《朱德海的故事》中也讲述了他们的相遇：

朱德海询问崔采今后的打算，崔采回答说：“中央已经同意我返回朝鲜。我这次是到东北局来办理改变党籍手续的。”当时，第3支队也有一部分干部去了朝鲜，部队正缺少干部。于是，朱德海对崔采说：

“你别走了，留下来咱们一起工作吧。”

“你还不了解我的情况。我的妻子和孩子本来都在上海，去年‘8·15’之后，我从山西省西北部的根据地来东北之前，曾经给在上海的妻子写了封信，告诉她我已经动身打算返回朝鲜，让她直接来朝鲜。”

朱德海听了崔采的话以后，哈哈笑着说：“那没关系，以后想办法让家里人再回来就是了。”朱德海介绍了北满同胞们人心惶惶、情绪不安的情况后，接着说：“教导大队在培养军事干部

的同时，还分期分批地培养地方干部。工作已经开始，你就去教导大队负责这项工作吧。”就这样，崔采留在了第3支队。

经朱德海的挽留，崔采作为第3支队教导大队教导员开始了在哈尔滨的生活，负责培养朝鲜人军政人员和地方干部。后来，他来延边与朱德海一起工作，成长为一名高级干部。

第3支队从成立开始，就根据朱德海的提议设立了教导队培养军事干部。教官大多是第3支队的领导和干部们，包括朱德海、李根山、金延、高永禄等。学习内容有关军事常识、社会发展简史、朝鲜历史等科目，不仅学习方法通俗易懂，而且还着力于民族革命教育。学员们结束学习后，一般返回各县大队和中队，或者被分配到地方武装队伍。

1946年12月起，在尚志县河东朝鲜人小学举办了两个月时间的北满地区朝鲜人干部讲习班。当时的教导员就是崔采，学员达400余名。学员以北满地区的朝鲜人民民主联盟、朝鲜民族妇女同盟、朝鲜建国青年会和朝鲜人中小学校教员为主。学习科目有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简史，以及国内外事件和形势等。崔采也负责一部分讲课。学员们结业以后，被分配到北满地区的朝鲜人地方担任地方干部，或被安排在中小学校，都发挥了骨干作用。

朱德海从1945年11月进入哈尔滨到1948年4月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处，朱德海在教导大队培养的干部总人数达1600余名。其中部队干部约660名，地方干部为900余名。他们大部分成为北满一带革命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孤儿。

中国共产党军队从红军时期起，就在作战部队里设立了“笔杆子部队”的编制，使宣传队的作用达到最大化。第3支队也不例外。朱德海被任命为第3支队政委后，创办了《战斗报》。这是在《民主日报》创办之前。

已故小说家李洪奎是这样回忆那个时期的：

“根据朱德海政委的指示，1946年5月在哈尔滨创刊了《新民日报》（朝鲜文），主编是朴振龙，还包括十几名记者和编辑。该报纸为8开2面，主要在哈尔滨市内发行。从第二年（1947年）初开始，又创办了以部队为对象的《战斗报》，宣传战斗快讯、支援前线、土改运动等。1948年初，《战斗报》与牡丹江市朝鲜民主联盟创刊的《人民新报》合并，在哈尔滨创刊了《民主日报》。当时，我在牡丹江办的《人民新报》担任记者，而且年龄最小。我们进入哈尔滨是根据朱德海政委的命令。当时，牡丹江《人民新报》的编辑和记者全都去了。《民主日报》由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处直接领导，社长是李旭成，副社长兼主编是金万山。朱德海政委当时在哈尔滨朝鲜人中间十分出名，再加上又是延安出身，就更让人羡慕不已了。当时只要是延安干部，谁都会顶礼膜拜。呵呵，我最初的印象觉得他像是个普通农民，如果不穿军服的话，会误以为是农村路边常见的青年农民。演说时也不是讲解什么深奥的理论，而是讲得非常通俗，很容易听进耳朵里。后来在指导我们报纸时，才发现他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大人物，不仅博学多识，尤其是政治上十分成熟。也许是因为拥有坚定的信念，所以说话大胆，没有漏洞。《民主日报》为8开2面的日刊报纸，登载朝鲜人聚居区的土改运动、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政权建设、前线消息等各种内容。报纸的对象主要是黑龙江地区的广大朝鲜人。”

采访已故小说家李洪奎后，笔者找来登载在《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金春善主编）中的《民主日报》阅读。读完登载的报道后，对先辈们的功绩大为感叹。可是，在阅读报纸的过程中也发现了疑点。报纸上竟然没有关于朱德海的任何报道。

这怎么可能？竟然会没有关于民族领袖的报道？即使在延边日报社的资料室里也没能解开疑问。其实，《延边日报》上关于朱

德海主席（州长）、地委（州委）书记的报道也是寥寥无几。只有几张朱德海在自治州成立时的照片和在新丰的水田里与崔竹松合影的照片，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受难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上面还能看到无知乱涂的痕迹。在采访原延边政协副主席金永万<sup>16)</sup>时才解开了这些疑问。听了关于“当时报纸上几乎不报道领导们的活动。这是上级部门的严格要求。后来关于领导们的消息报道逐渐多起来，同样是上级的严格规定”的解释后，才解开了疑问。

朱德海不光办报纸，同时还建立了部队文艺宣传队。他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吸收了大量拥有艺术才能和专门技能的知识分子，并安排合适的工作。他还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热情支持和指导他们的工作。在物质条件如此艰苦的环境里，努力解决他们的困难，创造能让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专门技能的条件。然后，通过他们培养艺术人员、医疗人员、宣传人员，使得后来在各条战线上崭露头角的人才辈出。文艺人才的涌现必然造成作品创作的全盛期。崔采的“太行山的血战”和赵得贤创作的“参军”、“劳动者的胜利”等，就是在那个时期创作并流行起来的。北满大地上率先绽放开民族艺术之花。

金三镇回忆道：“我们宣传队是在当时担任第3支队政委的朱德海同志直接指导下创建的。宣传队的发展也与他的关怀备至不能分开。朱德海同志不仅关心朝鲜人的文化生活，也非常重视文艺工作者。我们宣传队头一次进入哈尔滨时，朱德海同志对我们的宣传队工作人员讲了下面这番话：

“只要发现文艺人才，不管他在什么地方，都不要错过机会

---

16) 金永万，1929年1月9日出生，194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到1951年7月担任《东北朝鲜人民报》（《延边日报》前身）记者。后来历任中共延边州委宣传部干事、中共延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62年起先后担任延边党校常务副校长、延边人民广播电台代理主编、中共汪清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州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等职。2011年逝世。

把他请来。我们要不惜代价引进这样的人才。’我们第二次进入哈尔滨市时，在哈尔滨发现了不少文艺人员。其中还有把家属也领来的。我们根据朱德海同志的指示，不仅接受了这些文艺人才，还负责照顾好他们家属的生活。1947年7月延边工农剧团来哈尔滨演出时，朱德海同志在接见他们时勉励说：‘你们来参军吧，让咱们一起为祖国的统一而战斗。’后来，该剧团的金光出等5人参军来到我们宣传队。

“朱德海同志不但重视宣传队的工作，也十分关心艺术人员们的生活。虽然他在支队总部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依然抽出时间经常到宣传队来找队员们谈话，询问在生活和工作有什么困难。队员们十分清楚，只有朱政委来了才能解决问题，所以都会毫无顾虑地提出困难和要求。

“‘你们将来都是我们朝鲜民族艺术事业的栋梁。我们不仅需要拿枪的军队，还需要有文艺工作者。现在是如此，将来也一定是这样。’根据朱德海同志的指示，我们在1947年一年内前往北满各地的朝鲜人聚居区进行巡回演出。那时候，我们演出的节目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八路军进行曲》《军民大生产》《黄河之歌》《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朝鲜义勇军进行曲》等几十首歌曲，《参军》《太行山的血战》《杏花开放时》《北京之夜》等话剧，《诺德尔江畔》《乌克兰舞》《俄罗斯舞》《劳动者的胜利》《玩偶舞》等舞蹈……朱德海同志总是亲临我们的试演（彩排）现场，看我们的节目之后毫不客气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对我们的工作做出指示：‘战斗部队需要有好的武器，宣传队需要有好的作品。好的作品就像宣传队的生命一样。’

“我们宣传队会根据朱德海同志提出的意见来修改一部分节目。朱德海同志无法来参加我们的试演（彩排）时，宣传队领导成员总是不太放心，会个别去找他汇报节目的内容。宣传队领导

成员每次从朱德海同志那里回来，总会感叹地说道：‘朱政委看问题真的十分尖锐。’我们就是在朱德海同志如此无微不至的关心下得到了发展和提高。因此可以说，正是朱德海同志为今天延边的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艺宣传队初期仅有二三十人左右，到了1948年已经扩大到了百人的庞大队伍。宣传队不仅在部队内活跃地开展文艺活动，而且还深入广大的朝鲜人聚居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团结人民大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固人民政权，鼓动大家参军支援前线，为保障前线的胜利做出贡献。

1946年11月，宣传队从方正来到哈尔滨市，重新投入紧张的演出准备，并于11月下旬在哈尔滨市的亚细亚剧场进行了盛大的演出。为了这次演出，朱德海与政治处主任郑京浩一起审查了每一个剧本和节目的内容，并亲自检查和指导了整个排练过程。

在哈尔滨的演出结束后，宣传队于1947年1月赴五常、安加、杜家等地巡回演出后返回哈尔滨。朱德海亲自欢迎了宣传队全体队员，并对他们发挥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指示要扩大宣传队的力量。宣传队的排练场所搬到了新的地方，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拿出不少钱购买了许多乐器。宣传队队长金明俊被派到延边去，从中学生中间招收有文艺素质的新队员。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提高宣传队的业务水平，成立了由文艺骨干组成的文艺组，研究和指导文艺思想及技巧。通过这样的文艺活动，培养了大批朝鲜人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舞蹈家赵得贤<sup>17)</sup>、李仁淑、

---

17) 赵得贤，延边大学艺术学院教授。1913年9月29日出生于朝鲜平壤。1938年起先后担任哈尔滨交响乐团芭蕾舞团演员、第3支队宣传队演员、延边文工团舞蹈教员、编舞、延边文联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舞协常务理事、延边舞协主席、延边歌舞团副团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舞协主席等职务。1985年创立赵得贤舞蹈研究所，收录于《世界华人文学艺术名人录》。

世界级小提琴演奏家白古善、艺术教育家金在清、声乐家金仁淑、演员李相春、李长孙……等人。（摘自张万连的回忆录）

朱德海自从与音乐家郑律成成为朋友之后，用心学习和研究了音乐和文学对人的成长和精神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对在战斗中的军队能够百倍鼓舞士气的作用。延安时期，每次唱起《延安颂》和《朝鲜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心里就会充满激情，从而领悟到文学和艺术的力量是用武器无法替代的精神战斗力。

“9月中旬，金冠浩连长去哈尔滨支队总部向朱德海政委做工作汇报时，带去了‘驻哈连队歌’和剧本‘北风’，并汇报说这是连队建设工作和群众文化宣传工作的成果之一。他还介绍我具有一定的文艺素质，‘8·15’光复前就写过诗，还当过《满鲜日报》的记者。金冠浩连长回来以后对我说，自己已经向朱德海同志作了介绍，朱政委已经做出了把我调到支队宣传队去的决定。于是，包括我在内的8名同志在9月27日来到支队总部。我们在组织股办完手续，等候前往宣传队。29日吃完早饭后，组织股长曹京衡来找我，说是朱德海政委要见我，让我下午2点去政委办公室。我突然感到有些紧张。支队长和政委是第3支队的最高领导，怎么会接见参军不到4个月的我呢？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熬过了整个上午，刚到下午2点就去了朱德海政委的办公室。我在门口整理了一下服装，然后敲了敲门。屋里传出‘请进’的声音。我轻轻地推开门，进屋以后立正敬了个军礼，然后报告说：‘我是政委同志叫我来的。’坐在办公桌前的朱德海政委站起身，慢慢地向我走来。‘你是张万连同志？’说着，他向我伸出手来。我连忙上前一步握住他的手回答说：‘是。’朱政委指了指椅子让我坐下，又拿起暖瓶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慢慢地坐在椅子上对我说：‘关于你的情况，金冠浩同志已经作了介绍。‘驻哈连队歌’和剧本‘北风’我已经看了。听说你在‘8·15’光复前就曾写过诗，有机会

的话我很想看看。你的笔名是冰山对吗？如今已经解放，冰也该化了才是。’朱政委说的朝鲜语听上去不太熟练。……朱政委又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比如以前住在什么地方，家里都有什么人，都是干什么的等等。接着，他又问我：‘这次调你到宣传队去，有什么意见吗？’我从小送报纸，梦想着今后能成为一名诗人，现在能够专门从事文艺工作，当然非常高兴。不过，自己没有经过太多的学习，担心自己水平太低。于是，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觉得自己没有读过多少书，水平太低。’听了我的回答后，朱政委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你拿枪战斗的话，难道就不会遇到困难了吗？认为自己没有读过多少书，水平太低，那么，从现在起认真学习，努力提高水平，不就行了吗？今天，只要自己努力的话，就一定能够学习好。你以前当过报社记者，又在驻哈连队里写过歌曲和剧本，绝不是一个没有水平的人。你拿起笔写歌写剧本，唤起人民大众走上革命之路，鼓舞和激励战士们提高战斗士气，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你拿着一支步枪与敌人作战。我们不仅需要拿枪的军队，还需要有拿笔杆子的军队。’当时，朱政委讲了许多有关文艺的话，可惜我没有学过文艺理论，对许多话都没能有深刻的理解。头一次见到的部队政委，对我这个参军不到4个月的战士如此亲切地循循善诱，不由得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从那以后走过的40多年人生之路上，尽管充满了曲折，但是‘你要拿起笔杆子去战斗’这句话始终回响在我的耳边。朱政委在我心里播下的文艺种子，即使在狂风暴雨中依然抽出嫩芽，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摘自张万连的回忆录）

第3支队驻在哈尔滨时，朱德海的宿舍在与宣传队一墙之隔的“复兴公司”二楼。宣传队队员们都喜欢去朱德海的宿舍串门。特别是文炳玉、金淑子等女队员更是如此。其原因虽然是因为朱德海特别关心文艺工作者，经常倾听他们的意见，但是朱德海的

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同样起到了吸引队员们作用。哈尔滨时期，朱德海不仅是第3支队，也是北满朝鲜人中间的最高首长，但是完全没有任何架子，有的只是强烈的亲和力。

到延边以后，朱德海的职位在提升，身份在升级，但是人品却一如既往。依然有许多人喜欢去找朱德海交谈，进行沟通。《延边日报》记者朴胜宇在纪念报纸创刊40周年时写的“朱德海同志与记者”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朱德海与文化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尽管因为时间上的差异，叙述可能会有些杂乱，但是似乎并不影响笔者予以引用：

“我离开延边日报社已经有10年时间，但是，当年在报社时到处去采访的事情依然历历在目。虽然其中有许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不过，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当年几次跟随州委第一书记、州长朱德海同志去采访的事情……他的工作从来没有闲暇的时候。有时候不开会，晚上才会稍微有些许空闲。一旦有这样的時候，他十分喜欢与自己身边工作的同志交谈。有一次，我与何林（延边日报记者，《海兰江之魂》执笔者）吃完晚饭，去朱德海同志那里串门。他一见我们，就亲切地询问：‘这几天把你们忙坏了吧。怎么样，差不多了？’我回答说报道稿快写完了。他笑眯眯地说道：‘写的挺快嘛。那么，今天晚上就在这里歇歇吧。’他让我们别走，我们就安心地坐在那里，与金东基、龙永福同志闲聊起来。过了一会儿，金东基同志对朱书记说：‘今天晚上能听听朱书记讲故事就好了。’朱德海同志没有拒绝，很爽快地答应了，然后极其自然地开了个头。他把后背靠在墙壁上，半躺在那里津津有味地讲了起来。他讲的内容从‘9·18’前的延边革命斗争历史开始，回想了抗日战争的那些艰苦日子。其中大部分事件，他都亲自参与其中。这更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越听越投入，甚至忘记了困倦。我们一开始坐在那里听，逐渐觉得两腿发酸，就不客气地躺在那里听。

当朱德海同志说到接到上级通知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的那一段时，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朱书记笑着说了句：‘好了。呵呵……到此为止吧，以后再接着说。’我们考虑到朱书记该休息了，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回来躺下以后，我们还沉浸在朱德海同志对下级如此亲切相待的感慨之中，久久难以入眠……我们结束采访打算回去时，去向朱书记告别。朱书记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然后对站在身边的摄影记者姜赞赫说：‘既然来了，咱们一起照一张吧。’即使朱书记不提，我们也早就有这样的想法，因此高兴得马上走了过去。金东基、龙永福，还有朱书记的秘书和司机，以及我们一起站在朱书记两侧合影留念。接着，朱书记又让司机把我们送到图们。”

1948年3月，第3支队离开哈尔滨，出发前往吉林烟筒山一带。到达以后，与先前到达的吉东警备区司令部第72团（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和牡丹江地区独立团（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合并，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11师，参加了长春、四平战役。独立11师创建一个月后的4月初，朱德海接到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的调令，改任民族事务处处长，从而离开了部队。从那以后，他不再是军人，而是以民族领袖的身份负责行政工作，担子更重了。

这个时期，第3支队所属的大部分宣传队队员跟着部队离开了。于是，朱德海怀着不再建立宣传队而是建立文工团的想法，把建立文工团的具体工作交给了金泰熙<sup>18)</sup>，并与11月创建了文工团。最初叫做第3支队歌舞团，后来改名为“民族事务处歌舞团”。然而，人才是个问题。根据朱德海的指示，金泰熙到处奔波，从部队和地方物色了一些人员，依然不能满足需要。

---

18) 金泰熙，1918年出生，1948年起先后在民族事务处文工团工作，后来担任延边文工团（延边歌舞团前身）副团长、团长、延边艺术学校校长、延边话剧团团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蒙冤去世，享年58岁。

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11月2日沈阳解放。164师参加了战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49年5月，朱德海听说164师即将离开长春去别的地方，于是赶往长春。

朱德海在1949年3月20日到达延边后，当年5月22日被任命为延边地委书记，两个月后的7月13日又被任命为延边专员公署（自治州政府前身）专员。因此，5月中旬时，他还没有接到正式的任命状。不过，他从到达延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领导了党政工作。朱德海之所以赶往长春，是因为其另有打算。

到达长春以后，朱德海直接来到164师师部找师长李德山（金昌德）。李德山与朱德海是老战友，从莫斯科劳动大学时期开始，经过延安时期，再到第3支队时期担任副支队长、支队长，始终与朱德海保持步调一致。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虽然经历了数次改编，但是始终保存了一个团的朝鲜人兵力，活跃在与汉族部队混编的师团中。后来在1949年春天发展为完全的朝鲜人师团。朱德海到长春去找李德山就是在这个时期。当时，李德山在长春得到了东北军区所属的各部队中的1万多名朝鲜人指战员的补充，改编为一个完整的正规师，即中国人民解放军164师，由李德山任师长，罗哲勇任参谋长，张福任政治处主任。张福也曾与李德山、朱德海一起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又一起经历延安革命军政学校时期后来到东北。在分为黄埔系、红军系出身的时期，东方劳动大学出身的同学们因为拥有共同的志向，所以个人之间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李师长，现在战斗即将结束，新中国不久也将诞生，所以我也就长话短说，请你把我要的人给我吧。”

“听说你当上了延边党政一把手，没想到更加贪心了。呵呵呵……”李德山半开起玩笑来。

开始，朱德海却十分严肃地说：“我可不是开玩笑。这次我急急忙忙的行程就是为了在沈阳和长春办理急需解决的事务。在长

春首先要解决的是把文化人才带回延边。部队以打仗为主，文化人才还是交给地方吧。李师长，我非常需要得到你的帮助。”

朱德海在长春得到艺术人才后，还要到沈阳去处理“工农橡胶厂”（1948年10～11月设在沈阳）的事务。

“呵呵，早在第3支队时期里，你就一再强调部队里也需要有拿笔杆子的人才。现在转行当了延边党政首长，难道把第3支队时期的根本都忘了吗？”李德山师长的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去年冬天，金泰熙已经带走了二十几人，难道还不够吗？看来文化的欲望真是无止境啊。不过，部队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建设新政权。既然地方提出了要求，理应满足才是。好吧，我答应你的要求。那样的话，以后到延边去也许还能有碗饭吃。呵呵……”

李德山与参谋长罗哲勇和政治处主任张福商量后，决定根据朱德海的要求立即把20名文艺人才交给延边。

## 民族事务处

1947年在史册上被称为国内革命战争转折点的一年。

在日本投降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在与“延安”的战争中，权力和力量平衡的静止状态就不复存在，开始痛切地感受到了自己正在转向不利的事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战争中掌握主导权的那一刻，事态发生了逆转，国民党就像被水浸泡的土墙一样塌陷，无法挽回一败涂地的局面。昨天的白色地区，今天成了我军的后方。

形势就像转轮转动那样飞快地旋转着，对于留在地方的干部们来说，迫切需要尽快地掌握政治业务和行政业务。1948年4月，

中央东北局设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属的民族委员会（后来改称为民政处、民政委员会、民政部），还设立了民政处所属的民族事务委员会，任命朱德海为民族事务处处长。

民族事务处成立于1948年春天，到1949年2月完成了自己近一年的使命之后解散。但是就在这期间，朱德海做了许多工作。

朱德海必须负责处理整个东北与朝鲜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工作有关的一切事务。那是与战斗部队政委的工作内容完全不同的地方行政事务。带领东北境内近100万同胞在解放后的满州大地上开拓新生活的重任，如今落在了朱德海的肩头上。朱德海深切地感受到特定时代的特殊责任，正确把握民族问题的积案，全力摸索解决方案。当时，民族事务处办公室位于哈尔滨南岗马家区，是一幢俄罗斯式二层小楼，楼前有院子，还有一个小礼堂。民族事务处的任务是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培养民族干部，恢复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动员民族青年积极参军，组织民族群众支援前线等。当时民族事务处的干部全都是朝鲜人（族），工作对象也主要是朝鲜民族群体。民族事务处设有组织科、文教科、总务科等，还有事务处直属的民主日报社、文工团、朝鲜人干部学校、复兴贸易公司等。尽管不是战斗部队，而是行政管理工作，但当时还是战争时期，实行供给制，而且是身穿军服的军人集体。这无疑是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民族事务处任命全凤来为组织科长、金明汉为文教科副科长、朴元赫为总务科长、高永龙为秘书主任、金文宝为秘书，加上李羲一等几名事务员和警卫班，一共有30人。全凤来是朱德海在1931年入党时的介绍人。金文宝<sup>19)</sup>原

19) 金文宝，1923年出生于辽宁省桓仁县，1941年毕业于延吉四道学校，1945年9月在黑龙江省尚志县参加革命工作。先后任民主同盟尚志县委员、中共尚志县委文书、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处秘书等职。建国初期任中共延边地委秘书、秘书处处长、政策研究室主任、财贸部部长。1956年1月至1960年12月，任延边大学党委书记，1961年1月至1969年12月，任中共延边州委

先是尚志县委文书，被朱德海看中，经审查后起用为事务处秘书。

针对飞速发展的形势，朱德海极其关注民族干部的成长和提高，积极引导他们在政治上尽快成熟起来。有许多部队干部经他亲自教育并介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另外，通过工作总结会、工作汇报会、民主生活会、个别谈话等形式，为提高干部们的指挥能力和业务水平倾注了全力。尽管事务处人员比较少，但还是承担了北满地区培养民族干部的工作以及经济建设、支援前线、建设后方等繁重的任务。朱德海亲自担任了朝鲜人干部学校校长，经常给学员们讲课。1948年7月20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有从东北各省、县选拔的150余名学员参加。开学典礼上，朱德海在讲话中指出：“你们都是从民族社会中选拔出来的，不要辜负了对你们的期望，好好学习，回去以后能为民族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朱德海是个充满情感的人，不仅督促干部们的学习，而且对干部们在生活上的困难，特别是对有家庭的干部们的困难，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除了吃穿以外，任何人干工作都是没有报酬的。家里人口较多的干部和战士的家庭生活都很困难。朱德海给军属们安排适当的工作，在一定范围内予以经济补助。特别是家里发生特殊情况时，总是想方设法予以帮助。

政治处组织科长曹京衡的妻子金明淑在教导队学习时病倒了，诊断结果为膀胱骨结核的重症。当时对这样的重症根本无法治疗。她了解自己的病情后，想起了寄托在别人家里的三岁孩子，每天以泪洗面。教导队把情况向朱德海作了汇报，朱德海当机立断地说：“我马上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世上还有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吗？不管条件如何，一定要挽救她的生命。对于把三岁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来学习的好同志，我们不关心谁来关心呢！”他

---

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和迫害，于1969年2月20日逝世，年仅46岁。后来恢复名誉。

当场拿出 100 万元（当时的货币单位）让金明淑住进当时哈尔滨最好的医院犹太医院进行治疗。1948 年 12 月，朱德海为引进艺术人才去长春时，找到金明淑的丈夫曹京衡，详细地讲述了患者的病情，并嘱咐他回去一趟看一看妻子的治疗情况。曹京衡按照朱德海的吩咐，到哈尔滨与妻子见了一面。听了妻子从头到尾的讲述后，曹京衡感激万分，到民族事务处去向朱德海道谢。朱德海又给了他 300 万元，用来治疗妻子的疾病和贴补家里的生活。曹京衡感激地向朱德海深深鞠了一躬，流着泪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

1949 年 3 月，朱德海已经被确定派往延边工作，可他依然十分关心患者的病情，继续予以关照。朱德海让秘书告知曹京衡，妻子的病情已经好转，赶快回来办理出院手续。曹京衡怀着高兴的心情来见朱德海，朱德海又给了他 300 万元，让他把寄养在别人家里的孩子接回来。

“是朱政委给了我妻子第二次生命。”曹京衡夫妇永远忘不了这件刻骨铭心的事情。

朱德海在培养民族干部方面不惜任何代价。金文宝担任过朱德海的秘书，后来又担任了延边大学党委书记、州委文教书记，对延边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是朱德海到延边来的时候带来的人。曾经担任过延边大学党委书记的李羲一<sup>20)</sup>和州卫生处处长全凤来也是如此。

李羲一在《奋斗的一生》中讲述了与朱德海相遇的情况：

---

20) 李羲一，1918 年 1 月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奉化郡。1949 年 3 月起历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处教育干事、延边州委宣传部干事、干部教育科副科长、《延边日报》主编兼社长、州委文教部长、宣传部长、延边大学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严重迫害，后来得到落实政策，重新担任校党委书记、顾问。著作有《中国朝鲜族足迹丛书》1～8 册（主笔）、《朝鲜义勇军第 3 支队足迹》、《奋斗的一生》等。

“1948年4月，朱德海同志被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任命为民族事务处处长。大概是在1948年6月，时任尚志县民运工作队队长的全凤来同志被调到民族事务处工作。他个头儿很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临走前到我这里来。他劝我说：‘你别再当教员了，和我一起去哈尔滨工作怎么样？’我因为有家庭，所以没有马上答应。当时，我们家被划分为贫农，家里有八口人（母亲、妻子和五个孩子），还分到了两公顷多的土地，干农活儿没有男劳力，困难重重。妻子领着五个孩子，还要照料60高龄的婆婆，独自一人靠务农维持生计，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如果再离家外出的话，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不过，我反反复复想了以后，还是决定摆脱家庭的小圈子，投身革命。当时我之所以能作出这样决定的原因是，只要我离家参加革命，家里就能受到革命家属的待遇，村里就会给予代耕等帮助。当时要是没有这样的制度，我是无法去哈尔滨工作的。我把家庭生活的重担交付给妻子后，与全凤来同志一起离开尚志，前往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民族事务处。那是专门从事民族事务的行政机关。在那里，我头一次见到了闻名已久的朱德海同志。当时朱德海同志38岁，年龄不算大，看上去却非常老练。他穿着十分朴素，说话低沉缓慢有序，给人留下慈祥稳重的印象。……从尚志去哈尔滨的车上，全凤来同志给我介绍了朱德海同志的革命经历及其拥有的人品：‘朱德海同志很早失去了父亲，母亲和哥哥给他找了个老实温顺的女人，想让他成家过日子。然而就在1930年春天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朱德海同志抛弃个人的幸福，离开热爱的家乡，服从中共北满特委下属的地下组织的安排，前往黑龙江省宁安县一带开展革命工作。’”

李羲一就这样认识了朱德海，后来又跟随朱德海来到延边，先后担任文教部长、宣传部长、延边大学党委书记，是朱德海的坚定支持者之一，为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严重的迫害。

“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发展民族文化的关键是抓好民族教育。”现在我们经常听到的这段名言，其实是朱德海在民族事务处时期给学员们讲课时说过的话。

民族事务处建立于1948年春天，到1949年2月结束了特定时期的特殊使命。随着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临近，东北行政委员会搬到了沈阳，在民族事务处工作的绝大多数干部都跟随朱德海来到延边。

原延边电视台台长金熙宽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一开头就作了这样的介绍：

“1948年10月和11月之间，我的父亲（金文宝）跟随朱政委，组织担架队参加了解放沈阳的战斗（11月2日沈阳解放）。在朱德海书记的生平介绍里遗漏了这段主要的经历……事务处属于东北行政，所以就在哈尔滨地区组织了担架队。朱德海政委为了调查住在沈阳西塔和郊区的朝鲜人实情，就率领担架队前往沈阳，并趁此机会以民族事务处的名义接收了沈阳的一个橡胶厂（工农橡胶厂，即民族橡胶厂的前身）。该工厂后来搬到老头沟，又搬迁到图们，成为延边橡胶厂。那时候，我们一家在尚志县河东务农，那也是民族事务处的安排。我父亲原是间岛师道（师范）学校的优秀学生，回到尚志后很快参加了民主大同盟，担任宣传部长，后来又担任中共尚志县委秘书。当时，朱德海政委看中后就把我父亲调走了。那是在1948年春天，民族事务处刚刚成立。从那时起，父亲就跟随朱德海书记来到延边，后来又一起经历‘文革’，惨遭不幸。当时，朱德海政委要求民族事务处工作人员的家属都不要来哈尔滨，留在农村务农。这是根据当时哈尔滨市政府发布的‘关于移民工作的决定’和‘移民暂行条例’而采取的措施。1947年11月到1948年3月，有计划地让家属们下乡务农。我母亲（林粉圭）领着六岁的我和弟弟，又背着吃奶的婴儿在地里干活儿。母

亲告诉我们，她一辈子也忘不了 1946 年秋天，朱德海书记到河东来演讲时说的话。那个时期好像正是第 3 支队暂时从哈尔滨撤退，疏散到周边各县的时期。母亲还说，当时朱政委听说我是金文宝的大儿子，还亲切地摸了摸我的头。可是，那时候我还太小，没有什么记忆了……在我对当时的记忆中，只有挂在墙上的电话机。我还记得父亲从墙壁上拿下笨重的话筒说话时的情景，当时觉得很新奇，所以才会记得那么牢……听我母亲说，当时大家吃的都是高粱米饭、玉米粥、青菜汤，但还是那么生气勃勃。特别是在独立同盟改称为民主联盟后，预示着其性质上的变化，也使北满的我们民族的社会活动参与度更为活跃。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像那个时期那样，民众有如此高涨的社会参与意识。因此，也被看作是历史事变。”

朱德海在延安时期是朝鲜独立同盟延安分盟的主任，从沈阳到哈尔滨时又被任命为北满民主联盟主任。因此，绝不能忽视哈尔滨时期朝鲜人民民主联盟。

朝鲜人民民主联盟于 1946 年 7 月 22 日在哈尔滨正式成立。光复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东北处于真空状态。虽然建立了政权组织，其作用尚不成熟。在这样的特定时期，为了让北满各地由朝鲜人组成的各种团体组合起来达到正规化，从而保证朝鲜人（族）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就必须齐心协力，加强领导。

1946 年 7 月 20 日到 22 日 3 天时间里，在第 3 支队司令部（现在哈尔滨市红军街 66 号），由朱德海主持召开了“北满地区朝鲜人民民主联盟”第一次执委会。来自黑龙江省、嫩江省、松江省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讨论了加强组织宣传、培养军政干部、组织农民自卫队、开展扩军拥军工作、出版报纸等十项工作议题。（摘自徐明勋的回忆）

1946 年 9 月 11 日至 14 日，北满地区朝鲜人民民主联盟第三

次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市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教导队礼堂召开。来自各省的48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代表们汇报了所属地区朝鲜人（族）的情况和工作情况，还围绕干部短期训练、加强宣传工作、建立集体农场、统一朝鲜人团体的名称、扩军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还增补了以朱德海为首的执委会，通过了政纲。

根据朱德海的指示，哈尔滨市朝鲜人民民主联盟按照朝鲜人居住的情况，在道里区建立了9个分盟、南岗区2个分盟、道外区1个分盟，一共是12个分盟。各个分盟成立夜校，对群众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关于土改的政策、解放战争的性质等。还利用会议和学习的空余时间普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志们团结起来”、“最后的决战”等革命歌曲，进一步提高了民众群体的社会参与意识。

哈尔滨市朝鲜人民民主联盟在1948年4月民族事务处成立后解散，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哈尔滨市朝鲜人会”，不过，在唯一的权力机构，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属的民族事务处的绝对作用下，行动半径不断缩小，影响力逐渐萎缩。

## 朱德海结婚

《朱德海的故事》中讲述了因为革命工作需要，朱德海于1932年在东京城牛家屯与黄顺丹结为假夫妻，后来又成为了正式夫妻。另外在该书第7章“新的征程”中还有这样的章节：

“与黄顺诞（丹）没有约定就分离后，朱德海一直没有把她忘记。他无法忘记在英安和密山一起度过的日子。在浴血斗争的日子里，他俩从假夫妻成为正式夫妻，一起经历了各种苦难，相依

为命。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在一次讨伐中不幸分离。后来，无论是在密山、勃利等地活动的时候，还是在莫斯科、延安的日子里，朱德海始终思念着黄顺诞(丹)。他的脑子里始终浮现出黄顺诞(丹)刚毅、忠诚、善良的模样。只要一有机会，他就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地寻找黄顺诞(丹)，却都没能如愿。来到哈尔滨以后，朱德海的思念更加强烈。

“国民党军队撤离哈尔滨，北满的交通、通讯逐渐恢复，朱德海到处打听寻找黄顺诞(丹)的下落，依然是杳无音讯。1946年初的某一天，朱德海偶然遇到以前在密山一带一起活动的同志，才了解到黄顺诞(丹)已经与别的男人结婚，而且已经是生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与朱德海分离后，黄顺诞(丹)一直揪心地等待着朱德海的消息。可是，不但不见朱德海回来，连一点消息也没有。后来从别人那里听说日军两次大讨伐中杀害了许多同志，她以为朱德海已经牺牲了。她沉浸在悲痛之中，一连好几天痛哭不止。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才慢慢恢复了正常的情绪。黄顺诞(丹)后来嫁给了邻村的一个男人，迄今为止一直在农村务农为生。

“朱德海听了这个消息后，心痛难忍。但是，这不能责怪黄顺诞(丹)，当然也不能埋怨自己，只能诅咒残酷的战争岁月。这残酷的战争岁月拆散了他们夫妻，让他们尝到了生离死别的痛苦。即使像朱德海这样经历了无数生死关头、经过了狂风暴雨考验的35岁的革命家，也只能面对与亲爱的妻子分手的命运。

“不过，当朱德海想到黄顺诞(丹)经历了10多年的风风雨雨，终于找到了生活的安身之处，不由得感到十分欣慰。朱德海默默祈祷黄顺诞(丹)永远幸福，而自己却为了忘掉黄顺诞(丹)，便投身到更加繁重的工作中去。

“朱德海到哈尔滨工作的第二个春天，对他的个人生活有着特别的意义。他与住在哈尔滨道里区的一个姑娘订了婚。姑娘名叫

金永顺。当年6月22日，朱德海与金永顺举行了婚礼。”

朱德海当年去北满之前，曾经在家里的安排下跟一个姑娘订了婚，考虑到不能耽误姑娘的将来，就断然采取了解除婚约的行动。隐含在解除婚约背景中的真相，将会被埋在永远的神秘之中。其实，尽管是解除婚约，其中隐含的真实依然可以被披露出来。不过，这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朱德海的第一次婚姻最终没有成功。后来在抗日革命中与另一个姑娘黄顺诞（丹）结为了正式的夫妻。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黄顺诞还是黄顺丹的说法不同，而且他们结为正式夫妻的过程也存在着差异。据金熙宽说：“汉字中黄顺诞的诞是诞生的诞，用丹来表示的话，与诞为相同发音。依我看，黄顺丹比黄顺诞更有说服力。”

黄顺玉是特定时期延边学习毛主席著作而出名的女社员，也是朱德海的政治导师之一黄基范的女儿，与黄顺丹是堂姐妹。《山沟里的女秀才》是由黄顺玉口述、南熙凤整理的回忆录。黄顺玉在书中对黄顺丹作了回忆：

“当时，我的母亲在延东山沟里种地。朱德海同志是我父亲的交通员，经常到我们家里来。革命军战士们经常在我们家里住宿、吃饭。他们称赞母亲做的饭好吃，而母亲却总是笑咪咪地回答：‘不是我做得好吃，是因为你们肚子饿的缘故。’因此，我们家的口粮总是比别的家先吃完。不了解情况的人还责怪我们家不会过日子。

“当时，我的堂姐黄顺丹（后来成为朱德海的第一任妻子）、阿姨姜松逸（当时15岁）和朱德海的弟弟经常来我们家帮着干活儿。后来，在日本鬼子的折磨和监视下，我们无法再在延东山沟里住下去，就分批搬到了黑龙江宁安。

“我跟着伯父坐在朱德海赶的牛车上，翻过帽儿山，经过百草沟，前往宁安。当时，曾经对带领孩子们一起去的事情经过了

很多讨论。结果还是决定都领着一起去，实在带不了的话，就在途中送给别人。当时，母亲为堂姐（黄顺丹）出嫁时准备的丝绸、麻布等，不慎在路上被盗，连带在身边的包着衣服和鞋子的包袱也丢了。（当时堂姐与金哲正在谈婚论嫁）

“当时在日本报纸上也发表了抓捕黄基范的告示，因此检查相当严格。朱德海领着一批人，他的弟弟领着另一批人，走的是不同的路。为了应付检查，互相还假装成双结对逃难的样子。后来到了宁安县荒凉沟，借了一户汉族人家的房间住了下来。要是警察来巡查，就躲到水田里去。由于生活实在太艰难，只好把两岁的小弟弟送给了没有孩子的人家。（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1930年，由于受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革命势力恢复期’误认为是‘革命的高潮期’，要求在全国发起大暴动……在这样的形势下，1930年11月13日，我父亲黄基范与同志们一起发动了纪念苏联十月革命、杀死日本军官的暴动……他们打算把敌人引进山里予以消灭，不料父亲黄基范和宋司令员中了敌人的子弹，英勇牺牲。当时，我只有7岁。

“敌人一来搜查，老人们就大声喊叫，孩子们就大声哭闹，故意把气氛弄得乱糟糟的。朱德海有时候躲在秘密洞穴里，敌人来的时候，就把白布挂在烟囱上作为暗号，以防外人接近。

“后来，朱德海领着堂姐黄顺丹去了密山。”

朱德海与黄顺丹从假夫妻结为正式夫妻，是在特定时期才可能有的缘分，或者称之为不确定的“乱世姻缘”。所以，这样突如其来的夫妻因缘也可能导致毫无预兆的分离。这也是特定社会中内含不确定性的夫妻命运。

因此，对朱德海来说，金永顺<sup>21)</sup>是他的第二任妻子。许多认

---

21) 金永顺，1926年出生，1948年入党。延边党校教员，教务处主任，延边政协副主席，吉林省政协常委。1999年3月6日因患心脏病在长春去世。

识金永顺的人都说她“漂亮，贤淑温顺，手脚勤快”。朱德海也正是对金永顺的这些方面深感中意。风雪猛烈的北方天空下，宿命一般形成的爱情热流让朱德海和金永顺心情激动，也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舞蹈家赵得贤的夫人李美虔向笔者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那是1948年的事情。朱德海书记非常喜欢孩子。当时他住在民族事务处，二楼是宣传队，三楼是领导们的宿舍。我们家老赵（赵得贤）虽然是舞蹈家，在第3支队享受领导待遇，所以也住在三楼。我们和朱德海政委住在同一层楼……那时候一到星期六，晚上都会组织舞蹈晚会。宣传队里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到了晚上又有舞蹈晚会，一旦情投意合就举行婚礼。当时忙着战斗打仗，像朱政委这样的老光棍在部队内有的是。朱政委十分喜欢我们家的女儿，经常抱着她们玩。有一次，他抱着丹娘（丹娘是小名，本名叫赵仁海，蔡永春的夫人），还在她手掌上写了个名字。我偷偷一看，他写的是‘金永顺’的名字。现在看来，那时候朱政委已经和金永顺在自由恋爱了。我头一次见到金永顺，就觉得她长得非常温顺、漂亮……朱政委长得很朴实，又没有架子，就像个农民一样。但是，金永顺看上去不像是在受苦人家长大的人，身材高挑，漂亮可人。当时，人们都开玩笑地说，朱政委找了个资产阶级小姐当老婆。虽然不知道是否准确，但是当时听人说，金永顺解放前住在齐齐哈尔，在那里的女子中学毕业，还曾在火车站当过售票员，所以说她的经历十分丰富。当时中学毕业已经非常了不起，再加上人又长得漂亮，所以朱政委才会动心嘛。听说朱政委的老丈人和丈母娘能说一口流利的老毛子话（俄语），而真正的咸镜北道话却很少说，说起来也是结结巴巴的。永顺也向俄罗斯人那样，俄语说得相当棒。他们俩在哈尔滨结的婚，然后到了这里（延吉）。他们是1949年到延边来的，在哈尔滨生了大女儿英彩。那时朱政委大

概已经有 39 岁了，因此，朱政委来延边的时候，永顺并没有与我们同行。她留在哈尔滨坐完月子后才来的延边。”

共和国创建后，老干部们和部队指挥官们的婚姻，在一段时期里情况比较复杂，因为错过婚期而产生的悲喜剧，就像电视剧那样漫无头绪。此时，出现了许多嫌弃原来的妻子太土气而不顾道德的现代版“陈世美”。但是，朱德海夫妇琴瑟甚笃，堪称家庭的典范。

原延边电视台台长金熙宽回忆说：

“朱德海书记星期天下乡时，总是领着妻子一起去，足以看出夫妻感情之深厚。因此，能够很好地处理复杂的家庭关系。我在延边农学院学习的 1962 年春天，有一天从龙井徒步回家，看见朱德海书记家里的杏树下，有两位脸型差不多的老太太身穿完全一样的白色民族服装，随随便便地坐在那里闲聊。再仔细一看，原来不是什么老太太，应该说是中年妇女更准确。当时，杏树上正开放着白色的杏花，而那两个坐在树下闲聊的中年妇女又穿着白色的民族服装，所以至今还让我留下了清晰的记忆。后来才知道，其中一位是黄顺玉老奶奶，说是老奶奶，其实当时还是不到 40 岁的中年妇女。另一位中年妇女就是朱德海书记的第一任妻子黄顺丹。那天回到家里，我问在朱德海书记家院子里看到的那两位中年妇女是谁，谁知父母支支吾吾地没有告诉我。后来才听说，当时黄顺丹去朝鲜探望儿子，顺便来到延边。朱德海书记听说后，非要让她到家里来玩。金永顺夫人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当时，我听到父母在偷偷地交谈，不仅是朱德海书记，而且夫人金永顺的处事也做得非常好。听说，当时金永顺夫人还准备了许多东西让黄顺丹带到朝鲜去。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感人了。”

2011 年 7 月，笔者去延安采访途中，在长春第一次见到了朱德海的长女吴英彩（1949 年 3 月 6 日出生，现在住在长春）。她长

得与朱德海十分相像，性格非常豁达。据她自己说，自己的性格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不过，在回忆母亲的时候，她先流下了眼泪。就像女儿回忆母亲时总是会动感情那样，吴英彩在谈到母亲时也是先从感情说起：

“我不知道母亲是否认为与父亲的结合是件好事，但是作为女儿我来说，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母亲从认识父亲那一刻起，就开始过上了孤独的生活。我的弟妹们对父亲几乎都没有什么记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对我们兄弟姐妹来说，父亲只是个名字，更习惯的是没有父亲的家，有时候想坐坐父亲的小车，都不能如愿。你别以为我说的是假话，当时了解情况的人都可以作证。弟妹们在延边上保育院、幼儿园的时候，都是外婆和外公背着去的。虽然父亲工作繁忙可以理解，但是，最后离开延边到遥远的湖北省五三农场吃尽苦头，并在那里闭上眼睛的时候，守在身边的母亲会有什么想法呢？就在生命最后关头的无意识状态中，父亲依然说要回到吉林（延边）去，俯视着父亲瘦得皮包骨头的脸，又会想些什么呢？尽管不想再去回忆那些让人伤心流泪的事情，但是如果回忆母亲，去掉了这些感情上的事情，就无法突出母亲的形象。母亲的缝纫手艺相当好，不仅是我们兄弟姐妹的衣服，就连她自己的衣服也是亲手做的。你别以为这是因为当时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依我父亲的职位，别说是现成的服装，至少可以到缝纫店（服装店）去做衣服。尽管如此，母亲还是坚持自己做衣服。父亲实在是太早就抛下母亲走了。为了母亲，我们更为父亲的去世感到悲痛。父亲本来可以活得时间更长，也不应该在遥远的异乡告别人世。当时我也在湖北省五三农场。除了大弟弟吴阳松<sup>22)</sup>以外，其他兄弟姐妹都在父亲身边。我重新想起父亲是在‘文

---

22) 吴阳松，又名吴阳日，朱德海的大儿子，1951年出生。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就职于人民银行，现在住在长春。

化大革命’爆发后，父亲和母亲都被关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寒冷的深秋了，我们家连一棵辣白菜都没能腌上。我是大女儿，家里生活都得靠我。为了购买大白菜，我把吴阳清<sup>23)</sup>和吴坚<sup>24)</sup>留在家里，领着大弟弟阳松到朝阳川方向去寻找白菜地。当时，社员家里都是包下白菜垄以后再把白菜砍下来。于是，我们就开始捡社员们扔掉的青白菜。这时候，有个大叔跑过来询问为什么捡青白菜，还问我们家是不是养兔子，边问边撵我们走。我告诉他想用青白菜来腌辣白菜。他上下打量了我们一下，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听说我们是从城里来的，他摇了摇头，不相信地问我们的父母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让这么小的孩子出来捡青白菜。最后，我不得不说出自己是朱德海的女儿。那位大叔果然大惊失色，睁大了眼睛一再追问，最终确认我们真的是朱德海的儿女后，连声说道：‘朱德海是我们的领导，怎么能让他年幼的儿女捡青白菜呢？’接着，他又动员砍白菜的社员们帮忙。其中有不少汉族社员。他们纷纷跑过来，砍下最好的白菜给我们。虽然有了白菜，搬运工具又成了问题。后来，我们发现了一辆牛车。我跑过去恳求赶车的汉族农民大叔，那位大叔一开始没有同意，听说我是朱德海的女儿后，二话没说，从那么远的地方把白菜送到我们家里……当时，社员们一致说的话就是，你们的爸爸是好人。那时候，我第一次觉得父亲真的是好人。父亲在位的时候我不清楚，当父亲被延边抛弃并撵走时依然被认为是好人，这简直难以想象……这也说明延边还是有许多好人。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一开始什么话也没说，后来说了一句：‘对别人来说，你爸爸是个大好

---

23) 吴阳清，朱德海的二儿子，1954年出生。吉林大学物理系毕业，在长春物理研究所工作，现在住在长春。

24) 吴坚，朱德海的三儿子，1955年出生。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任中国中建公司副总经理，现在住在长春。

人。正因为太好，对我来说却是个坏人。’她还流着泪说，没有人像你爸爸那样不关心家里的事情。这也说明父亲去世后，母亲的思念更加深切。尤其到了晚年，母亲经常提起和想念父亲……她经常到延边去，经常去延吉体育场后山上父亲纪念碑和龙井胜地村的父亲纪念碑看看。父亲与母亲的年龄相差15岁，出身也不同，但却是天作之合。当延吉树立父亲的纪念碑，把父亲的遗骸奉还延边，在纪念碑后面修建墓地的时候，尽管我们想按照母亲生前的愿望，让母亲与父亲合葬于同一墓穴，但是没有勇气提出这样的要求。父亲与母亲的级别不一样，怎么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就在我们踌躇不定的时候，延边州委和州政府猜出了我们的心思，欣然指示按我们的要求办，实在让我们感激不尽。从赵南起将军时期起，延边州委和州政府就给了父亲和母亲很好的待遇。也正是因为靠了这样的恩德，母亲最终能够与父亲在另一个世界在一起。世上再没有比子女们完成父母的遗愿更加欣慰的事情了。”

1986年6月21日《吉林新闻》第3版上登载了龙井县光进乡（现在的智新乡）胜地村党支部和胜地村村民会共同给金永顺写的一封信。这封信似乎与朱德海的爱情故事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仔细阅读后，能让人意识到朱德海和金永顺在肉体 and 灵魂上的一致，也能体会到胜地村村民们赞颂他们夫妻爱情的拳拳心意。摘取几段如下：

“尊敬的金永顺同志：

“……尊敬的朱德海同志已经与我们永别了14年。可是，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他。

“……难忘的1960年温暖的4月某一天，他率领州县领导及有关部门的技术人员来到胜地村。他当时最先去的是金光镇先生的旧居。他在旧居的廊檐下坐了很长时间，回想着那些浴血斗争的日子，沉浸在深深的缅怀之中。他的表情相当沉重。

“他在胜地村住了半个月，召开党支部大会、老农座谈会，还到现场进行调查，夜以继日地与村里人一起制定‘胜地村五年计划’。计划内容包括建筑水力发电站、10里长堤，开垦40公顷水田；在岩下洞前后山山坡上种植果园，每户人家栽种30棵果树；把胜地村建成‘鲜花飘香的村庄’，在岩上洞、水浸洞、山水洞等三条沟里建立牧场，放牧牛羊；给每座山头戴上绿帽子、村前修建鱼塘等。他离开村子那天，村里人嘱咐他经常来家乡看看。他说：‘好的，我会回来的。等到这个计划完成以后，我一定会来的。’”

“1961年开始，我们……我们完成了10里长堤，增加了58公顷水田。另外，每户人家掀起了栽种李树、杏树、苹果梨树的热潮。过了新年，整个村子沉浸在花海之中……”

“我们怎么能忘记朱德海同志呢！李花盛开、香飘全村的5月，李子熟了、甜在心里的7月，五谷丰收、金浪滚滚的秋天，村里人都格外思念朱德海同志。”

“从朱德海同志与我们一起制定五年计划起，已经整整过去了26年……这几年，我们村里180余户人家都安装了有线电话，有了永久性的电力设备，今年还展开了自来水工程。我们决心继续艰苦奋斗几年，一定要完成朱德海同志的遗愿！”

“尊敬的金永顺同志，我们热切地恳请您代替去世的朱德海同志，今年无论如何要到我们村里来看看。”

朱德海的大儿媳妇金太顺<sup>25)</sup>从1982年结婚以后，一直照顾着婆婆，是位十分贤淑的事业型女性。她对笔者说：

“婆婆一直思念着去世的公公（朱德海），只要与公公有关的事情，她都不会推辞。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何鸣雁的主导下，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记录朱德海一生的电影。后来，导演给婆婆送

---

25) 金太顺，朱德海长子吴阳松的妻子，1955年出生。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长春党校教员。

来了几万元的报酬，谁知婆婆竟然大动肝火。既然是与已经去世的丈夫有关的事情，我怎么能接受这样的钱呢！婆婆到了晚年，更加思念公公，一有时间，她就会回想起从哈尔滨时期到延边时期的各种事情。婆婆与公公结婚之前，曾在俄罗斯（前苏联）生活过，来到中国以后，曾在火车站干过售票员工作，所以直到晚年，依然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1989年，我陪同婆婆去俄罗斯探望住在那里的婆婆的哥哥。过了海关以后，婆婆显示出了真正的价值。与其说婆婆的俄语实力非同一般，不如说她与俄罗斯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尽管已经有几十年时间没有使用俄语了，但是她一句也没有忘记。到了俄罗斯以后，俄罗斯人都不知道她是居住在中国的朝鲜族，都以为是居住在俄罗斯的东洋人。我们婆媳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婆婆对儿媳妇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只要为人聪明就行。不管是态度凶狠还是长得好不好看都没关系，只要为人聪明就行。我和阳松结婚时，婆婆还没见过我就提出了这个条件。我和阳松都是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都考上了吉林大学。作为同学，互相比较了解，逐渐发展到了谈婚论嫁。当时，我从阳松的穿着上根本不相信他是朱德海书记的大儿子。如此有名的朱德海州长的大儿子，穿着廉价的塑料凉鞋，身上穿着不合身的旧工作服，像个贫穷的乡下人。可是，相处以后才发现，他是接受很好教养长大的人。我们是在1982年结婚的。结婚那天既没有贺客，也没有宾相。阳松独自骑着自行车来接我，我也骑着阳松送我的唯一的结婚礼物白鸽牌自行车，跟着阳松上了路，身边跟着的只有我妹妹。我们的结婚仪式在当时也是最简单、最寒酸的。后来，婆婆一直为我们的结婚仪式而感到心痛。也许正以为如此，婆婆后来再没有提起自己和公公在哈尔滨时期的结婚。”

## 离开哈尔滨的日子里

原州政协副主席金永万对笔者作了如下回忆：

“我与朱德海书记是在1948年7月见面的。我当时是个19岁的年轻人，经牡丹江推荐，参加了民族事务处举办的民族干部学校学习。当时，朱德海兼任校长，还讲了好几次有关民族的课。目前在延边参加过当时干部学校学习的有原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张逸民（采访当时健在）李洪奎（小说家，当时健在）等。不过，李洪奎没有在民族干部学校学习过。他原先是牡丹江的新闻记者，后来报纸合并才来到哈尔滨。当时，民族干部学校有来自牡丹江、佳木斯及各县的约150余名学员，在学习的同时还发展了许多新党员。学习结束后，学生们都返回原地工作，我是唯一留在民族事务处从事《民主日报》记者工作的人，也许是因为我曾在牡丹江办的《新民日报》上发表过几篇文章的缘故。当时，李洪奎是《民主日报》的编辑，还有后来担任过延边作家协会主席的郑龙水。经过半年的学习，就在第二年快毕业时，朱德海同志和金永顺大嫂生了第一个孩子（吴英彩）。在我们学习期间，金永顺大嫂与玄允姬（第3支队金秉焕的妻子）经常到我们学校里来，在生活上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当时，大家过得都非常艰难，住处有很多死角，尤其是男生，到处都需要得到女生们的帮助。那时候，永顺大嫂年龄很小，容貌出众……现在看来，那时候是我整个生活的转折点。记得，当时《民主日报》的主编好像是金万成。还有赵得贤，跳芭蕾舞非常有名……现在，《民主日报》会作为资料留下的。可是，对于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所属的民族事务处最高领导人却没有任何消息报道。按照现在的常识来说，的确是无法理解的。《延边日报》合并后，依然很少对朱德海书记等延边党政干部们进行报道。当时上级对报纸上登载与领导有关

的报道另有规定。因此，无论是报纸还是广播，都很少报道领导们的活动。不过，民主日报时期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是朱德海书记拒绝了一切对自己的新闻报道，并指示报纸尽量多登载一些关于群众的报道和与形势有关的报道。对此，朱德海政委要求非常严格。当时，朱德海不满40岁，又是延安干部出身，政治思想上相当成熟，懂得如何照顾大局面，而且富有人情味，深得人心，身边也有许多辅助的人。后来，朱德海政委来延边的时候，我们二话没说，全都跟随而来。歌舞团、民族干部学校、报社的干部和员工全都来到了朝鲜民族的中心城市延吉。《民主日报》社的任晓远、李洪奎及夫人崔贤淑、郑龙水等人从哈尔滨出发，经过牡丹江、图们，到达延吉。他们踌躇满志地走出延吉火车站，发现延吉其实只是乡村，根本无法与哈尔滨相比。火车站附近都是水田，车站前的路两旁是成排的白杨树。我们坐上到车站来接我们的马车，到达报社临时安排的宿舍，而且都被分配在记者部。我们就这样到了延边。上面提到了马车，我们自治州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都是以马车作为交通工具，经常用马车来接送客人。而朱德海书记的专车经常被当作救护车使用，有时候还运载报纸去车站。延边社会各界逐渐了解到朱德海书记是个富有人缘、没有架子的人，经常不分白天黑夜地去找他。每当这样的時候，他总是把专车拿出来供大家使用。李羲一了解许多关于朱德海的故事，其中有不少关于朱德海书记专车的故事。李羲一曾经担任过报社社长，早晨分发报纸要是赶不上火车时间，肯定去找朱德海书记。朱德海书记总是二话不说，让自己的专车拉上报纸飞快地送往目的地。这样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他绝不容许自己的家人乘坐专车，公私非常分明。”

1949年2月10日，民族事务处完成了9个月的使命后解散。此时，东北局和吉林省委先后找朱德海谈话，向他通报了去延边

工作的部门及任命的职位。朱德海一边做好奔赴延边的准备，一边召开了动员大会。

朱德海对民族事务处的全体工作人员说，一旦到了延边，将被安排到延边地区党政部门和业务部门工作，并宣布文工团将与延边文工团合并，《民主日报》将与延边的报纸及南满的《团结日报》合并为《东北朝鲜人民报》。他还明确指出，“朝鲜人干部学校”将在延边继续办下去。

舞蹈家赵得贤的夫人李美虔回忆道：

“我们当时都不太愿意去延边。因为无论是民族事务处的工作人员还是下面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北满地区出身，怎么会愿意到陌生的延边去呢。当时，朱德海书记对我们说，东满（延边）土地肥沃，非常适合种水稻，那里有清澈的流水，有美丽的群山环绕。他还说，到了那里，要建设我们民族和谐生活的大城市，还要建立大学、幼儿园和小学，建立医院和工厂，使延边真正变成一个生活幸福的地方。我们家老赵（赵得贤）本来就十分尊重朱德海政委，因此二话没说就跟随朱德海政委来到延边。共和国成立那年3月8日，我们到达延吉火车站。你可别说，从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来到延吉，简直是……现在，延吉已经是高楼林立，可在那时候，延吉火车站周围全都是水田，而且来接我们的全都是汉族车夫赶的马车。如此凄凉的地方让人后悔……可是，过了河南桥进入市内以后，不禁产生了来对了的想法。在哈尔滨每天听到的都是汉族话，而在延吉的街上到处可以听到我们自己的语言，心里不由得豁然开朗了。啊，这里才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来延边的时候，朱政委把他的妻子永顺留在了哈尔滨。因为永顺刚生了大女儿英彩（3月6日）……没错，就是在我们离开哈尔滨的时候生的。永顺生英彩后，在气候比较暖和的4月份与娘家父母一起来到延边。当时去哈尔滨接永顺的是崔采部长。到了延边以后，

朱德海书记家与我们家十分亲密。他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朱德海书记身披军大衣，吸着烟连连咳嗽的样子。”

要了解朱德海来延边的情况，必须先了解1949年初在吉林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会议由吉林省委召开，邀请了哈尔滨的朱德海、长春的164师师长李德山和政治处主任张福，另外还邀请了林春秋、林民镐等延边的党政负责人，以及舒兰、蛟河等地的代表。根据会议的内容，朱德海准备了关于北满地区朝鲜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地位及生活实况的书面材料。延边的林春秋、金世均、李旭、吴勋等收集了延边的民族历史发展、延边的土改工作情况、延边朝鲜人（族）的参军情况等多方面的资料，并制定了汇报提纲。整整三天时间里，他们忙得废寝忘食，最后逼着林春秋给每人买了一碗冷面，吃完后匆匆上路赶往吉林。那时候，林春秋是延边专员公署的专员（1948年3月～1949年3月），柳俊洙是延边地委书记（1948年5月～1949年2月）。

朱德海与延边代表们按照1949年1月19日会议开始的日期，几乎同时到达吉林。省委派了小车专门到火车站来接他们。对于在延边只能乘坐马车出行的他们来说，这简直就是最高级别的礼遇了，大家都露出了惶恐不安的神情。

当时，《延边日报》的前身《东北朝鲜人民报》在1月19日登载了以《民族干部座谈会召开》为题目，“热烈讨论民族工作的各种问题，积极提出今后工作的意见”为副题的报道。现将原文转载如下：

“〔吉林〕吉林省委准备了很长时间的民族工作问题座谈会，于21日上午10点在吉林市召开。来自延边地区和舒兰、蛟河及各县的民族工作干部，以及松江、长春的民族工作干部，大约30余人参加了会议。根据省委决定，会议由朱德海、林春秋、林民镐、李德山、张福等五位同志主持。上午10点会议开始，省委陈政委、

周司令员（周保中）、李副政委等领导出席了会议。周司令员说明了省委召开民族工作座谈会的目的和范围，并号召与会人员对三年来民族工作的思想指导政策方针及建军、参战、建政、建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实际工作和革命斗争历史等等，遵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进行一次检查，总结经验教训，加强今后支援前线、后方生产建设等各项工作，使民族地区的工作获得更大的发展。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对今后的工作进行热烈的讨论，并积极提出自己的见解。可以预见会议必将取得圆满的收获。”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在1月21日会议听取各地区的具体汇报，有了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进入第二阶段会议，由陈正人主持会议。这次民族工作会议是中共中央委托吉林省委召开的会议，主要是为了讨论延边和东北其他地区朝鲜人的问题。40名代表中大部分是朝鲜人。周保中、朱德海、林春秋等许多人，都着重对延边地区的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会议上，周保中重点强调了1910年日本并吞朝鲜后，朝鲜人移居中国，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并且团结中国内的其他民族，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确立了在中国国内堂堂正正的少数民族地位，因此一定要把用血汗开拓的延边建设好。

1948年8月，周保中调往云南省之前，曾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信，建议“先在延吉地区实现民族自治”。（摘自1989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周保中》）周保中还为建立延边大学、成立延边自治区（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参加会议的延边代表一致肯定了延边朝鲜人（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的历史功勋，并对延边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前景进行了畅所欲言的讨论。

特别是在会议上还对延边的所属问题和朝鲜人（族）的归属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当时一共提出了三种意见。

林春秋主张延边应该归属朝鲜，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朝鲜民族的问题。这样的主张与林春秋的成分有密切的联系。1945年末到1946年初，有不少干部从延安和关内来到延边。他们不了解延边地区复杂的历史情况，而且当时的干部数量也不足。特别需要深刻考虑的是，延边是个民族地区。于是，周保中根据省委的决定与朝鲜进行联系，请他们选派非常了解延边地区情况的领导人到延边来。曾与周保中一起在苏联时期88国际旅工作的金日成首相派来了林春秋。林春秋也曾作为周保中和金日成首相的部下，一起在88国际旅工作过。林春秋在最困难的时期为延边的各项工作和基础建设做了很多工作。

林民镐提出按照苏联方式逐渐把延边建成自治共和国。林民镐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也与他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的出身有联系。他认为当时苏联的共和国联邦模式是成功的，所以才产生这样的想法。

然而，这两种见解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朝鲜民族所处的特定环境。朱德海充分倾听了会议上提出的意见之后，最终披露了自己的主张：

“无论是把延边归属朝鲜，还是建立苏联式自治共和国的主张，都不是从住在延边境内的同胞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的想法，只不过是在中国国情和东北实情中无法实现的空想而已。是否归属朝鲜是国家之间的问题，不是本次会议上能够讨论的议题。建立自治共和国的意见也是我们在这里难以讨论的议题，不仅不符合目前中国的国情，而且也不利于我们民族将来自身的发展。我认为，在民族问题上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孙中山和列宁的理论。我们民族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施在中国能够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在这方面，1947年5月1日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延边是中国的领土，因此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具有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政府的地方政府性质。”

从延安时期到担任哈尔滨第3支队政委和民族事务处处长工作时期，朱德海也曾产生过苦闷。而从土改时期开始，他的民族观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那就是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实现民族自治区域的民族生存的宏伟蓝图。朱德海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和即将诞生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充分享受民族自治权利，以国家主人的身份建设延边，是最为现实的生存方式。他的主张逐渐获得了代表们的赞同。在延边的朝鲜人行使民族自治权中，吉林民族工作会议无疑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朱德海的区域自治主张得到了周保中省长的支持，也得到了东北行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

另外，这次会议还对延边地区的教育发展进行了讨论，也对创建延边朝鲜民族自己的最高学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期间，代表们访问了长春。林民镐利用这个机会，到建国大学购买了很多书籍，后来这些书籍成为延边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会议于1949年2月4日结束。

朱德海在这次会议上认识了林春秋。林春秋1912年3月8日出生于吉林省延边细鳞河，自学医术后开设药房。1930年初，他成为游击队的军医，从事抗日活动。他曾经在东北抗联和苏联远东军第88旅工作。光复后，他为在延边建立延边大学和成立自治州做了很多工作。他去了朝鲜后，担任朝鲜劳动党平安道第二秘书、江原道党委员长等职务。后来，他又成为朝鲜驻保加利亚大使等外交官，1983年当选朝鲜国家副主席，1988年4月27日逝世。著有回忆录《回忆抗日战争时期》（1959年）、长篇小说《青年先锋》等著作。

会议结束后，东北行政委员会根据吉林省委的要求，2月10日解散了驻在哈尔滨的民族事务处，并在3月把朱德海派往延边。

## 第四章 延边的天地

(1949年~1967年)

### 朱德海的天空

1945年10月20日，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成立了中共延边委员会。以延吉（间岛）苏联红军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身份进行延边党组织成立工作和组建军队工作的姜信泰<sup>1)</sup>被任命为书记。同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遣雍文涛等一批干部到达延吉。雍文涛根据东北局和吉林省工作委员会的指示，于11月15日召开会议，撤销中共延边委员会，由雍文涛、姜信泰等7人组成中共延边地方委员会，雍文涛任书记。为了成立各县委，延边地委把干部派往各县。1945年11月20日，延边地委主管政权建设工

---

1) 姜信泰，又名姜健，1918年出生于庆尚北道尚州，1933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口才好，在游击战中表现出了才能，虽然年轻，晋升很快。1935年整编东北抗联，他以周保中部下的身份进行活动。以后，在金日成首相和苏联远东军第88国际旅工作，光复后，在延边工作一年。1946年回朝鲜参加创建朝鲜人民军的工作，1948年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大会议员，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并参战，1950年9月8日在庆北安东地雷爆炸事件中阵亡，金日成和朴宪荣参加其葬礼，授予共和国英雄称号。

作的董昆一主持召开了延边人民代表大会。经大会选举产生了延边政务委员会。21日，延边政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经选举产生了延边行政专员公署，选举关选庭（关俊彦）为专员，董昆一为副专员。在此会议上解散了间岛临时政府，把间岛市改称为延吉市，归延吉县管辖。11月23日，东北人民自治军延边军分区成立，姜信泰任司令员，雍文涛任政委。

1946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唐天际来吉东，以延边地方委员会为基础，成立了隶属于中共吉辽省委的吉东分省委，唐天际任书记，雍文涛任副书记。吉东分省委管辖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安图、敦化、额穆、蛟河等8个县，并保留了延边行政专员公署。

1947年2月，中共吉林省委决定撤销中共吉东分省委，成立中共延边地委和中共吉东地委。孔原任延边地委书记，省政府副秘书长徐元泉兼任延边行政专员公署专员；石磊任吉东地委书记，刘俊秀任副书记。吉东地委设在敦化，管辖敦化、额穆、安图、蛟河4个县。与此同时，成立吉东行政专员公署，董昆一任专员；成立吉东军分区，邓克明任司令员，石磊任政委。1947年4月1日，中共吉东地委改称中共吉敦地委，党政军领导人没有变动。

1947年9月25日，中共吉林省委决定合并延边地委和吉东地委，成立中共吉东地委，任孔原为书记，刘俊秀为副书记，地委机关设在敦化，并成立吉东行政专员公署，徐元泉为专员。1948年3月9日，吉林解放。10日，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由延吉迁回吉林。3月27日，吉林省政府把吉东专区改为延边专区，管辖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安图5个县，将额穆县并入敦化县。敦化县和蛟河县改为省直辖县。4月16日，省委决定撤销吉东地委成立中共延边地委，孔原为书记，刘俊秀、林春秋为副书记。

1949年，随着朱德向全国进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下达，全国解放进入倒计时。

1949年3月20日，经中共中央东北局同意，中共吉林省委派朱德海到延边工作。朱德海赴任前夕，3月1日在延吉人民广场参加了“3·1”运动30周年纪念集会。除朱德海以外，林春秋、崔采、宋振庭等人也参加了集会。有的资料中记载朱德海是3月20日到达延边的，但是根据随朱德海从哈尔滨到延边的同志们证实和《延边记事》等多种资料来看，均记载朱德海是2月末到延边，并参加“3·1”运动纪念活动的。

1949年5月22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通知，由朱德海、王录、文正一、崔采、林民镐等9人组成中共延边地委，正式任命朱德海为中共吉林省委委员、中共延边地委书记。现在的延边州委，曾经先后改称为中共延边委员会、中共延边地方委员会（1）、中共吉东分省委、中共延边地方委员会（2）、中共吉东（吉敦）地方委员会、中共吉东地方委员会、中共延边地方委员会（3）。朱德海曾任中共延边地方委员会（3）（1948年4月16日～1956年12月）时期的地委书记。两个月以后的7月13日，文正一调任东北局农林部秘书长以后，朱德海任延边行政专员公署（自治州政府前身）专员。随着解放，延边行政专员公署如走马灯一样，由延边政务委员会多次改称为延边行政专员公署、吉东（吉敦）行政专员公署、延边临时参议会，初始的延边行政专员公署等，但是主管延边的人民政权的职能没有变。公署先后由关选庭、董昆一、徐元泉、林春秋、文正一、朱德海为专员。其中，任期最短的专员是林春秋，他的任期不到一个月。朱德海任延边地委书记兼延边专员公署专员，成为统管延边全盘工作的党政第一任首长。至此，朱德海的政治地位已经确定，成为延边这个民族自治区域的第一任党政一把手。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地区 23 个单位（地区）的 134 名代表。会议制定了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省、市、地区的出席人员，为制定政治协商会议的条例和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方案和宣言打下了基础。会议还制定了新中国的国旗、国歌和国徽。朱德海作为少数民族代表一员去北京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并且还参加了 9 月 21 日至 30 日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爱国人士 662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产生了 180 名全国政协委员，朱德海也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的开幕词上，毛泽东铿锵有力地向全世界宣告后来广为后世传诵的豪言壮语：“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国策中制定合理而先进的民族政策制度，国家才有可能长治久安。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中央制定了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决策。在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多方面论证和反复讨论是实行联邦制还是实行共和国领导下的少数民族自治，最后做出了要实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决定。1949 年 9 月 7 日，周恩来总理在《关于人民政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向政协委员说明了中共中央对民族自治的设想。

9 月 29 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指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在讨论《共同纲领》的时候，朱德海表示在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符合我国的国情。中国的少数民族过去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民族，所以跟苏联的民族问题情况完全不同。会议期间，

朱德海还介绍了延边朝鲜族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地谈到了将来培养民族干部的问题，民族地区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等问题。他还指出，延边因历史的原因，汉族的教育文化程度相对落后，所以也有少数民族帮助汉族的问题。他又谈到了各民族的发展和团结的问题。只有各民族团结在一起，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共同发展。经济发展了，对国家也会有更大的贡献。

会议讨论的时候，朱德海编入少数民族组。参加这一组的还有回族代表杨静仁（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藏族代表天宝、刘格平（50年代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各兄弟民族聚在一起，共同商议国家大事，他们深深地沉浸在作为主人翁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之中。在会上他们畅所欲言，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参加会议的各少数民族代表一起讨论《共同纲领》后，一致协议应成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部级）。

会后，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地请朱德海等十几位少数民族代表到中南海座谈，征求他们对《共同纲领》的意见。

在座谈会上，朱德海谈了自己的认识，并代表东北120万朝鲜族人民表示坚决拥护《共同纲领》。

在政协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大会一致采纳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会上规定了国家的名称、首都、国旗、国徽和国歌。每当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朱德海充分行使作为朝鲜族代表的民主权利，他还参加了共和国的开国典礼。

以我国古典民族理论为基础的民族识别工作在，30年的历程中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1954年为止，可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一次性地确定了民族成分。其中，已确定的民族有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壮族、白族、傣族、傈僳族、鄂伦春族等38个少数民族。

经朱德海的努力，朝鲜民族在第一阶段就获得了“朝鲜族”这一族名的认可。

1949年10月16日，秋天宁静的阳光照耀着延吉车站，蜻蜓在蓝蓝的天空悠悠地飞来飞去。车站北边平展展的农田泛起金黄色的稻浪，阵阵稻香扑鼻而来。

这一天，朱德海从北京回到延吉。延边的党政军领导和延吉市内的市民都到车站去迎接朱德海的归来。整个车站人山人海，万头攒动。

“来了，来了！火车进站了！”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

列车吐着白烟徐徐驶进车站，整个车站一下子沸腾起来。乐队奏起《义勇军进行曲》，市民和学生齐挥彩旗，高声欢呼。延吉市各族各阶层人民举行仪式，欢迎朱德海参加政协第一届全国会议和开国典礼后光荣归来。朱德海一下火车，由宣传部部长崔采打头儿，组织部部长张宝云、延边大学常务副校长林民镐、延吉县委书记宋振庭等人，依次跟朱德海握手表示由衷的祝贺。这一天，五千多延吉市民到车站迎接了朱德海的归来。在延边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盛大的欢迎仪式，这既是延边人民对朱德海的拥护、信赖、爱戴和支持，也是延边人民拥护新中国成立的标志性的活动。

金永万回忆当时的热烈情景，说：

“朱德海书记一下车，接了献给他的花束，然后跟前来迎接他的干部们一一握了手。也许是因为刚刚参加过隆重而盛大的会议（开国典礼），朱德海书记穿着整洁干净，人也特别精神。那时，站前广场上爆发出‘哇！哇！’的欢呼声和掌声。人们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的口号。站前广场和站房墙上，贴了许多标语。当时，在人群中第一次爆发出了‘东北朝鲜人民代表朱德海万岁！’的呼喊声。这些欢呼和呼喊口号

的形式，都是从苏联那里学过来的。苏联人和苏联红军动不动就喊‘乌拉（万岁）！’所以延边人也都跟着学会了。当时，朱德海书记走上临时搭建的讲台上讲了话。至于当时他讲的内容，现在有些是记不清了。记得其中有句话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实现了我们民族的夙愿，我们要建设好延边，在中国的土地上，以主人翁的精神做好工作等等。那时，到火车站迎接他的延吉市人激动得热烈鼓掌，大声欢呼。当时那激动的场面，如今仍然历历在目，那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鼓掌声似乎还在我耳边响起。

“那天，永顺大嫂也去车站迎接朱德海书记，刚断奶的大女儿英彩由娘家母亲背着。她的娘家母亲个子很高。她们担心被政府的工作人员发现也让她们站到前面来，就远远地站在人群的后面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金永顺大嫂就是这么一个人，她行事低调，从来不仗着自己的男人大声说话，颐指气使。她是一个少言寡语，文静娴雅的人。那天，人群里突然爆发出‘朱德海同志万岁’的口号以后，朱德海书记严肃地说，以后再也不许这么呼叫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朱德海书记遭到这一‘万岁事件’的连累，他们说是朱德海书记指使的。”

朱德海参加开国典礼后回到延边，一直沉浸在如何建设繁荣富强的延边的激情和设想之中。他想，在开国大典上响起的礼炮声就是一个伟大的宣言书。第二天，延吉市内的千余名干部举行了欢迎东北朝鲜民族代表朱德海同志的晚会。

参加晚会之前，朱德海接受了《东北朝鲜人民报（延边日报）》记者的采访。8月29日以《东北朝鲜民族新纪元》为题的新闻报道，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朱德海的衷情。这不仅是朱德海的心声，也是当时东北地区朝鲜族人民共同的心声。下面是原文中的部分摘录：

……生活在东北的120万朝鲜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东北人民代表大会。“他们的兴奋和欢喜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为什

么呢？”东北朝鲜人民代表、延边专员公署专员朱德海同志提出问题以后，又深刻地回答说：“人民自己选派自己的代表，组织自己的政权，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如此广泛而高度的民主政治生活，我们东北朝鲜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没有享受过。东北朝鲜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是一本以血泪浸透的、受压迫的历史……‘8·15’的一声霹雳翻天覆地，终结了东北朝鲜民族的百年浴血史，开辟了新的纪元。从此，东北朝鲜民族从桎梏中摆脱出来。东北朝鲜人民全部的革命热情和勇敢性，如火焰迸发出来。三年以来，参军的青年占全人口的5%以上。”

朱德海同志首先谈到了经济生活的提高。他说：“在土地改革中，95%以上的东北朝鲜人民分得了土地、牛马和房屋。20万农户平均每户分得了肥沃的水田1垧7亩……在政权建设方面，东北朝鲜人民也已经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翁。占全东北朝鲜人民人口74%的吉林延边地区，从专员公署开始到区、村的绝大多数朝鲜干部都是朝鲜人民自己选出来的。在朝鲜（族）人数少的地方，区里安排了民族干事，县以上设置了民族事务科。我们的民族干部学校正培养300余名区、县级干部。其中已经毕业走向岗位的超过2000余人。在文化教育方面，‘8·15’以前，东北朝鲜民族中学只有17所、5000余名学生，而现在拥有70所中学、16000余名学生。我们又增加了1所大学和4所师范学校，就读的学生一共有1300余人。此外，已有的小学校就达1500所，上学读书的小学生有18万人。这就是解放后三年来，我们书写的灿烂的历史一页。要强调说的是这些学校全部以朝鲜文字教学，这是我们多少年来期盼过而又未能实现的问题。我们印刷了50余种、计100万册以上的各种朝鲜文教科书，印刷了数十种翻译的名著。《东北朝鲜人民报》每天的发行量达2万份以上，还有《延边文化》、《教育通讯》等朝鲜文杂志……”（聂眉初记者）

从参加共和国开国典礼的那一天起，朱德海就已经在心中画出了一幅“民族自治区”这幅延边的政治蓝图。

朱德海书记对民族观的思维是先进的。在哈尔滨时期，朱德海就解释过民族理论，他反复强调说：“民族问题是整个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只有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民族问题也才能得到解决。……民族利益必须服从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就是现在看来，时朱德海说的这一民族观点是符合中国现实的。朱德海成立自治区（州）的构想，应该说是他在哈尔滨的时候，就已经想过的。所以，朱德海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大会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会后，他又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反映自己的观点。

1951年，朱德海和崔采去北京参加建国两周年庆祝活动。当时，朱德海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座谈会上提出：“延边已经具备了成立朝鲜民族自治区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希望中央政府给予批准。”在座的崔采也在会上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得到北京的答复以后，朱德海一回延边就着手创立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的各项筹备工作。朱德海设计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的蓝图，构思自治区的基本框架，并引导其走向成功。当时，在国家民族识别工作中，把在中国的朝鲜族的族名确定为“朝鲜民族”。1955年，自治区改称为自治州的时候，把“朝鲜民族”改称为“朝鲜族”。

### “9·3”旗帜

1947年5月1日，中国第一个省级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宣布成立。接着，1950年11月成立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1951年12月成立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与此同时，“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筹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州人大常委会前任主任曹龙浩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成立跟朱德海的功劳是绝对分不开的。这是朱德海书记最大的政治业绩之一。1952年9月3日，延边人民终于翻开了民族区域自治历史的新篇章。那天，延吉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这一天，延吉市的街道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延吉市三万余名群众云集在市人民广场。几个月来，在朱德海书记的领导下，我跟民政处的工作人员一起，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从会场的布置到代表人数的分配、代表的选举、大会进行的步骤，朱德海书记都一一过问。期间，我有了多次跟朱德海书记接触的机会。我向他汇报工作的进展情况，也了解到了朱德海书记的为人。朱德海书记总管党政一切事务，在百忙之中，他也一一听取自治州筹备工作的汇报，做出具体的指示，嘱咐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漏洞。当时，朱德海书记的工作作风使我对延安干部仔细认真的工作作风有了确实的感受。

“其实，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的成立有她的历史背景。她有利于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中国历史的大框架中，考察中国式的自治区、自治州的产生。”

早在1935年2月，当时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吴平明确提出并主张“朝鲜民族有权成立自己的民族自治区”。

1936年，中共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接到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关于对东北朝鲜民族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后，回到了东北。此指示中包含着“关于中韩（朝鲜）民族联合起来，推翻日帝傀儡统治，建立间岛韩人自治区的主张”的内容。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指出：“……允许他们（朝鲜民族）同时拥有两个国籍。目前作为中国公民，享受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

允许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而且朝鲜一旦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以朝鲜公民的身份参加朝鲜反侵略战争。”

此后，在土地改革和建立人民政权以及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完全承认了朝鲜民族的中国公民资格，延边所有的朝鲜人都加入了中国国籍。1948年8月，中国共产党再次宣布：“延边朝鲜民族人民是开发、建设延边的主力军，他们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我们党和政府批准延边的朝鲜民族人民在中国境内拥有少数民族地位。党的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必须坚决贯彻我党关于同朝鲜人民团结到底的方针”，并且“要积极大胆地提拔民族干部。无论党、政、军、民，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培养和提拔民族干部。”

在这一时期，延边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干部培养等工作，已经打下了实施朝鲜族区域自治的组织基础，也确定了区域自制的地理范围。有关朝鲜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和构想，光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得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成为现实。1952年3月，东北区书记高岗<sup>2)</sup>请朱德海来，专门听取了对成立“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的意见。

1952年2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方案的决定》（政务院第125次会议）。乌兰夫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报告，对民族区域自治做了解释。

那一年，朱德海以中共延边地委和延边专员公署的名义，签

2)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横山县，原名高崇德，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后进驻东北，先后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中共东北区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区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1954年，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受批判，同年8月17日自杀。1953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署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聚居区域自治设置的计划》。同年7月，又主持起草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和《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条例（草案）》。

1952年7月24日，以彭泽民为团长、萨空了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一行50人，在吉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徐元泉的陪同下，乘坐火车到达延吉。代表团的到达，表明了中共中央对成立延边自治区的支持。朱德海、董玉昆<sup>3)</sup>、崔采等延边的党政领导人到延吉火车站迎接中央代表团。这一天，延吉市3万市民（延吉市的一半人口）沿街欢迎。

7月27日，延吉市3万余市民又云集在人民体育场，举行了欢迎中央访问团的盛大集会。在欢迎大会上，朱德海充满热情地致欢迎词和彭泽民做答谢以后，代表团赠送了毛主席给中共延边地委、延边专员公署的锦旗，上面是毛主席的亲笔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接着是中央访问团的礼物赠送仪式，有190幅毛主席画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亲笔题词500张，纪念奖章6500个，幻灯机2台，图书25种1392册，药25种15箱，还有包括一台显微镜在内的26种医疗器材和医药书籍303册。从29日下午到30日上午，中央访问团同各族各界的代表50余人举行了座谈会。

中央代表团在延边滞留期间，先后访问了中共延边地委、延边专员公署、延边大学、东北朝鲜人民报社、印刷厂、延边教育出版社、延边文工团、龙井市、老头沟东农橡胶厂、崔竹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

3) 董玉昆，1916年12月29日出生于延吉县。从1946年起，先后任珲春县县长、县委书记，延边专员公署副专员，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先后任吉林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四平地委第一书记。1963年3月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开除党籍。1968年7月23日自杀。

1952年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主席令。8月21日，延边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会议在延吉召开。会议产生了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了代表会议的意义、任务、代表资格等具体问题。8月29日到9月2日，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在延吉市人民剧场召开。300余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在大会上，朱德海做了《关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施政建设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自治区的方向，说：“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是中华人名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是一级地方政权机关，依据《共同纲领》和上级人民政府的决议、指示、法令，依据《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规定，在自治区区域内实施自治权利，开展工作。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即将成立的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任务是照顾民族特征，通过民族形式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团结各民族人民，经过有体系的步骤，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大会正式成立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通过了《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条例》和《关于民族团结决议》，选举了第一届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朱德海当选为第一届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主席，董玉昆、崔采当选为副主席，霍明光当选为秘书长，朴昌武、张国勤当选为副秘书长。田仁永、姚昕<sup>4)</sup>等32人当选为委员。大会把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日定为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成立纪念日。延吉市、延吉县、和龙县、珲春县、安图县等隶属于自治区管辖，共有854 000余人口。其中朝鲜族人口为530 000余人，占延边总人口的65%。

4) 姚昕，原名于春芳，1912年生。1950年起，先后任延边公安处处长兼边防84团政委、延边地委第二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彭真曾两次写材料，为其中共地下党员身份作证。1972年任中共延边州委书记，后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6年5月26日在长春去世。

9月3日，延吉市和从各县市来到延吉的30000余人在延吉市西广场举行了庆祝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成立的联欢大会。中央、东北局、吉林省派来的党政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当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朱德海庄严宣布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的时候，掌声雷动，欢呼声经久不息，直冲云霄，整个广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1952年9月4日，《东北朝鲜人民报（延边日报）》报道了这一盛况：

“……奏国歌以后，向国旗和革命领袖敬礼，向革命烈士致以默哀。接着，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朱德海主席讲话。他说，历时6天的延边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了光荣的任务。现在我宣告，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了。当他宣布每年的这一天为延边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纪念日的时候，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下午6点10分，大会在响亮的口号声中结束，接着开始了群众游行。延吉市沉浸在欢乐之中。夜里，街上都是手持五彩灯的游行人群。喧天的锣鼓声、歌声和‘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夜空。游行庆祝活动持续到深夜。”

《东北朝鲜人民报（延边日报）》大书特书8月30日朱德海的开幕词，9月4日刊登了自治区成立的消息和《致毛主席的信》的内容。报纸的第二版面还刊载了车昌俊作词、金声民作曲的《庆祝自治区成立之歌》。

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的成立是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缩影，受到了延边区域朝鲜民族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从此以后，每年的9月3日成为延边各族人民盛大的节日（1985年以后州人民政府把这一天规定为国家法定休息日）。跨过鸭绿江和图们江移居

中国，在近代史上被称为“跨境人”、“开垦民”、“朝鲜人”、“高丽人”的朝鲜族得到了“朝鲜民族”的固定族名，在中国确立了民族地位和政治地位。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55年12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国务院批准，自治区改称为自治州。自治区改称自治州这一问题不难理解。我国《宪法》第53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这里所讲的自治区相当于省级行政地位，自治区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比如，内蒙古自治区就是直属中央领导。自治州的建制比省小，比县大，是省级领导下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县是一个相当于县级行政地位的民族自治地方。由此而言，把比省的建制小，比县的建制大的延边称为“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显然是不合适的，于是把自治区改为自治州。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朱德海为州长。1956年12月召开的延边州第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这样，朱德海被选为延边第一任自治区主席，延边第一任自治州州长。

朱德海认为，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关键在于争取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平等，把延边建设成为和谐的、民族团结的自治区。宏观上，在民族干部的任用、民族干部的比例等政策性和细节性方面，他不但要求毫无保留地彻底地执行，自己也起到了带头作用。朱德海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政治上关心和重视朝鲜族知识分子的进步，坚定政治立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与包括姚昕、田仁永、卢基舜、郑奎昌、金炳镇、赵得贤和崔玉珠等在内的延边政治、经济、农业、医学、艺术等领域的许多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特别是他同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朱德海首先启动的是他和谐的政治观，

其次是他厚道的仁义之德。人们评价朱德海是位好干部，这与他的人品和做人的原则是分不开的。

朱德海积极培养汉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他积极地招来农业、工业、教育等方面的人才，请来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并从各个方面给予关照。在朱德海的倡议下，从1954年开始，把每年的9月规定为民族团结宣传月，检查民族政策贯彻情况，表扬民族团结模范。珲春市三家子乡西崴子村是朱德海亲自树立的民族团结村，这个村如今还保持着这一光荣传统。

朱德海强调，要使各民族搞好团结，首先州委的领导成员要搞好团结，做出榜样。朱德海同姚昕、田仁永等汉族干部之间结成的深厚的友谊，成为今天民族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朱德海灵活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国务院照顾朝鲜族的生活习惯，指示多供应朝鲜族每人3斤大米，朱德海就把国务院的关怀也落实到汉族在内的其他的民族身上。在州内，不论是什么民族，凡是60岁以上的老人和3岁以下的孩童都给增加了大米的供应数量。特定时期，还在给朝鲜族每人多发的3尺布票中，拿出1尺半给了其他民族。

## 延边大学

在《回忆朱德海》一书中，作者对朱德海创办的夜校做了如下介绍：

1935年春，朱德海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团留守处工作。5月，部队转移到勃利县，朱德海因病（肺炎）未能跟随部队，就留在勃利县管辖的小石盒水甸村养病。那一年7月，朱德海在村民太

昌洙家一边秘密地进行组织游击队的工作，一边把他家当作教室办起了抗日夜校。

日帝强占时期，在北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学校有崔锡千（崔庸健）在宝清县开办的“军政讲习所”、赵尚志在巴郎河谷办起的“第3军司令部电信学校”、许亨植在方正县开办的“短期训练班”等，而朱德海办的夜校与这些伟人开设的教育相并肩，成为初期的启蒙教育。可以说，朱德海的民族教育蓝图是从这时开始萌芽的，后来在莫斯科的东方劳动大学、延安、哈尔滨等地的革命实践中，提高为正规的教育思想。

黑龙江省尚志市朝鲜族中学校长金尚根说：“我们一所学校培养出近2万名朝鲜族人才，这是我们实现朱德海同志有远见性的学校运营方针的过程。他们这些毕业生中出现了像郑判龙教授、白元根（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这样的精英。现在，我们学校黑龙江省也已定格为名校。”

1948年10月，延边专员公署专员、延边地委副书记林春秋在延边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关于在延边成立一所民族大学的意见。

1949年1月，在吉林省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朱德海和林春秋再次提出了这一建议。他们起草了民族大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朝鲜民族干部的议案，向吉林省委提交。这一提案获得了东北局的批准。

《中国朝鲜民族教育史料集》第2辑创立延边大学的原始史料上，详细地记载了创立的报告、创立宣言、筹备委员会等一切经过。可以说，这是延边教育创立的宣言书。延边大学成立是延边文化教育发展的缩影。

1949年3月20日，在延吉市斯大林剧场举行了延边大学开学典礼。在这里要明确的是几次更改校名的前后过程。前面我们

已经提过，当得知开始拟定的“东北朝鲜人民大学”校名东北局有批准的意向以后，1948年2月18日，大学筹备委员会向东北行政委员会提交了申请。3月中旬，东北行政委员会答复时指出：综合大学的名称，应取以大学所在地的名称为宜，所以称“延吉大学”为好。大学筹备委员会接到通知后认为，在大学所在地分设在延吉和龙井的情形下，将校名称为“延吉大学”有一定的局限性，叫“延边大学”更好些。于是再次向东北行政委员会报告。同年4月13日，东北省委员会答复，表示同意。

延边大学成立后，地委书记兼专员朱德海任第一任校长，林民镐任副校长，金裕勋任教务处处长，朴奎灿任秘书处处长。对校长一职，有必要作出解释。延边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应视为林春秋。《不灭的英灵》一书中崔采也说，林春秋是第一任校长。可是，就在创立的当天下午他去了朝鲜，实际上大学创立以后的工作他都没有参与和过问。所以视朱德海为第一任校长也是理所当然的。

延边大学成立的时候，周保中以个人的名义赠送了一辆货车、一台钢琴、一匹绸缎。此后，周保中继续为延边大学的成长给予很多的关心。

中国第一所民族大学——延边大学成立以后受到的评价是，她的成立开辟了朝鲜民族教育史的新纪元。延边大学是一所集文科、理工科、医科、农科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学。她集中了朝鲜民族的高等教育，为形成从小学到大学都能用朝鲜语授课的教育体系打下了基础。

大学成立以后的初期，遇到了很多问题。其中教员问题和教材问题成了最大的难题。在朱德海的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决定从当时的北满等地区招揽人才。

朱德海亲自参与了制定学校的主要任务、确立培养目标、设置课程以及延边大学10大运营方针、12年教育事业发展计划、12

年科学研究计划的工作。1956年，经朱德海提议，省党委批准成立延边大学党委，金文宝担任第一任党委书记。早年，金文宝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少数民族事务处工作的时候，曾担任过朱德海的秘书。金文宝书记的长子金熙宽回忆说：“我母亲说，当朱德海的指示和地委关于延边大学党委书记的任命发布以后，父亲晚上回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呜呜地哭了。一个（伪满时期）师道学校出身的人担任延边大学的第一任党委书记，此时父亲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延边大学创立时期留下了不少插曲，其中原延边大学副校长郑判龙和全松林教授入学前去找朱德海的事情，至今仍然传为佳话。郑判龙博士从黑龙江省尚志学校来到延边，是一个高中也没修完就经朱德海推荐入大学的延边大学第一届毕业生。郑判龙<sup>5)</sup>博士在他的《离开故乡50年》中有这样的一段回忆：

当时，郑判龙是黑龙江省尚志初中的学生。当他听到在延边成立延边大学的消息时很激动。于是利用假期，他跟老师提前修完了初中3年级的全部课程。看到报纸上的招生广告以后，为了应考，他跟林极成和全松林（全凤来之子）一起，在村里人的欢送下来到了延吉。到了延吉，他们迫不及待地来到大学筹备委员会办公室，见到了林民镐。林民镐听说他们是初中三年级的在校生，高中尚未毕业，就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高中毕业了才能进大学学习吗？你们现在才多大呀？现在你们还小，初中都没毕业，不够条件。”这一句话如

---

5) 郑判龙，延边大学前任副校长，延边大学朝文系教授，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1932年10月3日出生于朝鲜全罗南道潭阳。1952年延边大学毕业，1955年留学苏联，1960年获得苏联莫斯科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延边大学语文系主任、党总支书记，中文系主任。1979年任延边大学教授，1980年任延边大学副校长。1986年任朝鲜语文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朝鲜文学研究会理事长，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复旦大学和吉林大学兼职教授，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国外研究员等职务。

晴天霹雳般撕碎了他们的心。回到旅店，他们就着白开水吃打糕，冥想苦思，愁眉不展。忽然，他们想起了从哈尔滨来到延边的朱德海政委。尚志的人谁都知道传说中的朱德海。郑判龙上的尚志中学就是朱德海当年在北满建立的最大的学校。

“对呀，我们去找朱政委吧！”

郑判龙领着林极成和全松林急急忙忙地来到朱德海书记的办公室。朱德海和蔼地接待了他们。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们是来上大学的。可是……他们说不行。”

郑判龙焦急地说。朱德海深情地看着从农村来的这几个年少的学生又问：

“你们中学毕业了吗？”

他们低着头照实说：“我们虽然是在校生，可是我们已经学完了初中的课程。”

朱德海微笑着说：“可以理解你们上大学的心情。可是，高中课程是要学完的。”

朱德海想了片刻，毅然拿起电话，给延边大学筹备会的林民镐拨过去。

“他们从那么远的北满农村找到这里来，真是难能可贵呀！我们需要的正是像他们这样有求知欲的青年。你看，能不能给他们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如果实在是难办的话，先让他们跟着学习一个学期，等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不及格就让他们回去怎么样？”

对方一答应，朱德海就让他们去找林民镐。他们刚要出门，朱德海又问他们：

“等等，你们刚才说你们是从河东来的，你叫全松林？你是不是全凤来的儿子呀？”全松林点点头。朱德海朗声笑着说：“你爸爸跟我来到了这里，你也跟踪来了，你可要好好学习哟。”

于是，他们三人带着期末考试的附加条件上了延边大学。此时，他们激动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1951年6月25日，国家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正式任命朱德海为延边大学校长。

延边大学金炳珉校长在《朱德海诞生100周年纪念会》上说：

“朱德海被任命为延边大学校长以后，为延边大学做了很多工作。延边大学的发展战略、校园的建设计划、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费的投入使用等重大的工作，都是在他的直接参与下做出决策的。朱德海很清楚预见性的战略发展思想是作为一个校长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和要求，这也是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依据和先决性的条件。因此，朱德海校长对延吉市的周边地段进行了全面的勘察。经过反复的比较和研究后，他把建校用地选在现在的位置上，把几十公顷的地皮划拨为盖校楼的用地。他亲自调拨资金，在改造原关东军司令部旧建筑的同时兴建教学楼。1951年，盖起了建筑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办公楼，后又陆续兴建化学教学楼和宿舍。现在的学校地基就如同坐在山脊一样，为形成层次凸现的大学建筑创造了条件。目前延边大学新的校区已经全部竣工。气魄、宽阔的建筑构图，独特的民族风情建筑风格，新的校区和原有校区的和谐相融，这些都使各界来访者赞叹不已。我们认为当年朱德海校长选准的建校用地，今天给我们提供了扩建新校区的广阔的空间。

“1952年初，朱德海校长亲自到龙井，在马蹄山下选择了农学院的建校用地。此后，他又为农学院争取资金，建起了1000平方米的农学院校楼。1958年，农学院教学楼又扩建为10000多平方米，基本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为了解决教学试验田的问题，朱德海校长又把马蹄山下原日帝侵略时期的18.9公顷水稻试验地拨给农学院用为教学用基地，把周边几百公顷耕地交给农学院作为

多种经营的实验农场。延边艺校也是朱德海校长在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二次会议上提案，经文化部批准成立的。艺术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为地方培养了大量的艺术人才，使延边享誉‘歌舞之乡’的美名。

“朱德海校长把走在时代前面的、超前的意识和开放性思维作为办学的主要理念。1949年3月20日学校开学，7月他把两个代表团派往朝鲜和东三省进行考察。去朝鲜的考察团访问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带回了200多册朝鲜文教科书。其中不但有朝鲜语言、文学、历史文化方面的教材，还有从苏联大学教科书中翻译过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教材。这些教材从延边大学建校初期开始，为继承民族文化，塑造办学特色，学习先进的教育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0年到1956年之间，延边大学同国内50多所大学构筑了合作交流关系。到目前为止，延边大学已经同国内外的140多个大学或者科学研究所构筑了合作交流关系，对外交流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喝水不忘挖井人’，正是因为有了朱德海校长开放性的办学理念，延边大学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形成了具有延边大学特色的学科优势，为扩大对外交流上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朱德海作为举贤爱生理念的实践者，在长期的教育过程中，树立了‘办学以教员为主体，教育以学生为根本’的教育理念。尊奉这一理念，他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激动人心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延边大学前任校长朴文一也说：

“朱德海书记代表中共吉林省委向全校宣布：延边大学是综合大学，她以4所大学的体制实行独立分院制。事后，朱德海亲自给各大学挂牌。历史证明，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延边大学分为4所独立大学，这对地区的大学教育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 “发展基础教育很重要”

朱德海教育理念和体系的健全完美，不愧于后人称他为教育行政家。在延边的教育事业中，朱德海从幼儿园教育开始到大学教育，确立和完善了健全的教育体系框架，为培养民族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解放初期，延边的教育虽然有一定的基础，但是没有统一的布置和合理的格局，教员缺乏，资金短缺等一系列要解决问题堆积如山。尤其是缺乏高中教育体系，成为教育发展的绊脚石。到延边以后，朱德海很快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抓紧进行整顿。当时，延边没有高中，不能满足众多初中毕业生的求学要求。这虽然是积案，但是一天也不能再耽搁了。朱德海召开特别会议，下达了成立高级中学的指示，并进行了人才招引工作。

朱德海的人才观也给后人留下了佳话。如果说干部是决定因数，那么人才是根本。他在农业、工业、文化等多个领域广泛录用人才，对教育专家给予优厚的待遇。

“许秉默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部毕业生，他接到朱德海的邀请，来到延边大学担任教育处的处长；权宁河原来是松江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处长，由朱德海斡旋调到延边专员公署文教科。还有日本工业大学毕业生池秉洛、日本东京大正大学地理系毕业生崔泰英、新京师道大学毕业生高永一等，在朱德海的邀请下都来到了延边。”（《朱德海的故事》）

高中是中学最重要的阶段，也是进入大学的最后一道关口。建国以后的第二年，延边终于成立了高级中学（现延边第一高中）。第一年，高中招了12个班的学生。校长有了（崔采为校长，权宁河为常务副校长），学生也招了，但是校舍成了问题。当时延吉没有几栋像样的楼房，数得上的也是日帝统治时期留下来的司令部

旧楼和间岛省行政公署旧楼。朱德海问董玉昆：

“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案了。现在我们专员公署楼还能用为校舍，你看怎么样？”

董玉昆有些疑虑地说：

“专员公署在哪儿办公呢？”

“可以搬到地委院里去呀。只能先委屈我们这些干部了。没办法呀，哪有比校舍更重要的事情？等情况好些了，专员公署再搬回来吧。”

地委和专员公署的领导都表示同意朱德海的提议。1949年春，中共延边地委曾在延吉市朝阳街的一个小教堂里办公，不久又搬到小教堂前面的大教堂里办公，以后又搬到公园水道局。日帝时期警察和官吏的馆舍，现在就要腾出来做学校的校舍。

几天后，公署搬迁，住进了从各县市招来的700余名学生。当时，这栋楼房在延吉市是最好的建筑。

延边高中的成立，使延边朝鲜民族教育从初中、高中到大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没有汉族高中。这一现象导致了汉族学校初中到大学相脱节，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汉族高中的建立问题不单是顾及民族公平性的政务工作问题，也是关系到汉族的教育结构是否均衡，延边的整个教育能否形成完整的体系化的问题。

“如果我们自己解决不了就向上级反映这个问题。争取资金，一定要建立汉族高中。正好汉语教员也不够，我们一并向上级反映情况。”

经过朱德海的奔波，1952年成立了汉族高中。这就是今天的延边第二高中。当时，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接到延边的报告以后，把原计划拨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盖校楼的专项资金拨给了延边，又把一批南方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延边来。朱德海指示教育

处处长梁贞凤要从生活上关心南方来的汉语教师，而且一有空就来到他们之间鼓励他们，向他们描绘未来延边美好的前景。地方政府发给他们生活补助金、大米和其它食品，在生活上提供了方便。朱德海图的就是延边的朝鲜民族和汉族的教育事业有体系地发展。

此后几经发展，1963年，延边第一高中和延边第二高中被命名为吉林省的重点学校。到如今，这两所学校不但在延边，在吉林省也享有很高的教育知名度。

延边的农村是群众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传统文化的阵地。随之，农村教育也成为农村文化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延边把普及教育的重点放在了农村。1949年朱德海刚到延边的时候，小学和初中各有647所和31所。十六年后，到1965年小学发展为1274所，中学发展为276所。虽然用量化的数字难以说明学校教育的发展，但是基础教育的发展无疑达到了引以骄傲的程度。

从1958年起，把原来的《文学》和《语法》重新合并为《朝鲜语文》教科书。教科书主要以翻译全国通用语文教材内容为主，辅以学生自己选择的内容编纂的。十年动乱之前，延边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全国，延边最早完成了“两项基本任务”，到1952年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2%以上。并且，在农村妇女和青壮年中基本扫除了文盲，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文盲的地区。

金时龙是延边农业合作社的代表人物。朱德海在延边工作期间，金时龙<sup>6)</sup>跟朱德海有着深厚的友情。金时龙原是半文盲，在朱

6) 金时龙，1919年5月21日出生于英盛村，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中唯一的朝鲜族代表。第一个成立了初级社、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曾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团的一员去苏联参观，受到斯大林接见。成立吉林省第一、全国第二的集体农场黎明集体农场和黎明高级农业合作社。第1届、第2届、第3届全国人大代表，第5届、第6届全国政协委员。

德海的支持下做出了震惊天下的大事。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可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业余农民大学，也就是今天的“黎明农民大学”。黎明农民大学虽说是一所大学，但是学校培养的是有文化的农民，所以从农民的角度和社会的环境来说，它仍属于基础教育。

原州人大常委副主任南兴烈<sup>7)</sup>说：

“当时，朱德海书记反复强调要重视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人才。对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不能用党员或者是政治干部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他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我们主要是看他们是不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就可以了。他们有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我们应该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

延边的医学博士卢基舜是早年首尔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后留学日本，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研究生系专研医学获得博士学位，是教育人才。解放后，社会上认为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延边大学成立后，朱德海大胆地任命他为医学部部长。医学院成立后，又任命他为医学院院长。卢基舜为延边的医学教育和医学发展，为培养医务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1957年6月，卢基舜因病去世，朱德海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葬礼上，朱德海为卢基舜护运灵柩的故事，至今仍然温暖着延边人民的心。

早在1950年审查干部的时候，朱德海就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予以慎重处理，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保护了很多人才。此后，他们在延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延边大学是伴随着共和国的创立而建立起来的民族教育基地，

7) 南兴烈，1930年3月27日生。从1949年9月起，先后担任延边专员公署民政科、州民政处科员，州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州党委办公室主任，延吉县党委副书记，图们市党委常务委员，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延边农学院党委书记，州党委统战部部长，延边州人大常委副主任等职务。

延边医学院、延边农学院、延边高中、延边艺术学校……等，也都作为民族教育的基地，半个世纪以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迎来了“太平盛世”。朱德海筹建的民族教育基地，在历史的岁月中经历了不断的改革和发展，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链更加牢固，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

金贞顺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

“有一天，朱德海书记把叫我去。我去了他的办公室，他说要交给我一项工作，让我担任保育院院长。朱德海书记了解到我曾在黑龙江省尚志当过教员还当过小学校长的经历以后，就把延边第一保育院的工作交给了我。这个保育院就是现在六一幼儿园的前身，是当时延吉市规模最大、专门由国家拨款经费的幼儿园。幼儿园的运营模式都是从苏联学过来的。朱德海书记的儿子吴阳青和吴阳坚也都上过我们保育院。朱德海书记把保育院的工作交给我以后，对我提出的要求都给予解决。当我向他反映说没有煤烧，孩子们受冻的时候，他二话没说给我们解决了烧煤的问题。他说，别的部门冷点可以，但保育院的孩子们不能挨冻。当时，延边流行着一句话：解决不了的困难就去找朱德海。尤其是涉及到教育和文化方面的问题，他全都给解决。”

不仅是基础教育，而且包括体育场、广场、公园、工人文化宫在内的延边一切基础性的文化、体育等软环境建设，都留下了朱德海的足迹。

延边日报社朝文版原副总编辑张正日曾在一篇文章中倾述了他对延吉的情怀：

“我从1949起在延吉生活。那时年龄虽小，但还是感觉到了延吉的几点好处。一是昔日只有数万人生活而到处都是平房的延吉市内正中心有了宽广的西广场，二是小小的延吉市内有座美丽的公园。就延吉公园来说，它是局子街的几个遗迹之一，是延吉

民俗民风生息的名胜景点。古木茂密的树林和松树林，冲向凌空的喷泉，优雅的湖水和亭子，希贵动物嬉耍的动物园，淡雅的石阶，还有现在虽变更了用途曾经是典雅的体育场，一眼能饱览延吉古迹小墩台遗址的悠久的亭子，要数延吉的情趣十个手指头都不够。延吉公园是市民独一无二的畅游宝地，是男女老少欢天喜地的心中景点。有哪个市民会否认不是这样的呢？一到节日，树林里特设的舞台上响起优雅而响亮的琴声、鼓声、唢呐声，体育场上朱德海州长正在讲话，尔后是形式多样的各种活动。公园成为休息散步的首选场所，接待宾客的首选场所，一到六一儿童节和8月15日老人节，这里就充满了男女老少欢快的笑声。外县的农村妇女一到农闲季节，到延吉来烫完头，吃完冷面，再到公园去游景，成为了她们最大的幸福。社会发展到以人为本、建立公园式的城市、讲究生活质量的今天，延吉公园成为唯一的市内中心公园，无疑是在远见卓识下诞生的名胜景点。”

作者的这一情感也正反映了朱德海对延边的情结。一个人的社会功德能够被后人称颂，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事情了。

## 战争的日子里

朝鲜战争，用一句话说是 不该发生的惨剧，是不该发生的同族相残的悲剧。对朝鲜战争，美国的政治家也好，军事家也好，称它是在出乎意料的地方发生的不明不白的战争，是“不愉快的战争”，“不情愿的战争”。历任美国国务长官的艾迪逊曾经断言：“如果让世界上最高的战略家们物色一场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该诅咒的、罪恶的战场的话，那么他们会一致地选择朝鲜战争。”连签署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命令的杜鲁门总统也不把“朝鲜战争”

称为“战争”。显然这是他为最大限度地缩小并消除同苏联的对立和交战意思所做出的努力。

在记者会上，有记者曾经问他“美国什么时候介入战争”时，他回避了正面回答。另一个机灵的记者问他“是不是执行联合国的警务”时，他就立即回答说“是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美国把参加朝鲜战争的士兵说成是警察的话，中国也是一样的。为了最大限度地缩小同美国对立的印象，把参加朝鲜战争的军队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志愿参加的军人，军服、肩章、胸章以及军级，这一切都无法辨清。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战争是人绝对不可以参与的最错误的行为。但是在特定的时期，中国最终参加了战争。战争后，得到的是世界政治、军事强国的认可。毛泽东也更加稳固了他在国内外的政治地位。不管是什么样的战争，都是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巨幅来诠释的，但是我们应该接受历史的原貌，实事求是地记述当时引起战争的特定原因和其过程。而且真实地陈述站在历史轴心的人物，这也是对历史的尊重。

在本文中，笔者本想对朱德海在这一阶段的历史一带而过，但是基于伟人的评传应是真实记述的观点，在文中稍微插入了朱德海在这一阶段的简历。而且把这一部分的历史交给读者诠释。因为铭记战争的惨痛，我们就可以以史为鉴，认识现在，面对未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把这场战争的性质定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派出了志愿军。1951年7月12日，《人民日报》第1版刊登了一篇居住在东北的朝鲜人回国参加“祖国保卫战争”的报道。报道说：居住在北京的朝鲜人召开集会，反对美帝侵略朝鲜，谴责李承晚发动内战，表示尽心竭力，支援战争，直至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止。

同年10月17日，《东北朝鲜人民报（延边日报）》报道了

延边大学林民镐副校长以东北朝鲜民族代表的身份，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的消息。10月14日，他在发言中说：

“居住在东北的朝鲜民族人民一致、完全地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解放战争。因此热烈拥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关于居住在中国的朝鲜人有权回国参加保卫祖国战争的光明而正大的声明。”

外界认为这一发言是动员参加朝鲜战争的信号。其实，它表明的是中共中央的立场，是接受中共中央领导的民族自治区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的政治立场。

1951年4月17日，在延边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延边分会。在成立演说中，朱德海强调了抗美援朝延边分会成立的意义，号召延边人民团结起来，以开展增产运动、捐款集资的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延边专员公署培训1000余名护士派往朝鲜战场。抗美援朝总会号召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各地的朝鲜族人民积极响应号召，开展了爱国捐献活动。延边地区共捐献了97多亿元（旧币），用这些捐款可以购买6架半飞机。两万多名朝鲜族官兵赴朝参加了朝鲜战争，其中八千余名官兵在战场上牺牲。朝鲜民族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内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三大战争，在三大战争中牺牲的官兵形成了一个烈士碑军团。

上述事实反映的是朝鲜战争时期延边的实际社会情况。面对这些数字，不知当年身临战争其境的延边人会是怎样的感受……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正激烈的时候，有一天，朱德海书记对我父亲说：‘金秘书，明天有位重要客人要来，在专员公署招待所接待他不太方便，最好是在办公室。金秘书，你去准备一下吧。’第二天，果然有位身材魁梧的客人来到朱德海书记的办公室，跟朱德海书记谈话。到了中午，我父亲把备好的饭菜

送到朱德海书记办公室，是一碗盛在大陶瓷碗里的手切面。午饭后，那位客人握着我父亲的手表示感谢，说他午饭吃得很香，然后匆匆走出了办公室。几天后，朱德海书记对我父亲说：‘你那天送来的手切面真好吃呀，客人吃得很香，还赞不绝口呢！金秘书，你不认识那位客人是谁吧？’我父亲回答说：‘不认识，不过好像是个职业军人。’朱德海书记告诉我父亲说：‘金秘书还真有眼力，他就是朝鲜的崔庸健。’我父亲就这样偶然见到了崔庸健委员长。当时，崔庸健委员长来延边还不是国事访问，所以至今也没有公开。崔庸健来延边访问跟朝鲜战争是有关系的。这事你第一次听说吧？当时，崔庸健跟金日成首相一起着手组织朝鲜人民委员会和创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崔庸健先后担任过民族保卫相（国防部长）、朝鲜人民军的总司令。还有一种说法是武亭、方虎山、李权武、李德山等延安出身的干部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是积极的，而崔庸健是消极的。

“朱德海是一位待人慈祥的书记。1950年初，有一天朱德海书记对我父亲说：‘金秘书，你也该结束孤单的生活了。现在情况好一些了，把家人都接过来吧。’我父亲就给尚志县的母亲捎了信。母亲接到信以后，背着小弟，牵着我 and 熙政的手，跟姑母金贞顺一起来到延边。之前，我姑母在哈尔滨第3支队教导大队工作，她到方正县去搞民运工作时冻伤了脚在家治疗，失去了跟朱德海一起来延边的机会。这次朱德海书记点名要我姑母一起到延边来，她就跟我们同行。到延边以后，姑母在崔采的手下作宣传干事工作，后来担任了延边保育院的第一任院长。后来因为受蒙冤被打成右派的姑父（金舜基，原延边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牵连，家庭破裂，带着三个儿子又回到了尚志县。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朱德海书记说我姑母是无罪的，重新让她回到延边并安排了工作。当然了，这都是以后的事情。……姑母到延边的那一天，

我父亲带着马车夫去车站接她。当时延边地委和专员公署只有一辆马车作交通工具。朱德海书记的美制吉普车是那年秋天，方虎山从战场上缴获以后通过图们海关送来的。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留在地委招待所里，也就是现在的向阳幼儿园，那时这里是地委招待所。那天晚上，母亲急忙地给我和弟弟熙政洗脸，说一会儿有位领导来看我们。那天晚上真的来了个穿一身军服的人和另外几个穿灰色制服的人，有一个年轻的警卫员还拎着好多吃东西。我偷偷地看他们，发现了他们别在后腰的手枪，我好奇地盯着。这样的德国制手枪，我父亲也有。当时在延边地委和专员公署工作的干部身上都带着手枪作为护身之用。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来看我们的是朱德海书记、崔采部长和金明汉等在哈尔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我们在延边地委招待所呆了三四天以后，搬进了地委在延吉市西广场后面给我们买的房子。记得搬家两天后，就迎来了五一节。那时候我第一次看见延边大学的学生在街里吹着喇叭搞庆祝活动。在延吉，我受到了文化冲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延吉还不算是那么繁华，但是对生活在尚志县河东一个小乡村的我们来说，延吉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脱光了衣服进大众浴堂洗澡，收音机修理部的木盒子里传来苏联歌曲，还有斯大林剧场，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繁华的延吉。不知不觉到了夏天。当时，在现在的国贸大厦东角处，有家东北新华书店，书店前面有个黑板报，那里挂着一幅大大的朝鲜地图，地图上贴的小红旗密密麻麻的。一个穿着上肥下瘦的裤子、戴着肩章的朝鲜人民军军官，正指着地图和地图上贴着的小红旗给围观的人讲朝鲜战争的形势。他说朝鲜军占领了首尔，说时还大声呼喊‘万岁’，我们这些围观的大人和孩子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跟着他喊‘万岁’。这就是当时我在视觉上感受到的朝鲜战争。

“到了初秋，延吉闹了一场大水。洪水经过现在的延吉百货

大楼、服务大楼、延边人民出版社和工人文化宫流入布尔哈通河。过去，公园（烟集）河水就是从这个地方流入布尔哈通河的。日帝时期，日本人为了开垦上游的荒地改变了水渠，烟集河就像现在这样直线流入布尔哈通河。延吉发大水的那些天，正是朝鲜战争发生变化的时期，美军登陆仁川作战（9月15日），人民军因水势不得不暂时撤退。那时，载满货物的捷克式大卡车吐着黑烟在延吉街道上急驶。那时，像我们这样的小孩子也觉得朝鲜战争吃紧了。随之，延边的气氛也紧张起来了。记得有一天，父亲急匆匆回到家，告诉我们说要搬到民主那边去。母亲问他，朱书记怎么办？父亲不让母亲问这些。对父亲来说，朱德海书记的一切都是秘密，所以不让任何人打听。到了星期天，我们急急忙忙把家里的东西装在一辆日本卡车上搬家。其实，全部的家当也就是几床被子和铁锅罢了。搬去的那个地方人烟稀少。那里有两栋长方形的砖瓦房，一栋房子能住进两户人家，另一栋房子能住进四户人家。我家和梁贞凤一家住进了一栋。另一间房子里住进了三家。其中有石东洙一家，他原是88旅的，后来去了朝鲜，在朝鲜担任要职；另一位是失去一条腿的乔树贵一家，他曾是周保中的警卫员和通讯员，后来任副州长；再有一家是在太行山参加革命的崔东光（后任州政协副主席）一家。当然他们的这些家庭情况，我都是后来才听说的。在那里我们过了一个冬天。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时期，地委和专员公署的干部下班也都不能回家，昼夜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地委和专员公署办公地址就在现在的花园小区，夜里他们都在那里办公。有一天深夜，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突然闯进几个不明身份的人，他们挨家挨户地敲打着门，威胁我们立即从家里搬出去，否则就要杀死我们。那时是朝鲜战争时期，国内的情况也很复杂。第二天，母亲给我一封信让我给父亲送去。当时我还小，我从民主那个地方一直走到延吉去找我父亲。

地委门前站着哨兵，我跟他说，我是金文宝的儿子，朱德海书记是我大伯，哨兵笑着马上把我带到了父亲面前。我把母亲的信交给他，父亲看了以后说是没什么大事，但马上到隔壁房间向朱德海书记汇报。朱德海书记过来抚摸着我的头说，不要害怕，我们会派军队去的，要我转告母亲放心。朱德海书记特别喜欢孩子，关心孩子，我们这些孩子也都一口一个叫他大伯，跟在他的后边，跟他调皮。有时候，朱德海书记在路上看到我们，就逗我们说‘小辣椒’长没长大呀，还要摸摸，所以我们一看见他过来，都嘻嘻哈哈地笑着跑掉。朱德海书记也经常这么逗我。我回到家，把朱德海书记的话转告母亲。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住的房子原来是地主和伪满警察等官吏们住过的地方。光复以后，他们都不敢出声，一看朝鲜战争爆发了，觉得机会来了，便死灰复燃，猖狂起来，还威胁地委和专员公署的干部家属，扬言要杀死他们。下午，军队并没过来，倒是父亲和梁贞凤他们带着卡宾枪坐着朱德海书记的吉普车来了。他们把枪发给了会使用的几个人。那天晚上，那些人又闯进院子里来敲门闹事，石东洙的儿子拿着枪跑出去朝天放了几枪。我呢，拿着斯大林的画像跑出去。那时我认为斯大林画像比枪更有威力。从那以后，那些人再也没来闹过。

“现在说这些，就像是天方夜谭似的。后来，父亲被任命为延边大学党委书记，我们就搬到了延边大学住宅区。父亲后又被任命为州委书记处文教书记以后，我家搬到了离朱德海书记家不远的地方。父亲38岁时是13级干部，也就是现在的副厅级级别。朱德海书记是副省长级别，9级干部。1950年末，国家给朱德海书记调拨了苏制‘瓦斯69型’吉普车，当时军分区的赵南起政委也坐这辆车。朱德海书记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不是下乡就是开会。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朱德海书记更忙了。有一天，父亲拿回来几个饭盒，是在长白山森林被我们捕捉的特务们用的，我们就

随便叫它罐头盒。后来才知道那是在日本大阪和美军基地生产的饭盒，现在想起来那饭盒做得还真精巧。那是长方形的铁制盒，内有两层小盒，最底下的盒里装的是用切细的牛肉做的半生不熟的饭，上面盒里装的是饼干、茶叶等饭后吃的小食品和饮料。上面还放了白磷，是专门用来烧饭的燃料。可是那时谁都不知道那是烧饭用的燃料，误以为是食品放在嘴里就吃，结果很多公安人员都闹起了肚子。那时我虽小，但是很好奇，这么精致的饭盒美国人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朝鲜战争中，延边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人员伤亡很大。在所有朝鲜族革命烈士中，这一时期牺牲的烈士最多。”

这就是当时延吉的一个小孩（金熙宽）用孩子的视觉看到的朝鲜战争的一角，也反映了朝鲜战争给延边社会带来的影响和气氛。

2011年4月2日，在延边州委和州政府举办的“朱德海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朱德海的三儿子吴阳坚说：“……父亲工作再忙，他也没有忘记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叔叔的家人，在延边工作期间一直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同延边很多烈士家属一样，朱德海在朝鲜战争中也失去了自己的弟弟。

1952年，朝鲜战争正激烈的时候，5月3日，驻扎在和龙县南坪边防部队的战士发现对面朝鲜燃起了熊熊大火，最近的山火离我们国境线只有三公里远。在这危急关头，朱德海为了减少朝鲜火灾引起的损失，为了保卫我国的森林资源，向吉林省政府作了请示报告。以延边专署、和龙县领导和民兵组成的山林灭火队急赴对面朝鲜参加灭火。除了赴朝鲜参加灭火的800名队员以外，还有3000余人在国境线上待命，随时准备支援。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制止了山火蔓延，进一步发展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亲善关系。

这一时期，因各种原因留在延边的朝鲜侨民有 10 865 人。为了明确他们的国籍，朱德海、董玉昆和崔采等领导代表延边自治州，于 1953 年 6 月 25 日赴朝起草《关于朝鲜侨民加入中国国籍的具体意见书》后上交吉林省人民政府。不久这一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 第五章 在故乡的山野上

### 堤坝下喜闻牛叫声

延边的经济发展，一般以 1949 年 10 月共和国创立到 1957 年大跃进时期，为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1949 年 10 月到 1952 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制定了 1953 年到 1957 年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 5 年计划，依次持续制定第二个、第三个 5 年计划。

这一时期，延边经济在艰难的历史条件下，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进行下一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积蓄了力量。特别是对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形成新的农业生产格局后，为延边的农业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据 1949 年 7 月的统计，延边的总人口为 744 260 人，其中农业人口为 635 620 人。总耕地面积为 202 204 公顷，生产的粮食只有 236 864 吨。按单位产量计算，旱田每公顷产量为 1000 公斤，水田为每公顷 2250 公斤。另一方面，上缴给国家的农业税占粮食产量的 20%，达 47 372 吨。当时延边的职工人数为 8694 人，这里

包括国营、省营、县营、私营企业和合作社手工业作坊的职工。把他们创造的财富用粮食换算的话，也只有10万吨左右。那时，重要的工业、企业都由国家来掌控，跟地方的财政收入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恢复和发展延边的农业生产成为发展延边经济最关键的问题，也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朱德海致力于农业发展也是来自于上述的原因。有的人也许会说，这是因为朱德海是农民出身，所以对农业有特殊的情感。可是，我们分析当时延边整个社会的发展模式和中国的政策，就不难得出答案。数据的变化是一个概念，它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和倒退。朱德海用心熟记延边各个领域生产的产值，尤其是与农业有关的数字，他更是用心之至。因各种自然灾害和经营方面的原因，延边的农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曲折，但是粮食生产却呈直线上升。大力加强水利建设，大量扩大水田面积，为粮食增产打下基础是其原因。1957年，延边的水田面积达51300公顷，比1952年增加了41.88%，比1949年增加了73.98%，这一数据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就是朱德海。

从以上的统计数据来看，农业发展是肯定的，但农业形势并不乐观。经过土地改革，再经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等阻碍生产发展的运动，农业发展陷入了缓慢、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状态。由此也能看出，朱德海的执政时期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运动式经济时期，是从政治上遭极“左”厄运的时期。

朱德海很清楚，发展延边的农业是一个关系到发展和稳定延边自治州的政治和经济的重大课题。但是农业生产靠空喊口号是发展不了的，它有自身的发展模式和规律。但是刚刚开始扬帆起航的年轻的共和国，缺乏能够促进农业发展的灵活性政策。失衡的农村现实鲜明地说明了农耕社会正处于低潮的原始性阶段，它缺乏的是硬性设施。再加上以红色形象贯穿的极左的“三面红旗”

的冲击，延边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难以想象的艰难时期，朱德海始终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农村解决实际问题。延边的农业是农耕社会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领域，也是最需要投入精力的国民经济领域。堆积如山的各个部门的工作都需要朱德海来处理。他下达指示说，干部不要坐在办公室说大话，要到农村去搞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拿出符合该地方的具体措施解决实际问题。

朱德海亲自到基层去专心调查研究，他认为发展农业的关键，首先是建设农业的硬性设施，要从水利开始着手，同时要解决农村的动力资源问题。他把思路定在培育延边的黄牛上。

朱德海的秘书孙仲仕回忆说：“朱德海同志把农业作为重点来抓。他每次到中央和省里开完会回来，简单地开会布置工作以后，大部分时间都到农村去指导工作。到中央和省里开会以外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在自治州的干部中，没有像朱德海同志那样有渊博农业知识的干部。他还是一个延边黄牛专家。”

如果天地之间以种庄稼为本，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农耕社会变迁史的话，那么，牛是农耕社会动力的替身，是役畜的代表。在中国，黄土高原的秦川牛、河南南部的南阳牛、山东西部的鲁西牛和延边的黄牛形成中国四大牛系（1975年，在全国地方牛普查中，延边黄牛被评为全国五大地方优良种牛之一），而只有延边黄牛的系谱不在中国，而在朝鲜半岛。也就是说，我们祖先越过图们江的时候带来的种牛是黄牛。根据地方的不同，牛的体格也有差异。朝鲜半岛南部的牛最小，中部和北部的牛较大。

延边的黄牛魁梧，抗病力强，腿和蹄子壮实，易于饲养管理。近100年来，延边黄牛在延边朝鲜族的精心培育下，形成了一个适合在延边地域生长的品种。在伪满洲国时期，曾被称为“间岛牛”。光复以后，获得解放的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和耕牛，延边黄牛的

饲养也就走向了高潮。1956年，集体饲养黄牛，结果走了下坡路，黄牛瘦得皮包骨头。1951年到1956年，延边黄牛年平均饲养数为84486头。1957年到1962年6年期间，延边黄牛年平均饲养数为79200头，减少了14394头，至少减少了17%。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1961年初，朱德海和延吉市委书记金乙锡到延吉市依兰公社（镇）柳菜大队（村）去蹲点，对黄牛饲养管理作了调查。对当时的情况，延边大学农学院院长严昌国说：“那时的情况并不是很好，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牛舍不够，设施落后，饲养管理差，经费不足。尤其是缺乏集体饲养的经验，且饲养技术水平也很低。1958年，为了解决农村使役黄牛退化问题，朱德海书记拿出了一系列措施，但是那时农村正处于放‘卫星’上天的极左形势，所以这些措施未能得到落实。大跃进即将要结束的1961年，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其中对牲畜的饲养管理有一条专门的规定。朱德海书记根据农村牛饲养不振的实际情况，指示州农业畜牧处拿出改善延边黄牛饲养管理的方案来。他们在报告中拿出了‘三暖一选’方案。简单地说，一是东北地区冬天寒冷影响牛的生长，所以牛舍要保暖；二是要用热水喂牛；三是要喂煮热的饲料；要选择优良种公牛交配。这些条件无不都是饲养优良黄牛的有效措施。”

1961年2月，朱德海到依兰公社柳菜大队的前几天，下了一场春雪，延吉至汪清国道原来就不是什么柏油路，平时道路坑坑洼洼，又经这一场雪就更难走了。身边的人劝朱德海过几天后再去，但是他坚持要去，旁人拗不过他。不出所料，去柳菜大队的一路都是厚厚的冰雪，在阳光的照射下地上的积雪又耀眼又光滑。朱德海坐的小车好几次在斜坡上危险地打转。

“这场雪下得叫人烦啊！”坐在车后座的孙盛春嘟囔着说。

“呵呵，瑞雪兆丰年啊！我倒希望下得更多一些。”朱德海心

情愉悦地说。延吉市委书记金乙锡和延边州委宣传部副部长金承玉跟朱德海同行。

“金书记，这次到柳菜大队得抓紧啊。中央下达了有关农村的政策，借这次机会把柳菜大队的黄牛搞上去。”

“朱书记，我也这么想。”金乙锡回答说。

“其实，现在农村的生活状况并不是很好。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像柳菜大队这样原本日子过得挺不错的地方也都变得衰退了，一切都变得乱七八糟的。柳菜大队坐落在山脚下，山上和田野青草茂盛，拥有天然的养牛自然资源。连这么好的地方现在都变得这么荒凉，更何况其他的地方呢？”

“是呀，现在延边农村的生活情况是五十步笑百步。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们不能夸大其词，说大话，放‘卫星’。一不小心，很容易给人一个我们这些干部净发牢骚的印象。我们应该对眼前的现实做不折不扣的反映，这样才能拿出解决问题的必要措施。毛主席和我们党一贯提倡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所以我们向上级反映问题的时候不能只唱颂歌，应该杜绝自吹自擂的作风。柳菜大队是延边农村的缩影，这次我们下去，一定要了解情况，解决实际性的问题。”

1961年，刘少奇和邓小平主管农村工作，在农村生产方式和收益分配上有了一定的进展。1961年1月，党中央发布的“十二条”和《中共吉林省委的补充规定》下达到延边。于是延边进入了全面纠正“五风”，彻底进行经济赔偿，恢复农村“四力”的调整阶段。根据政策，延边宣布包括水田地区在内的社员分配给自留地，不给自留地派征粮任务。于是，农民按人口平均分到了2分地。他们从自留地生产出来的粮食平均也有100公斤，基本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那一年春耕后，又颁布实施了农村工作“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实施条例》）。这一条例是我国实行人民公社化后第

一次制定的符合农村生产力实情的工作条例。它取消了供给制，农产品全部按个人劳动量给予分配。这一年，全州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0万公斤，比前一年增产了17%。社员的粮食标准也有所提高。

朱德海乘坐的吉普车到达柳菜大队。下了一夜的雪，一户户草房顶着积雪蜷缩在村里，刚刚萌芽的柳枝在冷风中颤动。见不到夏天柳菜大队茂盛的柳树和遍野的野菜，早春的柳菜大队显得无比孤独和凄凉。柳菜村同历史上延边的其他部落一样，也是由越江过来的移民形成的。在日帝时期实行所谓的安全村、集团部落政策，在山村建立部落以后，用刀枪逼赶那些散居户住进部落村里。虽说十年江山也变，但是共和国建立已经十年了，柳菜大队依旧破落不堪。只有朝鲜民族那淳朴、邻里和睦的民风 and 传统依然保存了下来。光脚跑远路的那年代，路过村里去汪清的客人一旦落脚他们村里，他们就给你端上热腾腾的小黄米饭，上面还特地给你加上云豆。

“当时，我是村里的共青团书记、民兵连长。朱德海书记一到我们柳菜村，就通过村党支部书记召集村里的老人来座谈，记得是在叫韩继春的社员家开的。那时，他家在村里还算是比较宽敞的，全村40余名老人都来了。朱德海书记说，从前有句话叫‘没有父亲还可以活，没有耕牛可活不了’。还说卖牛供孩子读书。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机械化，全靠牛来耕地，这牛多重要啊。今后我们怎样才能养好牛，我是来听听大家意见的。”

延吉市依兰镇柳菜村前任党支部书记文龙虎（1937年生，先后任柳菜村共青团书记、党支部书记、村长）回忆当年的情景，不胜感慨地说。1940年，三岁的时候，母亲背着他从韩国全罗南道长平郡长平面来到柳菜村落脚，也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踏踏实实村干部。

“那时，朱德海书记常到我们柳菜村来。他来我们村抓的就是

黄牛饲养管理的工作。就像大伙儿知道的那样，后来取得了很大成功……”

1961年4月2日，《延边日报》头版刊登了《朱书记在柳菜村，“解剖麻雀”领导全州备耕工作》的报道：

“州委第一书记朱德海同志，于今年2月下旬下乡到延吉市依兰公社柳菜大队深入进行政策研究和调查研究工作的同时，加强了全州备耕工作的领导。州委委员孙盛春、中共延吉市委第一书记金乙锡、州委宣传部副部长金承玉等10余名同志一起下乡。”

那时，《延边日报》很少刊登包括朱德海在内的有关州委、州政府领导的消息，但是这一消息作为头版头条刊登出来。

“柳菜大队的人把朱德海书记叫朱书记，那时朱书记戴着鸭舌帽，不认识他的人谁都想不到他就是延边州委书记，州长。他说话时的语气也跟我们农民一样。开始我们有点儿失望，因为朱书记给我们的印象不像传闻中我们想像的那样。那时，朱书记在延边人民的心中可是传奇式的人物啊。可是慢慢接触，我们发现这位大干部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他笑呵呵地问这问那，很全面。朱书记带领干部先去了牛舍，他环视了一下牛群，长叹了一口气，感慨地说，没想到原来那么优良的延边黄牛竟瘦得如此皮包骨，病怏怏的。朱书记还直言不讳地说，这都是我们的罪过。他说话一点也不藏藏掖掖的。那时，我还年轻，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朱德海书记领着10多个人来的，有州委副秘书长孙盛春、州委办公室主任张进发、延边日报社总编（社长）、延吉市委书记金乙锡、延边农学院金炳镇<sup>1)</sup>教授。他们大约在我村待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

1) 金炳镇，延边农学院教授，1916年5月12日出生于韩国全罗北道益山郡。1935年毕业于朝鲜尉犁农林畜产兽医专门学校，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至1949年5月在东北科学院进修。1949年6月至1985年11月任延边农学院畜产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从事教学、科学研究、研究生培养工作。著作有《延边牛》，任牛饲养顾问。

托朱书记的福，黄牛分配到社员家精心饲养。第二年开始，全大队的牛肚子都鼓起来了，山沟里到处是哞哞的叫声。这牛啊，没有别的，哞哞地大声叫，用角猛劲顶闹腾闹腾，那才是壮实的牛。如果牛没了劲，那就顶也顶不了，叫也叫不出来了。”

到了柳菜大队以后，朱德海召开座谈会以前，先带领一行人去牛舍察看牛饲养状况，现实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得多。

“农村的境遇真是不好啊。你们看，牛舍倾斜得就要坍塌了，在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养好牛呢？真是羞愧呀！农村的现实让我感觉我们是在犯罪呀！”朱德海脸上的表情很严肃。

共和国建立以后，生产手段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集体所有制的存在和发展虽是反映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生产形势，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它忽视了客观性，反映出了人为的、盲目的弊病。这种生产形式显然是倒退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谁也不敢指出这是错误的。

朱德海环顾了一下村里的牛舍，让陪同的柳菜大队干部和村民暂时回避以后，跟同行的一行人在积雪的路上围在一起交换了意见。

“一会儿，我们召集柳菜大队的老人们开个座谈会，之前我们自己先交换一下意见吧。柳菜大队的状况你们也都看到了，你们怎么想？”

朱德海看着同行的人说。他们都低着头，谁也没言语。朱德海长叹着摸了摸衣兜，一旁的孙盛春抽出一根“迎春牌”烟递给他。朱德海在屋里一般抽的是旱烟，在外面抽的是乙级“迎春牌”烟。

“现在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时候。来之前我也说过，柳菜大队是延边农村的缩影。这样的状况并不是昨天和今天突然出现的。一句话，就是生产关系没能适应生产力造成的结果。农村经济分明也有它的法则，如果违背了，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朱德海环视着默默倾听自己说话的一行人，脸上依然是严肃的表情。

“我们要以危机感来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出现解体和瓦解的现象，这就是农村的现实。延边现在有111个农村人民公社（乡、镇），1368个管理区和大队（村），附属的生产队（村民小组）达6097个。他们像柳菜大队一样受穷，这都是实情。在现实面前，我们没有发牢骚的时间，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排忧解难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积极地提出解决的方案。我们有解决问题的积极因素，以消极的态度站着旁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历史上，我们党也常遇到危机，每当这时机会跟危机如同双胞胎一样相伴而来。危机给一个智慧的群体带来的是因祸得福的机遇。我们要把现在的危机视为过渡时期的新的挑战，重新振作起来。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延边地区一直是役畜不足的地区。移民时期自不必说，就是共和国成立以后到现在也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制定农村地区役畜发展战略，就要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构思。”

每当朱德海带着严肃的表情谈论的时候，他那平时农民般的温和谈吐就荡然无存。

“去年，我去水洞沟（现在龙井市智新镇胜地村，是朱德海的第二故乡）帮他们制定了中、长期发展计划。柳菜大队也要先拿出有关牛饲养方面的政策或者是对策，重新找出优势和劣势，大胆、广泛地普及可行的生产手段。我们要以这次颁布的中央政策为依据，先要拿出指引农村发展的中、长期战略和构思短期的农村社会发展战略。先从柳菜大队开始推行吧。柳菜大队的人勤劳又不怕吃苦，这是他们最大的财富。”

从这一天开始，朱德海同柳菜大队的老人们促膝而谈，虚心听取老人们的意见。他召集干部和社员，展开了对牛饲养问题的

民主大讨论。

“朱书记对牛的知识很渊博。他说，延边的黄牛应该喂煮过的草，喂温热的水，在暖圈里饲养。他提出改建牛舍，把牛分到社员家里去饲养。那时集体饲养黄牛，结果牛瘦得没力气，摇摇晃晃的。春天耕地的时候，趴在地上都起不来了，因为这些牛实在是太瘦，太没有力气了。现在来看，当年集体饲养牛当然是养不肥了。”

在农村饲养牛，分散饲养比集中有规模地饲养效果更明显。可以说，这是当时中国特定时期特定的生产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朱德海提出把一部分集体饲养的牛分给那些劳动力少负债多的困难户饲养，并制定出相关的奖惩制度，把集体饲养和个人饲养结合起来。个人饲养的牛，每一个月秤一次，根据牛的成熟和体重分上、中、下等级，如果一个月牛膘增了25公斤，每0.5公斤奖励3分，牛膘增到25公斤以上的，每0.5公斤奖励1个工。（10分为1工，生产队时期，计算个人劳动报酬的单位）。

朱德海聘请延边农学院黄牛专家金炳镇为顾问，推进科学管理。他说冬季要保暖，应该在暖圈里饲养牛，把牛舍改建为砖瓦结构的牛舍。

从此，在柳菜大队的堤坝上，蒲柳茂盛的溪流边上，能看到成群的优哉游哉的黄牛，能听到又肥又壮的黄牛雄壮的哞哞叫声。负债累累、生活艰难的村民，托分户饲养黄牛的福，不但还了债，手里还留下了一些钱。

延边黄牛就这样继承了自己的系谱，柳菜大队也因此名声在外。如今，因产业的发达和农业机械化的推进，黄牛的使役价值一落千丈，只剩下人们追求的食肉价值。但是，当时延边各地农村处在典型的、农耕社会的状况下，黄牛确实成为“无父尚可活，无牛不可活”的珍贵存在。

共和国建立初期，马车成为延边地委（州委）的运输工具。当时在农村，黄牛占居八间瓦房之中一间，独一无二。所以有关黄牛的用词特别发达，我们应该从黄牛在农耕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中，追索其用词发达的原因。朱德海对黄牛的知识很渊博，一看黄牛他就能评说出子丑寅卯来。

到柳菜大队以后，朱德海一行把行李放在三队的许得福农民家里。朱德海的夫人金永顺每星期天都跟着他到柳菜大队去。当时，林英锡是柳菜大队党支部书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柳菜大队的农民也不例外，在煮豆皮儿的淀粉里加入少量的米粉熬粥或做糕对付一日三餐。朱德海在了解集体仓库粮食的储藏量后，指示撤集体食堂，每人一天按 0.5 公斤的标准供应粮谷，下田干活的农民再补加 0.5 公斤，60 岁以上老人每天再多供应 0.3 公斤。

“记得朱书记第一次来我们柳菜大队的时候是 52 岁，夫人 36 岁。那个时候，这里野鸡很多，朱书记枪打得很准。村干部开完会以后，他就让大家喝野鸡汤，可是他自己一口也不吃。自从朱书记来了以后，这里的黄牛数量大幅度增加，我们柳菜大队也从此在外有了名声。大队有个农民还到延边广播电台讲了有关黄牛饲养的方法。那时，朱书记夸我说，年龄不大，却把共青团工作做得很好，还让我列席了州里召开的共青团会议。朱德海抽烟的时候，每次一根一根地都先递给老人。跟老人和村民谈话的时候，那土里土气的方言说得也很地道。当时，朱书记寄宿在社员许得福家里。有一次，许得福的母亲患病痛得在炕上打滚，朱书记叫司机开车把她送到延边医院去住院治疗，还叫手下工作人员去医院探望，给了很大的帮助。朱书记是一个大领导，可是他一点儿架子都没有，所以我们这里的人都喜欢他。当朱书记尊敬地称年纪大的村民叫‘老人家’的时候，他们都不让朱书记这么客气。在‘文化大革命’中，朱书记被斗，我们柳菜大队的人全都加入了‘抗大’

组织，成了朱书记的‘保皇派’。那时，我还是这里‘抗大’组织的头头呢！作为主任还当‘抗大’组织头头的人，在延边恐怕还没有吧？我被抓进大楼里关了10天。现在说‘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情，我嘴都发苦，那么好的人都被他们抓走批斗……”

“那么好的人都被他们抓走批斗……”这是延边农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回忆朱德海时发出的感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最朴素的结论，也是对朱德海最朴素的评价。

“延边丘陵地带多，山谷多，平原少。朝鲜族农民种水田和旱田，最基本的动力是黄牛。从春天耕地开始，到秋天收割打谷，没有牛是不行的。既然是这样，我们能不能把牛改良为既能使役，又能食肉和能挤奶的牛呢？还有一个问题是牛舍问题。草棚牛舍里饲养牛是困难的。牛体内的热量大，集体饲养，到底牛棚里圈进多少头牛合适呢？是牛头对牛头好呢，还是牛尾对牛尾好呢？请你研究一下这些问题吧！”

金炳镇教授按照朱德海的吩咐，把它作为专题进行研究，设计出了最科学的两种牛舍结构图。设计图既考虑到了食槽、水、饲料、青草贮藏，也考虑到了通风和光线。朱德海看了以后非常高兴。1964年，经朱德海的斡旋，在琿春县马川子公社五二大队盖起了延边第一个标准的砖瓦结构牛舍。1963年召开的自治州第二次党代会充分讨论了朱德海提出的农业生产中最基本的“牲畜、种子、粪肥”方面的意见，做出了相关决定。

朱德海在全州推广了柳菜大队的经验。州、县（市）、公社三级组织特别重视饲养技术的传授，举办讲习班，提高饲养技术和对延边黄牛的科学管理水平。1963年，朱德海到龙井县东盛乡东明村对延边黄牛的饲养情况作了具体的调查，在自治州党代表大会上做出了《关于当前牲畜、粪肥、种子工作的规定》。大会号召各级领导抓紧延边黄牛的种纯度、后代更新和育种工作。从1963

年开始，延边黄牛的饲养业恢复，到了1968年，进入迅速发展时期。5年之间，年平均牛饲养数达到120200余头，刷新了记录。

## 马川子镇五二村

与珲春市郑昌权副市长取得联系以后，经他介绍去了马川子乡。下午正是烈日炎炎，酷热难当的时候。已得到消息的马川子乡党委书记兼乡长金龙哲在等我们，我们一到就领我们到五二村去。在来此之前，我们已经选好了采访对象，所以五二村的妇女主任直接把我带到了金光赫老人家里。金光赫老人（1931年生）事先接到了通知，所以我们一进家门，老人就马上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虽然耳朵有点儿背，但是戴了助听器，采访进行得很顺利。

“对朱德海老人，我比谁记得都牢。1964年，社教（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时，他带领工作队来珲春，就在五二村蹲点。那时，他把行李放在曹东国家里，曹东国是烈士家属。我头一次见到了朱德海他老人家。那时，他蹲点在我们村，吃住的时间比较多。现在熟悉当时情况的老人也没几个，对过去的事情很多也都想不起来了。但是，只要一提起朱德海老人，那时候的人都跟我一样记得很清楚。你说，我们能记不清楚吗？一到插秧季节，白天他就跟村里的妇女们一起拔秧苗，晚上到我们社员家来看望，询问我们的生活状况。他还很随和地跟水田管理员唠嗑……反正，朱德海老人来到我们村里以后，挨家挨户地把我们村全都转了一遍，尤其是经常看望和安慰那些军属和烈军属。他一到这里，就给我们发衣服、鞋等救济品。那时，村里的牛舍破得比外边还冷，黄牛也没剩下几头。那些牛饿得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朱德海老人看到这一切以后，长叹一声说：‘这不应该呀。’他还说自己看了

很心疼。”

金光赫老人对往事的回忆，从时间上和事情上都是没有出入的。1964年，朱德海到珲春县（市）马川子公社（镇）五二大队（村）蹲点。期间，五二大队盖起了砖瓦结构的牛舍，实现了牛舍的饮水供应、饲料加工、热水供给、粪便处理的半机械化，使牛在温暖的牛舍里喝温热水、吃煮热的饲料，安全地度过了寒冷的冬季，也没有耽误第二年的春耕。朱德海把这一经验同柳菜大队的经验一起在全州推广开来。

那天，朱德海在社员家看到他们窘迫困难的生活状况以后，辗转不能入眠。他起来对身边的金东基<sup>2)</sup>说：

“解放快20年了，合作化也已经10多年了，可是这里的农民还是这么穷。离开群众的吃穿问题搞‘社教’就搞不好，现在应该立即解决群众的吃穿问题。咱们社教工作团里，省、州、县、公社的干部都有，体现党对群众的关心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立即给省委起草电报……”（《朱德海一生》）

我们按工业、农业、文化、其他等类采访了群众。其中接受采访的农民数量最多，而所有被采访者一致流露出他们对朱德海的敬仰。他们脸上的那种郑重表情，衬托在表情中的那些真切感人的故事和背景，引起了我们的共鸣。

“朱德海真像个农民……”

“他到村里从来不让我们给他另开小灶，跟住宿的那家人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一点儿不假。”

“朱德海性格爽直，待人很好。”

所有认识朱德海的农民都以他们那种简单而无修饰的语言评

2) 金东基，出生于图们市苇子沟。先后任图们市委宣传部、龙井市委宣传部、州委宣传部干事，科长，《吉林日报》驻延边记者站站长，州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龙井县革委会副主任、龙井县委代理书记，延边州委副秘书长，州委常委、秘书长，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价他。住在龙井市的李玉今老人无限感慨地说：“给朱德海书记做石锅土豆酱汤，他最喜欢了。”

“那时，朱德海书记领着大队的干部每天晚上走访社员家。我第一次看到朱德海书记是1965年的夏天。记得那天下着小雨，我一大早就去了地里。我是水田管理员，所以下地下得早。当时，我看见有一个人从田埂上向我走来，我还以为是村里的什么人呢，也就没注意他。到了身边以后才发现是朱德海书记，他后边还跟着一个人（金东基），记不起那是谁了。我发现朱德海书记的裤腿都被露水打湿了。那时候，他满头白发，后来才知道他也就50多岁，呵呵呵……”老人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憨厚地笑了。

朱德海到珲春县（市）以后，在马川子公社（乡）五二大队（村）蹲点。在这里，他一边总结全州的工作，一边在思考五二大队群众的生活和黄牛饲养问题。来了以后，他向省委报告。没过几天，农村巡回医疗队下来了，救济款也到了，解决了困难户的鞋子和衣服问题。但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牛饲养问题更是成为燃眉之急。

朱德海在珲春县（市）五二大队蹲点，提出要盖一个标准牛舍。1965年夏天，朱德海亲自指导五二大队烧砖盖了500平方米的牛舍，并在图们召开各县、市委书记会议，把五二大队的经验在全州推广开来。

朱德海在珲春开会处理各种事情以后，晚上一定要回五二村住宿。多年来，朱德海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一起床，他就习惯性地村里转悠，碰到社员就唠一唠。金东基就急忙起来跟在后边。也许是太早了，村里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显得很幽静。

“我是不是太早了？那我们到水田去看看吧。”

插秧结束没几天，可是水田地里的稻苗已经绿油油了，长势很旺。

“一大早，辛苦啊！”

朱德海先跟金光赫打招呼。当时，金光赫才 33 岁。

“不辛苦。看管水田也算是一个技术活儿，没人愿意干，最后没办法，我就接下来干了。”

“你谦虚了！在农村，水田管理可是一项技术活儿呀！你年纪好像不大，什么时候开始当水田管理员的？”

朱德海以跟长辈说话的语气跟金光赫谈起来。

“老人家，我才 30 多岁，您跟我说话就不要使用敬语了。”

看到年轻的水田管理员有点儿难为情，朱德海转身朝身后的金东基笑了笑说：

“今年的水稻长势真不错呀！这些水稻插秧的时候是很累的，可是一旦把秧插完了，到了秋天就有较高产量了。听说，离开山屯不远的船口村泉坪平原一带早先就开始种水稻了。看来在水稻生产上，我们民族确实走在了别人的前面。我在北满的时候，查看了哈尔滨周边的尚志、方正、宾县一带的水稻种植情况，那里大部分是散种。种水田的大部分也都是朝鲜族农民。有的地方把稻种就这么撒在沼泽地里，可是很神奇，水稻就跟草似的长起来了。”

“是呀！我们村在光复后的一段时间里大部分也都是散种的。像现在这样采用插秧种田的时间也不长。现在有的地方依然使用散种的方法。”

“我看散种的方法虽然不是很累，但是产量不高，除草也不是很方便。”

“您说得对。稻子生长的时候，就算是用脚乱踩稗子不让他长，但是稗子还长，而被踩深的稻苗是长不出来的。”

朱德海听着年轻农民的话点了点头，无声地望着眼前伸展的平展展的稻田。

“珲春的地真是无边无际呀！要是水利建设跟上来了，很适合

开出大型水田。一旦红旗河和图们江的人工灌溉结束的话，沿江就能开辟出大面积的水田。所以从现在开始，在设计农田的时候，一定要想着引水渠和排水渠。就像这里的水田，如果用田头来代替引水渠的话，一旦下面的水田干涸了，就没法马上续水灌溉了。”

朱德海注视着水田，提出了水田的引水渠问题。

“您说得对。我看管水田里的水，最让我头疼的也是这件事了。耗子挖洞，一夜的时间这里的水全都流干了，我要把那边的水引到这里来可费劲了，得好长时间啊。”

“所以，从水田入口处开始到那边，就这么笔直地开出引水渠来，那灌水就方便多了，不但流速快，还能把它作为排水渠来使用。这里的水田都要这么设计才行。”

金光赫就这样认识了朱德海。

“我跟他聊了几句，没想到他对种田有那么渊博的知识，说得很是在行，好像没有他不知道的。第二年，按照他的话，开出了引水渠，从那以后别提看管稻田里的水有多方便了。这种田的活儿，表面上看是个屈指算算就可以的事情，但是要讲究起来，还真需要科学知识。朱德海书记在我们村的那一段时间里，给我们村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每当朱德海书记坐的车一进村口，那些孩子们便三五成群地跑着，喊着。当时，朱德海书记寄宿的曹东国家的女儿出嫁后，家里只剩下了老两口。冬天也好，夏天也好，他们家一烧炕就冒倒烟。记得那年秋天，有一天一大早我去看村里新盖的牛舍，发现朱德海书记正带领随行人员推倒曹东国家的旧烟囱掏灰呢，还有的在屋里起炕石板，掏炕道里的灰。朱德海书记两手黑乎乎的，指挥干活儿……”

说着，光赫老人开心地笑了起来。我们也好像看到了朱德海的心灵，听得津津有味。

“我虽然是个没见过大世面的人，但是我知道朱德海是州委书记

记、州长，又是吉林省的副省长，延边军分区的第一政委，觉得他很了不起。如果现在跟年轻人说这么个大人物满脸落灰，双手黑乎乎地给村民扒炕、掏炕道灰、修烟囱，他们肯定是不相信的。也是，谁会相信呢？”

在山村，再热的夏天，也要隔三差五地烧炕，消除炕道的潮气。“盛夏火也亲”，就是说炎热的夏天也会有寒冷的天，需要烧炕。在山村，一到8月，农民就把锄头挂回仓房里去，围坐在篱笆障子边上，要么下下棋，要么慨叹农夫一生无穷尽，还说一两句灰色的故事偷着笑笑。这是在8月的农村常看到的一道风景。到了这一季节，一般的人家都扒开烟囱道或炕石板，疏通疏通一年来积下来的炕灰，以备冬天无患。

曹东国老人好几年没有扒过炕，掏过灰，所以一烧火，灶坑里的烟直往外冒。气压低的天气，从石阶缝里也冒出黑烟在院子里飘散开。朱德海住在他家，曹东国暗暗担心，觉得很难为情，但是朱德海没有介意，一直住在他家。这一天就带领随行人员扒炕掏出积灰来了。

这一消息在村里传开后，大队干部们手里拿着工具急急忙忙跑过来。

“都来了，好啊，我们一起干吧，呵呵……我们祖先的智慧库里还有个朝鲜火炕，在寒冷的北方，它可是给我们送来太阳般的温暖啊。这火炕看起来简单，可是要把它设计好也是一门学问啊。如果就这么放置的话，烟就倒着冒出来，不能从烟囱抽出去了。以今天为起点，以后大队干部要多去那些五保户和烈军属家庭转一转，给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具体困难。”

朱德海不顾大家的一再劝阻，一直帮忙干到最后。

那一年，朱德海给五二村盖了全州最规范的砖瓦结构牛舍，第一个引进了用电切割草的电动切草机。

“哪里只是这些事情啊，还有呢……”在灶间做饭的金月仙（74岁）老人接着说：

“朱德海书记在我们这里蹲点，一点儿都不闲着，他跟我们一起拔稻苗。那时候，我们还头一次听他说到了延安。延安因为生活困难，军队在南泥湾开垦，男兵跟女兵一样摇车纺纱，还织布。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记忆。有一天，曹大爷身体不舒服，他用自己的车把他送到医院看病治疗。那个时候，村里谁家有了病人，都用朱德海书记的车送到医院去，就像自家的车一样。听说曹大爷的女儿在延吉，叫曹今善，今年也有77岁了。曹大爷的女儿生孩子，朱德海书记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回来的时候，给她买来了那么多的猪蹄。现在这些东西多的是，可是那时候猪蹄可稀罕了，只能在新郎新娘的大桌上才能见到。他是一个大领导，可是他还关心这些琐事，多不简单啊。他除了说话声音听起来有些意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呵呵呵……”

“你说什么呢，他说话的声音怎么了？挺好听的嘛！”

金光赫老人小声斥责她，但是老伴微笑着并不介意：

“他说话的声音确实是那样的。”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我采访著名舞蹈家崔玉珠的时候，她也说朱德海说话的声音有点儿沙哑，声带不算很好。

在农民的心目中，朱德海是民族的领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品德高尚的普通人，甚至是一个头发花白、说话声音并不怎么好听的人。

## 五月盛开的苹果梨花

每年5月是雪白的梨花在帽儿山南麓盛开的季节，“中国龙井

苹果梨花民俗文化庆典”也在这里拉开序幕。

龙井果园具有60年的历史，是亚洲最大的苹果梨生产基地。早在1985年，在全国梨类评议中龙井苹果梨获得了梨类一等奖；1990年和2003年先后被评为吉林省“AA级绿色食品”品牌，不仅在国内，也成为出口国外的主要果类品种之一，享有很高的声誉。1995年，龙井市被国家农业部授予“中国苹果梨之乡”，被命名为国家“第一批100个特产之乡”。延边的苹果梨跟延边的大米一样，成为朝鲜族的象征。她扩大了朝鲜族的内延和外延，占据了延边的特产席位。

在“中国龙井苹果梨花民俗文化庆典”上，大会致辞的第一句话就是“朱德海同志是万亩果园的总设计师……”这是缅怀朱德海业绩的延边人民对他共同的敬仰和怀念。

“从帽儿山到琵岩山全部种果树，搞一个果树生产基地。到那时候，延边人民因为你们的辛苦就能吃上水果了。”这是当年朱德海在建设龙井果园初期时说的一句话，如今已经变成了现实。

龙井万亩果园是朱德海亲自指挥建立的。到1960年，龙井果树农场发展成为从帽儿山到龙井县和和龙县的交界地带琵岩山，绵延10多公里，面积达13800公顷的果树农场。龙井果树农场主要以栽培苹果梨为主，还栽培朝鲜的洋梨、延光梨、明月梨、糖梨和八里香、葡萄等。

延边龙井果树农场是成立于1951年的地方国营农场。初期称“延吉县育苗场”，是规模较小的种苗场。当时，延吉县县长全凤来接到朱德海的指示以后，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就在龙井县西北处的梨树村开出了占地7.5亩的育苗场。1952年，崔文学、金光春、关相裕、金锡山等35名元老，用7头牛和铁犁、镐头等原始农具开垦了30亩苗圃和300亩田地。1953年春，育苗场改称为地方国营“延吉县示范繁殖农场”，确立了果园的经营方针。

延边具有利于栽培果树的气候、土壤、水利等条件。尤其是比同纬度地带冬暖夏凉，具有水果生长期气温日差较大等自然条件，是北方的“南方小气候”地带。在这样有利的环境条件下，延边有在北方其他地方见不到的水果，就是苹果梨。

那一年春天，朱德海在时任延吉县委书记田仁永、县长全凤来的陪同下，来到了正在种植苹果梨树苗的延吉县试验繁殖农场所在地东明村。龙井后山和风徐徐，春意盎然，一眼就能看出这里很适合建果园。

“龙井后山坡朝阳，种植果树正合适。”朱德海从吉普车上下来，环视着山坡说。延吉县的党政干部站在他的旁边。

“是呀，延边这样肥沃的、朝阳的丘陵地带很少。”站在朱德海身后的田仁永说。

“这山坡真是让人舒服啊！在平原造田种水稻，把山坡变成果园种果树，这样就能提高山坡地的使用价值。”

朱德海欣赏着龙井后山坡，脸上荡漾着愉快的表情。田仁永 and 全凤来向朱德海汇报了资金情况和果园规模。全凤来是朱德海的入党介绍人，比朱德海年长，朱德海很尊敬他。

“900亩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不是一个小面积。在树苗供不应求，资金、人员都紧缺的情况下，做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朱德海边向山坡走去，边跟身边的县领导干部们兴致盎然地说：

“今年是900亩，来年持续地扩大种植面积，办成一个大规模的果园。既然科研部门已经对有关苹果梨栽培问题做出了科学的结论，认为可以大面积栽培，那么，我们在行政上就要做大干一场的准备。如果延吉县感到吃力，你们就向专员公署提交你们的报告书和具体的计算书。如果可行的话，专员公署会帮助你们的。”

在延边地委和专员公署的支持下，龙井果树农场的建设方案

在1951年召开的延吉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此时正是全力以赴的时期。

从1950年春天开始，由东北农学院、吉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延边农业处和延边细鳞河水果示范农场技术队组成的吉林省水果品种考察组和延边地区水果品种考察组，在延边地委和专员公署的协助下，到小箕村进行考察工作。当时附近的农民各有各的叫法，有叫“香梨”的，有叫“青梨”的，有叫“大梨”的，也有叫“苹果梨”的。考察组经过一个阶段的调查研究后，命名它为“苹果梨”，并把小箕村的3株母树定为“苹果梨母本树”。在朱德海的支持下，研究小组和技术小组以小箕村为据点，在全州各地进行了历时两年的栽培技术调查研究和试验，为大面积栽培苹果梨树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和较为系统的技术。期间，技术小组还出版了《东北的梨》一书。在书中，以大量的篇幅系统地介绍了苹果梨的来历、特性和栽培技术，成为中国第一本叙述苹果梨的书籍。

朱德海根据技术小组提供的科学鉴定和特性，向中央有关部门推荐苹果梨是优良品种，获得了批准，苹果梨成为全国地方优良品种。研究小组总结了在延边大面积推广苹果梨的科学依据和实践结果，朱德海提出了关于在延边建设大型苹果梨基地的设想，并付诸实践。

那年初春，朱德海在北京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会上他得知山东省烟台地区大力建设果园的消息，开会一结束就直奔烟台。在烟台地区，他考察了果树的栽培过程。回到延吉后，朱德海立即同延吉县委书记田仁永 and 县长全凤来一起，起草了万亩果园的建设计划，指示延边农学院院长崔在权在农学系开设果树园艺专业。从1955年起，延边农学院培养出了发展延边果树业所需要的高等人才。1966年，延边万亩果园的建设进入正规化。那年春天，延吉县建立了达5万平方米的苹果梨苗圃，动员延边农学

院的学生栽种苹果梨树苗。

当朱德海和田仁永、全凤来一行到达栽种苹果梨树苗的现场时，苗圃员工们坐在地里抽烟小息，一看朱德海他们过来，都慢慢站了起来。

“是不是我们的到来影响了你们的休息？既然是休息时间，那就再歇一会儿吧。我也是个烟鬼，让我尝尝你们的烟吧。”

朱德海很随和地走到员工身边，接过来一个员工递给他的烟荷包。烟荷包做得像驴耳朵那么大，还嵌进了七彩缎。

“呵呵，多好的烟荷包啊！烟的味道也是一等的吧。”

朱德海用流畅的方言打着招呼，粗粗地卷了一支，然后麻利地用火石点上烟火。那些员工们在朱德海和跟在他后面的县委书记、县长面前，有些不好意思，拘谨地站在那里。然而，他们又无不怀着敬意，看着眼前这位说着方言卷着旱烟跟他们打招呼的公署专员。袅袅腾腾的烟雾从朱德海嘴里喷出。

“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现在栽的是什么树苗吗？”

“苹果梨树苗。”员工们不加思索地回答。

“对，是苹果梨树苗。你们知道苹果梨是怎么来的吗？”

“这个……有说是从老头沟那边来的……”

“听说是叫崔昌浩的人嫁接栽培出来的。”

员工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补充着。

“是呀，苹果梨是32年前（1921年）由延吉县老头沟镇小箕村崔昌浩园艺师培育出来的。这位崔先生把家搬到小箕村后，用父亲淘金挣来的钱买下了草木茂密的小箕村北山坡，开垦后种了杏树、李树、桃树、山梨树等果树。他在山梨树上嫁接各种枝条，让北山坡成了果园。有一天，他弟弟从朝鲜北青亲戚家串门回来，按照哥哥的嘱咐带来了那里的苹果树枝条。崔昌浩就把6根苹果树枝条嫁接在山梨树上。7年以后，山梨树上结出了他们从来没

有见到过的果实，崔昌浩一家就叫它香梨，也就是我们现在栽的苹果梨。解放前，苹果梨没能大面积普及，只在延吉县和和龙县的部分地区小面积地栽种。现在可就不一样了，苹果梨已经受到了我们国家的认证，成为地方优良品种。这样的优良品种，我们应该大量地普及开来。就在这龙井的后山，满山都栽种苹果梨树，扩大苹果梨生产的规模，这里一定会成为延边苹果梨的故乡，成为全国有名的苹果梨基地。你们说，我们该不该在这里大量栽苹果梨树呢？”

“当然要大量栽种啊！”

“那是当然，我们要有好日子过，当然要多栽种啊！”

员工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响应起来。

虽然朱德海对苹果梨的来源讲得不是很流利，但是目的明确，给了员工们很大的鼓舞。

“那好吧，我们开始干活儿吧。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动员家人和邻居都上这儿来干活，多栽些苹果梨树。”

说完，朱德海第一个起来拿着铁锹栽树。田仁永、全凤来等随行人员也都拿着铁锹加入到栽树的人群之中。

苹果梨这一新的水果品种造物者确实是龙井市老头沟镇小箕村的崔昌浩。从老头沟经过布尔哈通河，就能看到往南伸展五公里的山沟，这里就是苹果梨的故乡小箕沟。1989年9月25日，龙井市人民政府在这里的苹果梨母树前，树立了“苹果梨祖先纪念碑”。

崔昌浩是同苹果梨生死与共的人。他培育苹果梨成功以后，始终没离开过果园。他在果园系统地进行了对苹果梨树剪接和果园的科学管理，对病虫害的防治、果树的抗寒性等进行了研究，不断地提高了苹果梨树苗的栽培技术。从此，在小箕村第一次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优质的苹果梨果园。崔昌浩一生都在这个

果树园里度过，直到1969年8月因病去世。

朱德海亲自栽树的那一年，龙井果园面积扩大到900亩，以后每年都在继续扩大栽培面积。1956年，龙井果树农场变更隶属关系，直属延边农业管理处（现在的农业局），更名为“延边果树农场”，并大面积地栽种了苹果梨树。这一时期，被称为延边“米丘林”的和龙西城园艺师崔日鲜按照朱德海的指示，把5万株苹果梨树送给了龙井果树农场，为使龙井果园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万亩果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龙井果园栽种的大部分苹果梨树苗和在延边各地栽种的苹果梨树苗大多是崔日鲜亲自培育的。

我们称延边果树农场为“万亩果园”，实际栽种面积是2.5万亩。先后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这里视察过。1989年，在国家农业部举行的评议中，这里的苹果梨被评为国家优质产品；1990年获得了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食品”荣誉。目前，全州拥有达8万亩的果园，作为象征朝鲜族的水果闻名于世。如今，万亩果园形成了一个民族民俗的风景区，游客人次突破了13万人，在龙井的旅游业发展中起到了左膀右臂的作用。

### 栽种“花红树”

2007年10月14日，《延边日报》刊登了张京律记者和尹完柱记者题为《大苏果树农场苹果获得丰收》的报道：

“……被称为延边江南的龙井大苏果树农场苹果大获丰收，预计比去年增产30%。上个世纪60年代初，自治州第一任州长朱德海同志亲自选址建立的大苏果树农场栽培了红富士、金红等20余种苹果，种植面积达350公顷。从2004年开始，正式向俄罗斯出口，

扩大了销路。今年该农场的苹果总产量预计达 100 万公斤，比去年增产 30% 以上。”

坐落在图们江左岸的大苏果树农场场址也是朱德海选定的。笔者去大苏果树农场采访是在 2011 年 2 月 23 日，正是有几分春意季节。早晨明媚的阳光使笔者一路心情愉悦。

我先到龙井，同尹完柱记者一起短暂采访龙井果园以后，10 点钟我们向大苏农场出发，路过三合，沿图们江下游走了一会儿，前面出现了一条泥土路。10 年前，曾经三次坐勘察车路过大苏果树农场，但是记忆还是有些模糊。以为凭着大苏果树农场紧靠图们江左岸的印象，只要沿着江边走就能找到，所以尽管尹完柱记者要找熟悉路程的向导，但我谢绝了。我知道大苏果树农场与龙井相隔 83 公里。图们江江边的柏油路还没有竣工，车一辆接一辆急驶的时候，扬起的净是灰尘。

图们江上游的左岸群山绵延，形成了南江山脉。山下有村落，大苏也在其中。这里的村落形成很有特色，沿着如同防风林似的山势，房屋均坐东向南，而山坡上满是苹果树。村口有个用水泥做的村碑，上面刻着村名。到了村口，往右拐便是进村路，这里的地头上正烧着一冬天干枯的草。即使是在农村，在地头烧火也是被禁止的，但是人民政府行政性的“护林防火墙”还没有在这里启动。

我正犹豫着要不要把车停在村口去找村长时，看见有个腰里挎着剪枝刀和小型锯子的老人从村里走过来向果园走去。

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跟着那老人走进了果园。老人环视着被火熏过的果园，独自啧啧地咂起嘴来。不知是谁不小心放的火熏了刚栽不久的苹果树，这些被火熏过的苹果树只能连株锯下来了。

“这些果树都长四五年了，就要结果了。可惜，让火熏了。”

“是呀，都生活在一个村子里，也不好让他们赔偿。没办法，还得重新栽了。”

老人很和气，好像跟笔者是老相识似的，一点儿也不拘束或戒备。一般来说，山村里的老人都很正直，大都对他人不戒备。我硬给老人递烟以后，简单地向老人说明了我的来意，老人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

“延吉来的呀，我得有个话题才能说呀，不是吗？”老人随便坐在地里点上了我递过去的烟。

老人叫许在龙（1941年生），1964年大苏农场建立时从三合搬到大苏，亲身经历过大苏农场发展的整个过程。老人自称知道的不多，但他说话的样子见多识广，不像乡下的老人。他的子女都在延吉生活，只有老两口在这里守着，他们跟苹果树打了一辈子交道。

“我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正直当年。那一年大苏办起了果树农场，记得朱德海书记经常到大苏来。我看他满头白发，以为年纪很大呢，可仔细一看又不像。他领着年轻夫人来过好几次，能看出那位夫人特别喜欢乡下人的日子。那位夫人还跟着朱德海书记栽种过果树。反正建立苹果园的时候，朱德海书记来过好多次……”

老人慢声细语地打开了话匣：

“听说过平顶山农场吧？哦，没听说过的话，到那里去看看。那个平顶山农场也是朱德海书记建的。那边能看到的山谷叫小牛洞，以前沿着那条道就能去平顶山，吉普车也能上去的。近几年没有车上去，只有牛车了。听老人们讲，平顶山农场是年轻人从大跃进时期开始建立的。大概是在大跃进接近尾声的1960年初，朱德海书记到平顶山来视察的时候，路过小牛洞，中午由陪同的富裕乡干部安排在我们大苏招待所吃午饭。上饭的时候，先端上来的是花红。那时，我们按朝鲜习惯的叫法，把苹果叫花红。那

是过冬的苹果，味道好极了！当时，朱德海书记拿起苹果好奇地左看右看后说，这分明是苹果，是不是从朝鲜拿来的。当时，大队书记告诉他说，是我们这里产的。那个书记叫什么来着？姓金，好像有40多岁。一听这话，朱德海书记大喜过望，一再问是不是真的，大队金书记大概地向他说明了情况。听完以后，朱德海书记很兴奋，说没想到我们这里还能产苹果，于是午饭也不吃，就出门看苹果树去了。大苏的苹果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起来的。”

苹果属于蔷薇科的落叶乔木，一般在温带广泛栽培。在欧洲改良的苹果树逐渐成为东洋的栽培种，并在气候适宜的中国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栽培，当时叫花红，后来传到了朝鲜和日本。其实，苹果和花红学名不同。在朝鲜，18世纪末栽培了苹果树，以后逐渐扩大到全国各地。苹果的栽培关键在后期。适合苹果树生长的气温是 $20^{\circ}\text{C}\sim 28^{\circ}\text{C}$ ，开花期温度要达到 $17^{\circ}\text{C}$ 以上。学术界认为北纬 $42^{\circ}$ 以北是不能栽培苹果树的。

原以为在延边是不可能栽培苹果的，但是北纬 $42.5^{\circ}$ 的大苏能生产苹果，这对朱德海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消息。朱德海对办公室主任金东基和随行人员说：

“走，去看看。亲眼确认苹果树以后再回来吃饭。”

说着，朱德海从饭桌上起来，跟着大队金书记奔小牛洞而去。听说大苏能生长苹果，朱德海觉得很神奇。他仔细观察着大苏的地形和山坡，觉得一定是村西边连绵的山形成了一个屏障，才使这里的气候变得这么温暖。一路上，金书记还介绍了大苏的来历：

“听村里的老人们讲，我们的祖先越江移居到这里以后，生活稍微好转就开始养很多牛了。那时，放养大牛的地方叫‘大牛沟’。现在我们去的这个地方虽然不远，但因为放养的是小牛，所以叫‘小牛洞’，时间一长也就成了地名。清朝末期，地方官厅登记户口和地名的时候，就按照朝鲜语的含义记录为‘大牛洞’、‘小牛洞’，

并且一直延用到民国初期。‘大牛洞’之所以成为‘大苏’是因为当时记录的时候，去掉了‘洞’字，又把‘牛’字按照朝鲜语的发音直接写成了‘苏’字，也就成了现在的地名‘大苏’。这大概是中华民国时的事情吧。”

“呵呵呵，延边的村名大多是经过这样的历史过程偶然得来的。所以意想不到的村名很多。‘大苏’是叫起来挺上口的名字，叫‘大苏苹果’就更好听了。”朱德海回头看着金东基微笑着说。

“这里的苹果树，原来是个叫李东元的地主栽培的。”过了一个小山坡，金书记继续向朱德海作介绍，“这个人勤快，也有几块地，对果树栽培有兴趣，技术也不错。开始，他在院子里栽培了几株杏树，有一年他去朝鲜咸镜北道吉州郡拿来了几株苹果树苗。他考虑到图们江流域有气温高的地理特点，苹果栽培是有可能的，于是试着拿来了几株。朱书记，您也知道，紧靠图们江沿岸地区的气温较高，从种庄稼就能知道这一点。我是在朝鲜先锋对面鹤里坪（现在开山屯爱民1组）出生的，我们那里三面也都围着图们江，前面的山就像屏障一样围着村庄，所以节气总是来得早。黄瓜、茄子、香瓜等所有农作物比其他地方提前10天到15天呢。这里的气候也跟鹤里坪差不多。”

“说得有道理。这些实践经验都是在长期的种田过程中获得的宝贵经验。我们到农村去找那些老农，就是因为他们有经验，希望得到他们的指导。种地，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春播秋收来解释。所以说科学种田是关键。”朱德海点着头说。

朱德海对农业的知识达到了专家的水平，这是当年在他身边辅佐他工作的那些人一致的说法。曾经给朱德海扣过“黄牛挂帅”、“种田第一”的帽子，看来不是毫无根据的。

“珲春县图们江沿岸有个板石公社（乡、镇），板石公社有个孟岭大队（村）。那个大队也挨着图们江，是有名的黄烟村。要

是去琿春，一说孟岭烟，他们可自豪了。说到底还是气候适宜生产出的烟。那里的气候条件跟这里差不多。在历史的岁月中，图们江开垦出了许多冲积地。这些冲积地都是平地，种地收成好……那些山也都像屏障一样围着，气温就升高了。不仅仅是这里的大牛洞和小牛洞，上游的元峰、崇善、芦果、南坪……下游的三合、船口的泉坪原野、月晴原野、凉水原野、琿春原野、敬信原野……说真的，都是让我们感激不尽的福地。我们应该多开发肥沃的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在朱德海的心里，延边的地理并不是用肉眼能够看到的等高线或地形物，而是铭刻在心里的人文环境，是子子孙孙生活在这里的某种群体和实体。

“农业生产中，自然条件是关键。我在延边农学院曾看过资料，说延边主要是起伏跌宕的长白山脉，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区域特征明显。简单地说，延边的边缘是延长的山地，中间是分散的盆地和丘陵。这就是延边地貌条件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从延边的整个地势来看，西南、西北、东北三面向东南倾斜，西南、西北和东北部较高，东南部较低，相对的温度差较大，这样的自然条件是影响延边农业生产的主要的自然因素。这是科学，我们不能无视。大苏位于中间地带，海拔低。位于东南部的琿春县敬信一带海拔也不过是10米。所以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农作物的品种也应该不同。”

“朱书记，您把上次拿去的农业技术读本都读破了吧？”金东基笑着说。

工作再忙，朱德海也会挤出时间坚持看书，而且常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要多看有关书籍。

“你别给我戴高帽了，我也是好不容易才看完的，毕竟是专业书籍，不好理解。不能因为数学难就把教科书给扔了。过去那种

粗放种田的农业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不能在‘农夫一生无穷无尽’的叹息声中漫无计划地搞生产。主管延边农业的领导连最基础的地理常识都不懂，那是行不通的。大苏的苹果栽培成功了，这是他们懂得科学和地理气候学的结果。”

“您说得对。李东元是个老农，对气候特别敏感。所以就在屋后的山坡上栽种了几株苹果树。幸亏苹果树冬天也没受冻，春天长得很好。李东元一看栽活了，就在山坡上开垦了一公顷的地，又把家里人总动员起来栽苹果树。他性格本来就很坚毅，干什么活儿从不拖泥带水。他家里的人每天都在山坡上捡石头……”

朱德海一边听着金书记的介绍，一边不住地点头。

“就是这个地方。”

小牛洞并不远，一行人一会儿功夫就到了李东元的苹果地里。乍一看，就能看出苹果树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光复以后，在土地改革中，李东元被划为地主。于是，他扔下房子和苹果园，举家去了朝鲜。

李东元原来住过的房子早已换了主人，但是他栽种的苹果树依旧还在。

“栽的苹果树不少啊！”

“是的。那时李东元经常是天一亮就起来，一个人在山坡上捡石头，夜里在月光下继续干活。李东元被划为地主成分不是偶然的。1935年，他去吉州买来日本苹果树苗100株栽在山坡的石子地里，就是现在的这些苹果树。遇到干旱，他就领着全家人挑河沟里的水浇树，到了冬天用稻草包树，怕苹果树冻坏了。在他的辛勤努力下，这些苹果树都活下来了。”

李东元栽的这些苹果树在微风中摇曳着绿叶，呈现出它旺盛的生命力。

那是解放前几年的事情，延边的苹果就是这样在一个地主的

细心栽培下在大苏诞生了。遗憾的是因为李东元被划为地主成分，主要的社会关系也不清楚，无法在大苏落籍，所以虽然成功栽培了苹果树，但没能享受到成功的喜悦就去了朝鲜。随着时代的变迁，他辛勤栽培的苹果园由初级社归入了高级社，最终划归集体管理。

看着眼前剪枝的苹果树上蓓蕾满枝，朱德海喜形于色：

“我们延边真是个好地方啊，现在苹果栽培也有可能了。其实苹果对我们民族来说不是一种陌生的果实。在朝鲜，现在还习惯地叫它花红。从学名上来讲，花红与苹果稍微有差别，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叫花红。”

此时，一幅巨大的大苏苹果农场的地图在朱德海的脑海里绘出。他仔细构思着这块苹果地的远景。

其后，朱德海多次跟副州长南明学<sup>3)</sup>一起去大苏作了详细勘察。

那时不是柏油路，都是牛车道，所以即使是凌晨从延吉出发，过了大中午才能到达大苏。朱德海多次到大苏，反复研讨建设大苏苹果基地的各种方案，最终做出了在后山大量栽培苹果树的决定。并且根据农场员工不足的情况，劝勉包括三合公社（镇）在内的周边村民移居大苏大队，以扩大苹果农场的规模。许在龙老人也是在那个时候搬到大苏来的。

朱德海给大苏果树农场派来了当时在延吉市园艺农场当果树技术员的关治胜。关治胜的老家在辽宁，父亲是苹果专家。朱德海得知后，就把他从省农业厅请到龙井果园，这次又派他到大苏果树农场来。当时，果园有一半面积是荒地，另一半是耕地。那时，农民根本没有第二、第三产业的意识，只把粮食视为生活的唯一源泉，所以要在农田里建设苹果基地的时候，他们都担心栽了填

---

3) 南明学，1919年出生于延吉县东盛涌，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起先后担任汪清县副县长、县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3月归国后，任中共延边地委秘书长，1961年任州政府副州长主管农业。“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后来恢复副州长工作。1980年任州人大副主任，1984年10月26日去世。

不饱肚子的苹果树粮食就解决不了了。祖祖辈辈只以种地为天，只认粮食而不认经济作物的淳朴农民的担心和顾虑，反映了典型的农耕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农民意识。更何况他们尝过了“共产风”，经历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那些饿得吃树皮熬下来的日子，使农民对栽种苹果树大有顾忌。苹果地里出不了粮食，苹果也不能当饭吃，栽了苹果树，农民的日子可怎么过？农民半信半疑，认为朱德海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不免对他有些失望。

1964年春，副州长南明学按照朱德海的指示，动员州农业处处长许哲龙等干部到大苏做说服农民的工作。农耕社会的历史给中国的农民遗留了固执和保守的思想，但是像中国农民这样甘于奉献的社会集团也实属罕见。共和国创建以后，如果没有农民的牺牲和奉献精神，中国的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也只是空想而已。不能不说农民是一个伟大的群体。在干部的积极动员和说服下，他们的心开始活起来。

许在龙老人一支接一支地吸着我递给他的烟，接着往下说：

“从1964年秋天起，农民开始在山坡上挖坑准备栽苹果树苗。那时，我也上山挖了好多树坑呢。我那个时候正是当年，干起活来不知道累，一天能挖数十个呢。第二年，我们就在那些坑里栽了苹果树苗。朱德海书记到处奔波，给我们弄来了4万余株树苗。大苏苹果农场的大事情都是朱德海书记给我们解决的，如果没有他，大苏果树农场是建不起来的。我还听他们说，朱德海书记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架子。跟他来的干部都叫他‘朱书记’呀，‘州长’啊，可是我们这里的员工都亲切地叫他‘老朱’。”

技术员关治胜知道延边到5月末还有些寒冷，担心树苗会冻坏。

“朱书记，在延边防冻的办法只是在树干上刷白灰，可这些幼

苗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冬天。”

“你是科学技术人员，有这些担忧是可以理解的。”朱德海注意倾听关治胜的意见。

“花费那么大的力气栽的苹果树一旦冻坏了，我们承受不了。再说，这可不是一株两株，是一大片面积的苹果树啊。”

“嗯，这确实是个现实问题。我们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朱德海意识到了关治胜并不只是从农场技术员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站在农场负责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老关，现在工业也好，农业也好，一切事业我们都是从零开始进行。大面积栽种苹果树也是头一次，但是我们要大胆地推进这项工作。大苏在栽种苹果树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说明有了科学依据。虽然延边的气温差较大，但是我们不用怕。如果树苗冻坏了，我们就再种。通过失败的过程，我们也能得出相关的对策。在延边，大苏是最温暖的地方。关技术员，你曾经说过大苏是延边的南方，年平均气温比龙井高 $2^{\circ}\text{C}\sim 3^{\circ}\text{C}$ 的统计也是你得出的。我相信你。即使失败了，全部责任由我承担，你就大胆地干吧！”

从此，关治胜和朱德海以苹果树为纽带建立了亲密友谊。到今天，大苏人也还记得朱德海对关治胜的关怀。在关治胜的指导下，从北京、辽宁等地运来的20余种6万株苹果树苗在大苏200公顷的后山坡上扎了根。从此，红红绿绿的花点缀了春天的后山坡。

“栽苹果树的时候，除了这里的员工以外，400余名小学生也动员起来参加栽树劳动。苹果农场一建立，这里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许多。为了树苗的成活率，学生们还到图们江去挑水浇树。那时，大苏人全都动员起来了。”

在大苏苹果树的栽培中，关治胜提供了技术保证，做出了重要贡献。栽下树苗后，关治胜每天都到后山坡去侍弄果园。他给

苹果树施肥、喷农药，到了冬天用稻草把树厚厚地包起来，如同照看孩子一样给予悉心关照。可是不出所料，过了冬天部分树苗冻死。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坚持“死一株补十株”，把苹果树栽满后山坡。

关治胜在实践中摸索出了11种适宜大苏气候条件的嫁接方法，就是在山楂树上嫁接海棠树，海棠树成长以后再嫁接苹果树的方法。山楂树和海棠树跟苹果树相似的特性成为嫁接方法的基础。嫁接方法为苹果树的成活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除此之外，为了提高苹果树的耐寒力，施的主要是以鹿粪为主的农家肥，还及时进行间苗，使树苗正常成长。

可是第二年春天，又是一场大旱。朱德海听到消息后又来到大苏果园。他边听关治胜对旱情的介绍，边查看果园。然后，他召集大队的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拿出具体对策。

“你们也都看到了，这些苹果树旱得都蔫了。大苏现在还没有机械灌溉，要想让这些苹果树苗都活下来，就得靠我们的人力了。我们辛辛苦苦栽的苹果树，怎么能让它们死于干旱呢？马上组织青年突击队挑图们江的水浇树。再累也得坚持下去，这样才能救活苹果树。”

按照朱德海的指示，农场在各个村里挑选出140名朝气蓬勃的男女青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挑水上山浇树，终于战胜了旱情，救活了苹果树。大苏农场原为龙井果树农场分场，1966年州政府正式改名为延吉县“大苏果树农场”。

1972年，朱德海在武汉五三农场留下了“我要回吉林（延边）”的遗言。正是这一年，达250余公顷的5万余株苹果树上结了果。秋天，订购苹果的数量剧增，卡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进大苏。1998年，在吉林省第一次优质水果鉴定会上，大苏的“黄元帅”获得金奖，“新红星”获得银奖，“金红”获得铜奖。

朱德海没尝过一口大苏的苹果，也没见到大苏果树农场的奇迹。

## 朱德海和农业技术工作者

原延边州人大常委会任主任曹龙浩<sup>4)</sup>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笔者问及他跟朱德海的私人关系时，他说：

“有一时期，我在朱德海手下任副州长，我们没有私人之间的来往，就是在一个酒席上也没有闲聊过。朱德海是延安的干部，他位高权重，可是很有分寸。在办公室，他从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大声发号施令，也从不武断地以一两句话处理问题。他不愠不怒，待人温和、和蔼，以民主的工作作风让手下彻底贯彻自己的意志，他是一个广泛听取意见的高手。他的烟瘾很大，但是酒喝得并不多。所以几乎没有跟其他干部摆酒席饮酒的事情。”

曹龙浩主任很谦虚，从他的言语中多少看出了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作为行政管理的首长情绪得体是必需的。朱德海在行政管理上是一位很严格、严谨的首长。可是，对待农民他很随和很亲切。朱德海跟延边的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特别是跟农民有着亲密的关系。他跟农民干部金时龙，水稻专家崔竹松、柳昌银、吕根哲，园艺师崔日鲜，女模范李玉今，黄顺玉等农民和农民技

---

4) 曹龙浩，1928年出生于吉林省蛟河县，194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任延吉县智新区区长，同年10月任延吉县党委直属机关总支书记、延吉县人民政府民政科科长。1951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后勤部2分部武装工作队队长。1952年归国后，先后任延边州政府民政处处长，延边州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延边州政协副主席，州政府副州长兼秘书长，州革委会副主任，州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州政协主席。1980年1月任州委书记兼州长，1983年任州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1984年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第6届、第7届全国人大代表。

术家建立的深厚友情，至今还传为佳话。

《苹果梨》一书的作者崔承默、玄龙顺这样评价崔日鲜<sup>5)</sup>：

“……被称为延边‘米丘林’的崔日鲜，生活在和龙县西城乡明岩村的后山脚下，为延边的果树栽培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崔日鲜在山脚下的大岩石上用白漆写下了‘与自然作斗争，就要有岩石般的耐力’几个大字。这不是空喊的口号。崔日鲜在明岩村山脚下，把耐寒性差的朝鲜樱桃和虽然品种较差但耐寒性强的土种樱桃嫁接培育出了‘明岩樱桃’；他又把朝鲜的桃子和当地李树嫁接培育出了另一个新品种；他又以人工授粉的方法，让大连的苹果树在延边生根、开花、结果，结束了在延边的寒冷地带不能生产苹果（大连苹果）的历史……”

1951年的有一天，朱德海去了和龙。当时抗美援朝战争的支援工作、农业生产等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在朱德海的肩上。公务如此繁忙，但是朱德海也没忽视人才工作。几天前，他听和龙县委黄仁书记（汉族，1951年8月～1953年3月任县委书记）和崔锡林县长（1951年8月～1954年5月任县长）说，和龙西城明岩村有一位造诣很深的园艺师。延边人才缺乏，这样的园艺师无疑给朱德海送来了及时雨。

早晨，朱德海坐美式吉普车去西城，到达西城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和龙县县长崔锡林已在西城等候朱德海的到来。在崔锡林的引领下，他们向崔日鲜的果园走去。明岩村坐落在离西城不

---

5) 崔日鲜，果树栽培专家，别名为延边的“米丘林”，1911年在朝鲜咸镜北道清津市出生。1925年从龙井恩真中学毕业后，在明岩寺宝珍中学执教3年，辞职后专门从事果树栽培，为培育优良品种多次前往朝鲜咸镜北道，以那里的优良水果品种培育出适合延边土壤和气候的新品种苹果梨。50年代，受州政府的委托管理明岩果园，为龙井万亩果园的建设供应5万株树苗，普及苹果梨栽培技术。1956年当选为全国科学学会会员。1957年至1965年，任延边州人委会委员，1983年7月被授予国家民委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荣誉证书。1985年逝世。

到1公里的地方，村前村后都是山，山谷越走越狭窄。朱德海和崔日鲜相遇后，向崔日鲜介绍了龙井果园，希望他能为果园培育支援果树苗。崔日鲜跟朱德海的相遇使他的才能得到极大的发挥，也为他为龙井果园的建设作出贡献提供了机会。

崔日鲜的得意弟子金泰旭农艺师（1937年出生于和龙西城，散文家，现住西城镇）向笔者介绍说：

“1951年朝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朱德海州长和崔日鲜见面了，那以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崔日鲜在酒席上经常自豪地跟我们说，他和州长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关系，还说州长托付他多培育树苗。朱德海书记来找崔日鲜不止一两次，我们也都看到了。1980年初，集体的地都承包给了个人，但是果园依旧保留了下来。毕竟是技术业种，所以村里决定把果园作为多种经营项目，实行集体管理。那时，果园没有运输工具，崔日鲜就到长春去找朱德海书记的夫人（金永顺），结果要回来一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崔日鲜和朱德海的关系很亲密，他们俩都是1911年出生的。崔日鲜一到延吉就像回自己家一样去朱德海书记家，同样，朱德海书记一到和龙就去找崔日鲜，还带东西给他，帮他解决工作上的困难。崔日鲜是果树技术天才。那时，延边的农业技术员大部分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都成了名，果树技术员也不例外。我们都知道龙井果园的苹果梨树苗是崔日鲜在明岩为他们培育出来的。可是这以后他还继续为延边各地供给树苗的事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最多的时候，他都供应了30万株。说当年延边各地的苹果梨树苗都是崔日鲜供给的也不过分。”

金泰旭农艺师不愧为崔日鲜的得意弟子，知道的事很多。

“我第一次见到崔日鲜农艺师是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当时，我住在獐项村。崔日鲜来我村的时候，村里正忙着给果树剪枝。那时看他也就40来岁，蓄小胡子，穿上肥下瘦

的裤子，腰间带着剪枝刀，一看这人就不一般。崔日鲜农艺师从那以后很长时间都蓄胡子，直到晚年觉得不好蓄就理掉了。崔日鲜一生都被人们称为延边的‘米丘林’。他的这个外号不是明岩人随便给他起的。50年代初，崔日鲜正搞果树培育的时候，有一次，八家子电影放映队来我们明岩放了一场苏联电影，叫《米丘林》。电影里的主人公米丘林在果园嫁接、剪枝、培育……那干活的样子就跟崔日鲜一模一样。从那以后，明岩人都叫崔日鲜是‘米丘林’，后来报纸上也称他是延边的‘米丘林’。但是，崔日鲜说‘米丘林’只是他的外号不是他的职称，他就跟政府要职称。记得是1956年，他成为全国科学技术协会会员。没有相应的职称那怎么行啊，后来有关部门给了他农艺师的职称。朱德海十分珍惜农业技术人才，在崔日鲜的职称问题上使了不少劲。崔日鲜是龙井恩真中学的毕业生，那个年代，像他这样能上初中读书的人很少。听说光复以后，有一阵子他还在区公署别着枪当过干部呢。有一天，有一个苏联红军军官问他会不会打枪，他就拿起枪瞄准靶子射击，那位军官连声说‘哈啦少，哈啦少’，就让自己部下把子弹带和子弹作为奖励全都给了他。崔日鲜性格爽朗，胆子也大。原延吉广播电台台长金大铉是崔日鲜的外孙，金大铉的父亲是崔日鲜的女婿，是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果树专业的高级人才。据说，他在理论上指导崔日鲜，给过他很大的帮助。崔日鲜生前也夸自己的女婿水平不一般……

“朱德海书记每次来明岩的时候，一定带着肉食之类的食品，偶尔还跟他的夫人和孩子一起来。崔日鲜跟朱德海像亲戚一样走动，村里很多人都羡慕得不得了。可是村里人也很纳闷，像朱德海这样职位很高的人怎么会跟崔日鲜相处得这么亲近。时间一长，村里人都知道了朱德海书记和崔日鲜农艺师的为人，都说他们是命中注定。除了崔日鲜，还有个叫崔明吉的。他是延边农学院

果树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他的果树技术也很厉害。他在八家子中南村当果树技术员，也为大幅度提高苹果梨的优良品种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也受到过朱德海的不少关心。”

朱德海的长女吴英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一到星期天 或者是放假，我都跟着父亲去农村。记得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叫延边的‘米丘林’（崔日鲜）的果树技术员住的和龙明岩村。每次去的时候，父亲都在家里翻有没有什么可送的东西，哪怕翻出来的是米或者是糖块，他也要带些过去。那时，农村生活很困难，粮食是贵重的东西……父亲的性格就是那样，凡是家里有的东西，他都拿去送人。听我母亲说，那时父亲的工资几乎不拿回家里。去农村，他从来不空手去，特别是去那位果树技术员家的时候，父亲从来都是拎着东西去。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跟农村的很多人都很亲近，那位技术员就是其中的一位。母亲休息的时候也跟着父亲一起去乡下，和龙、龙井、柳菜、琿春、大苏果树农场，母亲都一起去过。当时，我大弟吴阳松也想跟着父亲一起去乡下，但是他晕车晕得厉害，就没有我去的次数多，所以他对农村的感情不如我。”

不只是这些，新丰村的水稻育种专家崔竹松跟朱德海的关系也很亲密。经朱德海的引荐，崔竹松跟州里的其他党政领导干部关系也十分亲密，跟郑律成也很亲近。在朱德海纪念馆或者在他的画册里都有的一张照片，就是1952年9月12日朱德海在新丰崔竹松生产合作社跟崔竹松和女社员一起在丰收的田地里观察稻穗的照片。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朱德海就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区主席的第9天，也就是1952年9月12日上午，朱德海亲自到崔竹松生产合作社去视察生产情况和秋收情况。这一天，吴太镐记者（原《延边日报》社副社长）和金镇浩摄影记者同行。这一时期，朱德海一有空就正式或非正

式地去访问龙井东盛涌的金时龙、和龙西城的崔日鲜、新丰的崔竹松等农民技术专家。以后又跟安图万宝的柳昌银<sup>6)</sup>育种专家、龙井英成的吕根哲等新型农民技术员如同亲密朋友经常来往，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给予实际的关怀和帮助。

这一天，朱德海正式访问崔竹松的合作社。他见到崔竹松很高兴地跟他打招呼，然后跟他一起直接去了水田，此时，新丰的田野翻起金色的稻浪。一到秋天，对乡下的追忆和田园的情趣无形中把朱德海推向农村，推向庄稼地里。

到了稻田，他们就走进金色的稻浪之中。

“今年的水稻大丰收啊！”朱德海抚摸着金灿灿的稻穗感慨地说。就在这时，崔竹松和一个女社员走过来跟朱德海一起察看稻穗。金镇浩抓住这一时刻迅速摁下快门。

“一看见丰收的庄稼，我就觉得心情舒畅，觉得自己心满意足了。”朱德海环视着丰收的稻田兴奋地说。耀眼的阳光暖暖地洒在新丰的稻田上，督促人们开镰秋收。徐徐的微风中，稻香扑鼻而来。

“是啊，马上就到中秋了，社员们都要求开镰收割，中秋那一天要尝尝新米呢。”

“好啊！在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农民吃饱更重要的了。中秋碾新米吃，倒叫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

朱德海的脑海里浮现出母亲布满皱纹的脸上那愁闷的阴影，耳边回荡着用瓢掏米时从米缸里发出瓢触到缸底所发出的“嘎嘎”声，儿时的记忆他都铭刻在心里。望着膝下饥饿难耐的孩子们，父母的心情该是多么痛苦。最难熬的是青黄不接的季节，为了度

---

6) 柳昌银，高级农艺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37年5月9日出生在依兰乡。1957年移居安图县万宝乡，坚持农业科学实验活动。1976年调入延边农业科学研究所，任党委书记、副主任、副所长、巡视员。1960年研究成功“水稻3段育苗技术”，此后培育成功“万宝6号”、“万宝11号”、“万宝13号（长丰）”、“万宝17号”、“万宝21号”稻种。

过难关，硬是吃下难咽的代食品。想起这些，嘴里都觉得很苦涩的。也许正是这些挥之不去的记忆，才使朱德海跟农民一样期待着秋天的收割，期待着能在丰盛的饭桌上看到香喷喷的大米饭。

这一天，朱德海的随行记者写了一篇与当时朱德海的感受以及他同崔竹松之间的谈话毫无关系的报道，刊登在7天以后的9月19日报纸上：

……朱德海书记听取了贯彻生产计划的主要经验以后，问生产合作社主任崔竹松：“今年的生产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崔竹松回答说：“今年虽然施肥施了很多，但是从水稻的实际长势来看，施的肥还是不足，翻地的深度也不够。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克服了这些问题，粮食产量还能提高。”当朱德海问他明年的产粮目标时，崔竹松回答说：“预计平均每亩产粮2千斤，高额生产地预计产粮2千5百斤”。朱德海书记听了以后，高兴地跟他说：“我们计划今后的5年内扩大近1万垧水田。在已有的水田和将扩大的水田里，都跟你一样实施增产方法，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那么我们延边人民就能丰衣足食了，就能建设延边美好的新农村了。”朱德海书记还说，今天的崔竹松合作社是我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区人民的光荣。并指示说，今后继续努力提高产量，发挥社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后，朱德海主席对搞好秋收工作的问题作了如下指示：“秋收是一项收获一年辛苦劳动得来的爱国丰产果实的重要劳动，所以要提前把镰刀、牛车、打谷机等工具备好，还要搞好路面修理，要合理组织男女劳动力，一粒粮食也不能在地里白白地浪费掉，要认真仔细地搞好秋收。”主任和社员们都很高兴，纷纷表示响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号召，搞好秋收工作。（记者吴太镐，《东北朝鲜族人民报》1952年9月19日第1版）

这是一篇官方的新闻报道。如果我们从非官方的角度跟踪新闻报道内容的背后，就能写出很多的生活逸事。

朱德海跟农业技术员之间结下了兄弟般的深情厚谊，朱德海跟他们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沟通如流。朱德海跟崔竹松的关系也不例外。

延吉市长白乡新丰村（现已取消长白乡和新丰村的行政隶属关系）很久以前就是以水稻为主的生产队，水稻生产是解决他们衣食住的主要经济来源。崔竹松虽然被授予高级农艺师的职称，但是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农学教育，纯属自学成才的农艺师。崔竹松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研究水稻栽培技术，他的水稻生产增产法是从科学的选种开始的。他想出了用泥水选种的土方法，这种方法在延边各地农村得到了普及。

1951年，崔竹松成功地研究出了水稻温床育苗法。那一年，新丰创造了全国水稻亩产高产记录。得知这一消息，朱德海第一个跑到新丰。从那以后，朱德海经常到新丰去现场办公，同崔竹松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朱德海成为崔竹松进行水稻增产研究的最坚强后盾，从物质上精神上不遗余力地给予了支持和帮助。朱德海每年给农村的农艺师和农民专家拨专项研究经费，其中也有崔竹松。朱德海鼓励他们“不要有什么顾虑，你们就大胆地干吧。出了问题我负全部责任”，以此来支持他们的研究事业，成为他们的后盾。崔竹松名扬全国后，为了使他接受正规的教育，朱德海派他去有丰富的水稻丰产经验和悠久栽培历史的朝鲜，学习水稻丰产经验。

崔竹松没有辜负延边人民的希望，1955年研究开发出了适合延边无霜期短气候特点的“塑料地膜温床育苗法”。这种育苗法以每公顷产粮5500公斤的高产量又一次创造了纪录。崔竹松当选为全国水稻增产模范，受到国务院的嘉奖。在1964年全国农业会议上，他被授予“南方陈永贵，北方崔竹松”的光荣称号。从此他以“北方水稻专家”的美誉名扬全国。

1953年1月27日延边成立了农业生产委员会，朱德海兼任主任，下设一个办公室。农委会是浸透了朱德海农业优先观的一个机构，确保了政府对延边农业系统的直接领导。

在此之前的1952年9月23日，朱德海指示安图县万宝区大甸子村建立一个以种水田为主的集体农场。根据朱德海的指示，安图县负责创办的这一农场成为延边第一个集体农场。创立以后，农场技术人才的需求量大增，也涌现出了像柳昌银这样的农民育种家。1957年，柳昌银自愿来到万宝集体农场。他是一个在朱德海的关怀下，在高山地区万宝涌现出来的育种专家。经过数年的研究，柳昌银培育出了适合高山地区的水稻，不但解决了当地的水稻种子问题，而且也为延边的其他山区提供了大量的优良早熟品种，受到了认可。每次朱德海到万宝，一定要找柳昌银了解他在研究、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多年来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柳昌银一心投入到水稻优良品种的研究中，耽误了婚期。他的母亲担心他会成为一个老光棍。朱德海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去找农场党支部书记说：“昌银同志埋头研究育种耽误了婚期，党支部要多给予关心，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此后，柳昌银跟一个美丽的姑娘结为伉俪，这也是一段佳话。

领导对农民育种专家的关怀和支持，在赵南起书记任职期间也没有中止而继续传承下去。当柳昌银患出血热，生命处于危急时刻，赵南起书记给予了亲切的关心和爱护。

## 心中流淌的河

如果说苹果梨是朝鲜民族的象征，那么水稻是与朝鲜民族迁移史共命运的象征。我们的祖先从农耕社会开始偏爱“干柴烧大

米饭”，并把它看成是生活中的最大享受。一铜勺白灿灿的大米饭，加上香喷喷的大酱汤或酱油，那可是别有风味的美餐。

种水稻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农活，是名副其实的“天下之大本”。但是种水稻的前提是水，跟其他的农作物不一样，它是一个必须有水才能收获的农活儿。昔日，只懂得靠天上的雨水种水田的我们祖先，迁移的时候，用柳树在山涧或水沟筑一个小型堤坝工程，用人力修水渠种起了水稻。这种种水田的方法，可以说是水稻生产的一大革命。

可是光复前生产力落后，这种靠人力和原始的水利材料筑一个小型长堤工程种水稻的方法，毕竟有它的局限性，大面积的种田是不可能的。延边的水稻生产主要集中在海兰江、布尔哈通河、嘎呀河、珲春江和图们江流域，但是由于江河流量少，经常受到干旱的袭扰。种水稻首先是天上的雨，其次是畅流无阻的水渠。原延边政协副主席金圣友<sup>7)</sup>说：

“朱德海在任的时候，延边农村很多人都传说朱德海书记喜欢打猎野鸡，其实朱书记一次也没有专门去打猎。我在《延边日报》上发表的怀念朱书记的一篇文章中也曾说过这件事情。那是在任和龙县委书记处书记、团州委书记期间，跟着朱书记下乡过好多次。我头一次见到像朱书记这样翻山越岭勘察地形的领导干部。不用远说，桦集岭水渠工程（古洞河引水工程）和平顶山农场都是朱书记亲自步行调查研究后绘出的工程。在《朱德海的画册》里，现在还有记录这一时期的相片，如果你看了，肯定会感动的。那时，一旦朱书记拿着猎枪上山，不久就会有水利工

7) 金圣友，1926年出生于吉林省和龙县。1950年4月起，先后任和龙县共青团组织部长、副书记、书记，共青团延边州委宣传部部长、副书记兼州委五人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和龙县委书记处书记，共青团延边州委书记，州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受迫害。后任延边人民出版社社长、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州政府农林办主任、州委统战部部长兼州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程的设计，就会启动像水利发电厂这样的水利综合工程。现在连腹地也都有水泥路了，可是当时没有路，即使有路吉普车也开不进去。没办法，我们就继续步行上去……你（笔者）勘察过桦集岭水渠工程，你也知道现在在那里仍然是泥路。它是林业专用道，车是很难开进去的。到5月了，那里还有残雪，冷得很啊！可是朱书记不管这些拿着猎枪就去，路上偶尔碰到了野鸡就打。朱书记喜欢打猎的消息就是这么传开的。”

朱德海下乡的时候身边只带着司机一人。可是那天有两辆吉普车出动了。朱德海的专用车上坐着农村工作部部长金炳天、州水利处副处长金鹤善，另一辆车上坐的是延吉县县长崔镇虎。离开延吉后，吉普车经龙井、头道朝西城驶去。到西城时，太阳已经高高挂在天空。

那是1957年4月的一天。早晨的寒风嗖嗖地吹在脸上，到了中午时分才减弱下来，阳光送来了一丝温暖，云雀在蜂蜜河上空婉转歌唱。在从西城去卧龙的路口，和龙县委书记金兴烈和县长李奉奎正等着朱德海一行的到来。

“哈，和龙县党政都出动了！”朱德海一下车，他们都过来高兴地跟朱德海握手。延吉县县长崔振虎也随后下了车。朱德海拿出迎春牌烟招待他们，互相问候漫谈数语后说：“我们就在这里尽情地抽吧，进山后再馋也抽不了了，山火危险啊！”

在办公室或家里，朱德海抽的都是旱烟，外出的时候就抽便宜的香烟。

“来，我们边抽烟边简单地交换一下意见吧。你们也知道这次我们要去的是蜂蜜河的发源地，得准备两三天用的东西。我跟延吉县崔县长只提到了古洞河，具体的情况也没有细说。我们这次进山的目的是能不能把蜂蜜河的水引进海兰江里补充那里的水源，再让它流入平岗平原。对这一项目，早在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

和龙县就已经派技术员进山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初步探测，是一项可行的项目，但是还需要技术团队精细的科学探测。我们在做出决策以前，首先要对我们的对象有个透彻的了解，所以今天就聚到了这里。和龙县把准备的材料带来了吗？”

朱德海停了一会儿，翻看着和龙县李县长递过来的资料说：“这是1949年的探测资料吧？”

“是的，我先看了一遍。对有些难懂的专业数字，请技术员过来解读后才明白的。这次我们还带来了当时参加过探测的工程技术人员。”李奉奎县长指着后边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说。

“很好。”朱德海称赞李奉奎县长以后，走到技术员跟前恭敬地伸出了手：“你辛苦了。这次我也请你帮我解读解读。这份资料虽然是初步的，但是做得很细呀。我们的水利技术工作人员真是辛苦！这份资料对我们这次行程是个很好的参考。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现在我们就出发吧。一路上我们要边走边看，需要很长时间的。”

“是利用森林铁路上山吗？”

“不，我们就坐吉普车去吧。吉普车开不进去的地方，我们就下车步行。趁这次机会，我们可以察看山路，还能了解沿途村庄的情况。这样的行程说起来简单，但是聚在一起也不容易，所以我们要提高工作效率。和龙县既然安排了向导，金兴烈书记你就可以回县里去了。现在正是繁忙的春季，书记、县长中得留下一个人在机关。”

按照朱德海的指示，和龙县的金书记回县委，剩下的人员在朱德海的带领下分坐在三辆吉普车上，朝卧龙方向驶去。光复前，日本人以掠夺森林为目的修筑了山路，吉普车还能开进一段路程。可是路中央坑坑洼洼，在积水中还能看到倒映在积水里的天上飘浮的白云。吉普车在路上爬行，后座颠簸得厉害。经过野玫瑰洞、

仲里村，总算到达了桦集岭。这里道分两路，往右直走是日帝时期木材场的所在地木兰屯，由木兰屯继续向前走就能到达安图县的万宝村。但是他们的目的地不是木兰屯而是古洞河的林场村。光复前，这里也是日帝的木材场所在地。从那时候起，延边各地的伐木人聚集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林场村落。

吉普车停下来，路上是一层还没有融化的冰，吉普车轱辘原地空转起来。

“不行，我们还是下车吧。司机他会把车开来的，我们就步行吧。”

朱德海叫司机停了车，然后让一行人下车步行，他自己带头走在前面。

“到现在了雪还没有融化。他们说的对呀，不愧是深山腹地呀。”朱德海环视着郁郁葱葱的森林说。

“这里冬季长，夏季短。”从西城跟来的中年向导加快脚步走到前面说。他是和龙县李奉奎县长委托西城乡政府找来的向导，每年冬季他都坐伐木车到这里来，所以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悉。

“再往前走一段路，有一个林场村庄，叫五道杨茶，古洞河就朝那边流去。那个地方日帝时期叫囚禁杨仓，意思是说，这里是日本人囚禁伐木劳工干活的地方。”

“哈，这里是五道杨茶的话，那就是光复第二年，朴根植团长率领第6团剿匪的地方了。”

朱德海停下来，脱下鸭舌帽，环视着耸立的众山做了一个深呼吸。

“来之前我大概看了一下地图，了解这里的人文历史环境，才知道五道杨茶战斗就是在这里展开的，当时打得很激烈。”

朱德海带领着一行人沿着山路边走边讲起了往事。他对这里的环境有较深的了解。

“就是这里了。五道杨茶位于和龙县的西北角，是指现在的林场村庄和整个古洞河来讲的。有一个时期，它属于安图县的行政管辖区域。从刚才我们路过的木兰屯延伸的道路再往下走，就能到达安图县的万宝，这就不难理解五道杨茶为什么曾经隶属于安图县的行政管辖了。当然现在它属于和龙县的行政管辖。这是10年前发生的事情了。光复以后有一段时期，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在山里，越是腹地这种状况越严重。这里的五道杨茶也是这么个情况。伪满残余势力组织地方治安维持会，下设生产、计划、劳动、交通……等行政机构。乍一看像是行政组织，其实这是一股组织起来的土匪。他们经常下山袭击刚刚得解放的邻近村庄，切断交通，掠夺财物。为了再也不让五道杨茶的这股土匪为所欲为，光复那一年冬天，延边军分区和龙6团团团长朴根植率部队乘森林轻便列车来到桦集岭，打响了五道杨茶的战斗。但是，最后失败了。第二年春天，延边军分区司令员姜信泰和政委雍文涛再次下达作战命令。你们也看到了，五道杨茶山高地势险峻，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在那一场战斗中，我军彻底消灭了土匪。”

“光复前后，这里是政治土匪的窝点，五道杨茶也够热闹的了。不能小看它只是一个林场小村庄。”延吉县县长崔镇虎点着头说。

“那是当然的。土匪在罗子沟活动猖獗，跟罗子沟幽深的地理环境有关系。这里五道杨茶土匪的存在也有环境的因素。特定时期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

他们边走边聊。忽然，从后面传来“吁吁”赶马车的吆喝声。有一辆装满枯树的马车和后面的爬犁快速奔来。虽说路上的积雪还没有完全消融，但是在没有磨擦的泥土路上爬犁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看出拉车的那匹马也不轻松。

“在乡下，冬天的运输工具没有比爬犁更方便的了，不过这个季节也已过去了……”

朱德海一行往路边闪开，给马车和爬犁让出道来让它们先过去。

“在山里，小爬犁和马爬犁比牛车更有用。”向导喃喃地说。

“做一辆牛车需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可是爬犁不用花钱，三下五除二当场就能做出来。”

“说的是呀。在北满，乡下用的都是爬犁。”

在运输工具中，小爬犁是能顶上畜力的最简单轻便的运输工具。乡下有句俗语叫“吃大米饭，烧枯木，热炕头”，而这些枯木都是用爬犁从山上运下来，再用斧子劈开后送进灶膛的。

沿着爬犁跑过的路再走一段后，眼前便出现了五道杨茶村庄。

“到村子了，不过今天已经不早了。办公室主任，你先到村里去请几位林场干部和年长的老人过来谈谈，我们要了解一下桦集岭和古洞河的水流量。明天先去古洞河实地察看，之后再上桦集岭吧。”朱德海对一行人说。

在这次行程中，朱德海心里逐渐对桦集岭的引水渠工程有了谱。

## 啊，桦集岭

和龙水利局防水指挥部崔振玉主任向我介绍了古洞河引水渠现场和河坝现场。他担心冰雪未化，道路险要，上山困难。但是，既然已经约好了今天要去，也就不必再延迟时间了。

我在西城跟散文家金泰旭会合后，经卧龙向五道杨茶走去。果不其然，一百里路全都是泥土路。虽说道路上比以前稍微好一些，但依旧是泥土路。春风徐徐，覆盖在山路上的冰雪慢慢融化，道路泥泞不堪。爬过一个山坡，便是去古洞河林场的道路。这里的林场专用道仍然被皑皑的雪覆盖着。车轮颠簸着打滑，又时时朝

路边的坑滑去。再加上装满木材的林场大卡车呼呼地从车旁掠过，拐弯的时候稍不注意卡车上的树梢就会横扫路上的车，叫人感到好危险，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我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古洞河林场。林场人烟稀少，只有那些在路旁优哉游哉的牛群偶尔抬头瞧我们一眼。

40年前，朱德海亲自到这深山腹地来过，而我现在觉得气都喘不过来了。每次追踪朱德海足迹的时候给我的那种“疲劳感”，到达眼前的桦集岭已经达到了极点。而这种“极点”，从情感上更加促动了我对艰苦年代伟人生活足迹的想象力，为揭开当时的生活情境给予了至关重要的帮助，使我的热情更加高涨。

古洞河发源于老岭山，流向西南后汇入第二松花江。在悠悠的岁月中，古洞河固执地沿着自古以来形成的河床远远流去。朱德海设想着要改变古洞河的河床。

从五道杨茶回来以后，朱德海要求州水利处提供古洞河引水渠工程的科学数据。当时，州农村工作处党组任命原水利处副处长金鹤善技师为水利设计队负责人，带领金锡钟、测量技术员金万洙、李宗善等人进行实地考察。经过一个星期的实地考察和科学的探测，他们发现五道杨茶和海兰江支流蜂蜜河发源地相距10 000米，有20余米的流水落差，修筑古洞河引水渠是可行的。他们就此上交了报告书。

朱德海召集探测小组了解详细情况后，以探测小组的可行性报告为基础，7月向省水利厅转交了“古洞河引水工程设计书”，并正式成立了古洞河引水工程指挥部。州委任命农村工作处许允道副处长为古洞河引水渠工程的总指挥，任命延吉县金皓国副书记（后任县长）、和龙县的俞治浩、州水利处的金万洙为副总指挥，并在两个县各抽调50余名干部为指挥部的成员。1958年3月，指挥部的成员背起背包，踏着没膝的厚雪向古洞河林场所在地出发。

到那里以后，他们把原来的旧棚子改修为宿舍，开始了工作。

那一年清明刚过，水利设计队的测量员也进山搭起帐篷开始了测量和设计工作。深山里的天气变化无常，不是下雪就是下雨。他们就在连麝鹿都很难立足的倾斜地上架起了测量仪器，在连10米都看不清的密林里，砍倒原木清理杂树。他们的脸和手被树枝和石砾子拉得伤痕累累，被寒冷冻得浮肿发紫。经过40天的苦战，他们终于出色地完成了再测量引水渠的任务。随之，省水利厅也完成了古洞河引水渠工程的技术设计转给了延边。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这个工程量是浩大的。就按当时延边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讲，这无疑是个规模巨大的工程，也是延边最大的水利工程。崇善地区的元峰引水工程也是一个声势浩大的工程，而古洞河引水工程有过之而无不及。想想看，种水田是我们民族世世代代的夙愿，现在从他处引水灌溉，哪能那么容易呢？把延边的平岗平原和台田变成水田，是朝鲜族越江迁移后，生生息息繁衍下来的我们民族的宿命和壮举，也是给靠天种水田、蓄池水种水田的传统耕作方式注入开渠引水大面积种水田的新耕作法，这里大有文章可做。”这是金泰旭散文家跟笔者一起现场勘查时发出的感慨。他还说：

“那时我19岁，在西城业余话剧团工作。1959年4月的一天，团长让我代替电影放映员黄英福到古洞河引水工程现场去放一场电影。在机械中，哪有比电影器械更容易操作的呀？于是我扛着放映机乘森林小火车去五道杨茶和桦集岭放电影。当时放的几乎都是苏联电影。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还有些国产片，而在50年代没有多少国产片，所以放的全是苏联电影。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时间太长，我记不清了，但是电影名字我还记得，叫《布尔什维克》，按我们的话来说，可能是共产党员的意思吧。当时，从延吉县和和龙县来支援的人很多，超过了1000人。所以，

打算先去指挥部所在的五道杨茶放映，然后再去隧道现场放映。凿隧道是两头同时开工的，所以两头都得去。那时电影少，劳工们可高兴了。以后，我也多次去放电影慰问过那些劳工……也许是朱德海书记亲自抓的原因吧，工程进度很快。那时，人们干劲冲天，积极性很高。”

古洞河引水工程共分三个阶段施工。1958年6月25日，由农民组成的1500余名民工集中在桦集岭从两头开始施工。当时民工们吃的就是玉米饭和放些海带熬的咸盐汤，条件相当差。古洞里草鱼、细鳞鱼等味道鲜美的鱼很多，一包炸药就能捞出100多斤鱼，但是没有一个是这么做的。民工们挖的引水渠足有10米宽。每一米就要挖出32.1立方米的泥土和石头。没有装运这么多泥土的工具，他们就想办法在施工现场自制了小型推车，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再跟森林部门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同意后，到离工地10多里远的山谷里去把3500米旧铁轨拆下来铺在修渠现场上，用54辆手推车装运泥土和石头。在手推车无法推的地方架设了井架。为了能在国庆节之前结束水渠工程，实行了一天3班倒的连续作业制。到9月30日上午为止，全部清除26.6万立方米的泥石，完成了水渠工程。至此，在五道杨茶的森林里，上宽30米，底宽10米，总长9000米的水渠横穿了桦集岭。

水渠工程完工以后，第二场战役是贯通桦集岭的隧道工程。根据施工计划，和龙县在隧道的入口处，延吉县在隧道的出口处各自搭起帐篷两头同时开始施工。从各乡镇选拔的100余名挖掘工和铁匠一到施工现场就上山砍柴烧炭，编簸箕。铁匠们铺铁砧打钎子和铁撬。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工作的，制作出了一部分掘进工具。8月6日，和龙县比原计划提前四天开始了挖掘隧道的工程。但是因为遇到岩石挖掘进度很慢，再加上隧道顶上的水如雨注般落在民工的衣服和帽子上，民工们不得不在寒冷潮湿的洞里

穿着淋湿的衣服继续施工。岩石隧道除了寒冷以外，还弥漫着炸药的气味，让人呼吸极为困难。没有排风扇，民工们只好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在空中挥动驱赶烟雾，坚持施工。指挥部向朱德海反映了上述情况，朱德海再次来到桦集岭。他边走边察看施工现场，倾听指挥部负责人的情况汇报和要求，当即派有关人员到天宝山矿请求支援。接到朱德海的指示，天宝山矿立即派出了以副矿长为总指挥的精干的技术队和挖掘工 38 人。他们带着机械设备来到施工现场，把人员编成 6 个挖掘工作小组后立即投入工作，换下坑木，安装挖掘机器，可是发动机还没有运来无法施工。和龙县鸡南铁矿指挥部接到朱德海的指示以后，把他们紧急时候备用的 75 千瓦容量柴油发电机运到了现场。隧道施工 10 个月后，1959 年 9 月 18 日上午 6 点 20 分，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破声传来，1300 米的桦集岭隧道终于打通了。

第三场战役是引水渠的交叉建筑工程。其中最艰难的是铺设 830 米长木架水渠桥的工程。为了按时竣工，和龙、延吉两县给古洞河工地派来了优秀的木匠和有经验的民工各 100 人，还送来了 80 头使役牛。三个月来，他们在大雪齐腰深的深山老林里采伐原木锯成木板后运到施工现场。完成水渠交叉工程共用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这真是一个若不是朱德海谁都不敢想象的巨大工程。

古洞河引水渠工程胜利结束。据有关部门统计，完成这一工程共用了 1 080 719 个劳动日，除了延吉、和龙两县共拿出 83.82 万元资金以外，国家投资了 139 万元的巨额资金。

从此，古洞河水经蜂蜜河流入平岗平原。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国务院表扬古洞河引水渠工程的胜利竣工，并于 1959 年 12 月把周恩来总理署名的奖状颁发给了延吉县和和龙县。

## 刻印在江河的足迹

原延边州政协副主席金圣友给笔者讲述了如下的回忆：

“1957年春天，我由共青团州委副书记调任和龙县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和龙县的工业只有福洞和松河坪两处煤矿和头道酒厂，还有镇里的那些锄头、镰刀、斧子、铧犁等手工业加工厂。说是工业，其实是很不相称的。这也难怪，因为和龙县跟其他县一样也是以农业为主。朱德海书记很少坐在办公室里，除了参加会议以外都在农村，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现场办公。朱德海书记每到和龙县视察时，总是强调‘水利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命脉’。可以说，这是朱书记自从到延边以后指出的农业基础建设方向。朱书记对我说：‘你来和龙县的时间不长，要先掌握和龙县的情况，尤其是要掌握农村的情况，这样才不会在工作中陷入被动。’他带我辗转头道长仁江流域和偏僻的卧龙山沟、崇善等和龙境内主要的江河流域，察看那里的水利资源。朱德海书记是拄着拐杖走路的，那时照的相片我现在还有呢。和龙县的山山沟沟朱德海书记都去过，他给和龙县画出了水利建设的蓝图。他召开了好几次以县委书记、县长以及水利系统干部为主的农业部门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讨论和龙县的水利建设问题。记得那时候元峰水渠建设已经竣工，古洞河探测设计开始着手的时候，朱德海书记指示，头道、龙水、东城三个乡负责亚东水库工程，崇善、芦果两个乡负责图们江引水工程，其他乡自行推进水利建设。于是，和龙县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水利建设高潮，亚东、石国、大成、崎水洞、牛心、明岩、兴西、南沟、兴进、西湖等十多个水库工程开始施工。后来这些水利建设大多因为地方财政困难、支出项目额度大等原因停了下来。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朱德海书记还健在的话，很多大项目也许都会竣工的。那时，朱德海书记亲自指挥了亚东水库、

古洞河引水工程和崇善乡的水利工程。我也跟着他多次去崇善勘察了元峰引水工程。在和龙县，能够灌溉万亩以上水田的灌溉渠有七个，万亩以下灌溉渠有四个以上。这里虽然有‘文化大革命’后期完成的工程，但是工程的初期建设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对这些灌溉渠的情况，朱德海书记了如指掌。元峰引水工程是从崇善乡把图们江的水引上山涧，再通过红旗河西边山顶的大粗铁管引到红旗河东边的倒弓形工程里。它为开发古城里的平原水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工程从1956年10月开始施工，到大跃进的1958年5月竣工。元峰引水渠建成以后，吉林省水利厅在这里召开现场会，水利厅厅长亲自把锦旗授给了崇善乡……

“当时我调任和龙县委书记处书记，也是朱德海书记的意思。他说，青年干部一定要到基层去多加锻炼，丰富阅历，提高实力。所以那时派出很多青年干部到基层去工作，接受锻炼。在基层工作，我亲眼目睹了朱德海书记的工作作风。他倾听基层干部的意见，有问题就当场拍板解决。朱德海书记到延边以后，先后兼任了专员、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等职，所有的党政工作都落在他的肩上。在延边他是一个最忙的人。可是在百忙之中，他经常抽空下基层，这不能不让人觉得既神奇又佩服。到了基层，他细心听取意见，只要是反映上来的问题他都给予解决。那么多基层干部的名字他都记得很清楚，还把他们反映的问题一一记在本上，再一一画钩核对落实。我在旁边看着这些很惊奇，这么多的名字，这么多的问题，他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的呢？我打心眼里佩服他。在延边人民的心目中，朱德海书记真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呵呵呵……可是把话说回来，朱德海书记第一次给人的印象并不是很深刻。他的口才并不是很好，汉语说得也不是很流利。第一眼看他会觉得太平凡了。可这正是他的资本。延边人民那么支持朱德海书记，那么怀念朱德海书记，这跟他的平凡是分不开的。现在

我们一开会，通用的语言是汉语，可是朱德海书记的那些年，所有召开的党政会使用的都是朝鲜语。所以在他的身边经常跟着两个专门翻译人员。我汉语说得也不是很好，可是那时我根本没有必须学会说汉语的意识，因为所有会议语言都是朝鲜语，你根本不用担心。那时我们真正感受到了朝鲜族自治州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自治州。朱德海书记从来不装腔作势或大声斥责别人。即使是这样，干部们也都很敬畏他，因为他有高尚的品德，有出众的组织能力，一有工作就冲在前面。朱德海书记给基层干部解决了无数的困难，但是类似庆典的场合，他一般不愿意出席，即使出席了，也尽量回避在会上讲话。古洞河工程多大呀，但是竣工后的庆典会上，他让姚昕副书记参加并让他讲话。元峰引水渠竣工后，各地参观团来参观，他也没有露面。”

和龙县的水利工程建设是由元峰引水渠为龙头开始的。以后，元峰平原数百公顷的旱田变成了水田，图们江上游地区的农民终止了只能吃上大麦饭的历史，家家吃上了雪白的大米饭。他们为有了 13.12 公里长的元峰引水渠而感到自豪。

朱德海把元峰引水渠的修建工程与芦果灌溉渠的修建工程同时进行。期间还遇到过一次“不测”。现任汪清县“延边大奇食品公司”的李龙春（60岁）厂长讲了这样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以前，朱德海书记踏查图们江流域，修建水利，开发出了很多水田。和龙境内的崇善、芦果、三合等地自不必说，图们江中游和下游之间千里区域，他也一样来去自如，期间也留下了不少故事。这些故事随着岁月的流逝，有的渐渐被遗忘了，消失了，但是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是朱德海州长和我父亲之间发生的，所以我仍然记得很清楚。我父亲叫李东奎，1921年出生，13岁那年，父亲从图们江对面的朝鲜迁移到了芦果。我父亲生前是芦果四队队长，水田管理员，还是州和县里的劳动模范。那是

1961年7月发生的事情。当时，崇善元峰灌溉渠工程已经结束，兴南引水渠和梨树引水渠建设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其实，我们芦果的引水渠建设比元峰引水渠开工早两年，只是因为规模小，所以没能受到重视。那天，我父亲在村后的谷子地里锄草。这时，一辆吉普车驶过来，拐弯的时候轧了地头的苗。我父亲虽然是一个乡下农民，但他也知道当时坐吉普车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物。可是我父亲天生性格刚强，脾气大，当场怒吼起来。吉普车开出去没多远停了下来。这时，从车里下来一位头发花白的人替司机向父亲道歉。但是父亲仍然大声说，你们鼻子下面一张嘴，吃的都是粮食，怎么能如此糟蹋庄稼？看你的穿戴倒也像是个干部，可到了乡下怎么能随便糟蹋庄稼，这怎么可以？事态变得严重了，司机也下了车小跑过来，连声向父亲道歉。可是父亲还是不依不饶，那位头发花白的干部再次表示道歉，父亲才算了事，事态得到平息。那天晚上，芦果生产大队召开各生产队长参加的会议。参加会议的父亲忽然发现白天被他骂的那位干部坐在正中间。当时是人民公社时期，行政村都叫做大队。大队书记介绍那位头发花白的干部，说是州里的朱德海书记。父亲一听，忽地站起来，很难为情地低着头，请他原谅白天自己的出言不逊。朱德海书记呵呵笑着说：‘我们错了，我们应该改正。损害庄稼的事情不管发生在谁的身上都不应该原谅。你批评我们，批评得很对。’朱德海书记给我父亲宽心，父亲佩服之极，从那以后逢人便说，朱书记毕竟是干大事的人，跟一般人不一样，心胸如大海呀！我把朱书记说得那么毫无情面，那么苛刻，可他毫不生气，我头一次见到这样大度的人。

“后来，我父亲到延吉参加全州劳动模范大会。那天，朱德海书记来到延边宾馆，听说和龙县芦果的李东奎也来了，就亲自到我父亲住的房间跟我父亲打招呼，询问芦果的生产情况。身为自治州的州长，亲自过来慰问一个农民，这可不是平常的事情。后

来爆发‘文化大革命’，父亲听说朱德海书记被批斗的消息，气得跑到村里大声吼叫：‘这么好的人都要打倒，哪有这么乱七八糟的狗屁事呀？’那个年代人人喊打倒，一提朱德海都避得远远的时候，我父亲却不分场合为他鸣不平，当然就没有安稳的日子过了。父亲立即被打成芦果的‘朱德海保皇派’。可是，我家是地地道道的贫农成分，所以虽然父亲被打成了‘朱德海保皇派’，但是没遭多大的祸。要是成分不好，厄运就难免了。”

在延边，有关“朱德海保皇派”的故事有很多。笔者到柳菜村去采访的时候，原书记文龙浩（71岁）也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在延边说‘朱德海保皇派’的话，那就是指‘抗大’组织了。一般提起‘抗大’，人们都说那是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其他学生组织，其实我们柳菜村也是毫不逊色的‘抗大’组织。那时，我们柳菜村的全体村民都参加了‘抗大’组织，成为‘朱德海保皇派’，我是这个组织的头头。所以，‘8·2’、‘8·4’事件（8月2日和8月4日发生的事件）中，我也被抓起来监禁在服务大楼里整整10天，也挨了不少打。那时，我们柳菜大队被迫逃离的人很多，可是我领着一帮村民往哪儿跑呢？”

“文化大革命”时期，凡是朱德海下乡时留宿过的村民家，也都因为给朱德海提供过住宿而遭到批判斗争。

## 海鸥在江河上飞翔

1959年2月，朱德海跟州水利处处长吴英彬、延吉市市长金铜山、延吉县县长崔镇虎和安图县县长权余庆一起，到安图县福兴乡亲自勘察福满河，寻找适合建设水库的坝址。之前，朱德海已经多次到安图勘察了福兴和福满河，根据工程技术人员提供的

数据筹划水库的位置，反复核查验证是否可能。

就是在这一时期，朱德海在政治上经历着莫大的考验。1958年晚秋，副州长南明学从北京带回来一些给朱德海定性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小道消息”。中国式的政治产物“小道消息”，有着惊人的准确性。就是到了今天，“小道消息”仍然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许多新名词层出不穷。有丰富政治阅历的朱德海对极“左”倾向的政治诬陷早有预感，但依然若无其事，一心理头工作。

“我们经过了初步的讨论阶段，现在该是决策的时候了，参加这次会议的各位市长和县长心里也都运筹帷幄了吧？根据工程技术人员的计算，在这里修建水库，最大蓄水量大约是5万立方米，按照这个数值，是属于中型水库了。

古洞河引水渠是延边最大的引水渠，那么明月水库也将成为目前延边最大的水库。这座水库年平均流量为7千立方米左右。有了它，布尔哈通河流域的4千公顷耕地就不会受到干旱的威胁，8千公顷耕地也可以摆脱洪水的威胁。这样的工程，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拿下来。从我州的财政状况来看，明月水库是一个很吃力的工程，但是我们不能坐视等待。我们要向国家伸手，得有个理直气壮的理由和要干的事业，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国家的支援。回去以后，我们会马上召开常委会，详细讨论和研究明月水库工程的建设方案。这一点，我们在勘察时期已经提出过的，现在就剩下如何做出决策了。各位市长和县长回去以后，在等文件的同时，也要着手组织劳力。”

现场办公结束回到延吉以后，朱德海召开了延边州常委扩大会，专门讨论安图水库修建的问题。扩大会议决定副州长南明学任总指挥，吴英彬、金铜山、崔镇虎、权余庆为副总指挥，成立水库建设工程指挥部。会议结束后，副总指挥们都回到各自县市动员青年，组织2千余名劳动大军奔赴工程现场。根据朱德海

的指示，天宝山矿、省建筑公司、延边水利工程队也选派了在设计 and 施工方面有经验的 300 余名技术人员。

3月3日，宣告施工的第一声爆破响彻明月镇的上空。

但是水库工程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1958年5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党代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会号召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随着总路线的贯彻，延边各地出现了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大跃进”的局面。到这一年的10月，全州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招展的时候，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激动场面。可是1959年进入实行阶段以后，到处出现了杂乱无章的局面。在农业国度，素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却要炼钢，还办起了集体化的大食堂，村民聚在一起统一开饭。生产纸张的石砚造纸厂这时也炼起了钢铁。《中国共产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史》上，把这一历史记录为“表面上声势浩大，可是却把人们头脑搞糊涂”的运动。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不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脱离实际，追求“大而空”的东西，大办集体食堂，出现了“平均调剂，平均收钱”的“共产风”。这是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盲动行为。

朱德海虽然心里并不情愿，但是也不能违背组织、行政原则，即凡是中国的政治家、地方的行政首长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朱德海跟中国其他地区的地方行政首长一样，无奈地走上了曲折艰难的道路。在延边，农民折腾着炼钢办集体食堂的时候，朱德海在北京阻止了要放“卫星”的基层干部，指示石砚造纸厂不要炼钢要造纸。他发挥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但是以他区区一个自治州的州长、州委书记的力量根本不可能阻止全党“左”倾政治倾向的运动。在这种大气候下，1960年10月，朱德海不得不停

止安图明月镇的水库工程。

有志者事竟成。三年自然灾害后的1962年6月22日，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一行13人来延边视察工作。好机会来了。

“现在也是如此，上级领导一旦到地方或是单位来调查研究，基层就很高兴。因为他们一来调查研究，准能解决基层的实际问题，给予财政上的支援……”

原州人大主任曹龙浩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患了‘狂热症’，刮起‘共产风’。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脸红。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想以几年时间就超过机械文明的发祥地英国，那现实吗？那个时期的后果是孕育了‘代食品’。农村的劳力、财力一切生产关系和生产工具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人都变得懒惰了。事实上，从这个时期开始，我们的素质下降了。再经过‘文化大革命’更是雪上加霜，急剧下降。朱德海同志最困难的时期也是这个时期，他差一点就被委屈地戴上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在我眼里，朱德海书记是个不追求功名，不回避错误，敢作敢当的领导干部。这一点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朱德海书记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安危，他一心想的就是延边群众的疾苦。所以，至今无数的延边人民都怀念他。延边也不例外地经历了大跃进失败和三年自然灾害。朱德海书记意识到了担在肩上的恢复生产的重任，在农村度过了大半的时间。当时，发展农村经济，恢复农村畜力成了燃眉之急。”

曹龙浩主任是典型的南道口音。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州委书记和州长的经历使他的思维很敏捷。

“大概是1962年6月吧（6月22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到延边视察工作。总管整个中国大家庭生活的总理的到来，极大地鼓舞和感动了延边人民，这对朱德海和自治州其他干部来说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后来我才听说，两个月以前，朱德海书记

曾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周总理就告诉过他，等会议一结束就要到东北去走一走，顺便到延边去看一看。朱德海书记事前已经知道周总理要来延边的……也有传说，在延安的时候，周总理跟朱德海书记就已经认识。但是对这一点我不是很清楚。周总理先到沈阳，参加了东北局的一个会议，随后到大庆视察。那时候，大庆正在余秋里部长的指挥下开展石油钻探大会战。周总理是从牡丹江经图们到达延吉的。在延边宾馆召开的汇报会上，朱德海书记向周总理详细地汇报了延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情况。特别是大胆地提出了在工业、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当时我就想，朱德海州长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周恩来总理称赞朱德海书记跟乌兰夫都是卓越的少数民族领导人，充分肯定了朱德海书记在延边党政工作的业绩。到延吉以后，周总理顾不上休息，就去视察了延边农业机械厂、延边大学，还到长白乡新丰村走访了崔竹松，对延边的水稻培育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每到一处，朱德海书记都详细地向周总理作汇报，周总理津津有味地听。当周总理听到千坪平原的大米历史上曾经是给满洲皇帝进贡的大米时，饶有兴致地说：‘东北大米在我国很有名气，而延边还生产了贡米，看来东北大米的精髓还是在延边啊！’周总理说着还愉快地笑了起来。朱德海州长趁这个机会又向周总理汇报了延边的水利建设情况，以及延边的水利工程与农民种稻子之间的关系。他说，布尔哈通河和海兰江流域是延边的粮仓，也是朝鲜族主要的聚居地，他们在这里生活，种水稻。但是由于水利建设跟不上，每年春天旱情严重，夏天洪水泛滥，发展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困难。接着他汇报了修建安图水库工程的计划。周总理饶有兴致地听着，有时候还回头给随行人员下指示。

当时朱德海州长汇报安图水库建设计划时，主要汇报了延边的财力难以承担的实际困难。周总理要朱德海书记起草一份关于

修建水库的可行性报告交给省水利厅，剩下的事情由他跟省水利厅解决。朱德海州长马上给有关部门下了指示，让他们把“修建安图水库的可行性报告书”交给省里。1964年3月，这一报告得到了吉林省人委的批准，于是安图水库修建工程重新上马。要不是朱德海书记，修建安图水库是不可能的。”

曹龙浩主任有着相当强的记忆力：

“1964年9月下旬，朱德海书记让我率领延边少数民族代表团参加建国15周年庆祝活动。10月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代表并跟代表们合影留念。现在我家还挂着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使我回想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数民族的关怀，也使我更加怀念朱德海书记。每当提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延边的话题时，我眼前就会浮现出当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延边时的情景。在延边访问期间，朱德海书记一刻也没离开过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下榻的宾馆，并且由朱德海书记斡旋，请周总理同宾馆服务员、州级领导干部一起照相，周总理还跟朱德海书记一家合影，留下了宝贵的瞬间。这不仅仅是一张照片，这是中央政府对延边人民的关怀，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延边人民更加怀念朱德海书记。”

从龙井视察农学院返回的路上，周总理针对帽儿山的造林问题，向陪同他的朱德海和田仁永作了指示。《朱德海的故事》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在州常委的汇报会上，朱德海向周总理汇报了延边的城镇人口和工农业生产现况。当他汇报说粮食不能自给时，总理说，延边的城镇人口太多，这和延边的八大森林工业局有关。延边不能算缺粮地区，但是延边的负担重，而任务是光荣的。总理又询问了征购粮任务和农民的负担情况。总理的随行人员算了一下帐，延边每年上交13万吨至15万吨粮食。总理说，这个任务过重，

农民负担太大，跟省里说一说减轻农民负担。总理接着又问：“对不足的粮食，你们有什么对策没有？”朱德海回答说：“我们准备扩大耕地面积四万垧到五万垧。每年要扩大两三千垧，多半是山区。”“怎么开荒呢？”“我们地区有一万多流动人口。另外，打算动员职工家属开荒。种粮后不收征购粮，让他们做到自给。”

朱德海尽可能详细地汇报了州委的计划，周总理听了很高兴。“可是有一点难处。森工局不归我们管，上级林业部门不同意我们这么搞。”朱德海实事求是地向周总理作了汇报。“荒唐！家属不搞农业搞什么？我回去跟林业部门研究解决。”说到这儿，总理紧锁起浓眉。接着，总理又问了城镇人口问题。

“你们计划缩减城市人口 78 000 人，能完成吗？”总理拿出具体的数据一问，与会的干部无不打心眼里敬佩周总理对待问题的认真态度。

“计划是这样订的，但是实际上不大可能。”朱德海老老实实地回答，“城镇人口主要是八大森工局及铜矿、煤矿、金矿、造纸厂等企业的职工和家属，可缩减的无职业人口没那么多。”接着，朱德海又汇报了延边地区的职工和两名干部去国外的情况。

周总理听了以后说：“少数民族地区可以不同。对患病的老干部，在生活上要给予照顾。书记、州长，还有委员中，年老体弱、长期有病在身的就不要担负实际工作了。职务不变，要好好地照顾他们。”

坐在一旁的曹龙浩插话讲了类似的问题：“我们地区有两名同志在抗战时期去了苏联，1958 年回国，组织关系还没有解决。还有一些从朝鲜回来的人，他们的国籍问题也没有解决。”

周总理说：“每个人的情况有可能不同，要实事求是地个别解决。”

在延边，一些人的党籍和国籍确实成了一个问题。早在 1956

年7月2日，朱德海就在向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副部长刘格平汇报工作时反映过这个问题。他说：“现在一部分朝鲜族家庭里有两种国籍，一个是中国公民，一个是朝鲜侨民。其原因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公安部对朝鲜族的国籍问题做出了三条规定。第一条规定是共和国成立以后从朝鲜回来的人一律划为朝鲜侨民。于是，过去曾在东北居住过的朝鲜族人为升学、探亲、治病去朝鲜住一段时间回来的，原来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转到朝鲜人民军，停战以后从朝鲜转业回来参加中国建设的人，也一律按侨民来处理。他们迫切要求改变国籍。我们认为其中的一部分人应该恢复中国国籍。我们搞了一个具体的方案上报中央，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尽快给我们答复。”曾经提到的这些问题，在后来的民族整风运动中被打成是地方民族主义，最后石沉大海。

周总理访问东北主要是为了解决东北存在的困难问题。当时，全国都处在经济困难时期，问题堆积如山。以实事求是为一贯工作作风的朱德海，不但汇报了几年来延边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汇报了20多个存在的问题，从而确保了水旱田灌溉建设需要的材料和资金，而且还加倍获得了农机和化肥的调拨供给量，增加了海鲜、白酒、绸缎、橡胶、煤炭等生活用品的供应，文化、教育和新闻出版等部门面临的难题，也有了解决的方案。常委汇报会以后，总理单独找朱德海谈话，嘱咐他不要满足现在的局面，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时，朱德海一家还跟周总理和邓颖超一起照了一张全家福。周总理对朱德海是爱护有加的。

原延边电视台台长金熙宽说：

“我父亲生平最尊敬朱德海书记，并不是因为朱德海书记引导我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担任了延边大学党委书记、州委书记处书记，而是朱德海的为人、宽大胸怀和大胆的工作精神。周总理

来延边视察的时候，延边的党政领导干部在场耳闻目睹了朱德海向周总理的工作汇报，很是佩服。当朱德海大胆地向周总理诉说延边的困难，又大胆地伸手要这要那的时候更是佩服至极。我父亲佩服的也正是朱德海书记的这一点。朱德海书记除了在会议上作报告以外，在其他演讲场合中连看都不看材料，可是他的话却说得十分顺溜。在周总理面前汇报工作时也是这样。周总理返回北京后，有一次朱德海书记私下跟我父亲说：“担负国家重任的周总理竟以百分比，不，以千分比来计算，真是让人佩服啊！”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吉林省人委在1964年3月批准了延边上报的“报告书”。省水利厅为支援安图水库建设派技师许国强为首的16名设计人员到施工现场，省水利工程公司派第三工程队的干部和工人带施工机械设备支援安图水库。州委和州政府下达指示，要求延边军分区和各县市武装部动员民兵参加。为了加强指挥部力量，任命许允道、刘成东为工程队队长、副队长，任命李成民为党委书记。工程指挥部到工地现场开展工作以后，各县市武装部于4月末前动员三千余名民兵到达工地。5月1日，根据省水利厅设计的新施工方案，工程指挥部开始拆除原有工程混凝土柱子底座，但是进度很慢。朱德海到现场了解情况后，再次给周总理写信，说明安图水库建设遇到的具体困难，请求国务院支援。周总理收到信后委托谭震林副总理办理，并指示一定要答应朱德海的要求。于是谭震林副总理立即指示有关部门拨给延边12辆解放牌掀翻车、5辆解放牌货车和5辆东方红推土机。收到这些机械后，工地欢声雷动，沉浸在喜悦之中。周总理送来的汽车和推土机，在水库建设的枢纽工程运输堤坝建筑用土石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安图水库建设陷入政治风浪中。朱德海任命下派的总指挥许允道和其他一起工作的干部，都被打成“审查”对象，造反派逼他们跟朱德海划清界限。但是，许允道理

直气壮地说：“朱德海是我的上级领导，如果说他是‘三反分子’，那么我也是‘三反分子’”，跟造反派针锋相对。水库工地陷入了混乱状态，面临着就要解散的境地。幸亏时任延边军分区副政委的赵南起把延边军分区教导队的金舜哲派到工地，成立了水库工程临时生产指挥部，这才使施工继续下去。安图中型水库经过四年零四个月的苦战奋斗，终于交付使用。

安图水库是延边第一个中型水库，蓄水量为4740万立方米。安图水库的建成解决了布尔哈通河两岸近6700公顷水田的灌溉问题。安图水库修建后，水力发电站也修建起来，并利用水库养白鲢和草鱼。水库建成后，部分控制调节布尔哈通河水源。冬季布尔哈通河结冰水量减少，安图水库就保证榆树川发电厂（现已迁移）用水，保证发电厂正常发电。安图水库给明月镇、朝阳川、老头沟、天宝山、延吉市等大小城镇供应生活用水，也补充供应工业用水，为发展商品经济做出了贡献，同时增加了水利经营内容，综合开发水力资源。

随着水利事业的兴起，水田规范化的工作也开始了。延边地区的水渠是小型性的，田埂又不规则。这些问题不利于水稻生产，也不利于实施计划用水。1957年秋天，朱德海批准州水利处的报告，对延吉县东盛涌乡东盛大队52公顷水田进行了规格化试验。经过一个秋季的奋斗，弯弯曲曲的田埂直了，引水渠也更加规则，造就了能够科学灌溉、排水的规范化水田。于是，朱德海在这里召开了全州农业干部参加的大型现场会议，把东盛的经验向与会干部介绍。接着，全州开展了大规模的规格化建设。现在的那些规范的水田都是在那个时候建设的。

延边地区有22条万亩以上的灌溉渠，分布在图们江、布尔哈通河、海兰江、嘎呀河和绥芬河流域。所有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朱德海的足迹。

## 平顶山青年农场

关于平顶山青年农场，是在大苏果树农场采访许在龙时偶然得到的线索。

“平顶山离我们这里不远，山上有那么宽阔的平原是有点儿让人不相信。听说，这个农场也是朱德海书记组织青年开拓的。”

根据许在龙无意中流露出的这一线索，我到处查找资料，但是没能获得像样的信息。难道是不可信的传闻？我正在犹豫该不该放弃的时候，却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情况，因为在第二次采访原政协副主席金圣友的时候，有了意外的收获。

“你说的是白金的平顶山农场吗？那你找对人了。那个农场是按照朱德海的指示开拓的青年农场。初期是叫平顶山青年农场。除此以外，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共青团搞的工程多着呢。”金圣友副主席慢条斯理地说。虽然已是85岁的高龄，但是喝半斤烈性酒也毫无醉意，记忆力超强。写这篇文章，笔者采访了众多人物。其中，前后共5次采访了金圣友副主席。采访的次数多，在他那里获得的有关朱德海的故事也多。下面就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

“我是在1961年到1963年担任团州委书记的，平顶山农场也是在这个时期搞起来的。那时，大跃进已经结束，三年自然灾害也接近尾声。延安很多建设也从这时起重新活跃起来。那是1961年的早春，我一上班，朱德海书记就派人找我。我跑到门外，发现他已经在外边吉普车上等我，一看见我出来，二话没说就示意我上车，然后朝白金方向驶去。我以为，可能是带我去我的故乡白金了解什么工作，也就不再多问一句。现在也是一样，共青团、妇联这样的群众团体工作都隶属于党委……那时，朱德海书记亲自主管我们共青团的工作。朱德海书记是延安干部出身，在我这

样的年轻干部心目中，他是一位我们都很敬畏的人物。当年，让我到和龙县委书记处任书记的是朱德海书记，又把我重新调回任团州委书记的也是朱德海书记。平时，朱德海书记下乡，就是党委或政府办公室主任也不曾带过，可为什么要带我这样一个青年干部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他每次下乡，也不许有关人员把他的行踪告诉当地政府。为了避免基层接待，他下乡都不先打招呼，这次肯定也是如此。因为朱德海书记最讨厌地方干部不管有无必要都围着他转的工作作风。吉普车驶过帽儿山，龙井依稀出现在眼前。这时，朱德海书记才脱下头上戴的帽子，问我想不想建设一个青年农场。……朱德海书记是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出身，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很喜欢戴苏联式的鸭舌帽。那时，谁没有崇拜过苏联啊？朱书记的夫人金永顺，以及他的老丈人、老丈母娘都是从苏联过来的，所以他们特别喜欢唱苏联歌曲《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朱德海书记的老丈人是延边大学第一代俄语教员。那时候，我们年轻人最喜欢唱的也是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其实，朱德海书记更喜欢《庆祝自治州成立之歌》《在故乡的山脚下》《兄弟姐妹欢聚一起》《锄头歌》这样的延边歌曲。”

金圣友副主席眯缝着眼睛深情地回忆着过去。这时，坐在旁边的夫人罗玉姬（81岁）削了苹果放在笔者前面，然后说：

“朱德海书记歌唱得好不好听我不知道，可是他的夫人金永顺可会唱俄罗斯歌曲了。这样的文章你们早点儿写就好了。熟悉朱德海书记和夫人金永顺的很多老干部、老同志都不在了。现在写起来会遇到很多困难的。金永顺是一个说话不多，很安静的人。虽然朱德海书记是自治州一把手，可是金永顺从来不仗着朱德海书记而颐指气使。她很内秀，手也很巧。她穿的衣服、连衣裙都是自己亲手缝的，孩子们穿的衣服也都由她自己做。‘文化大革命’中搞什么‘朱德海物品展览’，偷偷把百货商店里的衣服拿来冒充

朱德海书记一家衣服，让群众参观，妄图以此来批判朱德海书记过的是腐朽生活……”

看来，罗玉姬老人对朱德海书记的一家也很熟悉。

“等等，你这一插话，我把要说的话全给忘了。那一年，我30岁，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朱德海书记问我在平顶山上能不能建立青年农场的时候，我连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就回答说能。那个年代，共青团的代名词就是‘说话铿锵有力’……朱德海书记一听我的回答很有力度，就‘呵呵呵’地笑了起来。他说：‘1958年八家子到福洞区间的地方铁路也是共青团打先锋，以青年为主力军修建的，去年已经开通了。小金，当时你在和龙县委书记处工作，这些情况你是知道的。当年施工的时候，大跃进刚开始，条件比现在恶劣多了。如今通过那条铁路运往内地的福洞煤炭每年达30多万吨。我们把这条铁路叫做青年铁路线也是当之无愧的。’接着，朱德海书记向我讲述了开拓平顶山青年农场的意义。要想了解平顶山青年农场，首先得了解一下八家子到福洞区间铺设的专用铁路线……”

1958年8月26日，八家子到福洞的专用铁路开工仪式在离和龙县八家子镇5公里的工地现场举行。按照朱德海的指示，当时参加开工仪式的有州委副书记田仁永、副州长李浩源<sup>8)</sup>、延边军分区政委龙细欧、吉林省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刘雨农等党政军领导，以及从州内各县市来的青年和学生共3500余人。开工仪式上，州委号召全体青年铁路建设者“以愚公移山精神，多快好省地建设铁路”。这条铁路是延边煤矿专用线，是朱德海书记于1957年委托吉林铁路局测量的。这次施工是以青年为主力军展开的突击战。至今，火车仍然在这条铁路线上奔驰。

8) 李浩源，原名李松江，1891年出生。1946年起任吉林省朝鲜联盟主席、副州长、吉林省政协常委、州政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迫害，1978年去世。

“朱德海书记十分相信共青团，大胆地把施工任务交给共青团组织完成。这条铁路的成功铺设，体现了共青团的力量。所以，朱德海书记把开拓平顶山农场的工作也交给了共青团。我单独跟朱德海书记出行一共有两次。我怎么讲着讲着，又跑题了。不过，你听我给你说……第一次是1957年5月1日参加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大会，那时我头一次跟朱德海书记单独外出。当时，中共中央以李先念副总理为团长，还组织了全国少数民族慰问团。朱德海书记是延边各族人民的代表，我是延边青年的代表。我们先在北京集合，然后组成代表团去内蒙古。那时火车根本没有卧铺，图们列车段接到州委和州政府办公室的委托，在小房间为高级干部安装了自制的卧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列车卧铺。说是卧铺，其实跟乘务员的专用车厢差不多，顶多就是放了张床。为了提高房间的使用率，还放了上下结构的双人床。放了床以后，房间挤得连走动都很困难。现在我们坐火车去北京也就是一天多的时间，可是，那时候铁路旧，火车开得慢，也没有时间的紧迫感，两三天才能到北京。上车以后，朱德海书记微闭着眼睛思考着什么，偶尔还写在笔记本上。那时，朱德海书记使用的笔记本是镶有毛主席头像的笔记本，我们都很熟悉……平时朱德海书记话不多，说话也很慢，但是他看的书多，在笔记本上记得也很勤。青年时期，他主要读的是文学作品，到了延边以后，他就读有关农业和工业的书籍。我们两个人在火车上谈的话也多了起来。朱书记问我去没去过内蒙，我说没有。他就告诉我说，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和主席，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民族干部，曾在包头建立了很大的钢铁厂，促进了内蒙古的经济发展。他还说，要是我们延边也有一个大型重工业厂该有多好。内蒙古的经济比我们自治州发展得快，我们应该多多学习兄弟民族自治区先进的工作方法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去北京的路上，朱德海书记讲了很多，

他还说要好好学习民族区域共青团的工作经验，要尊重蒙古族文化生活习惯。他说，尊重他民族的文化生活习惯，也就是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生活习惯。他还给我讲了蒙古族的文化生活习惯。他说，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次会有很多少数民族青年参加，这样的机会难得，要我多跟他们接触，多学会不同的民族文化生活习惯，对将来搞好民族接待工作会有很多帮助。从北京回来后，我就从团州委调任和龙县委书记处副书记，1961年又重新回到团州委……吉普车驶出龙井市后，朱德海书记给我介绍了平顶山地形。这时我才大概明白朱书记为什么带我一起来。乍一看，朱书记像农民一样，没有什么架子，可是在政治上他很老练，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思路清楚，工作有把握……”

他们坐的吉普车驶出龙井后向三合方向奔去，到了六道河又转换方向往白金乡行驶。天上游动着灰白色的云群，像是要下一场春雪。乡间的路被牛车轱辘轧得坑坑洼洼的，说是行驶还不如说是爬行。

“我们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很多很多。建立农场，发展工业，还有把这样的泥土路修成柏油路，现在可不是偷懒的时候。”朱德海表现出了对工作的极大欲望。在他的眼里一切都要百废俱兴。颠簸在坑坑洼洼的乡间牛车道上，他心中还筹划着铺沥青修柏油路；看到平原和开阔地，他心中筹划着开凿水渠，修建水库，开垦水田种水稻。

“到了那儿你会知道的。满洲国时期，官方对平顶山也是很眼热的。在山上有着那么宽阔的平原，在延边其他地方恐怕没有这样的地形。你跟我上去看了，对这里的地形地貌会有了解的。然后，你马上拟出一个可行性报告给我。有了方案才能在常委会上讨论和研究。”

“是。”金圣友恭恭敬敬地回答。

驶出龙井后再行使了两个小时，吉普车到达五峰山脚下。再走一段路就是白金乡了。

“下车吧，现在开始得步行了。”说着，朱德海先下了车。司机从后座上拿起捷克制猎枪。被朱德海视为宝中之宝的就是这支捷克制双管猎枪。这是朱德海延安时期的战友送给他的礼物，一共两支，一支送给了英成村的金时龙。

“山上没有雪，野鸡也都藏到深山里去了，不会有有什么了。”

“五峰山树林茂密，为了安全也得带着呀。上次来这里的时候看到的那些狼群可不是闹着玩的。”司机说到安全问题，朱德海也就不说什么了。刚准备上山，从白金方向跑来五六个男人，上衣小兜里都插着钢笔，看来是乡政府的干部。

“您是朱书记吗？”跑在前边的人喘着粗气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呀，我就是朱德海。”即使是跟下级说话，朱德海用的也都是敬语。

“我们找对了，这位就是朱书记。”那人回头看着跟他来的干部们说，然后向前一步向朱德海鞠躬问好。其他的人也都向朱德海鞠躬。

“呵呵，我不是什么官衙里的老爷，何必这么拘谨啊？以后不要这样。这么说办公室好像已经知道我们的行踪了。”

“早晨县政府办公室来电话说，朱书记有可能来这里的五峰山，所以……”

朱德海揣测肯定是州委办公室通知了县委办公室，县委办公室再通知了白金乡政府。

“你看，我们稍微一疏忽就折腾了你们基层干部。你们马上回去守好自己的工作岗位。乡政府干部不做自己的工作，一大帮人来这里干什么呀？”

朱德海命令他们回去，可是他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有

动身。

“朱书记到我们这里来视察工作，我们怎么能怠慢呢？何况县政府办公室一再嘱咐我们……”他们都显得很为难。

“说的也是，你们这样回去也不好交代。那就这样吧，你们当中有谁熟悉平顶山，留下来给我们当向导吧。其他干部都回到自己岗位办公。至于县政府办公室那边我会处理的。”朱德海又严肃地说了一次，那些人才不得不按原路返回乡里。

“你们回去千万不要准备午饭，午饭我们自己会安排的。一定要记住了。”朱德海朝他们身后严肃地叮嘱了一句。

朱德海一行人往左拐，到了山脚下，越往上走，山势越险峻。

“这里的山势没有图们的高乙岭险峻，但是爬上去会很累的。”

之前，朱德海曾来这里勘察过一次，所以对这里的地形有所了解。山上连个小径也没有，他们只能攀上去。悠悠的图们江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下游给世人造就了平坦开阔的淤积地，让人们开发为谷仓；而在它的上游和中游又造就了险峻的山脉和峡谷奉献给世人。图们江又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伟大造物主，不但创造了险峻的山势，又在那险峻的山上创造出广阔的平原。他们现在要去的五峰山顶平原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气吁吁地一步一步攀登着五峰山，不免生出怀疑，这山顶上真的会有平原吗？谁能想到朱德海率先来勘查过的是这样的山地。

从那时候开始，整整50年过去了。2011年，笔者追踪朱德海的足迹来到这里。来之前，对这里山势的险峻早有耳闻，所以备了一辆越野吉普车。可是在崎岖的山路上越野吉普车也嘎吱嘎吱地发出呻吟。很难相信如此山高路陡的地方会有农场，也很敬佩如此险恶不易攀登的地方，朱德海竟来勘察过两次。如果当时山顶上一户人家也没有，那么，连眼前如此颠簸的山路也不会有，要上五峰山就得攀着草木枝条一步一步爬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

那会是怎么个情景，而眼前的现实却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起初仅由 17 人开辟的农场，其规模着实让人瞠目结舌，展现在眼前的是面积达 864 公顷的广阔田地，不，是广阔的平原。

平顶山农场，最初由四个自然村组成，现在成为三个自然村。农场指挥部就在第一个村庄。当然，现在已经失去了职能，只有两栋连房门都没有的砖房与桦树一起在寒风中孤独地瑟瑟发抖。岁月流逝，当年的农场建筑不可避免地埋进了岁月的年轮中，成为只能听到蟋蟀鸣声的废墟，但 864 余公顷苍黑的田地，正等待着播种的季节而散发出春天的气息。

这里的村民饲养着近 800 头黄牛。现在白金乡成为延边黄牛繁殖基地。追溯其 50 年前的历史，我们还能看到当年朱德海刻印在这里的足迹。

“我们好不容易爬到山顶，山顶上净是白桦、椴木等杂树，还有丈把高的茅草，到底从哪儿开始开垦，开垦到何处，我根本理不清思绪。虽然朱德海书记指这儿又指那儿，大致介绍了地形，可是我一点儿没有感觉，只是在想这里的平原面积的确相当大。”

金圣友副主席讲到这儿，微微闭上眼睛，像是在回忆当年的情景。

“平顶山平原是向东北方向伸展的，如果都开垦出来足有 1000 垧（公顷）。怎么样，1000 垧啊，值得干一场吧？”

金圣友听了朱德海的话大吃一惊。在这样的山顶上竟要开垦出 1000 垧地……

“是，是值得大干一场。”

“对，我们朝鲜族很早以前就垦殖拓荒，先放火把草木烧掉，然后翻地播种，所以也就称之为火田地了。”

朱德海无愧是一个农业专家。顾名思义，火田也就是在山坡或平原能耕种的地方先放火烧草木，然后开垦的田地。像这样刀

耕火种的农民，被称为“火田民”，朝鲜族的祖先就是“火田民”。我们叫这样的地是“开垦地”、“处女地”、“新开地”、“火带地”。火田地成了农民的命根子，反映了农耕社会中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图们江左岸延边地区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刀耕火种的火田地历史，反映了“农夫一生无穷尽，农事天下之大本”的祖训。

靠这样的祖训，我们的祖先在山坡平原上开出了数千片火田地，也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耕地。火田地朝鲜族的传统生活中成为“开拓”的形象，成为移民历史的见证者。火田民的开拓精神之所以成为民族传统的基础，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延边地处山区，虽然林业发展了，但耕地面积少了。我们把这个问题向上级反映之前，自己首先得有个解决问题的策略。粮食是经济，也是国力。我们开出1000余垧田地，生产出来的粮食粗略一算也很可观。希望你回去以后，召开共青团会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从平顶山下来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

“走吧，我们到英成的金时龙家吃午饭。虽然晚了一点，金时龙社长因为黎明高级农业社的事情叫苦不迭，说觉都睡不安了。我们顺便去看看他。”

下了山，朱德海让白金乡的干部回去以后，马上乘车往回返。朱德海注视着窗外，当吉普车开到开阔地时，叫司机停车，然后从后座迅速拿起猎枪绕到一座废旧房屋后边。忽然，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司机急忙跳下车跑过去。不一会儿，司机手里拎着一只耷拉着脑袋的野鸡回来。朱德海说：

“金时龙特别喜欢喝野鸡汤，这下好了。我给他的那支猎枪，他一次也没用过。真是个大忙人啊。”

他们直接朝英成村驶去。金时龙在村口一见朱德海也不打招呼，开口就让朱德海给他解决苹果梨树苗。一方是总管自治州的

州长，另一方是刚刚建立的人民公社社长，虽然两人的身份地位如此悬殊，可是交往却如此随和。

“苹果梨树苗可以给你，可是你得先给我饭吃。”

朱德海让司机把野鸡给金时龙家送去。

“你到现在还没吃午饭？啧啧……那你先去李玉今家吧，我去把她找来……”

说着，金时龙急忙朝高级社办公室的方向跑去。

“他可是干活狂啊。”朱德海望着跑去的金时龙自言自语地说，“在黎明集体农场时期，金社长根据英成村人口多耕地少的实际情况，组织剩余劳动力到依兰沟去新开垦了20垧地，种了大麦。又到珲春去利用英安的旧飞机场开了50余垧水田。后来，因为珲春离英成太远没法管理也就拉倒了。现在珲春人正种那块地呢。不光是这些，他还在长南村和东明村的山坡上种了33000株苹果梨树，修建引水渠，修筑防洪河坝，挖地下水。在延边，像他们这样搞基本建设的村子不多见啊。要是农村像他这样勤勉的干部再多一些，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也就更快了。”

如果说朱德海大力支持金时龙的工作显得有些“偏爱”，那也是因为金时龙的勤劳和勤勉。金时龙从互助组开始到初级社、黎明集体农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经历了各种风浪。朱德海喜欢的就是金时龙不屈不挠和耿直刚强的性格。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在共和国创立后的极“左”气候下，不合时宜地组织和成立的互助组、初级农业社和高级农业社直至人民公社，都存在许多问题。金时龙带领的初级农业社、高级农业社和人民公社的农业产量不断下滑，吃大锅饭的生产方式使农业生产不是原地打转就是倒退下来。

1956年组织高级农业社的时候，水田平均垧产3350公斤，比前一年减产不说，比1953年集体农场时期最低产量还减少了451

公斤。所以那一段时期，金时龙经常找朱德海发牢骚没法干了。金时龙的不满也是当时农村基层干部中普遍反映的问题，这种牢骚和不满是现实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一历史时期，农村政策是盲动的。这种盲动不仅在延边，而且在全中国都表现出来。如果把这一时期的过失问责当时执行中央政策的地方党政干部，显然是不公正的。

这一时期，朱德海也理所当然地与党中央的步调保持了一致，也跟所有党政干部一样撞到了临界点。到今天为止，我们之所以对当时的干部进行正面的评价，是因为他们身上打的是共产党员的烙印，是因为他们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广大人民大众而献身的。对朱德海的评价也是如此。

朱德海一行到了李玉今家的院子里，金时龙和李玉今也急急忙忙跑过来。

“呵呵，这是不是又给你们添麻烦了？”朱德海有些歉意地说。

“瞧您说的，朱书记，您天天来我们都乐不得呀。”李玉今向朱德海鞠躬以后高兴地说。

这一历史时期，在延边最出名的就是李玉今了。李玉今在厨房里忙了一会儿就把饭菜端上了饭桌，大米加少量小米和土豆做的饭、腌的芥菜，还有刚从菜窖里拿出来的辣白菜和泡萝卜块及石锅里熬的酱汤。

“酱汤的味道真香啊。这么精心做的饭，我们赶紧吃吧。”说着，朱德海高兴地拿起铜勺吃了起来。

即使是再困难的时期，像朱德海这样的领导干部在乡下的一个农民家里随随和和地吃一顿便饭，乍一听起来有些不可信，可是对朱德海本人来说，这是经常有的事情。在朱德海下过乡农村，饮食习惯早已广为人知。笔者去年采访李玉今（90岁）的时候，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朱德海书记最喜欢用石锅熬的土豆酱

汤了。”

李玉今已是 90 岁高龄了，耳朵有点儿背，可是精神饱满，思维清晰，是个干净利索的老人。有关朱德海的采访结束以后，笔者把采访费递给她，可是她坚决不要。

“你们采访的是朱德海书记，我帮你们还来不及呢，怎么能收钱呢？这钱我坚决不能收。只希望你们一定要把朱德海书记写好，让后人都知道他，记得他。这就是我这老太太生前的拜托了。”这是在延边认识朱德海的最后一个农村妇女李玉今的肺腑之言。

朱德海的三儿子吴阳坚也回忆说：

“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父亲都在乡下。他很忙，也很慈祥，在家的時候，从来不跟我们发脾气，也从来不训斥我们。在饮食上父亲从不挑剔。他说，有豆腐酱汤、辣椒酱和泡菜就可以了。”

那天从英成回来以后，金圣友召开团委会，传达了朱德海的指示。会后，先由延吉县团委组织团员和青年作为先遣开拓队登上了平顶山。

“从那以后，我一有空就往平顶山上跑。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信，那个时候没有通往那里的公共汽车，我都是步行去的。延吉和龙井之间还有车能坐，可是从龙井到平顶山就得步行了。那时候也不觉得苦。谁都这么走，也就觉得理所当然了。有一天，朱德海书记找我，我以为可能是关于上次递交的共青团工作计划的事情，就赶紧跑过去。不出所料，朱德海书记先询问了平顶山的开垦工作。我说，在延吉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第一批派了 17 个人上山，准备了临时的住处。这次要大规模动员青年上山，可是动员工作不好做……”

听到这儿，朱德海书记不知为什么“呵呵”地笑了。他说：

“你说不好动员也难怪，火田地的开垦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何况我们还没有机械化设备，全靠我们的双手去开垦呢。”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实的严峻和困难而放弃农场的开垦工作。”

朱德海说到这里，卷起了一支旱烟，接着说：

“我问你，你已经30多岁了，成家了吧？”

“是，我结婚了。”

“呵呵，那你应该知道男女之间的事情呀……你第一次派去的17个人中间有没有女共青团员或者女青年呀？”

“一个也没有。”

“那这次第二批要派去的人当中也没有女青年吗？”

“是……我想，开垦火田地是重活，太艰苦，觉得女青年不适合，也就没动员她们。”金圣友满脸疑惑地说。

“呵呵，这就是问题的根源了。共和国建立以后，女性参政意识越来越强，女性权益也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你怎么可以忽视女青年呢？青年工作的特点是异性相吸，我们可不能忽视人的这个本性哟。我们不能以为这只是私人的生活问题……应该正确地引导他们，树立革命的爱情观。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话，工作方式是不是也得变一变？我说的什么意思，你听明白了吧？”

“明……明白了。”金圣友恍然大悟。

“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在劳动中相爱，萌发爱情，再成为夫妻组成家庭，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做青年工作，对这一点不能熟视无睹。延安时期，我党为了活跃文化生活组织了舞蹈晚会，毛主席、朱德等党政领导都参加了，还有那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我军很多将领和战士也都来参加了。在舞会上，他们相互认识、交往、恋爱，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我们党积极提供了这种场合，鼓励他们参加这种活动。共和国成立以后也是如此呀。在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前，我们也都是平凡的男人和女人，所以异性相吸是很自然的现象……”朱德海笑嘻嘻地给共青团书记出了点子。

“呵呵呵……我按照朱德海书记说的去做了，果然立竿见影。再动员的时候，我大力鼓励女青年参加开垦工作，结果原来拒绝上山的那些男青年争先恐后地报名上了山。从那以后，开垦工作活力大增，很多青春男女上了平顶山，也动用了牛、马等畜力，劳动效率相当高，一天一个样。期间，朱德海书记也来过几次平顶山，给我们送来了当时很难搞到的粮食和肉。……后来，我向朱德海书记汇报说，动员女青年上山以后，男青年不用动员就主动上山了。朱德海书记听了以后，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呵呵呵地笑了。他告诉我说，成为共青团员以前，他们就是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所以，在开展工作的时候，要注意结合青年们的特点。现在来看这些事情，只是引导青春男女相亲相爱，积极工作。可是那时候，稍微不慎就会被扣上误导青年的帽子。”

在那个年代，我们社会正直的思维正向“左”倾斜，人世间最基本的爱情也不得不与美好的心愿相隔千里之外。就朱德海的身份来说，这种提议很容易招来其他人的闲言碎语。但是，他不顾这些，给共青团书记指出了最人性的工作方法。

“在不同的场合，朱德海书记说话都很幽默。很多人说他寡言少语，令人敬畏。其实，朱德海书记跟同事唠家常话的时候很多。有一次，朱德海书记跟姚昕副书记一起去平顶山。在车上，朱德海书记还跟姚昕副书记讲了有关被子的笑话。笑话大概是这样的。有一个小学老师教学生学习‘被子’，有一个学生就是记不住。于是老师问这个学生，谁在褥子上面呀？那个学生回答说，妈妈。老师又问，那妈妈上面是什么呀？那学生回答说，爸爸。朱德海书记跟姚昕、田仁永这样的汉族干部都很谈得来，跟他们一起出差的时候经常跟他们开玩笑。现在我们去敦化只要两个小时就够了。可那时坐火车也得花六个小时。和龙的崇善、龙井的平顶山都需要四五个小时的。经常下乡的朱德海书记在路上花费的时间

很长，思考问题的时间也就多了起来。一旦有了同行者，自然话也就多起来了。”

## 朱德海和金时龙

为延边的农业发展，朱德海书记做了建立龙井万亩果树农场和大苏果树农场、大兴水利设施建设、开垦大量水田、饲养延边黄牛等大量工作。其中，朱德海书记对农民的关怀更是人性化。在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他的这些故事更让人耳目一新。

1950年，东盛涌乡涌现出了众多模范人物，以“英雄的故乡”驰名全国。在一个小乡村里出现了4个全国劳动模范。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金时龙、全国妇女模范李玉今、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吕根泽、全国毛主席著作学习模范、乡村女秀才黄顺玉。而且这4个农民人物都跟朱德海有着密切的关系，命运把他们同朱德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接受着连续不断的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在运动的大海中沉浮。

现在来评论这些历史人物，或者说他们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时代的牺牲品，或者说是特定时期派生的特定的社会人物。评价他们，首先要把他们放在历史视觉以外的自然人的角度来评论。但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4个人物都是不懂何为政治利益，何为经济利益，何为荣华富贵，唯有民族感情十分鲜明的农民，是拥有最纯粹的情感最优秀的品德和伦理道德的农民。就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决不能贬低他们在农业建设中的作用。

朱德海认识金时龙是1951年3月，延边成立第一个初级农业社——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经历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都熟悉金时龙。向世人广为宣传金时龙的是已故的朴河林

先生。他从《延边日报》记者时期开始，就跟金时龙有着深厚的友情，还写了一部报告文学《海兰江之魂》。

金时龙先后受到毛主席 27 次接见，可以断言，在中国农民兄弟中，他是受到毛泽东接见最多的农民。在海兰江畔，他赢得了很高的信任和尊敬。

金熙宽曾经评价金时龙说：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朱德海被打成特务、走资派挨斗的时候，金时龙愤慨无比，要去北京向毛主席反映朱德海的冤案。他担心在延吉车站上车被人发现，就沿着铁路徒步走到朝阳川以后才上的火车。虽然途中还是被抓了回来，没能去成，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金时龙对朱德海书记笃深的情谊。金时龙性情刚烈耿直，是一位跟朱德海书记有着深厚感情的农民干部。”

1951 年 3 月下旬，延边地委和延边专员公署派出工作组到金时龙互助组，并把他的互助组命名为延边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的互助组一开始就得到了朱德海的关心，成为从互助组跳跃到初级农业社的契机。此时，朱德海正为龙井果园和抗美援朝的支援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始终没有忘记金时龙的互助组。事实上，金时龙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延边地委和延边专员公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个年代正需要像他这样的榜样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他正是我们党这一历史时期宣传的典范。1952 年 8 月，金时龙光荣地成为中国劳动模范代表团的成员到苏联去参观访问。离开之前，朱德海再三嘱咐他：“到了苏联，要好好参观集体农场，把他们管理农场的经验学过来”。

金时龙牢记朱德海的嘱咐，不但参观了好几个集体农场，还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在朝鲜族农民中，金时龙是唯一见过斯大林的人。当时，苏联是全世界共产党的老大哥，拥有莫大的权势，斯大林也被敬仰为至高无上的伟人。所以，能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是无尚的光荣。

1953年3月12日，英成村“黎明集体农场”宣告成立，金时龙任农场主席。东北局行政委员会农村工作部部长王如、吉林省委书记李梦龄和朱德海参加了成立大会。

“‘黎明集体农场’这名字起得好啊。”李梦龄书记称赞农场的名字起得好时，朱德海也十分赞同。

黎明集体农场不仅是在延边，就是在全吉林省也是第一个建立的集体农场，在全国是第二个建立的集体农场。

可是，困难还在后头。我们的先人给我们留下了“树好栽，却难养”的名言。名言的影响是无限的。在这之前，谁也没搞过农场，所以成立伊始，处处碰到难题，步步遇到障碍。

“他妈的，众人聚在一起种田好是好，但不好管理呀！”

金时龙是个急性子，没曾想到的问题不时冒出来，使他顾得了东却顾不了西，急得连声骂娘。村民的利益要分配，但如何制定分配的标准，是最叫他头疼的事情。如何制定生产过程中每个劳动环节的强弱，怎样把它换算为劳动的报酬，确实是会起连锁反应的难题。

“难啊！”

金时龙马上到延吉找朱德海反映问题。他比朱德海小8岁。

“呵呵，又碰到什么问题了？别急，慢慢说。”

朱德海劝着急得团团转的金时龙，让他先坐下来，然后耐心地听金时龙犹如机关枪一般的讲述。

“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农场管理的关键问题。”听完，朱德海沉稳地说：“金社长，虽说我是地委书记、主席，但是论农村劳动现场体验和管理，你还是老师。……我们就这么看这个问题吧，利益分配，其实说的就是劳动的报酬。在生产中，多干多得，少干少得是劳动分配的原则，黎明农场也应该体现这样的分配原

则。劳动分工要细一些，如果一大帮人都凑在一起干活，不但不现实，而且生产效率也不高，白白浪费劳动力，劳动报酬也不好计算。你看这样好不好，先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会，根据一年四季不同季节的劳动强度制定生产额，再分给各作业组，由各作业组负责劳动分工，并根据生产定额的完成情况计算工分。稻苗管理和水田管理属技术活，报酬要定的高一些……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你再想想吧。”

“对呀，这就对了。”

金时龙就劳动分配和劳动报酬问题很苦恼，一心想摸索出生产管理的方式来，朱德海的这几句话使他心里有了谱，有了方向。根据劳动强度制定生产额，再根据生产额的完成程度计算劳动报酬。这样，提高劳动效率不说，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也会大大提高。

“朱书记，我现在马上回去组织开会，制定生产额。”

金时龙霍地站起来要走，朱德海从椅子上站起来挽留他：

“急什么呀，刚才我提到的那些方案是不是合理，我也没把握。但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所干的事情都是前人没有干过的，我们要干的事情很多。我们要以主人翁的精神推进工作，解决问题。有时候，我们也会失败也会受挫折。可是，如果我们害怕失败，不敢大胆地开展工作，那就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我家在胜地（村）的时候，母亲经常给我们分工干活。春天到了，妹妹负责到地里去挖小根蒜，我负责在地里用铁锹翻地。集体的管理方法跟家庭里的分工劳动也许有类似的地方。不过，我们还是要在实践中摸索经验，扬长避短。”

朱德海让金时龙坐下来，然后喊来了秘书：

“通知办公室准备午饭。我们的特等劳模来延吉了，不招待他吃饭，我们再去英成的时候就没有饭吃了。呵呵，给我们送两碗三千里冷面来吧。”

当时，延边地委后胡同里有“三千里冷面馆”和“仁川冷面屋”。每次客人来了，朱德海就在那里订餐。日帝统治时期，延吉也有冷面铺。送冷面的人一手把着自行车，一手托着冷面，穿梭在人群里，那惊险的一幕成为当时延吉胡同里的一道风景。金时龙在朱德海的办公室里吃了一碗一毛五分钱的冷面后，急匆匆地离开延吉回英成去了。

原延边电视台台长金熙宽说：

“据我父亲说，朱德海书记除了外交上接待客人以外，其他的客人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简单地招待。朱德海书记特别喜欢吃冷面，金时龙也很喜欢吃，于是两个人就在办公室里吃冷面。这种招待方式，现在的人根本无法理解。建国两年后的1951年，父亲担任了地委研究室主任。三年后，1954年担任了财贸部部长，也就是现在州财政局局长一职。父亲担任的是要职，是最直接掌握朱德海书记经济支出情况的人。父亲常说朱德海书记从来不乱用公款。正因为父亲非常了解朱德海书记的清廉，了解朱德海书记是一个为党为国家献身的伟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让我父亲证实朱德海书记是叛徒、走资派的时候，父亲就以死来抗拒他们，以自己的死颂扬了朱德海书记的品德和清廉。”

金时龙回到英成后，当天晚上就跟农场管委会的委员们和懂得生产要领的老农们一起，从春播开始，到夏锄、秋收等一年四季的每个劳动环节制定合理的生产定额和报酬。他们还对没有把握的生产额和报酬进行了讨论，一致同意经过下地劳动体验后再作决定。

通过讨论，他们把生产劳动分为6个等级，给每项劳动都制定出了生产定额。最后，金时龙把这些综合起来，拟出了“分级生产定额表”，制定出各生产队承包的工分，分发给各生产队。

朱德海了解到金时龙的小阶段责任制和生产劳动责任制以后，

认为值得在全延边普及，于是人民公社成立后，把这一经验推广到基层的核算单位生产队。

经过互助组、初高级农业合作社进入人民公社以后，金时龙肩负的责任更大了。他只熟悉种地，不熟悉管理工作。在苦恼和烦闷中，他又去找朱德海倾诉自己的苦衷。从初级社开始，金时龙在工作中一有困难就去找朱德海。后来金时龙跟朱德海一起参加省人大和全国人大会议，与朱德海的关系更加亲密。凡是有什么事情，他都会一五一十毫无保留地跟朱德海交换意见。

集体化时期，金时龙因对集体办食堂的做法有意见，就来找过朱德海。

“吃饱饭撑得没事干了？这集体食堂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我想不通。生产队长不管生产去管食堂，各家的碗盆都交到食堂里，全村的人都挤在食堂吃大锅饭。生产队那么多人，口味都不一样，怎么能调好众口啊？真是憋气。小孩愿吃这个不愿吃那个来折腾大人，没办法好多人把饭打回去另做菜吃。想吃酱汤的人，干脆不来，就在家自己做了吃。这到底是谁让干的呀？在集体食堂吃了饭，回家还得烧炕，这不浪费烧柴吗！”

朱德海觉得金时龙说的话不无道理。

“我们是国家机关干部，上级下达的指示我们不能不执行。所以，金社长，有些事情你就看着办吧。农忙季节想办就办，没有长期办下去的必要。反正这集体食堂跟我们民族的生活习惯不符，适当地看着办就行了。”

朱德海的这句话等于说别干了。在那个年代，如果这些话被别人听见，他的地位就会动摇不稳，但是，朱德海敢于对金时龙说这些话。

金时龙回去以后，马上解散了集体食堂。于是，在全州办得最早办得最好的英成二队集体食堂，却比其他地区的集体食堂最

早解散。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延边的主要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中心。所以我们说，朝鲜族聚居地区党组织的历史就是指导农业生产的历史。总之，农业集团化是失败的作品，违背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只不过是超越生产力水平而形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假象而已。

“朱书记，公社社长我干不了。高级社没办好，闲话没少听。人民公社这么大，我怎么运营得了？这个担子太重了，我没有能力做好。我只是一个农民，还是让我回到生产队跟农民一起种地吧。”

“呵呵，我们的特等劳模又碰到什么头疼的事了？快把心里想的都说出来让我听听。”朱德海笑着安慰金时龙。

“我怎么想自己也不是搞管理的料，还是让别人来干吧，反正有会干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我做这件事情？实在搞不懂。”

“金社长，你有这样的想法我很理解。这是农民出身的干部在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朱德海卷着旱烟，沉着地说，“人民公社社长是拿国家工资的干部，你却不愿意做。你的苦衷我充分理解。可是，经验都是在摔打碰撞中积累起来的。我现在干书记和州长的工作，可没有谁把现成的经验传授给我。路在哪里，该怎么走，全靠我们自己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出经验来。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勇气面对它，闯过它。金社长，你可能对延安的生活不了解。那时候，我们八路军经历的是何等艰难的岁月，你可能想都想不出来。军队屯田种地意味着我们面临的是绝境，没有退路，也无路可走，只能向前进，延安精神使我们终于冲破了难关。同时，这也是我们相信自己、相信群众的结果。如果那时，我们缺乏勇气，失去了前进的动力，那就等于宣告失败。”

朱德海做政治思想工作出了名的。他不是演说家，说话也慢条斯理，但说的话特别有说服力。这是政治家朱德海的才干之一。

“在我这里你尽管发你的牢骚，闹你的情绪，我都会听进去的。但是在公社，在农民面前，你千万不能说那些泄气话。你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随便说出来的一句话，很可能对农民和普通群众是一次打击，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对立情绪。所以，我们干部说话要谨慎。干部在成长过程中，首先要学会的能力是如何把自己的嘴管好。表面上看，农村的活儿都是些粗活，其实是很细致周密的活儿。世上的事情哪能都那么顺心呢？有顺心如意的，也有烦人闹心的。遇到解不开的事情，就要学会借助身边人的智慧。什么事情都不要自己一个人干，要学会组织大家、团结大伙儿一起干的工作方法。在我看来，东盛涌人民公社干得不错。这都是因为你主持工作做得好。这次回去，你要重新振作起来，从组织和团结村民着手。千万不要忘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

金时龙听了朱德海意味深长的话以后，心情平静了许多。

“还要注意休息。我把这支猎枪送给你，遇到什么头疼的事情，就到外边去打个鹌鹑什么的，调节调节情绪。”朱德海把一支自己视为宝贝的猎枪送给了金时龙。

金时龙闹情绪的时候，正是全国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时候。中国特有的政治运动给农村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和忧患。

1958年，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但是却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是在没有充分理解中国实情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

在总路线的指引下，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人民公社的红旗到处飘扬。1959年党中央八届八次会议上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以来，“左”倾错误更加严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

政府单方面毁约，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极其困难的状况。这种状况从1959年到1961年持续了三年。后来人们称这段历史时期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代食品”时期。在这个时期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了毛泽东的排斥。

三年困难时期，延边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遭到了天灾人祸。生产关系的突然变化和对价值规律的无端破坏，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低落到极点，生产力水平遭到了极大破坏。

1958年5月1日，我国第一所“黎明业余农业大学”诞生，创始人就是金时龙。1958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18个省市扫盲先进代表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点名金时龙发言。这时，金时龙竟忘记了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脱稿说了一通豪言壮语，还说他们已经具备了开办业余农业大学的条件。陈毅副总理再次问金时龙到底能不能开办业余农民大学后，拍着桌子说：“好。延边业余农民大学成立的话，我会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的农民大学成立了。”会后，陈毅副总理亲自到金时龙的住处来找金时龙，对他说：“延边的朝鲜族有良好的教育基础，有优良的民族传统。希望能早一点听到业余农民大学成立的好消息。”

从北京返回的路上，金时龙心中有些担心和不安。天不怕地不怕的金时龙知道，单靠自己的力量是办不起业余农民大学的。况且这么大的事情事先也没向县、州尤其是向朱德海汇报，只是当场感情冲动，张口就说出去了，过后开始后悔是不言而喻的。

金时龙在延吉站下车以后，没有回英成，直接去找朱德海。见到朱德海后，他低着头先做了自我检讨：

“朱书记，给你汇报大会情况之前，我先要做检讨。”

“呵呵，别急，先坐下来吧。不过，金社长，你怎么会做检讨呢？这可不像你的风格。满腹牢骚才像你呀，呵呵呵。”朱德海爽朗地笑了起来。

“我犯了个大错误。这次去北京，事先没有向组织请示，也没有经过组织的批准，就在会上说了大话，说要成立业余农民大学。我这个错误犯大了，我甘愿受组织的处罚。当时我一激动，就向陈毅副总理夸下海口。回来的路上细细琢磨了一下，我的心就发慌了。说是‘业余大学’，可是不管怎么样，毕竟是一个大学啊，总不能简单地说办就办啊……”

“刚才你说了什么？什么‘业余大学’？你再重复一遍。”朱德海认真又急切地问道。

“是真的。陈毅副总理还给我写了题词呢。”金时龙拿出陈毅副总理写的题词给朱德海看。

“呵呵呵，还是你金时龙敢想敢说呀。你这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立了大功。这可是给历史留下的大好事呀。连我们州党政领导都没有想到的事情，金社长你给想到了。在全国会议上你都敢这么说，看来你的胆子真大。不过，你为延边办了一件大好事。”朱德海热情地握着金时龙的手满脸喜悦地说。

“真是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放了大炮后，我一直提心吊胆，快把我吓死了。”金时龙这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气。

朱德海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对金时龙的农民业余大学给予了大力支持。首先考虑的是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的效应，积极宣传农民大学的意义，还能为延边自治州做广告。其次是通过这所学校在延边这个民族地区大量培养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农民，促进农业发展。

“你回去等消息吧。我马上与州委讨论后作出决定。”

就这样，开办黎明农业大学的事情被安排上了议事日程。朱德海指示州委文教部长李羲一和教育处长梁贞凤<sup>9)</sup>成立筹备委员

9) 梁贞凤，1912年3月21日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194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后任延吉县文教科科长、延边专员公署文教科科长。1952年至1966年

会，其宗旨是“培养为当地工农业生产服务，有社会主义觉悟，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又红又专的新型的劳动者”。接着，成立了领导机构，由东盛涌乡党委书记朴安哲任名誉校长，金时龙、李学林（第11中学校长）任名誉副校长，崔京泽任校长。这是新中国第一所业余农民大学，于是决定从金时龙的“黎明农场”中取“黎明”两字，全称为“黎明业余农民大学”。给省里有关部门报告后，他们认为这“不仅是延边的光荣，也是我们全省的光荣”，于是立即批复同意成立。

三个月以后，1958年5月1日“黎明业余农民大学”（现在黎明业余农民大学和工人大学合并，改称为“延边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成立。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主席肯定“人民公社好。”毛主席的这句话，使全中国农村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1958年8月29日，黎明高级农业社与海兰、瑞兴、东盛、龙新、太平等8个高级农业社合并成立了东盛人民公社。仅仅在一个月內，全州921个高级农业社就合并成立了78个人民公社。全州172388户农民全部参加了人民公社。

东盛公社有3462户，18000余名人口。他们把8000余名劳力分成15个生产大队。金时龙担任了公社副社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金时龙到延吉找朱德海发了一通牢骚。农民的种田变为劳动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团化，吃起了“大锅饭”。同年10月，又掀起了大炼钢铁的新高潮。

金时龙又到延吉找朱德海诉苦说“乱套了”。当他诉苦“乱套了”的时候，情形还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此后的形势变得越来越糟糕。“文化大革命”期间，金时龙被打成“朱德海的保

---

任延边州教育处处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8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5年2月逝世。

皇派”、“走资派”而被批判斗争。1969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这一年的粮食产量一落千丈，由1967年的1 264 000公斤下跌到869 000公斤；人口平均收入由152元减少到103元；粮食征购任务由594 000公斤减少到362 000公斤。从此，英成村开始走下坡路。英成村是中国农村的缩影，经历了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而最后剩下的只有贫穷。这是时代的悲剧。悲剧的产生，不能说当时的干部没有责任。朱德海作为延边党政一把手，也深感自己负有责任。这种责任也是那个年代中央和地方党政首长们需要共同承担的部分。

1978年6月20日，延边州委召开的为朱德海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大会上，金时龙作了一次“金时龙式”的痛快淋漓的发言，使所有与会者心情大为舒畅。

### 李玉今讲的故事

如今，李玉今老人是东盛涌乡唯一健在的全国劳动模范。她经常自豪地说“毛主席给我倒过酒”、“我六次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李玉今是逐渐登上延边社会舞台的农村妇女，虽是女人，干起活来却如同黄牛。她就像在头顶上顶着沉重的包裹走过了艰难的人生路程。她26岁那年（1948年）加入了共产党，历任农业社主任、农业高级合作社副社长、妇女主任、支部书记等职，从来没有离开过农村半步。她担任过的最高职务也只是支部书记一职。虽然官不大，可是她获得的荣誉却与此相反，不但数量多，而且档次很高。

“朱德海州长没有架子，尊重我们农民。我第一次见到朱德海州长是我从北京参加亚洲妇女代表大会（1949年12月）回到延吉

的那天欢迎会上。我在延吉车站下车，当时妇联会的金灿海<sup>10)</sup>主任和刘菲副主任领着一群干部到车站来迎接我。那天晚上又举办了欢迎晚会。晚会就要结束的时候，朱德海州长和延吉县委书记宋振庭<sup>11)</sup>一起来到会场，就是在这一天，我第一次见了到朱德海州长。

“朱德海州长经常下乡到我们英成村，而且每次来都要见金时龙社长和我。他在我们家吃过饭，还夸我做的土豆酱汤好吃。记者同志，你总问我再嫁的事情，其实那个时候，烈士遗孀再嫁的话，别人都会在背后戳你的脊梁骨，指手画脚地议论你。因为大家都知道烈女必须保持贞洁。即使是普通人家的女人再嫁，别人也不会正眼看你的。我再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的公婆。从1952年末开始，我公婆就说：‘我们不能只顾自己，耽误了你的青春。你替我们再找一个儿子到家里来吧。’他们去县委找宋振庭书记（田仁永）（宋振庭在延吉县委工作的时间是1949年2月至1950年4月，而1950年4月至1953年5月是田仁永任延吉县委书记，李玉今误以为是宋振庭），多次提出我的再婚问题。他们看我坚决不同意改嫁，就说如果我同意改嫁了，那么他们会把我的新丈夫当作他们自己的儿子一起过日子。

“既然公婆都出面了，金时龙书记也要给我做媒。金时龙书记和崔采给我介绍了曾在太行山参加过革命的老干部。当时他（曹德浩）在英成村党支部做宣传委员工作。他们介绍说，他很小就

---

10) 金灿海主任，1905年出生，1929年加入朝鲜共产党。1930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与同学林民镐结为夫妻。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延边地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延边妇女代表大会执委会主任、延边师范学校校长、州民政处处长。“文化大革命”时期蒙冤下放到敦化农村劳动，1972年12月22日逝世。

11) 宋振庭，1921年出生，先后任延吉市委书记、延吉县委书记、延边地委常委。1950年起先后任吉林省政府文化处处长、省政府党组成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教部长、宣传部长、省委常委等职。1985年2月15日在北京逝世。

入伍，参加了不少战斗。他还在火线上入了党，当过班长，立过功。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是不想改嫁，谁都不想见。……有一天，宋振庭书记（田仁永）来找我，笑嘻嘻地对我说，县委已经批准我嫁给曹德浩了，还说，朱德海书记也积极支持这件事情，催促我赶紧结婚。那个年代，党员要改嫁必须得到组织的批准才行。像我这样的烈军属更不用说了。跟现在的年轻人说这些，他们都不相信。当时我就不相信，一个堂堂书记怎么还能记着我这妇道人家的小事？县委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县委书记还亲自出马？后来我知道了，真的是朱德海书记亲自过问了我的事情。”

在延吉参加会议的时候，早就了解李玉今的金时龙先找到曹德浩，向他详细介绍了李玉今的情况：

“她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长得端庄贤惠。只是她身边有两个跟前夫生的女儿。不过这不能算什么呀，你不是也受过伤吗？再说了，我们英成村需要像她这样的女人。”

曹德浩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于是，金时龙去找朱德海，直截了当地说：

“朱书记，我有件事情要请你帮个忙。你能不能劝劝李玉今嫁到我们村里来？”

“金社长，你怎么干起媒婆的事情来了？”朱德海笑嘻嘻地跟金时龙开玩笑。

“李玉今是什么样的女人，朱书记你比我清楚。我们也不是强把他们拉在一起，是他们两个人相互都有好感。所以，我们希望组织上批准他们结婚。”

“批准不难。不过你们征求过李玉今的意见吗？还有男方呢？不听听双方的意见就要组织上批准，这可是不讲理呀。”

“曹德浩已经爽快地答应了，李玉今的公婆很积极，应该没什么问题。”

“呵呵，那也不行啊。婚姻绝对要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延安时期，党中央颁发了两个法令，其中一个就是《婚姻法》。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干部更应该模范遵守《婚姻法》。李玉今同志是革命烈士遗属，但她首先是一个平凡的女性，有婚姻自由，也有再嫁的权利。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绝对要尊重李玉今她本人的决定。”朱德海说得一点不含糊。

金时龙重新回到兴安乡发展村（现在的大成村）找李玉今试探，得到确认后又来到朱德海的办公室。听了金时龙的汇报后，朱德海通过州委组织部给延吉县委书记田仁永“下令”，让他们解决李玉今的改嫁问题。于是，1953年1月，李玉今在田仁永家身穿朝鲜族民族服装跟英成村的曹德浩举行了婚礼。

“你想想看，我只是一个农村妇女，可是朱德海书记却这样关心。朱德海书记每次到英成村来，从来不背着手摆架子，不发号施令。一到插秧季节，他就挽起裤腿，在泥水中跟我们一起插秧；锄草季节，他又拿着锄头跟我们一起铲地。庄稼活儿，朱德海书记没有不知道的。有一次，我们在水田地里除草的时候，朱德海书记来了。那天也跟往常一样，朱德海书记在我旁边徒手除草。他仔细地观察我干活后，夸我干得好，立即把社员召集过来，让我在他们面前做示范。

“我改嫁到英成村后，也经常到延吉、北京去参加会议，朱德海书记好几次都来欢送我们。有一次，我跟着黄顺玉去朱德海书记的家。黄顺玉是朱德海原夫人的表妹，因为能把毛主席著作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名扬全国。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朱德海书记的夫人。她跟别人说的一样，年轻、漂亮，也很和蔼。朱德海书记跟老丈人和老丈母娘一起生活。说句笑话，如果你不认识他们，还会以为朱德海书记的夫人是朱德海的女儿，朱德海书记的丈母娘才是他夫人呢。

“原以为延边有这么好的书记，这么好的州长，我们的生活会过得很好。谁知道‘文化大革命’一爆发，朱德海书记就挨斗受批。当时我也受到迫害，他们说我是‘朱德海的保皇派’，为了找出朱德海书记的所谓黑材料，竟把我家的火炕扒了两次。金时龙社长也被打成‘朱德海的保皇派’，遭了不少罪。红卫兵在我和他的脖子上挂了大牌子以后，用解放牌汽车把我们拉到延吉市游街。黄顺玉也被打成了‘朱德海的保皇派’。我是不识字的文盲，不知道什么是黑材料，什么是‘保皇派’，更不知道我有什么罪。我只是跟别人说过朱德海是好人，他是没有领导架子的好干部。除了这几句话以外，我也没说过什么呀。他们给我脖子上挂了一个写着‘女资本家’、‘当权派’的大牌子到处游街，狠狠批斗。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女资本家’，什么是‘当权派’。那些年轻人像是丢了魂一样，上窜下跳，让我揭发朱德海书记的罪状。我顶撞他们说，我也想揭发他的罪状，可是没有，让我揭什么呀？这些家伙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打翻在地，乱踢我，乱踩我。当时，我的头发被一撮一撮地揪掉，还流了不少鼻血。他们骂我不揭发朱德海的罪状，还把我带到我的故乡发展村去游街批斗。那是个什么样的岁月呀，我到现在也搞不懂，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运动。不过我还算是幸运的，我只遭了两年罪。多亏有好多善良的人给我作证，给我写证实材料，我也就解放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朱德海书记的消息。他们把那么好的干部都逼成什么样子啦？后来听人们说，他在关内很远的地方去世了……”

## 去东方第一村

在中国的版图上，珲春既是盆地也是平原，而珲春市的敬信

一带却是湿地。延边有三处湿地。其中，敬信、防川一带的湿地面积最大，在中国也是湿地面积最大的地方之一。湿地的第一个特点是平原，第二个特点是资源丰富。这两个特点是水稻生产最基本的条件，也是天然的条件。

据珲春市副市长郑昌权介绍，珲春的水稻生产跟朱德海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德海派来水稻专家和技术员，把原本到6月才能插秧的传统耕作方法变革为5月下旬就能插秧。朱德海为珲春一带和敬信一带的图们江水利建设和水田开发立下了功勋。据《珲春市志》记载，1949年珲春市的水田面积是3957公顷。从那开始三年以后的1952年达到了8093公顷，四年以后的1956年达到了11280公顷。建国以后的七年之间扩大为建国初的3倍。

“珲春一带尤其是敬信一带的水稻生产，因受特殊气候的影响，必须到6月才能插秧。6月插秧的有利方面是，第一，可以避免5月末最后一次冰冻；第二，可以避免水稻开花时期在冷风中结粒。敬信一带的气候来看，每到这一季节一定刮起很大的风。所以，长期种水稻的老农一听说5月插秧就特别反感，说会把水稻糟蹋的。由于这种原因，虽然其他地区5月分基本都投入插秧，而珲春大约到了6月中旬才开始插秧，产量当然也不会很高。另一方面，珲春受海洋性气候的影响，无霜期比汪清地区和安图地区稍长，温度也高 $1^{\circ}\text{C}\sim 2^{\circ}\text{C}$ 。这也是固定在6月份插秧的原因。可是朱德海书记改革了这条‘种地铁规’。

朱德海书记听了老农对6月份插秧的解释以后，首先肯定了这是在长期的实践经验中得出的种田规律，但他又指出了两点不足：第一，不能获得高产量；第二，是对无霜期界限的认定。珲春地处东部，但毕竟也是延边地区，无霜期虽然差几天，但是大体上也差不多。朱德海书记倾听了老农的经验之谈并调查了解后，请来延边农学院的教授和崔竹松、吕根哲等水稻专家，终于解决

了这个问题。实行5月插秧后，果然提高了水稻产量，掀起了珲春地区水稻生产的大革命。建国以后，珲春在经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各乡的行政隶属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到1951年增加到21个乡，其中没有朱德海书记没去过的乡。中苏边境发生火灾，他急忙赶来；他乘橡皮船去防川，考察那里农业状况；珲春风大，来珲春指导营造防风林的也是他。1956年，延边因低温冷害，粮食生产受到了影响。受强劲的海风影响，珲春的粮食产量减产一半。这时，朱德海书记任命李羲一为珲春县委书记，并指示在风势大的春化、马滴达、马川子、杨泡、板石等地方营造防风林。珲春的防风林就是在那个时候根据朱德海书记的指示营造起来的。我在敬信工作的时候，那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朱德海书记的。每到一地方，朱德海书记都给当地留下了很多故事。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还能在乡下听到有关朱德海的故事。说实话，有这么大影响力的领导干部还真不多。”

听了郑昌权副市长的介绍以后，笔者先去的方是防川。到了防川，高春焕（50岁）书记带我见到了李振宇（71岁）和原防川书记的遗孀。

“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记得是在1964年4月柳絮飞扬的春天。有一天，一位头发花白的人带着随行人员（金东山）来到村里。那时，村里的书记是金太云。在金书记的陪同下，那人在村里走来走去，每遇到人总是询问什么。谁能想到那位头发花白的人就是朱德海书记。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朱德海书记。这一天，朱德海书记是乘坐敬信边防部队的橡皮船经圈河来到我们防川村的。那时候，图们江水流到洋馆坪方向又形成回旋倒流回去。没办法，每当过洋馆坪的时候不得不借用苏联的地段。朱德海书记是有身份的人，所以他不象我们，没有借苏联的道，而是乘部队的橡皮船来我村的。朱德海书记在我们防川村住了大约一个星

期，给我们做了不少事情。那一年，我们新开了5垧水田，也养了不少黄牛。朱德海书记在我们防川村搞了很多调查。他说，我们防川村虽然河里有很多鱼，可以捕鱼增加收入，但是没有太大的销路。把新鲜的活鱼运出去又没有运输条件，所以还是多养牛好。多亏朱德海书记的指点，我们防川村的牛比别的村子多得多。现在市里限制我们养牛了，说是要保护生态环境。朱德海书记到这里那一年，我23岁，不，24岁。我现在还记得朱德海书记说过的话。他说，延边没有哪一个村像我们防川村这样路上的牛粪这么多。”就跟敬信一带其他老人一样，李振宇老人说的是一种方言。这种方言叫“庆兴方言”，在咸镜道一带是最独特的，曾被称为“朝鲜中世纪语言”。

这一年，因接连不断的各种各样的会议，朱德海忙得脚打后脑勺。可是，无论再忙，有关农业的会议他必定参加。3月3日到8日，全州农业技术工作会议召开，朱德海参加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有关农业会议每年都要召开，朱德海从不缺席，连东盛人民公社东明大队召开的家畜评比会，他也参加。朱德海对农业的情感是任何人都无可比拟的。

李振宇老人说朱德海是4月中旬到防川村来的，这里有些误差，朱德海到防川村的时间应该是4月下旬。因为4月1日到20日，州委党校组织了州党政领导及部长、处长以上14名领导参加的第一届学习班。朱德海是这届学习班的组长，直接参加并指导了学习班的工作。无论工作有多忙，朱德海从不忽视学习，而是以身作则积极参加，所以学习期间不太可能到防川去。应该是4月下旬，朱德海带领刚刚赴任的农村工作部部长金东山去了防川。

这次到防川以后，朱德海从防川的地理人文环境着手，作了细致的调查了解。他虽然得到了因图们江渗入，去防川的路已被破坏的消息，但他还是坚持经过敬信去防川村。洋馆坪全村集体

迁移到敬信平原以后，来往防川村的人都要借道苏联。所以，上级曾做出决定，连防川村也一并集体迁移，但遭到了固守世代家园的防川村民的拒绝，防川村保留了下来。后来，省委和省政府也下达了保留防川村的指示。现在看来，当时省委和州委的决定是正确的。

“金部长，前面那座山叫张鼓峰。你听说过张鼓峰的历史吗？”凌晨，到图们江边散步的朱德海询问身后的金东山。

“我来之前，按照朱书记的指示，派人到延边大学图书馆去查了资料，不知朱书记满意不满意。”金东山说着，赶紧把一本小册子递给朱德海。那一年金东山38岁，没有学过历史。

“搞农业的干部能找到这样的资料，还是值得一看。”

朱德海坐在沙滩上聚精会神地看起来。图们江下游江边的早晨，隐隐刮起带沙的凉风，朱德海捋了捋白发，继续看资料。图们江刮起的风，不断地把沙子吹到沙滩上，在防川村西边堆起了小小的白沙丘，成为图们江下游独特的风景。

“从这本书上看，日军也不是苏军的对手。朱可夫元帅在内蒙古诺门罕曾跟日军打过一场硬仗。后来听说有人曾问朱可夫元帅，哪场战役最艰苦。他回答说在内蒙古诺门罕的那一场战役最艰苦。他的回答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人们都认为在苏德战争中莫斯科保卫战或者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最艰苦的战役，怎么会是内蒙古诺门罕的那场对日战争呢？年轻的时候读过不少文学方面的书，可是现在50多岁了，喜欢看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书了。金部长，工作再忙也要多读读政治、历史方面的书。作为干部，掌握的知识多了没有什么坏处。”

朱德海站起身拍了拍屁股，把小册子递给金东山。

“海边的风太凉，我们回去吧。”

“朱书记，我还没看过这本书呢，您就大概给我讲讲吧。”

朱德海边走边给金东山讲起了书上的内容：

1938年夏天，日本关东军东宁守备队破译了一份苏军电报。于是，驻朝鲜罗南的日军派打扮成朝鲜农民的侦察兵，带着望远镜和摄像机到张鼓峰去侦查。苏军在自己的控制区域内，开枪打死了侦察张鼓峰一带的日军摄影师。以此为导火线，苏日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其实，这是日军对苏军的武力侦察。在张鼓峰战争中，日军大败。防川村的朝鲜村民在那场战斗中也大受其害。战斗打响前后，日军强征妇女做饭，强迫村民运送日军尸体和伤员。隆隆的炮火声中，不少儿童和老人的耳朵被震聋，房屋也被战火烧尽。战斗一打响，在惊慌之中误把枕头当作孩子抱着跑出来的故事，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在张鼓峰战斗中，诞生了那首极大地鼓舞苏联红军战士冲向苏德战场的歌曲《喀秋莎》。

历史上防川的地理位置显得非常重要。1908年夏天，安重根同义会的义兵部队也曾路过防川村。朱德海的故乡俄罗斯远东地区（沿海州）乌苏里克斯（双城子）道别阿村离防川村也不远。从乌苏里克斯去朝鲜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海路，到100多公里外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乘船去朝鲜；另一条是陆地，也就是经防川去朝鲜。

在俄罗斯生活的时候，朱德海叫吴基燮。他八岁那年，父亲吴禹瑞被不明身份的人杀害。1918年10月，朱德海的母亲为了生计，领着3个小叔子和朱德海兄妹4人乘船到达罗津，再从罗津辗转回到了已经离开16年的丈夫的故乡会宁。这时的会宁不再像从前，人变得陌生了，人情也变得淡薄了。饥饿与寒冷使他们谁也顾不上谁。于是，两年后的1920年2月，朱德海跟着母亲和叔叔再度跨过图们江，翻越蛮子岭来到和龙县勇新水洞沟（今龙井市智新镇胜地村）定居。翌年，朱德海到和龙县公立第十四小学读书。这一年，他才十岁。

“岁月不饶人啊。我们常说的回忆，大概说的就是经常去想的意思吧。”

“啊？”

金东山不知道朱德海说的是什么意思，疑惑地看着他。

“没什么，是我在自说自话。金部长，你看，防川像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岛。如果图们江继续渗入洋馆坪的话，我们要向苏联借道的历史将会越来越长。回去以后，通过省政府再次请示外交部，要么照会苏方，要么得到哪怕是口头上的同意，解决交通问题。”

“如果是那样的话，暂时能够解决防川村的交通问题，可是根本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边防部队驻在防川，我们也不能因为交通问题再把防川村迁移到敬信去……”

“你说的对，既然部队驻在那里，我们不能再想把防川村迁移了。想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就得找出可行的方法。这也是找回领土的外交问题，相信中央和国家会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得等待上级的指示了。”

朱德海的这一设想 20 年后变成了现实。1982 年，珲春市政府分两期工程，在通向防川村的洋馆坪修筑了 800 余米的水坝，开辟了新的通道。1991 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到延边视察时再次扩建，并于第二年结束工程，成为通往防川村的唯一通道。

“金部长，你是负责农村工作的领导，这次到防川后有什么感想？”

“我想，图们江左岸地区的农村现实，大体上是半斤八两。但是防川却不同。地处图们江最上游的广坪，利用当地肥沃的土地条件建设了一个农场，可是防川地处图们江最下游，土地贫瘠，在这里搞农场建设是不现实的。虽然沼泽多，水源丰富，但不能养鱼……”金东山看了看朱德海，没有把话说完。

“这里就我们俩，有什么顾忌的呀，你就大胆说吧。”

“说实话，我到防川以后看见最多的就是遍地的牛粪。延边的任何一个村庄都看不到像防川这样随地都是牛粪的村庄，我这可是头一次看到啊。如果问防川有什么特别的，我想，这就是防川的特点吧。要是在中苏两国边境线的铁丝网上做文章的话……”

“呵呵……瞧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不过，你还真看出了问题。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跟平顶山农场一样，也在这里搞一个放牧饲养基地？铁丝网就算是圈牛的界限。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从防川的地理环境来看，三面都围着铁丝网，一面被图们江水包围着，成了一个陆地上的岛屿。汪清县西崴子苍安大队三面也被水包围，那里的自然条件很适合饲养黄牛。我发现防川的自然条件比他们更好。”

“您要下乡住几天的话，肯定是带着设想来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10年以前，您为了开垦安图县万宝公社大甸子广阔的水田，准备大量移民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无霜期连100天都不到的地方怎么能种水稻？可是，现在不是种得挺好的吗？农民育种家柳昌银去年还成功地培育了‘万宝11号’。如果没有万宝的水田，也就不会有柳昌银。”

万宝大甸子农场是指1952年9月23日朱德海委托州农业处，并由安图县负责在万宝区大甸子村建设的大型集体农场，是延边第一个以种水稻为主的集体农场。那时，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刚刚成立不久。区主席朱德海三天两头去万宝乡，每次往返都要花两天时间。经过精心筹划，终于建立了农场。

“这件事已经过10多年了。如果说在工作上干部是决定因素，那么在农业生产上关键的因素是农业技师。也就是说，人才是第一位的，人是第一位的。国家也好，我们延边也好，还没有从农耕社会中摆脱出来，农业相对落后。我们的农业就是秋天留种，春天播种……在漫长的岁月中就这么反反复复地重复着，没有划

时代的发展。几千年前使用的铁铧犁至今还在使用，还得靠牛拉着犁铧翻垄、播种、培土。我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时，曾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家是拖拉机在广阔的田野上奔驰着翻地，可是我们还在唱着祖先的‘农夫一生哟无穷尽’。我想这是一种危机。所以说，农业要发展，人才打先锋，政策要跟上。早上的风的确有点凉，我们赶紧回去吃早饭，再去找村里的老农唠唠。”

这天早晨，金太云（原防川村党支部书记）的遗孀路过时，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岁月无情呀，过去的事情我都忘得差不多了，很多都想不起来了……不过，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有两个人看着路上随处可见的牛粪说起了黄牛。朱德海书记在防川期间，召开社员大会，让我们讨论饲养黄牛和开水田的事情。现在我们村的5垧水田，就是那个时候开垦出来的。我们村是延边黄牛最多的生产队。我们防川历来种的都是稗子，吃的也是稗子饭，根本不会种水田。后来，吃上雪白的大米饭，我们才明白朱德海书记为什么要我们种水田。”

李振宇老人说的话是对的。19世纪中叶被朝鲜移民称为“黑木子”、“洋馆坪”的地方，到了20世纪初，以“防川”的名字为世人所知。防川成为抗日抵抗组织和独立军进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必经之路。那时的防川，江边和平原上柳树成荫，形成了自然的防水河堤，“防川”也由此得名。在江边平原，朝鲜边民开垦的火田地里都是青青的稗子，这里的农民只熟悉种稗子、大麦、土豆，并以此为生。

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苏关系变得紧张。因图们江水渗入不得不借苏联的道路进出的防川村，着实成为最紧张的前沿阵地。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是当代创造和储存物资财富的手段和方法。过去防川村民全靠5公顷水田和70公顷旱田过日子。如今他们完全改变了只靠种地为生的传统生产方式，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半个世纪以前朱德海到防川预言过的时代终于来到了。如今防川村有120名朝鲜族农民，他们固守着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一年下来，靠劳务输出和渔业获得的人均纯收入达到好几万元。防川村的男劳力一年四季在图们江捕鱼，春天是鲑鱼，夏天是梭鱼和鳟鱼，秋天是鲢鱼，冬天是鳗鱼和鲈鱼，销路都很好。现在防川村村户户都有渔业用船，现代渔具应有尽有。

村里的土路已经变成了水泥路，自来水、街道、绿化、路灯等基本建设也已竣工，成为了现代的文化村。特别是朝鲜民族的房屋风格和现代建筑风格相谐调，仿佛是一幅五彩缤纷的水彩画。防川村成为文化旅游村后，在东海前沿的哨所成了必经的旅游景点，社区公园、吴大澂纪念碑、东海哨所，这些一并成为今天的旅游路线。防川村向世人发出了一个灿烂的信号，她是飞向未来的文明村，也将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第一村。

这就是50年前朱德海哼唱着《在故乡山坡》时设想的农村风貌。

“……虽然因为饲养黄牛会破坏山林和沙滩，政府限制黄牛数量，但是当年农村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饲养黄牛。朱德海书记也喜欢钓鱼。有一天，他在村后的池子里钓鱼，引来不少村民围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钓鱼。那天他钓了很多鱼，然后在大锅里放进辣椒酱和大米，熬了一大锅鱼粥。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鱼粥，而且知道了鱼还有这样的吃法。那天，朱德海书记让所有在旁边围观的人都尝了尝他做的鱼粥。嗨，别提那鱼粥有多好吃了。那时，朱德海书记还跟我们说，延边没有像防川这样的渔乡，等到过些年家家生活富裕了，我们防川村光靠捕鱼也能把日子过

得很好很美。但是，我们当时都不信他说的话，只以为他是给我们这些没见过大世面的农民说好听的呢，还偷偷地笑他。那时候，我们只以为农民怎么能不种粮不种地，天天到河里去捕鱼，顿顿吃鱼汤过日子呢？可是，今天应验了他当时说的话。你说，他怎么就说得那么准呢？朱德海书记来我们防川村三年以后，这里也发生了帮派斗争。他们把朱德海书记住过的那家夫妇斗得够呛，你说他们有什么罪呀？他们只是给朱德海书记提供了住宿，给他做了饭嘛。还有，朱德海书记钓鱼的鱼竿也成了批斗的对象。”

被称为“东方第一村”、“大陆之岛”的防川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能幸免。

朱德海喜欢打猎和钓鱼，也喜欢跳舞、打扑克、下象棋。这都是正当的娱乐活动和休息方式。朱德海的长女吴英彩回忆说：

“听母亲（金永顺）说，凡是男人玩的游戏和娱乐，父亲都玩得很好。每年春节里，父亲熬夜玩扑克都成了习惯，年年如此。跟父亲一起玩扑克的有姚昕副书记、裴克部长，还有崔采等人。崔采调省委去以后，又来一个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可我不认识。还有，卢基舜博士下棋下得很好，他和父亲下象棋的时候，就像两个天真的孩子一样。父亲打猎打得也很好。”

我们的祖先有个训导，男儿要懂得“六礼”。“六礼”是古代周国定下的教育内容，当时称“六礼”、“六德”、“六行”。“六礼”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术。“礼”指礼容；“乐”指音乐；“射”指弓术；“御”指马术；“书”指书道；“数”指数学。精通“六礼”的人称为“能者”。可以说朱德海就是个能者。

但是，在采访的时候，很多老干部对朱德海的打猎、钓鱼等爱好表示沉默，好像是担心说了这些会影响朱德海的形象和品德。在极“左”思潮下，禁止革命家、政治家、教育家们有这种爱好和闲情逸致。这不能说不是悲哀。怪不得在“文化大革命”中，

朱德海打猎成了一条“罪状”，钓鱼又多了一条“罪状”。延边的党政首长不应该打猎，不应该钓鱼，这无疑是极端的社会思潮制造出的不幸。

朱德海在防川的七天，制定了黄牛饲养和新开水田，以及灌溉问题的方案，然后乘坐军用橡皮船回到敬信。到了敬信，他又马不停蹄地到马川子五二村看了新盖的牛舍。五二村是朱德海在“社教”工作中蹲过点的生产队。

这年7月12日至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和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来延边视察工作。朱德海陪同他们参观了延边大学、延边医学院、龙井果树农场，视察了延边的教育、工业、农业等方面的基础工作和主要设施。3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来到延边，在朱德海的陪同下视察了驻军某部队、长白山天池和中朝、中苏边境。罗瑞卿大将来延边的时候，赠送给朱德海一辆苏制“胜利”牌轿车。朱德海把这辆轿车转送给延边大学，作为金裕勋、郑奎昌等老教授们上下班的专用车。

## 第6章 民族工业

### “胶鞋的诞生”

1949年10月至195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一时期，国家要恢复在解放战争中受创伤的经济，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中国式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在延边，用铁锤砸铁砧仅仅能生产出镰刀锄头的铁匠铺需要重新整修；传来刺耳刨子声的木工厂需要重新整修；日帝时期留下来的石砚造纸厂、开山屯纤维浆厂、天宝山铜矿和老头沟铜矿都需要早日恢复开工。

特别是在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期间，延边集中主要力量加强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需要在1953年动工的重要项目为114个，其中全部或者是部分开工的项目为36个。

石砚造纸厂是朱德海蹲点的企业。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要结束的1957年，石砚造纸厂的生产量超过了伪满时期最高生产量的11倍。从1955年开始，石砚造纸厂生产的新闻纸已经开始出口，

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了认可。该厂每年向国家上缴 1500 万元利润，大大超过了当时全延边向国家交付农业税的总额。天宝山铜矿虽然因为遭到严重破坏，全面复工受到了影响，但是经过几年的恢复和扩建工作，到 1955 年矿石粉年生产量比伪满时期的最高生产量增加 4 到 5 倍，在东北地区的工业建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时期，延边的能源、冶金、机械、化学、森林、建材、纺织、食品等工业得到全面的恢复并开始出现新的景象。尤其是民族用品工业在延边工业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与朱德海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朱德海热心于工业，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为了保障朝鲜军政学校后勤供应，他办过商店，通过崔采搞过农产品贸易。后来在哈尔滨第 3 支队任政委时，为支队的后勤保障办起了“复兴”贸易公司。从延安到哈尔滨第 3 支队期间，朱德海对工业生产的认识还只是做生意的水平，但是对他来说，这也是对工业萌发意识的时期。在沈阳，朱德海接收“三昌胶鞋厂”以后，开始了他的工业设想。1930 年前后，朝鲜人罗京锡在沈阳开办了“三昌胶鞋厂”。解放战争时期，很多工厂面临破产关门，三昌胶鞋厂也停了产。1948 年 11 月 2 日，沈阳解放的时候，东北行政委员会接收管理了三昌胶鞋厂。当时，朱德海担任民族事务处处长，在哈尔滨组织担架队支援沈阳解放战争。为了解决居住在东北境内朝鲜族穿胶鞋的问题，朱德海以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处的名义请示，把位于沈阳市北市区 3 径路的三昌胶鞋厂作为民族企业划归民族事务处管辖，并很快获得了批准。朱德海任命朝鲜义勇军出身的金明为该厂第一任厂长。

三昌胶鞋厂名义上是工厂，但厂房破乱不堪，几乎是废墟，只有几间东倒西歪的旧房子和几台棱角都磨损的机器。但是，为了满足朝鲜族需要，重新建设胶鞋厂的消息在沈阳市一传开，朝

鲜族高兴地奔走相告，有 100 多人自愿到工厂来干活，还把他们使用过的减速器、计算器、压水机等机械设备和技术资料无偿捐献给工厂。

1949 年 4 月，朱德海到达延边。他派朝鲜义勇军出身的尹龙、韩泽柱等 11 名干部到工厂去，任命尹龙为第二任厂长，韩泽柱任指导员。干部和工人们齐心协力，在最快的时间内建设了 1000 余平方米的厂房，安装了机器设备。当时，生产一只鞋从设计图开始要经过 100 多个技术程序。当他们的手里拿到用自己的双手亲自生产出来的胶鞋时，高兴得相互拥抱，互相祝贺。

一个不起眼的工厂生产出了优质的胶皮鞋，于是他们把“工农胶鞋厂”的匾额挂在墙上，还在产品上贴了“工农牌”的商标。1949 年 8 月 15 日，胶鞋正式投入生产。朱德海接到沈阳工农胶鞋厂正式投入生产的消息，立即找来申德宽。申德宽也是第 3 支队出身，曾任第 3 支队供给处股长、处长，帮助朱德海保障了第 3 支队的后勤。

“现在你动身去沈阳，代替尹龙同志管理工农胶鞋厂。他已经知道你去替他，正等着你呢。本来打算派青年部和组织部的同志跟你一起去，可是你也看到了，地委和公署的干部太缺，所以不能派人了，你就体谅一下吧。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现在是非常时期，有能力的干部就要多吃一些工作了。”朱德海让申德宽坐在自己身边，“你要记住，目前全国解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新中国的建立就在眼前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延边专员公署管辖的工农胶鞋厂不能继续留在沈阳。万一东北局把工厂交给沈阳的话，作为我们民族工业基础的胶鞋厂就会从我们手中飞走。我说的意思你明白吗？也许他们会说我是地方本位主义，但我已经准备好了，就让他们说好了。我就是要把胶鞋厂搬到延边来。所以，你这次去沈阳，一边抓生产，一边提前做好搬厂的准备。现在初步设想

明年就搬过来。明年结束战争，新中国就成立了。国内形势安定以后，经济建设就得打头阵了。”

“我去了，尹厂长怎么办？”

“组织上会另有安排的，有关人事问题你就不要再打听了。就我们现在的财力只能在老头沟找地皮，可是暂时还没有建厂房的余力。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创造机会盖厂房。你就按照我们这里的指示工作吧。”

“我知道了。”

申德宽去沈阳任厂长的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10月1日，接到朱德海的指示以后，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传达了延边专员公署的决定。

“延边地委和延边专员公署决定把工农胶鞋厂搬迁到吉林省延吉县老头沟镇。朱德海书记指示所有与工厂同患难共命运的工人一个也不要落下，都请到延边来，还有家属也都一起请来。延边是朝鲜民族聚居的地方，我们都要一起去延边，在延边生产朝鲜民族喜欢穿的胶鞋。”

申德宽一鼓动，所有职工都响应起来。190余名工人一起拆卸机器，装上货车，并与1950年11月初向延边出发。

到了老头沟镇，把解放前地主的宅子维修以后当了厂房，技术员在个人家的小饭桌上绘起图纸来。整个厂里只有一辆马车，工人就用背来背建筑需要的小石子、沙子和石头。7吨重的锅炉从火车站运到厂址时，大家交替铺上铁管，把缆绳系在锅炉上拽拉，一直拉了8里地。这一时期，朱德海多次到老头沟镇慰问工人，解决他们遇到的实际困难。经过全体工人的团结一致，顽强奋斗，仅用三个月时间，延边第一座橡胶厂在老头沟镇诞生了。

1952年9月3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成立。工农橡胶厂由老头沟镇搬到图们市，与图们橡胶厂合并后改称“延边橡胶厂”。

即使是穿厌了也不会裂开的结实的黑胶鞋、男人偏爱的白色宽胶鞋、鞋尖儿上带两条白线条的天蓝色胶鞋，都是这样问世的。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对胶鞋的记忆仍然十分清晰。

## 延边的纤维纸浆

1955年1月22日《延边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过去一年来，延边工业进一步壮大》的报道。现在原文引用如下：

“延边国营企业及地方国营工厂超额落实了1954年国家生产计划111.35%，比1953年实际完成量又提高了13%。12个国营工业中，有2个森林工业局、2个造纸厂（石砚、开山屯）、1个矿山，分别比原计划超额完成了11.9%、11.5%和192%。不但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直属地方国营工厂延边煤矿、橡胶厂、造纸厂、制革厂和纺织厂完成了计划，而且延吉、安图、汪清等县营工厂、企业、基本建设部门也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在过去的一年里，各企业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开展了劳动竞赛，学习和普及了苏联的先进经验，普及了我国的先进经验，采纳了合理化建议，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新产品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就。生产的新产品和改进规格的主要产品达144种。过去的一年里，延边各企业（电业、天宝山铜矿、珲春县企业除外）提出合理化建议共2718件，其中被采纳和落实的有1466件。仅国营石砚造纸厂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就有402件，采纳落实的有204件，大部分都是有关解决生产方面的重要问题。”

这是一篇统计式的报道，也可以说是当时工业经济形势的统计数据，标志着延边工业已进入初步发展阶段。在这篇报道中提到的造纸厂指石砚造纸厂和开山屯纸浆厂。

石砚造纸厂是国家重点企业之一，是一个大型纸浆厂。它的前身是1936年伪满时期建立的“东洋纸浆株式会社石砚手工业工场”。1946年，东北人民政府军工部《东北日报社》接管该厂后，隶属关系和名称先后改为“东北人民政府军工部第六工厂”和“东北日报社石砚造纸厂”。从1949年起进行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建设时期，该厂被划入国家生产计划之内，改称为“东北第一造纸厂”。当时，工厂职工有239人，生产设备有2台蒸解机，2台磨木机，2台切纸机，一年最多生产能用几百辆汽车运输的产品。当年日帝败退的时候，东北铁路、钢铁工业和造纸业中达80%的设备被运往日本或遭到破坏。日本人还叫嚣说工厂和生产绝对不可能得到恢复。

朱德海到延边以后，视察了很多工业设备，其中也包括石砚造纸厂和开山屯纸浆厂。4月初，海兰江畔的残雪还未消融，初春的风还很凛冽。朱德海与时任延边专员公署专员的文正一（1949年3月至7月）商议以后，在公署建设科科长赵光鉴（汉族）的安排下来到了石砚造纸厂。他们沿着嘎呀河上游步行，远远就看见了耸立苍空冒着滚滚黑烟的烟囱。这是造纸厂特有的烟囱，也是工厂运行的标志。

汪清县委书记王录和副书记田仁永、县长南明学已在石砚造纸厂等候朱德海一行。除了王录以外，田仁永和南明学都是第一次跟朱德海见面。当时朱德海虽然受吉林省委的派遣到了延边，但是还没有正式下发文件，只是先到延边地委主持日常工作。对组织人事制度很敏感的县级干部们都认为朱德海担任延边党政一把手只是时间问题。5月22日，朱德海被任命为地委书记，两个月后的7月3日代替文正一担任延边专员公署专员。5月，朱德海上任的时候，王录跟文正一、崔采、林民镐、田仁永等8名干部同时被任命为副书记。此后，田仁永担任汪清县委书记。从这

个时候起，朱德海和田仁永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被后人传为佳话。“文化大革命”中，朱德海深受迫害的时候，田仁永自始至终理直气壮地坚持说朱德海是好人，保护朱德海，为朱德海辩护。

当时，石砚隶属于汪清县。在县干部的陪同下，朱德海在工厂里转了一圈，然后就在现场召开座谈会。朱德海的现场办公方式，是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已经形成的。

“来之前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所以，看了一圈，觉得没什么可惊讶的。虽然不能大量投入生产，但没有停产本身就很不起了。去年开始，我在哈尔滨、沈阳、长春等东北大城市看到了破坏程度相当严重的工厂，当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这时，南明学请朱德海到工厂保卫室坐一坐，朱德海摇摇手继续说：

“现在整个东北都在进行艰难的恢复工作。我看了今年东北局下发的资料，东北的铁矿石储藏量大约 38 亿吨，煤炭储藏量也超过 200 亿吨。生铁产量占全国的 87%，钢铁产量占全国的 90%。东北工业基地在全国是最牢固的。但是日帝败亡的时候，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再加上苏联老大哥进入东北后掠夺走了不少东西。鞍山钢铁厂年产量 200 万吨的设备被他们拆卸运走，现在只能生产 40 万吨。他们还拆走了 80 个工厂的设备和丰满水力发电站、抚顺火力发电站在内的发电、铁路设备。由此，我们丧失了 70% 的电力、90% 的煤炭、50 ~ 100% 的钢铁生产能力。一句话，东北的形式很严峻。相比之下，石砚造纸厂还算是可以的。”

说到这里，朱德海暂停了一会儿，拿出了一支烟点上后，接着说：

“虽然我们延边的木材、煤炭被掠夺走了，但是光复以后，我们接收了天宝山铜矿、敦化军需厂、老头沟煤矿在内的铁路、邮电、金融及中小型企业 89 个，而且已经以国营体制正在运行或恢

复之中。其中，石砚造纸厂和开山屯纸浆厂是延边最大的中型企业，要尽快恢复并扩大生产量。1946年东北日报社派遣干部接收经营了这个厂，因此现在石砚造纸厂还保留着这样的设备和生产能力，真算是幸运的。”

朱德海又拿出一支烟，南明学赶紧把火递过去。朱德海猛吸了一口，嘴里冒出一股青烟。王录和田仁永听着朱德海说出来的那些复杂的工业数据，连连点头。

“今天说是开会，其实是座谈会。所以，大家把心里想的都谈一谈。今天汪清县党政同志都到了场，你们对石砚造纸厂的情况比我了解得多。我们应该从哪儿开始抓，大家还有什么好方案，不要介意，都讲出来吧。”

“石砚隶属于汪清县行政管辖，但是石砚造纸厂是延边专员公署直接管辖的。”南明学又把球传回给了朱德海。

“南县长说得对，论隶属关系属专员公署直接管辖，在人事问题上我们不好介入。汪清县行政管辖区域内有这么个工厂，也不能说我们一点责任都没有。我们需要早日扩大工厂，扩大生产量。”田仁永说得很大胆，而且话里有话。

“田副书记说的话我理解，谁都不愿意干那些背着弟媳妇过河的事情。革命形势的变化一日千里，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到时候，我们首先碰到的困难就是缺乏经济型、管理型的干部。现在，经济型的干部同样很难找到。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困难就说放弃。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军队里涌现出了很多骁勇善战的干部。他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积累了经验。他们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学过军事理论。你们也许会说，延安出身的干部连什么是经济模式都不懂，只知道一味蛮干。说得也对，军事和经济毕竟是两个概念，不能以管理军队的模式来管理经济。我不太懂经济，但我也不能把它推给别人去做。刚才视察工厂，

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田仁永副书记提出的工厂干部任用问题。看来，干部是决定因素，确实是真理。”

朱德海视察石砚造纸厂和开山屯纸浆厂以后，任命金仁焕为石砚造纸厂厂长，刘东虎为开山屯纸浆厂厂长。金仁焕和刘东虎都是哈尔滨第3支队军官出身，是跟随朱德海到延边的革命干部。

国营工业、交通、邮电、贸易等企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从经济上、物资上、技术上给地方工业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当时，恢复生产的企业数量并不多。但是，正是这些企业发展成为延边地方工业的基础和延边国民经济的支柱。石砚造纸厂在我国成为最早恢复生产，产量和质量最好的企业之一。金仁焕任厂长以后，把各种纸张和原料生产水平恢复到伪满时期的最高水平，第二年开始投入大量生产。开山屯纸浆厂也扩大了工厂规模，产量大幅度增加，成为延边的骄傲。此外，汪清、天桥岭、八家子、和龙、敦化、大石头、黄泥河等森林工业企业生产了大量的木材，有力地支援了全国各地的工业、交通建设。1949年，延边的工业总产额达6816万元，在省内排在吉林市后面的第二位。

### “实事求是”不是口号

“朱德海书记的工作作风大胆而又实事求是。正因为这种工作作风，1958年差一点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而丢官。大跃进时期，也因为实话实说，我们常常为他捏一把汗。那时候，在中国说实话、真话的后果是很残酷的。彭德怀元帅也是因为说了真话才遭厄运。朱德海书记来到延边以后，在石砚造纸厂蹲点，工厂才得以运转，逐渐成为中国有名的中型造纸企业。但是，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期，石砚造纸厂也不得不卷入了大炼钢铁的

洪流里。有一天，朱德海得知这一消息后来到石砚造纸厂。他说，造纸厂为什么不务正业，热衷于炼铁？说这种话，在今天也许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可在当时很可能会结束一个人的政治生命。”

原州政协副主席金圣友经历过这一历史时期，是位有发言权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无缘无故挨批斗，还被赶到“五七干校”当养猪饲养员，接受审查，劳动改造五年，1971年才复职。直到今天，他也不知道自己当时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如果说有“罪”，那也只不过是阻止了红卫兵串联，说了几句不顺耳的话。

“我们党从建党时期开始，就强调发挥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可是说起来容易，落实到实际行动就难了。现在还存在着‘左’倾思想影响，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经常发生冲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左’倾思想完全不是同一类型……在民族问题上，朱德海书记就因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曾经受到过诽谤，差一点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而罢免职务。‘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因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蒙受冤屈。

“那是在和龙县委书记处工作时候发生的事情。1960年春，崇善公社广坪农场有个中国小伙子与对面朝鲜的姑娘产生了爱情。你到那里也看过，广坪位于图们江上游，说是隔着一条江，其实就像一条乡村的小溪水，所以这里的人几乎没有国籍概念，深夜还互相串门。青春男女一旦有了爱情就想结婚。果然，他们连结婚的日期都商量好了。但是再怎么样，毕竟国境分明，国籍不同，不能说结婚就结婚。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个小伙子就偷偷过河去了朝鲜。当时朝鲜的情形比我们中国好一些，所以偷渡去朝鲜如同传染病一样流行。不仅是图们江，听说鸭绿江那边偷渡去朝鲜的人也不少。接到崇善偷渡事件的报告，我立即到崇善调查情况，当夜把调查报告送到了州委办公室。州委副书记姚昕把报

告转发给各县市，也抄送了吉林省委办公室。省委接到报告后下达指示，要我们以中共延边州委正式文件的形式再向吉林省委和国务院报告。看来事情闹大了，姚昕副书记和秘书长孙盛春、农村工作部孙培良一起来到和龙。我向他们作了详细报告，并跟他们一起去了崇善乡。到了以后，我们发现事态比我们想象得更严重。崇善公社还有其他青年偷渡去了朝鲜，而且我们还发现，偷渡的不仅是图们江沿江一带的村民，还有延边其他各县市的人，其中甚至有个别党员和国家干部，还有知识阶层的人。于是，国务院调查组和吉林省委联合工作组先后来到了和龙。朱德海书记也跟他们一起来了。那天，我坐朱德海书记的专车又去了崇善。一路上，朱德海书记再次向我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当时，朱德海书记什么话也没说，表情严肃，沉思着什么……”

5月初，如屏风围起的军舰山脚下，山杏花盛开。车驶进村里，一股熬酱油的香味扑鼻而来。

“呵，熬酱油的味道真不错。瞧，院子里盛开着杏花，树下母鸡还领着一群小鸡咕咕地跑，真是一派和平景象啊。”

去崇善的路上，朱德海听了金圣友的详细汇报后，心情很沉重。当车驶过军舰山的时候，他才和颜悦色地让司机减慢速度。

朱德海对农村的情结不是在书里学来的，而是在生活中深深烙在心里的。

“要不是事情这么紧迫，真想到村里去喝它一碗啊，呵呵，要是刚磨出来的水豆腐拌上新熬的酱油，那就更有味道了……”

听了朱德海的话，司机和金圣友都偷偷笑了起来。他们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位喜欢乡村酱油和豆腐的州委书记。

“从苏联莫斯科到延安这段时间，知道我最想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杏花盛开的春天，尽情地尝尝刚熬出来的酱油。在水洞沟（胜

地村)生活的时候,我母亲一定会在杏花盛开的季节熬酱油,每次我都要喝上一瓢。不是说吃东西要符合自己的口味吗……”

车在崇善公社平房前停下。公社(镇)的负责人和边防部队、边防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向调查组和朱德海书记汇报了案情。听完汇报后,朱德海默默无语,静静地听着调查组成员的发言。最后,他表情凝重地说:

“首先,从行为本身来看,越境就是非法,所以对事情性质的再解释、再判断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们既可以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也可以从边防住民的角度去思考。农民是现实主义者,考虑和贪图眼前的利益,这对农民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上级派来的调查组同志们,你们也已经看到了,眼前图们江对面的朝鲜盖了新住房、新校舍,实行义务教育,国家免费发给学生包括鞋帽在内的学生制服和一切学习用品。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怎么会不动心呢?”

听到朱德海这么说,金圣友一行人紧张得手里捏了一把汗,大气都不敢出。只有朱德海才敢于在上级面前有胆量实话实说。

“延边和朝鲜有特殊的历史原因,现在延边地区朝鲜侨民很多,这是事实。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12月29日,延边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吉林省政府的指示,动员各县的失业者和土地不足的农民去朝鲜,支援朝鲜的经济建设。从那时候到现在,延边一共有1299户、4222个工人和农民,先后分11次去了朝鲜。既然延边有这样的历史和背景,所以我认为,在把这次非法越境案件以民族化、政治化的问题加以惩办以前,先要稳定边境住民。这就需要提出措施,讲究方法。”

朱德海停下说话看了一下在场的人。其实,朱德海平时下乡的时候,对图们江左岸边民的穷困生活早就有所了解,也想过解决的办法。

“首先，我们要改善住房。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这里边防的居民住房条件很差，环境恶劣，经济状况也很差。朝鲜民族历来在文化教育上打先锋，有着优良的传统美德，为了让子女上学，他们宁肯卖掉耕牛来给子女筹措学费。所以，我们还要改变这里学校的条件。等回去以后，我们将召开党委会专门研究，拿出具体的措施。在此之前，我们希望国务院为边防建设专项投资。对这个问题，我们回去以后也会另行报告。”

调查组回去以后的第二年，国家民委每年都为边防建设投入了几十万元专项经费，还为崇善公社改善了农民住宅和学校。

“……自从朱德海书记来延边以后，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打下了基础。在民族问题上，朱德海书记有自己的主见，实事求是地做了许多事情。我也知道朱德海书记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资料很多，你们也了解了不少。其实那个时期，朱德海书记最大的功劳就是解决了朝鲜人的国籍问题。光复以后，国民党政府把中国的朝鲜人视为外国人，委托朝鲜临时政府组织东北侨民会，代替国民党政府管理朝鲜人。当时，社会也普遍认为朝鲜人是从朝鲜避难到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朱德海书记虽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在延安时期曾以朝鲜人革命家的身份做工作。光复以后的朝鲜义勇军，在一个时期也被视为是一支外国人的部队。当时的朝鲜人习惯上也把自己看做是外国人。东北农村开展土改以后，朝鲜人的问题凸显出来，因为外国人不能拥有土地所有权。从那开始，朱德海书记坚决主张应该认定中国的朝鲜人是中国的公民。他的理由很简单，朝鲜人从朝鲜半岛迁移到中国开荒垦地，保卫和建设了这片土地，在东北种植水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作用，而且未来东北的发展一定跟朝鲜人的努力分不开，这些都是他堂堂正正的理由。于是，在土地分配中，我党对朝鲜人和中国人给予了同等的待遇。建国后，对朝鲜人的国籍有几种观点。有的人

认为‘无产阶级的祖国是苏联，民族的祖国是朝鲜，现实的祖国是中国’，提出了‘多祖国论’。每当这时，朱德海就指出，从血缘上看朝鲜半岛是朝鲜人的祖国，从政治上看中国是朝鲜人的祖国。基于这种观点，他主张居住在中国的朝鲜人改称为朝鲜族，跟中国其他的少数民族一样享受同等的权利。其实践的结果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诞生并存在至今。”

延边朝鲜族从迁移来的那一刻起，因地理和历史的特殊原因，家庭成员和亲戚隔着图们江过着“隔江千里”的离散家族生活。家族的离别和解体不仅是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鉴于这一现实，朱德海于1955年向东北公安部建议，由当地边防派出所给朝鲜族发放边境通行证。接受延边地委的建议后，东北公安部和国家公安部于第二年同朝鲜内务省协议后，在图们江沿岸的左岸地区设了5个通商口，后来又增加到16个。从此，朝鲜族可以当天办理通行证来往朝鲜。

经历过这一历史时期的图们市月晴乡石建村的董胜权（67岁）说：

“50年代中期，我们在石建村边防部队办理通行证后，经‘石建村海关’乘坐渡船去朝鲜。那时，这里的人都说是朱德海书记让我们办理通行证来往朝鲜的。生活在延边的人，谁家朝鲜没有亲戚？那时我父亲也常去朝鲜。有一次，我父亲还从朝鲜偷偷地把铜勺藏在衣服兜里带了回来。那时，边防检查不是很严。光复后，中国边民随便来往于朝鲜，走私也不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石建村还组织足球队去朝鲜进行比赛。我记得那是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以后，可能是1953年吧。”

1953年，因各种原因，生活在延边的侨民达到了10865名。为了明确他们的国籍，6月25日由朱德海和董玉昆、崔采等领导，代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向吉林省人民政府递交了关于确定中国国

籍和朝鲜侨民的意见书。已故作家柳燃山先生在《朱德海——为朝鲜族生活播撒种子的人》一书中写道：

……1956年7月2日，朱德海以地委的名义向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刘格平副部长提出，要求把在中国具有朝鲜国籍的人改为中国朝鲜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东北公安部关于从朝鲜来中国的朝鲜人一律划为朝侨的有关国籍问题的规定，使得不少朝鲜族家庭里出现了中国国籍和朝鲜国籍同时存在的现象。在东北生活过的人去朝鲜上学，因探亲访问或因病返回中国的人，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后来根据中央命令去朝鲜参加朝鲜人民军，战争结束后回中国的人，全都成了朝鲜侨民。其中，也有原为中共党员，后来去朝鲜加入朝鲜劳动党的人。在延边，从朝鲜人民军回国的人中，小队长以上的干部就有1200余人。可是他们的国籍没有得到解决，党籍也成了遗留问题。这些问题原来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由于开展反右派斗争，朱德海的努力都成了泡影。

朱德海为了解决这些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所做的努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利用为蛊惑社会的“地方民族主义”罪证。金圣友就曾为此而发出这样的慨叹：

“……对‘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评价，至今我还不清楚。因为没有先例呀。当时，经朱德海书记努力争取过来的国家民委对边疆地区的投资也中断了。大跃进时期也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因极‘左’路线的影响，延边的工业自不必说，农业也大步倒退。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1957年，延边的粮食产量是21 000吨，大跃进开始后就极速下滑，三年后的1960年，不得不花802万元从外地购买粮食。那时802万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面对这种现实，朱德海书记常叹息不止，说这是对人民的犯罪。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朱德海下乡时极力反对在农村一大

帮人马一起下地劳动。朱德海书记常说，‘干不干活一样吃饭的思想要不得。这种平均主义会使农民变得懒惰，干活不出效率。’1964年，朱德海书记在汪清县西崴子第九生产队蹲点时，总结了实行包工到组，社员家庭承包三年不变的生产责任制经验，并制定了社员口粮按劳分配加照顾分配的方法和把水田、自留地承包给社员的方法。这些经验和措施，经省委的批准转达到州内各县市。但是，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化为乌有。真是让人痛心……”

原延边电视台台长金熙宽说：“……周总理来延边的时候，朱德海在宾馆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在一旁听他汇报的其他党政领导干部都赞叹不已。朱德海书记事先并没有拟写汇报提纲，却把延边工业、农业的数据如数家珍般说得极为流畅。周总理总管着国家的生计，特别偏爱那些敢于实践的行政领导和实事求是的干部，因此，他称赞朱德海是工作有成的领导干部并不是偶然的。为了延边的经济建设，朱德海亲力亲为的实例很多，说这是朱德海的功劳毫不言过其实。”

## 第7章 朱德海和文化

### 朱德海的文化年表

金学铁<sup>1)</sup>的文集《太行山麓》里，有一篇题为《朱德海年表》的文章，以其特有的幽默笔触写出了朱德海真实的生活画面：

“朱德海与崔采、裴克<sup>2)</sup>等人，聚集在延边贝多斐俱乐部——反动文人金学铁家里摆了100多次酒宴，策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这是在噩梦般的岁月里，延吉市各条街道贴出的传单——铅字化的诽谤。这也是极为熟悉的“朱德海120条罪状”之中的一

---

1) 金学铁，原名洪性杰。1916年出生于咸镜南道元山，黄埔军官学校毕业。1938年朝鲜义勇队创立时队员，在胡家庄战斗中受伤，后来在日本长崎监狱服刑，光复后回朝鲜参加朝鲜独立同盟，并开始创作小说。1950年到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因《二十世纪神话》遭受迫害，在监狱服刑10年。留下了长篇小说《激情时代》，《说吧，海兰江》等多部著作。

2) 裴克，1946年起先后担任吉林军政大学第4队政委、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土改工作队队长兼区委书记；1949年起先后担任延边州委党校教育长、延边专员公署秘书处主任、延边州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州委常委、延边大学第1副校长，延边州政协常委、副主席。1981年逝世。

条。朱、崔、裴确实聚在我家下过棋，但是没有摆过酒宴，更不用说 100 多次！

说真的，过节的时候葡萄酒是喝过一杯的。他们对酒都不感兴趣，我更是一个对酒厌恶至极的人。延边医学院卢博士逝世以后，朱德海同志来看我时说：“……解剖后一看，血管硬得像钢丝。他完全是被酒给毁了。”朱德海说着，还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就是这样的朱德海，竟说他摆了 100 多次酒宴……真所谓“人事不省，人心难测”啊。

烟嘛，除了我以外，他们三人都吸得厉害，三人都是瘾君子。

朱德海同志去世的消息，我是在监狱里通过报纸得悉的。从那天起已过去了 10 年的今天，我平生第一次为他而执笔。贝多芬俱乐部的另一成员裴克同志也成了不归之客。只能说是人生太无常了。

休假日经常聚在我家里下棋，总是一对三的局面。一是朱德海，三是崔、裴、金。如同《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同吕布一人交锋一样。因为朱德海的棋艺比三人技高一筹。崔采和我是初学者，只有裴克还算是玩得不错。可是棋艺再高，两只眼睛也抵不过六只眼睛。每次崔采和我紧挨在裴克旁边提醒他时，朱德海就会急得连连摆手，捂着棋盘说：“不许说，不许说！”不让我们给裴克支招儿。但是每当他吃掉对方的棋子时，就会高兴得唱歌一般喊起来：“吃啦！”“哈哈，又吃一个！”“吃啦”一词原来是我发明的。后来大家都受到感染，只要一下棋，四个人就总是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吃啦”挂在嘴边。

朱德海同志是第一书记兼州长，繁杂的事情似乎不少。所以，他总是带着羡慕的口气对我这个职业作家说：“学铁最舒服了！什么都不用操心……真是个土皇帝呀。”说着，还会回头看着崔采笑笑。

朱德海同志从苏联经新疆去延安的时候，同行中有一个人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环境中失去了对胜利的信心，向敌人投降变节。这是在太行山时候的事情。跟所有的叛徒一样，他也当了日本人的走狗，还通过特务把劝降信送到抗日部队。信的内容大概是：……在如此艰险的山沟里，用草根树皮苟延残喘，还有什么前途可言？赶快做出决断，来过好日子吧。只要过来，就会有光明的前途……

可是，没过多久日军就无条件投降，那家伙也就成了断了茎蔓的空心葫芦。朱德海同志从太行山下来以后，在张家口碰到了那个垂头丧气的家伙，陶醉在胜利喜悦中的朱德海同志忘了曾经气得咬牙切齿发过的誓言：“一旦抓住那个家伙，我一定会把他大卸八块！”还是原谅了他。后来，那家伙到延边来找朱德海乞求给他一条生路，朱德海只好把他安排到大学当教员。

“那样的家伙，你还管他死活干什么！”我很不满意地说。

“给认错悔改的人一条生路，是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人道主义，符合党的政策。那家伙有充分的资格在大学当老师，是个人才。好端端的家伙却干了那么蠢的事情，实在是气人。他自己也一定会后悔莫及的。”说到这里，朱德海同志又补充了一句：“搞政治的话，得学会容纳百川。一棍子打死并不是最好的办法。”

正是因为朱德海拥有宽厚的品格，所以才能在延边人民的心中享有非常高的威望。我不知那是他的天性，还是修养的力量，反正他是一个有正人君子风度的政治家。

那是我在乡下体验生活时的事情。有一个农民家做祭祀，全村人都不干活儿聚集在他家里，我看到党支部书记竟也在其中，心中大为不快：“地里的活儿那么忙，跑这里来干什么！”

第二天，我回来向朱德海同志反映了这个问题：“放着活儿不干……大白天……那是干什么呀？而且还是应该在群众中带头的

党支部书记！”

听了我的话，朱德海同志微笑着有些责怪似地对我说：“现在农民肚子里都没有油水了，怎么也得吃点什么呀！所以，谁家结婚或者做祭祀的话，他们都会趁机聚在一起吃一顿……总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干活吧。”

我的脑袋也不是榆木脑袋，早已听出了那话里包含的意思。于是，我点点头表示已经明白了。他又进一步开导我说：“现在法律禁止农村私自酿酒……那也不能太死板地加以禁止。农村的老人们酿点米酒，口渴时舀上一瓢，或者用火筷子拨一下火盆，热一热再喝，怎么阻止得了呢？普通老百姓肚子都吃不饱，还谈什么爱国呢。所以，你要好好体察他们的苦衷后再落笔。”

当时曾经责怪过我的朱德海，随着岁月的流逝，其形象在我眼前越来越高。他是一个无论在怎么艰难的环境中也不会动摇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只有金学铁才能刻画出如此有血有肉的朱德海形象。迄今为止，关于对朱德海的回忆中，像金学铁这样把朱德海如此形象化的文章实在不是太多。乍一看，朱德海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可是这种现实性的观点和姿态是高格调的宽宏大量的产物。特别是朱德海对文化的理解与实践及其对文化的领导艺术，至今都被传为佳话。说作家、文化人是“土皇帝”的朱德海，其实是那样的尊重文化人，理解文化人，跟作家、文化人相处得那么和谐。

保护非物质文化的工作也是根据朱德海的指示进行的。在这一时期，朱德海下达了以“救火的消防车速度”加紧恢复民族文化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延边文化界成立了延边民间文艺家协会、延边文学艺术研究所、延边艺术学院、延边民族艺术研究所、延边艺术汇编办公室、延边朝鲜族民俗学会等文化团体，

对蕴藏在民间的大量珍贵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了整理、发掘和收集工作。1962年，民间文艺汇编小组访问了东北三省60多个县市、200多个朝鲜族村庄和5000余名民间艺术者和群众，收集、整理和保管了800余首民间音乐、200多张传统民间舞蹈照片，以及120余个音乐录音资料。遗憾的是这些珍贵资料大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销毁或遗失。

著名编舞家崔玉珠<sup>3)</sup>是一位花了较长时间接受笔者采访的艺术家。她熟悉朱德海，讲了许多关于朱德海的故事。采访结束的时候，她还推荐了自己的朋友金永奎（朱德海的妻舅）及其妻子松竹（电影《奇袭》中的女演员）接受采访。

“1957年，朱德海书记和赵得贤等艺术家领头创立了艺术学校。后来听金泰熙校长说，创立艺校的时候颇费了周折。省里认为已经有一所省艺术学院，延边不必再建艺术学校，所以一开始没有同意。早在1955年和1956年，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朱德海书记和赵得贤老师等朝鲜族政协委员，连续两次提交了《关于在延边地区成立朝鲜民族艺术学校的提案》。但是，起初并没有引起重视。后来，周总理过问了这件事情，提案随之也受到了国家文化部的重视。也有人说，朱德海书记跟周总理是延安时期就认识的‘老铁’，所以获得了批准。当然我也只是听说而已。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春天，文化部正式批准成立延边艺术学校。朱德海书记亲自在施工现场注视着一块一块红砖砌起来。经过艰难的筹备工作，中等专门学校延边艺术学校终于在1957年10月5日成立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如此牢记艺校成立的日期吗？在我

3) 崔玉珠，1934年出生于延吉市，原延边歌舞团副团长，中国特级编舞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先后在40余部独舞、二人舞、舞剧中担任主角，还在大型朝鲜族民族舞剧《春香传》等20余部作品中担当独舞。现在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家学会副会长，吉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政协委员，延边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延边舞蹈家协会主席。

的一生中，有我最不愿意干的几件事情，都因为上级的指示不得不勉强干下来，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当艺校教员。为了不当艺校教员，我还去找朱德海书记恳求过，可是根本不行。后来我才知道让我到艺校去当教员，正是朱德海书记的意思。延边艺校是全国第一所少数民族艺术学校，尤其在州级地区成立艺术学校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艺校的成立是延边的大喜事，也是艺术界的里程碑。按照朱德海书记的指示，当时把12名业务骨干调入艺校当教员。金泰熙担任校长，舞蹈家赵得贤、画家石熙满、作曲家许世录担任副校长。有一天，单位突然召开全团职工（那时歌舞团有200余名职工）大会，说是宣布工作调令。州委组织部的干部也来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人事调令名单中也有我。当听到我的名字时，我不禁站起来大声说，我是搞舞蹈的，怎么能去艺校当教员呢？坐在我旁边的同事对我说：‘是朱书记下的调令，你怎么敢拒绝？’那位同事还说：‘瞧你，多好的事情呀，你还不愿意……’现在想起来，觉得我那个时候太幼稚了。事实上12个人中，我是最年轻的。那个时候我只想在歌舞团里当好舞蹈演员，所以让我到艺校去当教员，当然是难以接受。我去找赵得贤副校长求情，可是他一口咬定说不行，还说，作为共青团员应该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决定。我还是想不通，多次去找赵得贤副校长。他只好向朱德海书记汇报了我的情况。朱德海书记沉默了半天，然后说：‘那就给玉珠一次特殊吧，玉珠是一个难得的舞蹈人才，让她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在歌舞团跳舞。北京汇报演出没有她也不行呀。就让她兼职吧，一举两得。’有了朱德海书记这句话，我才同意到艺术学校报到。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听说的。其实，那个时候作曲家郑律成已经找过我，想把我调到北京民族歌舞团去。有了朱德海书记的关照，我就在歌舞团继续参加独舞排练和演出，同时在艺校当教员给学生上课。当时，艺校舞蹈部里有我、崔今善、朴永远，还

有北京少数民族舞蹈学校毕业的舞蹈家李英爱4个人。包括声乐理论的所有艺术专业课程都由延边歌舞团的骨干承担。他们是姜文求、金在青、金泰益，还有弹伽倻琴的高手金震。这么多人从歌舞团调入艺校，有一段时期都传说歌舞团没有人演出了。这件事反映到朱德海书记那里，他说：“歌舞团的演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培养艺术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我们花那么大力气成立艺校并不是摆给人看的。与其一直是个人唱个人跳，还不如把声乐和舞蹈传授给几十人、几百人，把他们培养出来。这就是百年大计。”当时，朱德海书记多次强调艺校总的教育方针。现在回想起来，朱德海书记真的是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1957年，延边艺校成立初期，校方根据朱德海书记的指示，聘请朴贞烈、金文子、李今德、申玉花等民间艺人担任教师。1959年，又聘请朝鲜的伽倻琴演奏家池万洙和民族声乐家方玉兰到校教学一年，给学生传授朝鲜传统音乐。不仅是延边艺校，延边歌舞团的成立同样是跟朱德海书记分不开的。”

崔玉珠说话如同她的舞蹈创作一样，流畅而柔和。

延边歌舞团的前身是1944年6月在晋察冀边区成立的华北朝鲜义勇军和政治干部学校俱乐部。1945年初，俱乐部改称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宣传队。1945年秋，部队在辽宁省大石桥重编的时候，把宣传队的骨干编入第5支队宣传队。1946年8月，第5支队宣传队融合地方剧团及龙井艺术团的部分演员，改称为吉东保安军政治部文艺工作队，1946年9月与吉林军区宣传队（汉族）合并编入吉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第二大队。

1947年2月，吉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第二大队在龙井同安图的“5·1”宣传队合并，称为吉东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队。1947年12月，宣传队归属延边专员公署。经过短期的准备工作，1948年3月16日建立了延边专员公署民族事务处文工团，简称延边文工团。

1949年3月，延边文工团同朱德海带到延边来的黑龙江省哈尔滨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处文工团合并，组成延边文艺工作团，1950年1月再次改为延边歌舞团，当时有97名演职人员。这一时期，朱德海派金泰熙担任歌舞团团长。延边歌舞团除了几名汉族演员外，清一色全是朝鲜族演职人员。歌舞团建立初期为轻骑兵形式，在延边地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艺术活动。1950年到北京参加庆祝国庆一周年活动，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延边歌舞团演出的《英勇的朝鲜人民站起来了》《新阿里郎》《织布之歌》等节目，中央新闻电影摄影站还拍成记录片在全国上映。

1951年，根据朱德海的指示，延边歌舞团派创作人员到各县市发掘和继承民族民间舞蹈。这一时期，大量发掘、搜集、整理出了“民谣”、“盘索里”和民间舞蹈。金凤官的《中国朝鲜族民间音乐集》就是这个时期集大成的大型音乐教材。

从远古时代开始的朝鲜民族民间音乐，口传历史悠久、传播领域广阔是其特征。朝鲜民族扶老携幼，把粮食的种子带到了这片土地上，同时也把音乐的种子带到了这里。民族音乐是我们祖先生命的脉搏，是原始反映我们民族意识和情感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在民族音乐领域，在整个文化领域中也大规模地展开了收集、整理、发掘工作。朱德海书记多次组织研究组工作人员召开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在精神上、物质上提供大力帮助。这一时期，经过金震、赵顺姬、郑俊甲等教员的努力，编纂出了《伽倻琴歌集》（内部油印资料1～5集）、《朝鲜民歌集》（内部油印资料1～5集）。延边广播电台还录制了很多民间艺术家的原声材料，使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宝贵的艺术资料大部分被销毁或遗失，众多民间艺术工作人员和民间艺术家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迫害。

目前，延边艺术界普遍认为，延边艺术学校升格成了吉林省延边艺术学院，其实这是错误的信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南希哲教授跟笔者讲到这一情况时说：

“现在延边很多人士认为延边艺术学校已经升格为吉林省艺术学院延边分院，后来又改称为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和艺术学院分开）。其实，这是错误的信息。1957年，朱德海书记建立的艺术学校作为中等专业学校仍然存在，吉林省艺术学院延边分院是另建的独立分院。当时，延边艺术学校两个牌子一套人马，从指导教员到领导都在一起办公。所以，有人误认为延边分院升格了。事实上，自治州成立5年以后的1957年，在当时延边的财政状况和文化环境下，成立延边艺术专门学校，并不是像新闻报道那样容易的事情。艺术专门学校建立以后，延边的艺术环境从人才开始，在硬件和软件上带来了很大的变革和高水准的升格。正因为如此，朱德海州长的功劳在软环境建设中得到认可，以致人们至今都非常敬仰他。”

不仅如此，延吉“工人文化宫”于1958年施工，翌年交付使用，总投资额为62万余元。这是一座综合性的文化大厦，设有剧场、文化活动馆和体育馆，可同时容纳3000余人。当时，很多人建议朱德海用这笔款项先扩建自治州委员会（州委）和政府大楼，但是朱德海主张应该先给工人提供文化娱乐场所。他说：

“在座的有建筑学家，你们也知道，建筑不仅仅是盖一栋楼，而是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组成的复合性产物。因此，工人文化宫从外部的建筑开始到内部的布局，都应该以工人为主。他们将是这里的主人公。我们建设工人文化宫的意义也在于此。”

工人文化宫建成以后，正像朱德海所说的那样，成为延吉，进而成为延边的象征性建筑物。

## 朝鲜语文

原延边大学党委书记李羲一<sup>4)</sup>回忆了把朝鲜语言规范到“平壤”语言的过程。他说：

“因为《毛泽东选集》第4卷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是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并由各自治地区党委亲自指挥翻译出版的，所以成为了民族语言规范化的样板。民族语言翻译都效法它或向它看齐，出现了全国少数民族语言都朝着汉语化方向发展的倾向，导致社会上各单位、各阶层和语言学界都对这个问题议论纷纷。”

1963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崔庸健委员长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朱德海到长春跟周总理一起陪同崔庸健委员长。朱德海急急忙忙赶到长春，见了崔庸健委员长热情握手。

“崔庸健委员长同志，您好！”

“让你亲自到长春来，实在不好意思！”

虽然是正式场合，但两个人还是很高兴地互相问候。

周总理在一旁看着，笑呵呵地说：

“本来就听说崔委员长跟朱德海书记很熟悉，果然是这么亲近。朝鲜的同志们因历史的原因，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中国革命。崔委员长同志也不例外哟。崔庸健同志还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教官，我也在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工作过，咱们有特殊的缘分啊。你们两位也在特定时期特殊相遇，所以友谊很深。”

---

4) 李羲一，1918年1月出生。1949年3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处干部，1949年4月起先后担任延边州委宣传部干事、干部教育科副科长、《东北朝鲜人民报（延边日报）》主编兼社长、州委文教部长、宣传部长、延边大学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后得到政策落实，重新任延边大学党委书记、顾问，全国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委员。著作有《中国朝鲜族足迹丛书》（1~8集，主编）《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足迹》《艰难的路程》等。

对我们革命者来说，这都是缘分啊。既然今天相见，咱们就畅所欲言吧。”

朝鲜战争时期，朱德海和崔庸健在延边见过面。距离再次见面已经过去了10年。50年代初，崔庸健委员长在朱德海办公室里吃过一碗金文宝秘书送来的手切面。但是在正式场合，他们是不能谈这些的。在这次见面会上，崔庸健委员长说：“延边的朝鲜语，我有20%~30%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崔庸健委员长回国后不久，吉林省在长春春谊大厦召开了政界和文化界有关人士共同出席的关于朝鲜语规范化问题的专门会议。省委书记李砥平出席了会议。延边有朱德海、崔采、李羲一三个人参加了会议。在朱德海的指示下，崔采和李羲一根据会议内容，在“以我们为主，向平壤学习”的方针下，向大会提交了朝鲜语规范化的方案，通过讨论被大会采纳。会后，延边州委和州政府以省政府的名义向国务院报告了此方案。周恩来总理了解朝鲜语的使用情况以后，于1963年6月28日视察吉林省的时候，做出了“我们国家的朝鲜语要以平壤语为标准”的指示。

上报中央的方案得到批准以后，朱德海找李羲一下达了具体的指示。当时，对朝鲜语的规范化问题，延边有“汉城”、“平壤”，还是“延边”的三种不同观点。

“上报中央的方案得到批准了，总的精神是让我们‘一边倒’，向朝鲜平壤倾斜。这样，95%的词汇就可以跟朝鲜统一。当然，完全统一是困难的。朝鲜的语文水平比我们高，我们的知识分子要虚心向他们学习，错了就改。在翻译问题上，一是政治水平问题，另一是语言水平问题。延边的朝鲜语听着不顺耳，读着不顺口，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缺点。不少人都说对民族语言的感情越来越淡薄，我看在语文工作中也存在这个问题。民族感情是通过民族形式表现出来的，不是抽象的。所以，在目前的形势下，不要犹豫

不决，要‘一边倒’。只有这样，朝鲜语文才能得到规范化。”

延边的语言学者根据朱德海的指示，召开一系列会议，传达了上级的精神。然后，他们首先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朝鲜文版进行了修正出版工作。新闻出版部门也通过传达会议精神，逐渐改正了语言混乱的现象。

朱德海对文化部门的关心是全面而多方面的。1952年7月，朱德海对崔采说，在自治州筹备工作中应该有一首自治州的歌曲，并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了崔采。崔采指示金永万干事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一定要创作出一首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成立庆祝大会上唱的歌。任晓元、金声民、车昌俊等二十余人参加了座谈会，具体研究讨论如何创作庆祝自治区成立歌曲。自治区成立以后，就能以我们的语言和文字自由进行创作了，与会者都兴奋得立即行动起来。座谈会一结束，诗人们忙于写歌词，作曲家忙于谱曲，几天后就创作出了好几首歌曲。最后选定了车昌俊作词、金声民作曲的《庆祝自治区成立之歌》。

哎噜化 欧折西古 召库那召内  
海兰江放声歌唱 长白山热烈欢呼  
哎噜化 跳起来 长鼓声声传四方  
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成立啦  
哎噜化 跳起来 团结起来一条心  
各民族友好合作 建设我们新家乡

哎噜化 欧折西古 召库那召内  
共产党领导我们 民族自治是方向  
哎噜化 跳起来 长鼓声声传四方  
新生活多么幸福 跳起舞放声歌唱

哎噜化 跳起来 团结起来一条心  
各民族友好合作 建设我们新家乡

这首歌曲不仅民族风格浓郁，突出了节日的欢乐气氛，而且内容丰富深刻，歌颂了共产党的领导。歌曲运用了民歌的节拍，热烈奔放，能让人很自然地产生欢快的共鸣。

金永万把这首庆祝歌曲向崔采部长作了汇报。他边听边跟着哼唱，对内容和曲子表示了肯定。他说：“把这首歌曲汇报给朱德海书记和地委、专员公署的领导同志们，等审查后再作决定。”朱德海一听，就连连点头称好。就这样，这首歌曲被确定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成立的指定歌曲，并被刊登在自治区成立那年9月3日的《东北人民朝鲜报》（延边日报）第2版上。原延边政协副主席金圣友回忆说，朱德海十分喜欢唱《庆祝自治区成立之歌》。这首歌曲富有生命力，至今依然被人们常唱不衰。

在《岁月的尘土》中，金永万还讲述了发生在这个时期的轶闻：

“1962年出版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十周年纪念画册》的第一页，是从空中俯拍的延吉市全景。这张照片是1952年8月新华社摄影记者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成立而拍摄的。这张照片还包含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1952年8月，一位新华社记者到延边来，为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的成立提前来摄影。我经常陪着他一起到处走动。有一天，那位记者提出要从空中俯拍延吉市的全景，要求我找一架飞机。对于这样的要求，凭我个人根本无法解决。我十分着急，直接向朱德海书记作了汇报。他说：‘需要飞机的话，只能与驻延吉市的朝鲜人民军空军部队联系。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帮助解决。’朱德海书记让我回去等候消息。

“两天后，朱德海书记亲自打电话给我。我急急忙忙地跑到朱

德海书记的家里。他一看见我，就满脸笑容地对我说：‘朝鲜人民军空军部队答应协助我们。你马上领着新华社记者去一趟河南机场。’

“我十分高兴，直接领着新华社记者去了朝鲜人民军空军部队河南机场（现延吉机场）。朝鲜人民军空军部队机场某大校负责人和苏联顾问正在机场等候我们。那个大校负责人指着一架空军训练机告诉我们，将由这架飞机协助我们进行空中拍摄，并且详细介绍了搭乘飞机后的注意事项。新华社记者和我按照指令坐在训练机的后座上。

“我平生头一次坐飞机，既感到新奇又觉得害怕。飞机箭一般地升空后，在延吉市和延吉县、汪清县百草沟等地上空盘旋飞行了28分钟，给新华社记者提供了足够的摄影时机。”

朱德海在哈尔滨的时候，就对招收艺术人才格外地关心。时任延边歌舞团团长的郑镇玉发现林圣镐在声乐方面很有造诣，就去州委找朱德海书记说，林圣镐是延边必需的人才，并要求一定把林圣镐安排到延边歌舞团。

于是，朱德海亲自出面，最终经中央民委和中央文化部的努力，把林圣镐户籍落在延边歌舞团。

许吉龙<sup>5)</sup>在其回忆录《难忘的关怀》中这样写道：

“我见到朱德海同志是1957年的夏天。当时，我接受紧急采访任务去安图县福兴乡，正赶上朱德海同志在那里谈论修建水库的问题。几年前，我已经认识他，但是像今天这样坐在一张饭桌上边吃饭边交谈还是第一次。他是一个老革命家，我很想听他讲故事。他对干部们介绍说：‘别看他年轻，他可是个记者。记者的职业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很了不起的。’接着，他问我：‘听说你是

---

5) 许吉龙，1951年5月起任《延边日报》记者。

农村方面的记者？党对农村的有关方针政策你精通吗？《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学过多少次了？’我不禁觉得脸红，照实说：‘我只看过两遍。’朱德海同志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对农村来说是纲领性的文献，只看两遍怎么行？40项条目，得一条一条地背熟，一条一条地宣传，每个条目都可以拿来作新闻标题。’说着，他拿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小册子给我。我接到小册子，心里很震惊。朱德海同志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吉林省副省长，比谁都听得多看得多，比谁都熟悉党的政策，可是仍然在认真学习，重要之处还拿红笔划出来。真是让人感叹不已。朱德海同志的一席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深刻的教育。从那天起，我就把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经过认真学习，从过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一直到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等各项方针政策和条例，我都能背下来。除此之外，对上级下达的指示精神随时记在笔记本上，有空就拿出来学习。通过学习，了解了各项政策，遇到的难题少了，还能及时发现新问题，写出有分量的新闻报道。这些成果都是跟朱德海同志的教诲分不开的。

“朱德海同志对我们新闻工作者的生活给予极大的关心。那是在1960年，国家因三年自然灾害而处于极度困难时期发生的事情。我们报社的编辑和工人天天都上夜班，深夜12点都要吃一顿夜宵。可是因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供应遇到了困难，延吉市粮食部门停止了各单位的夜餐粮食供应。那时我负责总务科的工作，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白天干八小时的活儿，晚上再不给夜餐吃，时间一长肯定会影响新闻工作者的身体健康，也会给新闻出版工作带来很大影响。我多次找有关部门诉说困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直接去找朱德海同志反映问题。听了我的汇报后，朱德海同志说：‘报社不能停止夜餐。现在虽然困难，

但也没有延安时期那么困难。那时候我们面临的困难不知比这大多少，可还是保障了对新华社记者的夜餐供应。新闻记者站在宣传工作的最前线，夜以继日地工作，现在有了困难就停止供应夜餐，影响健康，这怎么行？’朱德海同志让我去找州粮食处（局）处长，就说是他让我来的。我高兴极了，还是朱德海同志理解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艰辛，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了他对我们新闻工作者的亲切关怀。我把将去有关部门办事的介绍信拿出来放在他面前说：‘请您在这里签个字吧。’朱德海同志笑着说：‘好吧。’他在介绍信上面写道：‘粮食再困难，也不要中断报社的夜餐供给。希望继续供给。’我带着朱德海同志写的亲笔介绍信去找有关部门，他们二话没说就给解决了。在朱德海同志的关怀和照顾下，我们报社的职工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依然吃上了夜餐，保证了党报的正常出版发行。”

2011年去世的老作家李洪奎是笔者采访的唯一高龄作家。哈尔滨时期，他是《民主日报》的记者和编辑，跟着朱德海来到延边。到延边以后，1949年7月他担任在延吉创刊的综合杂志《文化》的主要负责人和主编。到1951年10月止，《文化》杂志共出刊25期后停刊。也可以说，《文化》是《延边文学》的前身。

“……现在记不清具体地点了。1949年2月的一天，礼堂里聚集了很多人，有民族事务处的工作人员，还有《民主日报》的记者和文工团的演员。那是给我们开的动员大会，说朱德海政委就要到延边去工作了，希望我们能跟随而去。我从牡丹江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跟着朱德海书记来到延边。到延边以后，我没有再做记者工作，一直到现在都是搞文学，成为一名作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我越加感到作家的社会地位和文学的地位一落千丈，比过去凄凉多了。可能那时社会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其他事业没有正常运作起来，才使文学的地位非正常地超过了前。可是到了今

天，文学和作家虽说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结果是作家消失了，文学折了翅膀坠落了。所以，我总是在怀念过去。那时，一说是作家、记者，腰杆就挺起来了，地位也动摇不了。其他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延边对文化和作家的待遇，跟朱德海书记的功劳是绝对分不开的。朱德海跟文化很亲近，跟金学铁等众多作家和艺术工作者是朋友。通过采访，你可能也了解到了从延边大学，到农学院、工学院、艺术学校、作家协会、歌舞团、《延边日报》社、广播电台、出版社、《延边文学》等文化行政单位，以及学校的硬件和软环境建设，都是跟朱德海书记的关怀分不开的。他对记者和作家的关心和爱护也是无微不至的。当时，作家都非常尊敬朱德海书记，因为他们从朱德海书记那里得到了真心的关心和爱护。那时，延边对文学和作家很宽容，所以金学铁先生同朱德海书记取得联系后，也从北京来到延边。现在的《延边文学》那时候叫《延边文艺》，朱德海书记还在第一页写了题词。现在我还记得题词的内容：‘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应该以文艺形式正确贯彻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实情。’有一次，我应邀参加文学创作会议，在会上做主题发言，就引用了这段题词。当时，在我们作家群中有一句流行的话，就是‘有事情找朱书记’。只要去找朱德海书记，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

《延边日报》第三任社长李羲一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用朱德海书记的专车把报纸送到延吉车站。报社一遇到赶不上火车时间的问题，就给朱德海书记打电话借用他的专车。每次他都二话不说就把专车派给了我们。

“新闻工作是政治性、政策性、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哪一个环节都不能疏忽。一定要保证报纸出版发行时间，当天送到读者手里。”

朱德海经常在百忙之中抽空到报社进行调查研究，解决实际困难。

## “我们是朝鲜（民）族”

崔玉珠回忆过去的时光时，总是显得无限感慨：

“我16岁那年，也就是1950年参加了歌舞团。当时，我在图们。按现在流行的话说是‘面试’，过去的话来讲是‘考试’。第一次考试我就落了榜，也就是说我不会跳舞，在第一次面试中就落榜了。‘崔玉珠不会跳舞，所以落榜了’，这话谁信呢？不过，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到底还是加入了歌舞团。后来又有了机遇，使我很快成为歌舞团的主要演员。有一次，朱德海书记看了我的双人舞表演后问金泰熙团长，那个跳舞不错的孩子是谁，金团长介绍我说叫崔玉珠。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听说的。此后，中央来代表团或客人，朱德海书记都要请我们歌舞团去演出。当时，中央到我们延边来的客人很多，在我的记忆中最清楚的是达赖喇嘛到延边来时的情景。1955年2月17日至22日，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为团长，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为副团长的西藏参观团一行120人，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格平的率领下来延边参观访问。参观团成员中，还有阿沛·阿旺晋美。朱德海非常重视这次接待工作。

“那天宴会结束后，还组织了舞蹈晚会，歌舞团演员要陪客人跳舞。可是，从来没有跟其他少数民族跳过舞的歌舞团女演员们，一个个躲躲闪闪地不愿进舞池。朱德海书记通过金泰熙团长严肃地告诉我们，虽然这不是政治任务，不强迫你们跳舞，但是，你们作为朝鲜民族，要为延边把客人陪到底，而且还特别严肃地对我提出要求。如果没有朱德海书记、赵得贤等老师们的帮助和支持，就不可能使我最终成为舞蹈演员，成为一个编舞者……”

1963年12月，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艺汇演大会的消息传到延边。当时，吉林省把组织群众业余艺术代

表团的任务和汇演任务交给了延边，受到了以朱德海为首的州委和州人委<sup>6)</sup>的重视。朱德海把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张逸民找到办公室，把组织筹备汇演的工作重任交给了他：

“这次在北京举行的文艺汇演大会虽说是业余的，但很可能是少数民族文艺工作的一次总结，对少数民族文艺工作来说是一次大检阅。所以，张部长，你要把这项工作当作我州文艺工作的大事来抓，宁肯放下其他工作，也要周密地组织好这项工作。迄今为止，我们民族的歌舞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这次对我们的期待值也会很大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称赞我们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这次我们一定要大显身手。你就大胆地干，有困难来找我，州委会全力以赴支持你们的。”

张逸民副部长从第二天开始筹备组成代表团、创作汇演节目、选拔和训练演员、服装设计和制作、舞台布置和照明、字幕等一系列工作。

有一次，张逸民副部长在延吉县（现龙井市）群众业余汇演大会上发现舞蹈《抗旱姑娘》以后，觉得作品的结构虽然不够紧凑，演员的演技也不是很精湛，但是加工修改后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好节目。于是，他就把舞蹈所反映的内容向朱德海作了介绍，邀请朱德海亲自去观看。朱德海爽快地答应下来。正巧那天下午老头沟亚麻厂俱乐部有一场延吉县群众业余汇演，其中就有舞蹈《抗旱姑娘》。张逸民副部长陪同朱德海来到老头沟观看了那天晚上的演出。一起观看节目的还有李挥、金泰熙、崔玉珠等人。据崔玉珠回忆说：

“1964年，我们去北京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汇演大会，对，是那一年。有一天晚上，金泰熙团长到我家来找我，我以为

---

6) 州人委，1963年5月，延边州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组成了第2届委员会；1955年12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政府改称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

又来了中央什么代表团就跟着出来。院子里停着一辆轿车，我上车后问金泰熙团长去哪儿，他笑着没有回答。到了宾馆，看见那里还停着一辆轿车。朱德海书记和张逸民副部长上了那辆车，不一会儿车就开了，向着老头沟方向驶去。那里灯火辉煌，农民们正在露天演出节目呢。他们看朱德海书记来了，就大声欢呼起来。在那里我们看了他们演出的顶水抗旱的舞蹈（‘顶水抗旱’是指头上顶水送到地里抗旱之意）。朱德海书记让我坐在他旁边，对我说：‘你要好好看看这个舞蹈，进一步升华艺术和思想内容。’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农民跳的舞生硬粗糙，怎么还能升华艺术内涵呢？当时，我在歌舞团只是跳舞，对编舞还没有想过。就那几个姑娘顶水上山的动作让我重新改编，实在没什么意思。演出结束后从老头沟返回的路上，朱德海书记说：‘依我看，把那个舞蹈好好推敲推敲的话，会是一个好作品。希望你一定要把它改编出来。’当时，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想为什么偏让我搞创作呢？我想跳芭蕾，想跳独舞，可是却让我去编舞。回来以后，我两天没出门，金泰熙团长再次找我，给我讲了很多道理。他还给我讲了创作对艺术家的重要性，还说是朱德海书记亲自点名把我带到老头沟去的。目的是让我找创作的素材，得到创作的灵感，不管理解不理解，一定要把这个作品编好。那时我不知道如何确定主题，如何构思动作，只觉得头脑一片空白。后来，我按照朱德海书记的指示，硬着头皮到延吉县（龙井市）三合公社（镇）去体验生活。那里的妇女正头顶水罐给地里的庄稼浇水。有的妇女顶水顶多了，头上有明显的垫圈痕迹，有的妇女甚至都掉了头发。我也顶着水罐跟着妇女上山，才知道顶水上山是多么不容易。在那里，我深刻地懂得了没有感情的创作是不会有艺术感染力的道理。忽然，走在我前面的那位妇女摔倒了，头顶上的水罐掉在地上摔碎了，水洒了一地。那位妇女站起来，把破水罐里剩下的一点点水小心



翼翼地捧着去浇禾苗。这个细微的动作大大激发了我创作的欲望。后来，我创作的舞蹈作品获得10余次全国创作奖。而我也在生活中找到了真正的创作素材。后来我才知道，根据朱德海书记的建议，延边歌舞团的金声民和我当选为吉林省代表团的艺术指导。我们和延边群众艺术馆的全体成员一起，废寝忘食地投入到排练工作。我的处女作就是这样在朱德海书记的指示下创作出来的。如果说一个自治州的州长为了舞蹈创作，亲自带领舞蹈演员去老头沟看演出的话，谁会相信呢？在生活中，我无数次地听到了别人的闲言碎语，背后给我起外号的、骂我的，什么都有。当然，别人骂我，我也骂过别人。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在那些外号和骂声中迷失自己，始终以清醒的头脑坚持下来。我想，像朱德海书记这样的自治州首长是罕见的。也正因为如此，我非常尊敬朱德海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还被打成了朱德海的‘保皇派’……”

那一年8月，由19个农村业余演员组成的“吉林省群众业余艺术代表团”诞生了。9月初进京以前，朱德海、姚昕等州党政领导人先观看了节目。演出一开始，场内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给平生第一次登台演出的农村业余演员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演出结束以后，观众们感慨万分。他们说，《抗旱姑娘》《顶水舞》《背架舞》等节目，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愧为我们民族的艺术。

经过数个月的排练，做好了一切准备，终于要进京了。

“到了北京，不要扭扭捏捏的，要大大方方地登上舞台，把我们民族最好的艺术和精神面貌展示给毛主席和党中央以及全国人民看。”朱德海到延吉车站送行时，跟演员们一一握手鼓励他们。

艺术团的演员们一直生活在延边的乡村，只知道北京是首都，从没有去过。更何况是在党中央领导人和北京的观众面前表演节目，他们感到无比自豪。

终于到了演出的时间。吉林省代表团和甘肃省代表团按照预定的安排，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进行演出。甘肃省代表团的演出结束后，吉林省代表团的演出开始了。那天，以文化部部长林默函（作家）、国家民委副主任萨空了在内的大会评审员，以及中央直属机关、北京市文化界领导、专家、新闻界人士和各代表团全体成员满满地坐在看台上，座无虚席。这使毫无舞台经验的业余演员不免有些紧张。

随着轻松自如的民族器乐和打击乐的伴奏，演员的衣袖和裙角摇摇曳曳摆动起来，场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演出逐渐达到高潮，当舞蹈《抗旱姑娘》演出时，全场情绪热烈，观众兴奋无比，直到谢幕以后，鼓掌声也没有停止。演员们只好再次登台重新表演舞蹈的结尾部分，场内的掌声才停止。演出结束了，观众仍然依依不舍地站在那里不愿离开，鼓掌祝贺我们艺术团演出成功。

代表团在北京的大小舞台上一场接一场地演出，成为大街小巷的热门话题。尤其是舞蹈《抗旱姑娘》每场演出都得到观众的大声喝彩。在舞台上，独唱演员在观众的邀请下加场是常有的事情，但是舞蹈表演中极其罕见。

几天后，张逸民副部长见到了来北京开会的朱德海。听了张副部长的汇报以后，朱德海说：

“这次汇演成功是大家辛勤努力的结果。告诉演员们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不要骄傲。过几天，我邀请东北局和东三省领导一起去观看我们代表团的节目，你们要做好准备。”

几天后，吉林省代表团在北京“二七”剧场为东北局和东三省领导表演了节目。（摘自张逸民《为民族争光的日子》）

如果说业余演出受到了人们的喝彩，那么专业团体的演出更是盛况空前。

“……记得那叫‘中国舞蹈周’，中央（国家）文化部把1956

年和1957年定为中国舞蹈周(年),中国有名的艺术团体都参加了演出。因为中国很大,所以当时还是有很多地区没有参加。第一年,我们延边歌舞团表演了大合唱《长白之歌》。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我们带着《顶水舞》《农乐舞》《扇子舞》,以及方初善的《闺女之歌》等节目去了北京。我们的演出一落幕,天桥剧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欢呼声。直到现在,《农乐舞》依然很受欢迎。当时,朱德海书记到北京来开会。他是吉林省副省长,又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估计每年有一半时间需要参加会议。那天,朱德海书记把我们歌舞团全体演员叫到北京民族宫。在那里,他对我们说:‘你们这次演得很好,没有辜负延边人民的期望,轰动了北京城,放了‘卫星’。不过,有一个遗憾,就是演出服装太寒酸了。这是我的责任。’说完,他就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立即跟州里取得联系,给歌舞团演员做新的服装。那时,跟其他地区歌舞团相比,延边歌舞团的服装确实是寒酸了点。朱德海书记的一句话,使演员、乐队,以及工作人员都换了一套新西装。我们接着去全国巡回演出,上海、广州都去了。朱德海书记又吩咐有关部门,在我们巡回演出期间,不要扣除演员们的伙食费。所以,巡回演出半年来,团里不但没扣伙食费,还给我们发了全额工资。那时,我的工资是60.50元,算是很高了。所以,我们比上海、广州那边的演员阔气得多了,甚至戴着墨镜上街,好像真的变成了一个很有钱的歌舞团。所到之处,报纸对我们延边歌舞团大书特书,并以国际级的水平来评价我们的演出。

“下面我再讲一个故事。1960年的一天,我去找朱德海书记,希望他能同意我去北京艺术学校(院)学习。我向朱德海书记恳求的时候,心里很紧张。当时,延边选送四名12岁的学生到文艺学校(中央艺术学院)去学习,这是金泰熙团长按照朱德海书记的指示办的。他们毕业回来以后,我的水平当然不能跟他们比了。

我意识到了去北京进修的必要性。后来朱德海书记同意我去学习，当时一起去北京学习的还有歌唱家方初善和金仁顺。有一次，朱德海书记叫我们来民族宫，我们三人是中午去的。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都在饥饿中受煎熬，我们在学校也吃不饱，还要练习舞蹈流很多汗，瘦得皮包骨头。饭菜端上来了，朱德海书记和崔采副书记为了让我们多吃，就把饭菜全都推到我们面前。那时我们都饿慌了，3个人低着头猛吃起来。饭菜是那么香，那味道我至今都忘不了。饿极了的时候吃的东西是最难忘的。艺校有一位舞蹈教员叫崔今善，现在居住在美国。有一次，我见到她，向她提起了当年的朱德海书记。她说：‘我不像你是团里的主要演员，可是朱德海书记一到北京也一定会把我们找去，请我们吃饭。’歌舞团的演员，无论是谁都有过这样的故事。有一天，朱德海书记把我叫到民族宫。我去了以后，发现朱德海书记的脸色很严肃，我顿时有些紧张起来。虽然朱德海书记平易近人，可他毕竟是自治州的党政首长，也有严肃的一面。待我把饭吃完后，朱德海书记问我：‘玉珠，听说你要到东方歌舞团去？’听了这话，我心里咯噔一下，紧张得要死。朱德海书记即使跟小字辈说话，从来也都是使用尊称，可是这次直呼我的名字。朱德海书记的情报来源也太快了，他是在哪儿听到我想去东方歌舞团的消息呢？我向朱德海书记照实直说，把东方歌舞团团团长让我留下来的话全都告诉了朱德海书记。其实，当时我也很苦恼，延边把我送到北京来学习，我怎么能背叛延边去东方歌舞团呢？没想到这件事情还是被朱德海书记发现了。朱德海书记试探了我的意思之后，命令我收拾行李马上返回延吉。他斩钉截铁地说，你别想再调到其他单位去了，延边就是你要待的地方。你说，那时我有多么天真，朱德海书记一说让我回延边，第二天我就乖乖地离开学习了三年的艺术学院返回延边，连个毕业证也没拿到手。回到延边后，因为

跟郑镇玉团长在工作上出现了分歧，想离开延边调到省歌舞团去。那是1964年发生的事情，当时连档案都拿到省民族歌舞团去了。我把想调走的事情悄悄地告诉了姚昕副书记，姚昕副书记听了以后表示理解，同意我离开延边去省里。可是，这件事情又被朱德海书记发现了。朱德海书记大发雷霆，结果我的档案在省团只待了一天又回到延边了。

“被朱德海书记从北京‘撵’回来的那年是1962年，也是自治州成立十周年。延边歌舞团正在准备庆祝十周年演出的节目。可是我们艺校却什么活动都没有。我毕竟是艺校的教员，心想哪怕是搞一场毕业演出也行呀，于是去找朱德海书记，提出我们艺校单独搞庆祝文艺晚会。那一年我27岁，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时自己的胆子也太大了，什么节目都没有排练，怎么搞庆祝晚会？朱德海书记支持我说，我相信你，你就大胆干好了。于是，我以艺校的毕业班学生为主排练节目，把在北京学到的8个舞蹈全都亮了出来，中间还穿插了独唱。朱德海书记看完以后，称赞我们演得很好。后来，我回到延边歌舞团担任副团长。现在的演员一过20岁，就说年龄大了得改行，可是当年朱德海书记主张，即使是生了孩子也无关紧要，只要还能搞艺术就行。为解决女演员的后顾之忧，朱德海书记还批准在延边歌舞团办全托托儿所。朱德海书记也许因为受苏联影响比较多，丈人、丈母娘和夫人金永顺也都是从苏联过来的原因，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也都是苏联式的。现在回忆当年的朱德海书记，觉得他虽然是党政首长，但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意识。他说，不能让演员牵挂孩子们，要让她们放心去演出。歌舞团办起托儿所以后，他任命金泰熙夫人为托儿所所长。朱德海书记还指示，要办一个像苏联那样的托儿所，就连购置保温瓶和水桶这样的事情都给予关心。那时，别提我们有多感激了。因为托儿所就设在歌舞团的院子里，我们能透过玻璃窗看

见自己的孩子，而且又是苏联全托式的管理方式，孩子们都睡在床上，还制定了伙食营养卡……

“可是，这么好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然受到批斗。我第一次看见朱德海书记挨批斗是1966年的10月，那时在延吉百货商店前面开的批斗会。当时，朱德海书记站在汽车上受批斗。我发现朱德海书记的夫人金永顺正流着眼泪站在最后面，就立即走过去安慰她说，朱书记是好人，这种局面不会长的，你要坚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铁杆的‘朱德海保皇派’。朱德海夫人被解放的时候，我是省政协委员。那次在省政协第一场演出时，我给朱德海夫人送去一张票。我身边的人都担心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敢把朱德海的夫人带来。可是，我没在乎。那时，朱德海夫人刚刚获得解放，很多人怕连累自己，都不敢跟她打招呼。可是，我不仅把她带来，还给她找了个位子坐下来。他们说简直是疯了，是不是还想挨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逼我说舞蹈《抗旱姑娘》是在朱德海书记的唆使下编出来的毒草，让我揭发朱德海书记的罪状。当时，我反驳说：‘不，我认为是香草。朱德海书记说这是社会主义的文艺，连毛主席看了演出都说好，怎么能是毒草呢？反映工农兵生活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他们看我坚决不承认是毒草，就说我是顽固不化的朱德海‘保皇派’。我在一生中见过很多领导，但是从没有见过像朱德海书记那样没有架子、遇到事情先为别人着想、为民族着想的干部。所以，每当想起朱德海书记的时候，我总会因为自己是朝鲜族而感到自豪……”

编舞家崔玉珠在回忆朱德海的时候，总是直言不讳。虽说她的语言有些过激，但是在她毫无修饰的言语表达中，蕴藏着一颗真诚的心，反而让人听起来感到十分顺耳。

## 延边医院和卢博士

1951年，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6月，有一天早晨，朱德海带领副专员董玉昆、秘书处处长金文宝和地委民政、卫生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延吉县县长全凤来、延吉市市长池圣禹（当时延吉市隶属于延吉县行政管辖），徒步来到了现在延边医院所在的大豆地里。之前，朱德海和林民镐、卢基舜博士已经多次来这里进行过现场考察。朱德海的一贯的工作作风就是现场办公。

“请各位看看，现在这里虽然是大豆地，是延吉市北面偏僻的郊外，但是我相信，以后延吉发展的话，这里一定会成为延吉市的中心。”

朱德海环视着随行人员，又意味深长地说：

“请大家记住，那一天不会很远的。所以，我们要大胆推进市区建设规划。如果这里成为市中心的话，就会跟哈尔滨中心区域一样。我们要以这里（延边医院）为中心，开出几条环城线路。医院首先要交通发达，这个道理我们谁都清楚。既然要在延吉建设医院，就要建一个最大的，而且比其他地方规模更大的综合医院。”

在朱德海的现场勘察和现场会议后不久，延边医院工程正式开工，也就是现在位于延吉市局子街119号的延边医院。

延边大学金炳珉校长介绍当年建设延边医院和延边医学院时期的情况时说：

“1951年，朱德海书记与林民镐和卢基舜等一起勘察以后，选定了延边医院的建设用地。……后来又经过朱德海书记的辛勤努力，不仅从省政府争取到资金，而且延边专员公署也调拨了资金。1953年清明节过后，延边医院新楼建设工程正式施工，12月竣工，建成了面积达11260平方米的三层楼医院用房。之后，朱德海又同林民镐、卢基舜一起，把医学院的校址选定在延边医院的北侧，

总占地面积达 147 720 平方米。为了延边医学院的基本建设，从 1953 年到 1957 年，朱德海亲自奔波，争取政府的支持和资金，终于建成了面积达 15 649 平方米的教学用房。后来，又争取到国家资金修建了达 20 000 平方米的教学科学用大楼和教职员宿舍。”

1951 年 7 月 1 日，延吉市人民政府批准 147 490 平方米土地为延边医院建设用地。此地块东边长 417 米，南边长 422 米，西边长 315 米，北边长 350 米。1953 年 3 月，吉林省人民政府根据朱德海的要求，为延边医院建设调拨了东北币 191.8 亿元（1 万元东北币折合人民币 1 元），延边专员公署调拨了东北币 40.4 亿元。同年 12 月，建筑面积达 11 260 平方米的三层大厦竣工并交付使用。1953 年 12 月，延边医院同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合并后正式迁入大楼。

延边医院的建设是延边医疗卫生界的一次软环境建设，也是一场革命。延边医院于光复第二年成立，并经多次脱胎换骨，成为延边医疗的中心，保证了延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治愈了大量的伤员。1957 年根据临床教学的需要，中共延边州委决定把延边医院归并于延边大学。到目前为止，延边医院对外使用“延边医院”和“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两个名称，而且是吉林省卫生厅的直属医疗机构。

朱德海不仅对建设医院大楼十分重视，而且对医务工作人员也给予了深切的关怀。1957 年 6 月 7 日夜 10 时 40 分，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神医”卢基舜<sup>7)</sup>教授，在延边医院 253 号病房因患

---

7) 卢基舜，延边医学院教授、博士，1893 年出生于图们市。1917 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1931 年 6 月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研究生学科，1932 年 1 月获博士学位，随后担任朝鲜釜山小儿科医院院长。1936 年 6 月回到中国，先后任牡丹江市国际医院医师、图们市立医院院长。1946 年 10 月参加革命，担任吉林省龙井医科大学校长、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分校教授、延边医学专门学校校长、延边大学医学部部长。

动脉硬化、脑溢血逝世。6月9日《延边日报》登载了“医学博士卢基舜去世”的讣告。

卢基舜博士在延边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去世以后，朱德海以自治州委员会（州委）的名义组织了由17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朱德海任主任，副书记姚昕和副州长田仁永、李浩源、石东洙及延边大学副校长林民镐任副主任。朱德海建议为卢基舜博士举行隆重的葬礼，并动员州委和州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追悼会。

9日下午，在延边大学医学部校园里举行了卢基舜博士遗体告别仪式，朱德海亲自致悼词。那天，天阴沉沉的，下着蒙蒙细雨。延边医疗界一颗巨星陨落了，人们的心情无比沉重。追悼会在露天举行，所有参加的人衣服都被淋湿，但是谁都没有离开。朱德海的衣服也淋湿了，随行人员有些担心，但是朱德海跟州委和政府的其他干部一起一直坚持到最后。按照朝鲜族传统的葬礼习俗，还进行了出殡祭、丧輿运柩和下棺。追悼会一结束，直接举行了传统葬礼。在护丧的号哭声中，随着嗨咿、嗨咿的号子声，八个人抬的丧輿慢慢向墓地走去。人们忽然发现，朱德海头一个牵着丧带走在丧輿前面，姚昕、田仁永等州委副书记和副州长也都跟着朱德海执紼走在前边，后面跟着的是前来吊唁的宾客。葬礼队伍从延边医学院的校区一直绵延到公园桥。朱德海为首的丧輿队伍来到延边大学后山脚下，延吉市数千名市民沿街目送卢基舜博士，并对牵着丧带的朱德海投去敬重的目光。

这一天，延吉市民看到了两个震撼人心的场面，一个是延边的神医去世，一个是自治州州长亲自执紼走在灵柩前面。时光荏苒，时过境迁，但是那天朱德海穿着淋湿的衣服，牵着丧带弯着腰，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向前走的背影，给延吉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后，有人认为，卢基舜博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州委

书记、州长等领导不但参加追悼会，还为他执绋，这是没有立场的行为，是“右倾”表现。听到这些背后议论，朱德海理直气壮地驳斥说：

“什么是品德？我们党历来把每一个党员的品德放在首位。我，朱德海在担任州委书记、州长以前，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普通人参加另一个普通人的葬礼，运柩、牵着丧舆有什么错？而且，尊重、关心知识分子是我们党一贯的方针政策。卢博士在医学理论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果，给医务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卢博士是一位把平生心血献给我们民族医学教育事业的德高望重的医学教育家。他忧虑人民的疾苦，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人民的健康事业。难道向这样的知识分子致哀有什么错吗？”

朱德海对延边大学医学院院长卢基舜博士极为尊重和信任。他和卢基舜博士还是一对棋友，一见面必先下一盘棋，然后再讨论工作。卢基舜博士性格有些怪癖，对人并不是很温和。1948年秋天，卢基舜博士按照东北军区卫生部长贺舒的命令，来到刚刚建立的延边医学专门学校任校长，1949年，学校与延边大学合并以后任医学部部长。卢基舜博士第一次见到朱德海时，觉得他土气，对这样的人担任延边的党政首长兼延边大学校长不太服气，所以一直没有打开心扉进行交谈。但是，见面两三次以后，卢基舜博士不禁由衷地被朱德海的人格魅力所打动，并表现出了积极的支持。

卢基舜博士拥有高超的医疗技术，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组织上就委托卢基舜博士以延边地方病调查组负责人的身份调查地方病的起因，研究有效的措施，从而基本上控制了克山病、土质病、甲状腺肿、大骨节病的发病率。卢博士病危住院接受治疗的那些日子里，朱德海多次到医院探病，鼓励他战胜病魔。

卢基舜博士是出了名的好酒之人。住院期间，他仍然在病床旁边放着酒瓶，时而喝上两口。他喝酒的方式不同于别人，每次

喝酒都在酒里兑上凉开水再喝。平日里，他把这样兑好的酒放在办公桌上，当作茶水喝两口。卢博士去世的时候，留下了把自己的尸体交给病理解剖教学的遗言，表现出了医务工作者最高贵的品德。

卢基舜博士和他贤淑的日本妻子冈岛千惠子留下了三儿四女。卢基舜博士逝世后，朱德海对他的家人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据朱德海的长女吴英彩回忆，朱德海逢年过节，严禁同事和部下到家里来，可是特别欢迎延边大学教授卢基舜博士的夫人和遗属到家里来。

不仅是卢基舜博士，郑奎昌<sup>8)</sup>教授也是朱德海的莫逆之交。由郑奎昌口述、李银实整理的回忆录《把一生献给朝鲜族医学教育》中，有一段关于郑奎昌教授与朱德海友情的佳话：

“1949年4月1日延边大学创立以后，延边医科专门学校改称为延边大学医学部，由卢基舜博士任部长，郑奎昌任副部长。当时，延边大学因缺少宿舍，搬到现在的龙井市政府办公楼（原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分校）里，一年后搬回延边大学新化学部的楼里。1954年，经朱德海书记的努力，东北行政委员会拨款70万元备齐了新的教学设备，成为比较现代化的医学院。在这一过程中，朱德海书记和郑奎昌副部长频繁接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56年的一天，延边大学召开教员大会。延边大学党委负责人在会上做动员说，无论对党有什么意见都不要有什么顾忌，尽管提出来，协助我党搞好整风。医学部（延边医学院独立之前）

---

8) 郑奎昌，1917年10月1日出生于朝鲜平安南道。1941年12月毕业于新京医科大学医学部，1945年8月起先后担任龙井医科大学、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分校教员和延边医专医学科主任，1949年4月任延边大学医学部基础讲座总讲师，延边医学院创始人之一。先后担任医学部副部长、医疗部主任，还兼任延边医院院长。1978年8月被授予教授职称，同年任医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1985年9月任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让郑奎昌负责收集群众的意见向党委汇报。

当时，郑奎昌虽然是医学部副部长，但还不是党员。郑奎昌出于帮助我党搞好整风的一片诚意，找教员谈话，收集他们对党组织的意见，并综合为12条意见后交给了党组织。其中有一条意见是“党和群众的关系紧张，请从速予以解决”。郑奎昌毕竟是中国知识分子，还具有视清廉和真实为生命的朝鲜族儒生精神。那个时代，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解释问题的。但是，郑奎昌根本没有意识到“党和群众的关系紧张”这一条意见会给自己带来危害，也没想到会在学校里引起轩然大波，还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

就像“干部一张纸，帽子一句话”这样的新名词在政界流行一样，否定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使郑奎昌真正领略到了“帽子一句话”的含义。两年以后的1958年，郑奎昌在极“左”政治棍棒的挥舞之下，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一戴就是整整21年。他戴着“右派”帽子在社会最底层受尽折磨。

1949年夏天，郑奎昌作为延边大学赴朝鲜平壤医科大学考察团一员到朝鲜访问时，其父母和妹妹苦苦哀求他留下来跟他们一起生活。他极力说服亲人，说延边的医学教育事业需要他。当时，他父母和妹妹穷得连个像样的盛饭盛汤的碗都没有，可是郑奎昌还是毅然回到了延边。共和国成立以前，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从那以后，只要是党组织吩咐的事情，他二话没说，挺身而出。后来，曾经极力劝说郑奎昌留在延边工作的林春秋去了朝鲜，但是他仍然毫不动摇，继续为朝鲜民族的医学教育事业劈荆斩刺。可现在自己怎么成了“右派”呢？郑奎昌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有一天，窗外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雨水拍打着满是污垢的窗玻璃，如同眼泪般地流下来。郑奎昌站在窗前茫然地望着那一行行流下的雨水，十分沮丧，愁闷不堪。就在这时，外边

突然亮光一闪，一辆轿车驶进院子里。夜这么深了，哪来的车呢？他正在纳闷的时候，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他不禁打了个寒噤。

“是谁？”郑奎昌紧张地询问。

敲门声再次传来，一个女人推开门轻轻走进屋里。郑奎昌一惊，来人原来是朱德海的夫人金永顺。

“天这么黑，金老师您怎么……”

当时，金永顺是党校教员，所以大家都称她老师。

“是不是朱书记身体不舒服？”当时，郑奎昌虽然被免职了，但是在医院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还是一位诊断奇才。

“对不起，深更半夜来打搅您。正是我家老朱让我来请郑院长的。咱们赶紧走吧。”

郑奎昌很纳闷，想问问朱德海为什么请他去，但是看了金永顺脸上的表情后什么话也没说，跟着她上了车。苏制“瓦斯69”型轿车载着他们在风雨中急驶，很快来到坐落在布尔哈通河北堤后面的朱德海住宅。

这是日帝时期日本军官专用的宅子，当时朱德海一家就住在这里。朱德海正在看《延边日报》，见到郑奎昌进屋，就招手让他快上炕。

“呵呵，快上炕吧。半夜叫你过来，你不会见怪吧。”朱德海握了握郑奎昌的手，然后接着说：“夜里下雨，连我这样的人都没什么好心情，你郑院长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想请你来聊聊。”

朱德海给郑奎昌让坐。郑奎昌比朱德海年轻六岁。金永顺摆上了简单的酒桌，看来是早已备好的。

“俗话说，门前过客不讲究，郑院长，你也算是门前过客，所以我也就不讲究了。我们就这么无拘无束地坐着聊吧。虽然半夜里避开别人的眼睛把你请来，但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不过，酒有的是，你不要客气，敞开喝。其实，我是怕郑院长一个人独自

烦闷，想给你宽宽心，才请你过来的。你可以把心里想的全说出来。”

眼泪在郑奎昌的眼眶里打转，但他硬忍住了，没有让眼泪流下来。郑奎昌再一次痛感到，人一陷入困境，感情就会无比脆弱。

“郑院长，你知道我的酒量。所以，你就别管我，尽管自己喝。”

朱德海亲自给郑奎昌倒了一杯酒，郑奎昌拿起杯子一饮而尽。

“不要急，慢慢喝。”朱德海说着，把菜碟子挪到郑奎昌面前，然后语重心长地说：

“现在政治形势过于复杂，所以要小心才好。以我现在的心情，很想照顾好像郑院长这样的知识分子，改善政治待遇，提高社会地位，但是就目前的政治环境来说，我只是一个负责延边自治州的州长，的确无能为力。在你们眼里，也许因为我是自治州的党委书记，又是州长，权力大，只要愿意的话什么事都能办成功，其实不是这样的。在中国，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广泛开展的政治运动，对文化、教育界人士打击很大，运动的强度是不可想象的。打击的力度这么大，我也是没想到的。你也知道，很多作家也都被戴上帽子，受到社会的排斥。这次运动既然是中央发动的，中央也会有新的指示的。……你们是社会的财富，我们党会改变对知识人才的待遇。所以，你要相信中央，要耐心地等待。”

朱德海的一席安慰话，使郑奎昌解开了心中疙瘩。朱德海的这些肺腑之言，对蒙受不白之冤、陷入政治斗争漩涡中挣扎的郑奎昌来说，无疑是一颗定心丸。

朱德海又给郑奎昌倒了一杯酒，接着说：“任何时候，我们党都是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但是，遇到像这次这样的运动，我们应该有退一步的肚量。郑院长，你曾经担任过延边医院的领导，有行政能力，所以不要以局部的现象来掩盖和代替真相。”

“朱书记，那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只是把群众的意见归纳以后向组织反映而已。”郑奎昌急忙为自己辩白，不过实在是太天真

了。

“呵呵呵，在党和群众关系的问题上，决不能混淆事实和真实。无论怎样，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这才是真实的，这一点绝对不会变的。来，再喝一杯，醉了也没关系。不要太苦恼，要做好工作。别人对郑院长怎么想我不清楚，但是，我朱德海是相信郑院长的清白和忠心的。我相信，历史一定会有公正的结论。”

“是，我明白了。”

那天晚上，郑奎昌被朱德海厚道的人情所感动，开怀畅饮朱德海给自己倒的一杯杯酒。

### “反右”斗争和“地方民族主义”

1956年12月8日，延边地方委员会按照中共吉林省委11月19日的决定，改称为“中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员会”。但是，名称的改变并没有给延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反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1957年5月1日，各家报纸转载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党的整风运动，提出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性的批判和意见。

接着，各家报纸也刊登了全国各地广大群众和党外人士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我党提出大量有益的批判和意见的报道。事后，人们以通俗的语言解说这次运动是“先宽宏大量地引诱你说出真心话，然后再把说真话的人当作右派抓起来”。中国的高层

领导也没预料到这次运动会会出现怎样的结果，会是怎样的走向。

同样，以朱德海为首的延边党政领导也没有预料到这次政治运动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没有料到这次运动会走向毁灭人性的极端。州委按照上级的指示，从5月下旬开始发动群众“鸣放”，号召群众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迈开了整风运动的第一步。

整风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召开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座谈会征求意见。运动首先从文教部门开始，先在文化界进行。5月20日，延边文艺界人士以中国文化界的“政纲政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为旗帜，在延边文化剧场南侧会议室召开了首次座谈会。

座谈会由朱德海主持，并作了简短的讲话：

“我们党从延安时期开始就开展了整风运动，发扬民主，提出意见，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不纯思想。能不能搞好党的整风，在于大家能不能敞开心扉，充分提出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出现错误的意见是不可避免的，这不能算是过错，错了也没关系。观察一事物，人们对它的结论不可能是一致的。同样，作为文化人要全面、正确地判断一个问题也是不容易的。鲁迅的文学精神表现在他的批判意识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批判意识强。所以，知识分子是中国的文化财富。我们党创立新中国，在领导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过程中，也曾犯过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犯错误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能不能纠正错误。为了执政党的纯洁性，为了长期执政，一定要解决好存在的问题。具体地说，我们延边也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我们党是为民众谋利益的政党，我们党会诚恳地接受意见，并在执政中加以改正。”

当时，朱德海的发言是由衷的，但是后来，朱德海因主持了这次会议，又在会上诱导与会人员发言，被误会为不保护知识分子，

给知识分子戴右派帽子。那时，朱德海误以为这次整风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继续，想到的只是通过纯粹的整风运动加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这一时期，不仅是朱德海，延边其他党政干部和文化界人士的出发点都是纯正的。这种近乎神圣的纯正，使文化界的人士敞开胸怀，把心里的话掏出来给组织听。时任文教部长的李羲一随朱德海参加了那次会议，并把与会者的发言记录下来。接着科学界也召集了内容相似的会议，延边各县市、延边大学、石砚造纸厂、开山屯纸浆厂等企事业单位，以及州民委、州文教处，还有省内通化市、吉林市、长春市、海龙县等民族杂居地区的代表们也都纷纷召开了大型座谈会。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新闻出版、工商界、民委等单位参加的座谈会，先后召开了七次。

李羲一在《艰难的历程》一书中写道：

“……座谈会上主要反映了在分散地区存在的民族问题。如民族歧视问题，不重视民族文化教育以及因此在民族文化教育中产生的问题，民族干部不重视民族语言使用的问题，关于发展民族工业发展的问题，建立卷烟厂、制药厂的问题，建立中等工业专门学校以培养民族技术干部的问题等等。此外，还提出了祖国观的问题和有关爱国主义的问题、把自治州扩大成立为自治区的问题……”

朱德海在座谈会上讲话：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了解各地区贯彻民族政策的情况，听取大家关于对民族问题的意见。解放后，我们党实施民族平等政策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全国已经成立了2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50个自治县。计划再建立2个自治区，并继续建立自治县。已经培养了20万的民族干部，绝大多数民族地区经过民主改革进入了社会主义。由此，自行管理民族内部事务的关键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在组织参观团相互学习中，大幅改善了民族关系，曾经在

历史中形成的矛盾也基本化解，形成了友爱合作的新的民族关系。多民族生活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存在民族关系问题。中国正在实施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根本性政策，也就是实施民族平等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在谈到爱国主义问题的时候，朱德海斩钉截铁地说：

“现在，在延边有所谓的政治祖国、民族祖国的争论。我认为在有关祖国的论争中，首先不应该混淆国家和祖国的概念。居住在中国的公民，他们的祖国就是中国，不能有其他的祖国。延边的朝鲜族因为历史的特殊性而热爱朝鲜，这是因为拥有共同历史的原因。但是，祖国观绝不能糊涂。”

在几次召开的会议上，朱德海都讲得很坦诚。但是，整风运动的打击目标出乎意料地转移到了“极左”的方向。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表现出了极“左”倾向：“……现在少数人借我党整风之机，反对党和社会主义，企图代替党的领导，向党发起进攻……”7月中旬，省党委和州党委进行了关于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动员。

延边的形势跟全国一样，8月正式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以朱德海为首的延边党政干部起初有些疑惑，但是又不得不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运动到底如何发展，谁也没法估计。延边自治州是全国30个自治州之一，地处中国的最边缘。为了搞好整风，在座谈会上坦诚直言的人都被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线索。郑奎昌、崔贞延、金学铁、金舜基、徐宪等作家和学者受到了批判斗争。从结果来看，所谓的“鸣放”，成了开展反右派斗争的策略和挖出右派分子的手段。

1958年开始，接着反右派斗争又开始了民族整风运动。结果，已经受到批判和斗争的大多数朝鲜族右派分子又被戴上了地方民



族主义的帽子。朱德海曾经预感到的事情终于变成了现实。这时，朱德海更是想不通。他很清楚，所谓的民族整风是在反右派斗争的延长线上进行的运动，是揪出所谓民族主义分子的运动。朱德海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政治考验，由于他站在运动的最前线，很可能在不可思议的时候，从不可思议的地方飞来不可思议的打击。

1958年4月15日，自治州委员会（州委）召开了关于在延边深入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民族整风运动再动员大会。延边各县市委的书记参加了大会。大会由姚昕副书记主持。省委副书记关锋和省委统战部部长宋任穷在会上讲话。只有朱德海没有讲话。所以，这次大会也可以认为是排斥朱德海、批判和斗争朱德海的动员大会。姚昕在讲话中指出，延边的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巨大成果，全州共揪出右派分子、民族主义分子972人，其中，民族主义分子486人。（摘自李羲一《艰难的历程》）。

此后，延边的政坛上有种种传闻，说朱德海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就要倒台了。这时，朱德海很清楚要把自己赶出政治舞台的牵头人物及其内幕，所以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在中国官场上，执政的人被迫下台或隐退叫“下野”，朱德海做好了承受政治打击“下野”的思想准备，也让妻子做好了思想准备。

“干部一张纸”这条新词语是对干部的任命和调令的比喻。干部的升职和降职的程序简单，就是所谓的“帽子一句话”。如果“朱德海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命题成立的话，那么，从那时候起，朱德海就得戴着沉重的帽子结束政治生命。可是，在中共党员和干部中不乏政治立场坚定、品德高尚的党员和干部。笔者追寻朱德海的生活年代，在反复对照、核实无数资料及采访中，感觉到我们的长辈，特别是与朱德海在平职或垂直关系上工作过的某些领导，他们跟朱德海之间的那种微妙关系。只有老干部、老同志

才能知晓的这种藏而不露的人际关系，即使写出来，也只会沦为小道消息而绝无结果。所以，笔者放弃了在那一方面的采访。不过，心中的疑虑还是要解开的。

“呵呵，我怎么知道啊？”熟悉那个阶段情况的某位领导干部，起初回避了细节，但是对我提出的疑问也没有否认。此后，我虽然偶然掌握了当时给朱德海扣上“地方民族主义”帽子的背景，但是为了躲避给读者传递不必要信息之嫌，这里就不再记述了。

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朱德海基本上处于“落马”的状态。朱德海的所谓“地方民族主义”，虽然后来由组织澄清了事实，但是，朱德海的命运从此与看不见的暗流联系在一起。其中，我们民族自治州某些领导成员以缄默发起的攻击，也起了极大的作用。这无疑是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

郭沫若在《朝鲜义勇队》中写道：

“……（在武汉）我乘坐的车经过后城的时候，看见书写标语的人（朝鲜人）还在继续工作。他们三四个人一组，手里拎着柏油或油漆，扛着梯子，辛勤地抓紧时间工作。我承认这一情景既感动了我，也让我羞愧难当。他们都是朝鲜义勇队的朋友，他们中间确实连一个中国人也没有。我们中国也有不少懂日文的人，光日本留学生至少也有几十万。可是当武汉面临危险关头时，街上书写大幅标语的只有朝鲜的朋友！……朝鲜义勇队的组织形态不是很清楚，不过他们的思想好像很复杂。这是朝鲜朋友共同的毛病。他们派别多，总是达不到统一……”

郭沫若的看法是对的，“他们（朝鲜人）派别多，总是达不到统一”。“表兄买地就眼红”是我们民族独有的俗语。

中国的政治运动使我们这个“派别多，达不到统一”的民族，群体之间更是相互攻击、拆台。事后，也只用一句“政治运动嘛，在特定时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来敷衍塞责。不可否认的是，

如同在金钱和生死面前才能看出人的道德品性一样，在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面前，人性的刻薄和缺点暴露无遗。从文化的角度透视这一现象，可以说这是由中国朝鲜族特殊的、局限的民族地位所导致的自私自利的“生存竞争”。这种竞争是在形成朝鲜族共同体，确保坚强的整体性和同质性，克服其他民族异质性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正面（效应）和反面（效应）共存。朝鲜族从迁移的时候开始，表现出了对中国特有的生存环境的适应。这种适应虽然凄苦，但是确保了生活的地位，获得了生存的空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地位得到了保障，民族成员之间的竞争意识也愈加强烈，从而产生隔阂，导致了最不应该的派别争斗和相互攻击。

扣在朱德海头上的“地方民族主义”帽子，其实，事先已经由对朱德海不满的部分少数民族干部准备好了。这些人发现时机到了，就弯弓把毒箭射了出去。他们所说的朱德海的“地方民族主义”有以下几条：第一，有的人不是搞共产主义政党的建设，而是搞民族主义政党的建设；第二，扩大民族自治州，企图建立“独立王国”；第三，在祖国问题上，主张政治祖国、阶级祖国、民族祖国等“多祖国论”；第四，以消除民族之间事实上不平等作幌子，强调民族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只想维护本民族的利益；第五，认为朝鲜民族是优越的，汉族是落后的；第六，主张民族语言的纯洁论。

就是幼儿园孩子也能听得出，这是针对朱德海政治生命的别有用心地攻击。其中的条目早在整风运动第二阶段“鸣放”时期，就有少数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其一，在教育的问题上，他们认为朝鲜族学用汉语是“同化”；其二，在民族自治问题上，他们盲目地提出扩大自治区，提高自治地方的行政地位，脱离省的领导，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其三，就是他们自己提出的“多祖国论”。

当时，朱德海对少数人提出的这些观点做了斩钉截铁的回答，但是整风到了第三阶段变了味，反而被人滥用为攻击朱德海“地方民族主义”的罪证。

整风运动到了第三阶段，发展成为反对“右倾”，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从7月26日至8月6日期间，州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整风。各县（市）党委第一书记，部分工矿企业的党委书记，州委部长、副部长参加了会议。会上，朱德海和姚昕做了自我检讨。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关于改进民族工作，全面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的整改方案。

关于朱德海的自我检讨，还有这么一段插曲。《不灭的英灵——崔采》（柳燃山 著）一书中这样写道：

“……朴春植<sup>9)</sup>说：‘我1954年从部队转业，到吉林省民委报到。崔采同志是1958年调到省里来的。我经常跟崔采同志去延边，每次都能见到朱德海书记。朱德海书记来省里，也经常来找崔采同志，我就给他们跑跑腿。他们两人都是少言寡语的性格，在一起除了谈工作以外，从不谈其他无聊的话题。民族整风一开始，省里派出以关书记为首的工作组到延边，我也跟着崔采参加了工作组。在州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朱德海同志自我检讨说‘我有民族情绪’。当时，我和关书记的秘书两个人作会议记录。回到长春以后，有一个部长来问我，朱德海在民族整风会议上检讨的时候，说他有民族主义的思想还是有民族情绪？我回答说，他说自己‘有民族情绪’。那个部长不相信，让我跟他一起去关书记的家。关书记的秘书也接到通知来了。我们两个人对照了会议记录，分明写的就是‘民族情绪’。那个部长这才无话可说……’”

中央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规定，与民族区域

9) 朴春植，1950年8月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第6处训练队，1954年部队转业后，历任吉林省民委干部、吉林省统计局党组书记。

自治地方邻接的地区（区和县），根据政治、经济上联系的需要和民族比例情况，可以划归自治地方。在建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筹备工作的时候，朱德海为发展党的民族事业做了长远打算，并根据《纲要》的规定，计划把敦化县、蛟河县和长白县划归延边。省政府派出6人调查组，对敦化、蛟河两县进行两次调研后，原则上同意敦化和蛟河归属延边。后来，因受到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冲击，只有敦化归属了延边。然而，他们竟然不顾事实，攻击朱德海是想扩大自治范围，建立“独立王国”。

尽管这些计划符合我党规定的政策，也得到了省里的批准，但是却被他们滥用为给朱德海扣“地方民族主义”帽子的罪证。

朱德海的民族观，其实早在1948年吉林民族工作会议上已有定论。朱德海任延边党政首长以后，为保持民族平衡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汉族干部和朝鲜族干部比例失调问题，汉族和朝鲜族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和不均衡问题，以及教育问题等，都是光复前遗留下来的特殊历史现象。朱德海多次召开地委常委会，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朝鲜族和汉族平衡及缩短朝鲜族和汉族差距的措施。

“我们一定要抓好民族之间的综合平等和平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存在的民族之间不均衡和差距，已经成为影响延边社会环境建设的障碍。要想搞好这项工作，需要政策的扶持，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具体实践也很重要”

在朱德海的主持下，延边地委早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朱德海多次向有关部门请示，从内地调来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1950年至1951年之间，又从内地调来了一批汉族大学毕业生，发展延边的汉族教育，首次建立了汉族高中。从1955年起连续几年，每年推荐100名汉族高中毕业生到东北师范大学接受培养。此后，又让延边的三个高等学校在招生的时候，都要招收地方的汉族学生。由此，很快发展了汉族的教育体系。在教育经费的使用上，

朱德海指示要多照顾汉族学校，甚至拿出上级拨来的民族事业特定经费补贴汉族学校。

在生产上，朱德海一方面鼓励汉族农民多养猪，多养鸡，增加家庭副业收入，一方面又积极扶持汉族农民种水田，动员朝鲜族技术员给汉族农民传授水田管理技术。经过几年的努力，平原地区的大部分汉族农民学会了种水田，与朝鲜族农民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逐渐缩短，汉族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在干部培养上，朱德海通过省委把其他地区的汉族干部调来延边担任各级领导工作，并由组织部负责，把本地汉族干部中思想品德好、政治素质高的汉族同志送到各级党校和团校培养。朱德海又大胆地使用汉族干部，使他们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于是，大量的汉族干部迅速成长起来，逐渐在全州范围内形成了从上到下各族干部相互合作的体制。

据延边教育出版社任志先生（1943年出生，2004年退休）介绍，其父亲任继尧先生（1911年出生，吉林省政协常委，副厅级）原来生活在辽宁省。1951年朱德海到辽宁省考察农业时，发现那里养蚕业很好，就向辽宁省人民政府请求，调任继尧先生到延边养蚕研究所（现在的延边特产研究所）工作。任继尧先生先在汪清进行研究，后来搬到龙井县龙水村。任继尧先生为发展延边的养蚕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59年获得“五一劳动勋章”。当他从北京回到延吉的时候，朱德海亲自带领随行人员到延吉车站迎接，并举行宴会慰劳他。同事们看到朱德海亲自送任继尧先生回单位的时候都很感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任继尧先生同延边的其他汉族学者、技术员一起享受了100%的细粮和两斤豆油的特殊待遇，这些都是朱德海亲自指示落实的。任志先生是主动找笔者提供线索的汉族同志。他说，朱德海是自己最崇拜的人，他崇拜朱德海厚道的人品和尊重知识分子的先进工作理念。他还说，父亲生前最尊重的人也是朱德

海，自己对朱德海的崇拜是受了已故父亲的影响。

尽管如此，整风运动把朱德海的这一系列功劳抹煞殆尽。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次会议，历史上称“庐山会议”。事实上，这次会议是为了解除提出纠正党中央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左”倾路线方针的彭德怀、张闻天的职务，是为了驱除在党内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参加会议的朱德海目睹了实事求是的两面性，体验到了政治运动的残酷性。面对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国防部长、元帅，被打成“反党”而免去职务的残酷现实，很多干部谨小慎微，缄口不语。会后，在全国党员和干部中查处了三百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原延边州人大主任曹龙浩在《深深怀念朱德海同志》一文中，对朱德海的民族工作作了如下评价：

“1952年10月，自治区书记朱德海、副主席董玉昆，批准我代表民政处提出的关于大力开展群众性民族团结运动，召开民族团结模范代表大会的建议。参加会议的各族代表共366名，实际有36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是在从下到上普遍召开民族团结模范代表大会的基础上召开的。从基层来的代表作了典型发言，交流经验，为发展民族团结事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朱德海主席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及加强民族团结的报告，使参加大会的代表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更加认识到了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朱德海同志倡导的民族团结模范大会，在延边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每五年召开一次。1994年、1999年、2005年连续3年，国务院命名延边为全国唯一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自治州’，民族团结事业一直走在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前列。全国少数民族接待工作也是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参观团一行200余人参观延边的时候，朱德海同志

对接待工作给予高度的重视，指示我对参观团的住宿和饮食问题一定要安排好。2月18日，朱德海书记在州政府会议室会见了参观团的全体成员，向他们介绍了延边自治州的概况，陪同他们参观了延边大学、延边医学院、延边一中、延边农业机械厂等单位。晚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延边歌舞团演出了节目。在朱德海书记的关心和重视下，我州的接待工作受到了参观团成员和刘格平副部长的高度评价，为增进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作用。1962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经常跟新疆班的学生接触，交流学习经验。他在中央党校跟新疆班学习团的纪念合影至今还保管着……”

原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张逸民在反右斗争时期是延边医学院的党委书记。他对上级的指示和作法也有疑虑，曾经到朱德海家去向他倾诉了心中的疑问：

“党的有些政策真的是没法理解。难道我们是为了开展这样的政治运动才流血创建共和国的吗？向党提出党内存在的问题就成了右派，如果一贯使用这种片面的压制方法，我们党会失去执政能力的。现在，机关内部和干部中，对朱书记是地方民族主义的传闻很多。无风不起浪，这不可能是平白无故传开的。我也听说国家民委的某些干部和省委少数人正在搜集资料向中央提交。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整人，我真的不理解。”

“我无法理解的地方也很多。但是上级要求我们这么做，我们有什么办法？文化界的作家和艺术家说了真话，就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真是太不幸了。全国也是一样。费孝通、丁玲这样的科学家、作家也都被打成了右派。依我看，这是上级对基层的实际还没有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现在也只能这么理解了。总有一天，中央会重新提出实事求是的政策。所以，不要再发牢骚了。”

两人深深地叹了口气。遗憾的是朱德海没有任何权力来保护所谓的“右派”。

吉林省委书记、省长吴德看到关于朱德海地方民族主义的材料后大发雷霆。他知道，国家对于在民族地区工作过的干部是予以肯定的。这也说明了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重视。在民族工作中，干部是决定一切的重要因素，所以党中央历来重视民族干部。吴德深知，培养一个民族干部并不容易，也懂得对朱德海这样延安出身的民族干部更不能随便乱扣帽子。何况，吴德早就知道朱德海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品德，也知道朱德海在延边民族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吴德当场把文件合上后说：“副省长同志（朱德海）是最懂党心的人。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干部中，有几个像他这样优秀的民族干部？中央不是经常强调我们在朝鲜族的问题上要多听听朱德海同志的意见吗？蒙古族有乌兰夫，朝鲜族有朱德海呀。”说完，他指示办公厅工作人员把朱德海的材料密封，等待重新请示党中央。此时，总书记邓小平正好来长春，吴德向邓小平总书记汇报了朱德海的情况，并说了自己的看法：“朱德海书记是值得信赖的同志。他的问题不少是某些人的成见。还有，这份文件是省和国家民委的几个人在没有经过省委的情况下秘密上报中央的。”吴德的态度很明朗，邓小平听了以后就叫省委自行处理。（摘自《朱德海的故事》）

吴德立即到延边召开处长级（县级）以上干部会议，充分肯定了延边取得的工作成就和朱德海的工作成就，把朱德海从政治攻击和诬陷中解放出来。后来，朱德海在湖北五三农场劳动改造的时候，吴德得知朱德海患肺癌后，购买了德国进口药品送到朱德海那里。朱德海在五三农场去世以后，遗属途径北京返回延吉时，吴德接见了朱德海的遗属，并招待他们吃北京烤鸭，还建议他们在长春定居生活。朱德海遗属最终决定留在长春生活，吴德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 东西南北的故事

采访朱德海的长女吴英彩的时候，笔者要求她讲一讲生活方面的故事，她第一句话就是“父亲可喜欢冷面了。”

“我小的时候常听父亲说，延吉三千里冷面馆的冷面最好吃。他从老头沟出差回来以后，又说那里的冷面好吃。后来又说珲春凉水的冷面也不错，服务大楼的冷面也很好吃。当时，我还跟着父亲去服务大楼吃过那里的冷面。”

朱德海对民俗饮食十分偏爱，像豆腐酱、辣椒酱、泡菜、冷面等。其实，不仅是朱德海，我们民族都特别喜欢冷面。

“父亲说，延边冷面的味道是按照东北的气候特点加工出来的，保持了我们的祖先过江时带来的味道。他经常念叨刚到龙井后吃过的冷面。父亲说，日子好一点的人家，备一副模子，不管冬天还是夏天都自压冷面吃。在咸境道，冬天的时候，人们还搞荞麦冷面聚餐。他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时候，顿顿吃面包，所以就非常想吃冷面。在延安的时候，一想到故乡的冷面就馋得要命。托父亲的福，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经常吃冷面。至今我还忘不了，那时在延吉服务大楼花两毛钱就能吃一碗冷面。”

如果不是特定的宴会，朱德海一般不搞外交性的排场。如果客人来了，大多是在办公室简单地点两碗冷面吃。那时，农民把到延吉吃碗冷面看成是很自豪的事情。金时龙、崔日鲜、黄顺玉、李玉今等州内农村干部随时来找朱德海，他都用冷面来招待他们。1956年，作为延吉象征的服务大楼开张以后，朱德海就经常领着客人到服务大楼去吃冷面。

去延边的任何一个乡镇，都能听到有关朱德海的轶事。其中，图们市凉水镇关于朱德海在饮食方面的故事最多。这是因为这里的地理人文环境使然。当时，延吉至珲春国道，经过延吉、苇子

沟、图们、凉水、密江后到达珲春。按现在的速度，从延吉到珲春也就需要个把小时，可是当时从延吉到珲春路过凉水镇的时候就已经是中午时间。尤其是车开到图们至凉水之间以险峻而让人生畏的高乙岭时，所有车辆都如乌龟般慢慢爬行，会耽误不少时间。同样，从珲春返回延吉要过大八岭，到凉水镇的时候也已经到了中午时间。所以，凉水就成为延吉至珲春的驿站和歇脚处。凉水的对岸是朝鲜的稳城，光复前稳城的冷面业很兴盛，夜里小商贩偷渡图们江到稳城掏钱吃碗冷面是常有的事情。稳城的冷面也就在凉水传开了。凉水的“稳城冷面”和“龙井冷面”，大体上都是以荞麦和淀粉作为原料做成的。大多用骨头汤和鸡汤作为冷面汤，但是从材料的配法到调料、调味汁等一切调理法都是商业秘密。民间的这些冷面发展成为今天的延边冷面，并达到了鼎盛期。

已故李珍顺的四女儿金淑子（1943年出生，居住在凉水镇石头村）在接受采访时说，母亲李珍顺是在凉水经营“龙井冷面屋”的时候认识朱德海的。

“现在也许很难理解。大跃进（1958年）前和大跃进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国家是允许个人办饭店的。后来，出现了合作社（供销社）集体食堂。母亲经营的‘龙井冷面屋’也就被集体食堂合并了。母亲领着国家薪水在集体食堂继续做饭。我们七兄妹，都是母亲靠一双手养大的。母亲的手非常巧，不仅在凉水，就是来往于珲春、图们的客人也都说我母亲做的冷面好吃，都会到母亲经营的冷面屋吃一碗。朱德海书记就是那些客人中的一位。后来，朱德海书记还请母亲到延吉某饭店传授冷面汤的制作方法。当然，现在一般不可能教授那些秘方的。那时就不一样，想学就会教你。母亲回家的时候，带回好多东西，都是朱德海书记送给母亲的礼物，有绒布做的民族服装，还有白胶鞋。要是母亲还活着的话，正好一百岁了。听母亲说，她去延吉还教给了他们做米糕的方法。”

珲图公路从光复以前开始到80年代中期，都经过现在的图们市凉水镇所在地。路两旁开饭店迎客是很自然的事情。虽然现在这里比较寂静，但是当时这里却是热闹非凡的地方。从村口到村中间，解放牌大卡车一辆接一辆鸣笛而来，掀起的灰尘厚厚地落在路两旁种植的玉米叶子上。

那时候，李珍顺就在路旁经营一家个体饭店，还挂了个牌子“龙井冷面屋”。李珍顺做饭烧菜有一手好手艺，再加上她待客厚道，司机们都喜欢在她的冷面屋落脚，回头客很多。大跃进开始那一年，冷面屋停业，大跃进结束的上世纪60年代初，又开始重新开业。那个时期，朱德海因修筑珲春的图们江堤坝，开发防川水田，营造珲春平原的防风林，检查珲春防火护林、国境防火线等工作，经常出入珲春。当时，州农村工作部部长孙盛春、作家李根全，还有金东基、李羲一、金东山等州委负责人，以及农村工作部和负责文化、工业等部门的领导经常与朱德海一起同行。他们跟朱德海一起出差，从来不住宾馆，也拒绝当地党政部门的招待。从延吉去珲春，或者是从珲春返回延吉的时候，朱德海就会说：“到凉水吃碗冷面吧。”于是，他们一行就到李珍顺经营的“龙井冷面屋”歇脚，吃碗冷面。到了地方尽量不麻烦当地干部，简单吃个便饭，就是朱德海下乡的原则。

朱德海每次都夸奖李珍顺做的冷面好吃。这里还有个小故事。笔者在凉水镇政府工作的时候，有个叫郑乙龙的好哥哥在凉水供销社合作社工作。他性情随和、幽默，我和他私下交情很深。下班后，我们几个人总是凑在他家喝酒。他的母亲给我们准备酒席，做的饭菜很有味道。从他母亲那里我们才知道，冻明太鱼不用水洗直接下锅的话，味道更加无与伦比。乙龙哥的母亲是全罗道出身，不但会做一手好菜，而且也会喝酒。饭桌端来以后，我们会经常邀请他母亲一起过来喝酒。她还会给我们讲许多有趣的故事。

有几个故事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她家的亲戚、延边大学副校长郑判龙来她家的故事和朱德海在她家吃冷面的故事。“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她在供销合作社食堂做过冷面，上个世纪70年代初还当过食堂的主厨。朱德海来珲春或回延吉的时候都会在他们的食堂吃冷面，每次都夸凉水的冷面好吃，所以她跟朱德海很熟。不过，现在看来，这应该是李珍顺的“龙井冷面屋”被供销社合并以后的事情了。

“朱德海书记真是礼仪周到，待人和蔼。每次吃碗冷面以后，他都要到厨房或者是厨房的小窗口打招呼，而且一定会叮嘱随行人员别忘了付钱。有几次，凉水公社的干部听说朱德海书记在食堂吃饭，急急忙忙地跑过来想请朱德海吃饭，每次都被朱德海婉言谢绝。虽然朱德海书记是延边的最高领导，可是他都是自己掏钱吃饭。”当时，笔者只是当作酒席上的故事听的，没想到今天还能跟我的采访有缘。

朱德海在家里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朱德海住在布尔哈通河北边，离青年湖西边河坝不远的住宅区，房子并不大，原来是日本关东军驻延吉的军官专用住宅区。朱德海是吉林省副省长，9级干部，完全可以享受国家提供的更好的居住待遇。但是，朱德海跟地委和延边专员公署的干部以及舞稻家赵得贤、作家金学铁等文化艺术界人士一起住在这里。朱德海总管延边的党务政务，接待客人频繁，家里还有秘书、通讯员。当时的地委办公室考虑到朱德海的居住条件比较差，劝他搬进二层楼房去住，但是朱德海一直没有搬过去。

朱德海的家是日本式的正方形住宅，跟咸境道按照厨房、炕、里屋等顺序设计的房屋不一样。从南面的出入口到北面是长长的走廊，进屋先是日本式的拉门，左边是会议室（客厅），连着一间卧室。打开走廊里的门进去，是一间带炕的小厨房，厨房和卧

室之间还有一条朝西的走廊，随走廊往前走，便是朱德海夫妇的卧室。这是走廊左侧的格局。右边先是一间小卧室，然后是卫生间，再接着是一间卧室。在这套住宅里，住着朱德海夫妇、四个子女以及秘书、通讯员和保姆。有一段时间，朱德海的岳父母也住在这里。

朱德海的生活很简朴，家里吃饭有酱汤和辣白菜就可以。按规定，国家供应朱德海的粮食全部是大米，但是他从来不另开小灶，一直跟家人一起吃杂粮饭。朱德海的长女吴英彩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正上小学。家里的生活也很拮据。不了解的人会摇着头说，自治州州长的家里还会没有粮食吗？可是，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家里吃的白菜叶粥。如果当时父亲睁一眼闭一眼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粮食了，但是父亲坚决不让我们搞特殊化。所以我家也跟别人家一样，每天都得吃菜粥或菜饭，这种饭又叫‘代食品’。当时，我家吃的是粮店供应的粮食。不知为什么，我家的粮食供应证上少算了一个人，我们好几年都没发现。那时按人口供应粮食，少了一个人的份，粮食自然就更紧了。有时候，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母亲就给父亲另做一碗大米饭，可是父亲不吃，总是把大米饭倒进杂粮饭盆里搅在一块。当时，我母亲也上班，政府办公室给我家安排了一个保姆。如果我家有什么特殊化的话，那就是政府安排的保姆和父亲直通北京的电话及父亲的专车了。父亲非常尊重保姆，从来都让保姆跟我们在一个饭桌吃饭，当时我们都叫她姑妈。她的名字叫赵凤燕，后来嫁到朝鲜去了。1949年，父亲快到40岁的时候才有了我，那是在哈尔滨。后来在延边有了三个弟弟。父亲非常爱我们。弟弟嫌父亲的胡子扎他，可是父亲总是抱着弟弟，亲他的脸。这是父亲的乐趣。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们几个孩子在小时候更喜欢父亲，反而与少言

寡语的母亲不太亲近。父亲很慈祥，从来不跟我们发脾气。但是，父亲工作很忙，跟我们一起的时间很少。也许因为这个原因，父亲更想亲近我们，跟我们一起玩……反正我也好，弟弟们也好，都很喜欢父亲，喜欢跟他在一起。大弟弟阳松有很多爱好，是个热情的邮票收集狂。父亲一有时间，就饶有兴致地翻看阳松收集的邮票，夸奖他的这种爱好很好。遗憾的是在“文化的革命”时期，这些邮票都被没收了。被没收的不仅仅是邮票，还有延安时期父亲的朋友送给他的齐白石的画，那是我家唯一最值钱的东西，可惜那幅画被没收了。父亲虽然对我们很慈祥，但是一旦发现我们跟别人家的孩子争吵或打架，就会变得很严肃。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朋友吵了起来，被父亲看见了。他就让我先向那个朋友道歉，我到底还是向她道了歉。不仅是对子女，对亲戚也是一样。父亲也有兄弟，小弟弟参加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父亲从来不滥用职权为兄弟和亲戚徇私情，给他们办事。父亲严守原则，所以有的亲戚不是很喜欢我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只看见过一次父亲发火的模样。有一次，南明学叔叔就有关长白山的事情跟朝鲜使节进行外交谈判。谈判后，南明学叔叔喝醉了，父亲很严厉地批评了他。我头一次看到父亲发那么大的火。一到春天，父亲就抽空在院子里种蔬菜，每次都动员我们几个孩子运粪，用铁锹翻地。那个时候，地委使用马车，所以有很多马粪，我们就用箩筐装马粪运到院子里。父亲说这是培养我们爱劳动的习惯。父亲对家里的大事小情从不过问，都交给母亲处理，但是原则上的问题从不过问。大跃进时期，大概是我十岁的时候（1959年），母亲被提拔为延边党校教务科科长。父亲不知道母亲晋升的事情，等到母亲告诉了他才知道。当时，父亲的脸色不是很好，怀疑组织上是不是因为他的权力才给了母亲晋升的机会。从那时候开始，父亲跟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什么不要参与领导层的事情啦，不

要有优越感啦，不要借丈夫的权力行事啦，等等。其实，除了原则性的问题以外，父亲很爱我母亲。父亲常常因为公务出差，有的时候10天、20天才回家。每当出差时间长了，父亲就给母亲写信，把身边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告诉母亲。父亲出差时间一长，母亲就盼着父亲的电话和信。”

金泰顺（朱德海的大儿媳）说：“80年代末，我家原先的保姆赵凤燕听说我婆婆在长春，就找来了，在我家住了三个月，跟我婆婆聊了很多。听说，当时她在针织厂上班，跟一个朝侨男青年订婚了。当她要去做朝侨的时候，父亲多次劝她慎重考虑，母亲也挽留她。她在我婆婆家当保姆，就跟一家人一样。到了晚年，我婆婆的话更少了，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很多。赵凤燕保姆来了以后，婆婆可高兴了，可以跟她说说心里话了。”

原延边电视台台长金熙宽说：“我小时候，有一次偷听了父亲和母亲的谈话，说朱德海书记和夫人年龄相差15岁，可是两个人的感情可深了。金永顺夫人是跟着父母从俄罗斯来的，所以她的俄语很好，朝鲜语和文字都是后来学的。在哈尔滨工作时，别人也曾说他娶了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小姐做妻子，可是朱德海书记根本不在乎，还是高高兴兴地跟夫人结了婚。在婚姻问题上，也能看出朱德海书记的性格。但是在工作上他很严格。听我父亲说，朱德海书记担任党校校长的时候，金永万担任常务副校长，金永顺是教务科科长。虽说朱德海书记是校长，但是他不具体管党校的事务。当时，学校想通过金永顺向朱德海书记反映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却被朱德海书记拒绝了。朱德海书记还埋怨金永顺，组织上的问题为什么要你出面向我反映呢？他严厉地说，通过特殊关系的工作汇报无效……”

金贞顺回忆说：“朱德海书记从来不用专车送孩子们去幼稚园（保育院）。他严禁搞特殊化。当时，我是保育院的院长，所以那

时候的事情记得很清楚。孩子们上保育院的时候，全是他丈母娘送的。他丈母娘个子高，性格也爽朗，每天接送都背着孩子。偶尔，金永顺夫人也来接孩子。她从不让孩子撒娇，也不让孩子在别的孩子面前显摆。她多次叮嘱保育院老师，一旦孩子不听话，一定要严厉批评。”

在朱德海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上，朱德海的三儿子吴坚说：“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我没有穿过新衣服。我们跟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一件衣服往下传着穿。大哥的衣服二哥穿，二哥的衣服最后我穿。母亲很会做针线活，自己给我们改衣服，而且她自己穿的衣服和我们兄弟穿的衣服都是亲手缝的。”

依兰镇柳菜村原党支部书记文龙浩（71 岁）说：“朱德海书记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就跟农民一样，说的都是我们这里的方言。在柳菜村召集老人开会座谈的时候，村里的老人都屈膝向他问好，朱德海总是制止说，不要屈膝了，随便坐坐吧。当时，老人中还保存着向官厅（政府）工作的人屈膝行大礼的风俗。朱德海书记在柳菜村蹲点，几乎访问了全部村民家，对村民的生活状况了如指掌。当时，柳菜大队有好几个自然屯，一共有 600 多人口。朱德海书记一般都是清晨到村民家去谈这谈那，跟村民们聊天。有时还上山猎个野鸡回来，开会或者是座谈的时候和大伙儿一起吃。而且，朱德海书记就坐在门槛上吃，从来不与社员一起坐在饭桌上。那个时候是‘代食品’时期，家家缺粮，都饿着肚子。所以一有什么吃的，都会瞪大眼睛盯住吃的东西。朱德海书记寄宿在许得福家里。当时的支部书记叫金英燮。朱德海书记常去这两家，打来的野鸡一定要让大家一起吃。朱德海书记吸的是乙级迎春烟，他总是把自己的烟递给老人们，自己吸老人们烟包里的旱烟。偶尔也跟他夫人一起到村里来，夫人总担心他烟吸得太多……”

## 好人的后光

朱德海的专车有时是救护车，有时候是免费出租车，有时候又是货车。凡是朱德海到过的地方，都有传说般的故事在流传。

原《延边日报》记者金哲镐（小说家、儿童文学家）于2002年9月3日以“朱德海的两则故事”为题发表了文章：“那是我10年前写的报道，因为故事太震撼人心，所以至今我还忘不了。当时，我参加了延边丹枫散文协会主办的《散文集》出版仪式。在那次会议上，有人讲起了朱德海的故事，乍一听似乎跟文化主题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故事很生动，就发表在报纸上了。”

第一个故事：

60年代初，朱德海跟金永万一起去内蒙古自治区参加庆祝活动，而且还收到了高级手表作为礼物。回到家里以后，金永万高兴得闭不上嘴，见人就炫耀说：“这块表是我跟朱德海书记去内蒙古时得到的礼物。”

年轻人有了一块高级手表怎么能不兴奋呢？更何况手表在当时可是贵重物品。有一天，朱德海把金永万叫到他的办公室。

“呵呵，小金，舍不得也没办法，你得把手表交出来。”

“啊？”金永万的脸上顿时流露出舍不得的表情。

“手表是给我们延边人民的礼物，不是给我们个人的。今后这样的事情还会有的，我们都要按原则办事。凡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要放弃，不能贪心。人心的可变性本来就大，今天收了手表，明天就可能想要别的东西。我们干部应该保持清廉才行。”说完，朱德海让秘书把两块手表送到州政府有关部门去。

第二个故事：

有一次，朱德海经安图到二道白河和长白山天池视察。当时，一个在长白山气象台工作的年轻工作人员看到朱德海的专车后，

偷偷地恳求许乙天司机，要是有空位的话，带他一块儿下山。当时，那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有要紧事必须去延吉，正好首长的车来了，就厚着脸皮向司机求情。那时道路不好，来往的车辆也很少。

“不行，我没有权力在首长的车上带人。”许司机考虑到安全问题拒绝了。

年轻人遭到拒绝后，十分失落。这时，旁边有一个同事提醒他跟朱德海书记去说说看，也许事情就差不多。于是，年轻人壮着胆子跟朱德海说了实情。

“呵呵，你跟你们队长请假了吗？”

“早就请假了，只是没有下山的车……”

“那好，车里正好有空位，完全可以带你下山。你们在风这么大的高山地区工作，真是太辛苦了。”

到了松江，一行人下车吃午饭。年轻人怕给他们添麻烦，独自悄悄地去了另一家饭店。朱德海一行吃完午饭，坐上车继续驶向延吉。驶行了60余里路，朱德海突然问许司机：

“等一下，气象台的那个年轻人呢？”

“对了，在松江吃饭时我就没看见他。”

“啊？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找找呀？”

“我担心耽误了首长……”

“好了，都是我的错。赶紧把车开回去。”朱德海严肃地说，“想想看，那个年轻人一年四季在高山地区工作，多辛苦啊。这次，他想到延吉去看看妻子和孩子才向我开口求情，我们怎么能不满足他的要求呢？我们的事情再急，像他这样的情况也应该给予照顾。”

朱德海的车调头按原路返回松江。到了松江到处寻找，最后在长途客车候车室里找到了那个年轻人。年轻人一看朱德海回来找他，就向朱德海深深地鞠躬，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朱德海身上，这样的故事有的是。比如，在珲春马川子

五二村送孕妇去医院的故事；在去和龙的途中，把一个在地里被蛇咬伤的农民送到医院去的故事……

1957年的一天晚上，天宝山铜矿一个工人受重伤急需送医院治疗。可是，来接他的急救车驶到朝阳川发生了故障。护送他去医院的人到处打电话求车也没结果，就想起了朱德海。对，朱德海书记一定会帮忙的。他们顾不上已经是深夜，给朱德海家里打了电话。从睡梦里惊醒的朱德海接到电话后，急急忙忙穿上衣服，命令警卫员备车。当警卫员和司机到达车库的时候，发现朱德海早已在车库门前等候。他告诉司机开车要稳当、要快，又让警卫员给延边医院打电话，让他们准备接收患者。这个工人因为得到了及时的治疗，脱离了生命危险。

朱德海厚道的人品和高尚的风格，在关于他的故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赵得贤先生的遗孀李美虔回忆朱德海初到延边时的情形说：

“刚到延边的时候，朱德海书记住在地委干部宿舍里。他每天下班都要经过我家的院子，才能回到自己宿舍。所以，他总是先到我家来向老赵了解延边歌舞团的工作情况，还跟老赵谈艺术，谈政治、经济……其实，若不是朱德海书记，我家老赵很难从朝鲜回来。他随医疗车去朝鲜平壤后，战争爆发，道路被堵塞。于是，朱德海书记通过组织找到了老赵，然后由地委专门派人到平壤接回了老赵。那时朱德海书记说老赵是延边艺术界的‘贝多芬’，是一个合唱团也顶不了的人才，非常尊重老赵。现在我一闭上眼睛，朱德海书记披着旧军大衣、边咳嗽边工作的形象就会浮现在眼前。那时，朱德海书记老是咳嗽，可还吸烟……朱德海书记不喜欢喝酒，但是烟瘾很大。他很喜欢孩子，我的几个女儿都喜欢朱德海书记。”

在《不灭的英灵——崔采》一书中，崔采也留下了这样的回忆：

“……男人们自不必说，家里人也都像亲姐妹一样亲近，关系密切。朱德海、崔采、金学铁，按年龄大小排，就好论哥哥弟弟了。可是夫人们就不好排了。如果不根据丈夫的年龄来排的话，崔采的夫人刘雪琴应该大姐，金学铁的夫人金惠元是二姐，最小的是朱德海的夫人金永顺。可是俗话说，肚子里还有爷爷辈儿呢。因此，辈分也就不能太讲究了。尽管男人享受的是大哥的待遇，而他的夫人只能享受小妯娌的待遇。如果把最小的视为嫂嫂，对她毕恭毕敬，心里的确会感到比较别扭。不过，数千年来遗留下来的传统也不能打破呀。所以，三家聚在一起，总会为如何排序的问题议论不休。此时，朱德海就会看着崔采和金学铁说：‘称呼不重要，怎么称呼都可以。但是，一家人决不能有丢人现眼的事情发生。’言外之意就是不想被人指责，自己的夫人行事要有教养。因为朱德海是老大，最小的金永顺托男人的福，享受了大妯娌的待遇。不过，为此她也付出了代价，把娘家妈妈亲自酿的大酱、腌的辣白菜等，经常给两个妯娌送去。家里有什么新鲜东西，她也总是与两个妯娌一起分享。要不，就会伤了另外两位夫人虽是姐姐却不能享受姐姐待遇的心。”

龙井智新镇胜地村是朱德海的第二故乡。他们家从沿海州来到朝鲜会宁，又从会宁跨越图们江，翻过蛮子岭，来到朱德海生长的胜地村。胜地村有朱德海的纪念碑，纪念碑也包含着一段故事：

去年冬天，笔者和胜地村原党支部书记许允哲老人（74岁）、崔文俊老人（82岁）在许允哲老人家见了面。许允哲老人是胜地村出身，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做胜地村的党支部书记工作，是土生土长的胜地村人。树立在胜地村的“朱德海纪念碑”，一眼就能看出立碑者的精诚。纪念碑是1984年许允哲老人拿出村里的经费，再动员村民集资建立起来的。

“我们建立朱德海纪念碑，并不是想得到什么回报。我们农

村人不会评价政治上的业绩，也没有评价的资格。但是我们能分辨出什么样的人是人，什么样的人是人。朱德海州长是好人，就凭这个理由，我一提议，全村人就一致响应，纪念碑就这么建立起来了。我记得朱德海州长第一次访问胜地村是1953年，那时我才14岁。那是自治州成立后的第二年，也是初级社时期。虽然那年3月，东盛涌英成村已经成立了金时龙高级合作社，但是延边其他地区的高级社是从两年后的1955年开始兴建起来的。那时，朱德海州长请来初级社社长和村里的老人开座谈会，制定了初级社五年计划。对了，崔老人现在是我们村里的元老，他当时也参加过座谈会……”许允哲书记指了指坐在旁边的崔文俊老人。

崔文俊老人干咳了几声，客气地说自己不太会说话。许允哲书记就让他知道多少说多少，于是他打开了话匣：

“嗯，当年朱德海州长来我们村的时候，我是村里的治保主任，跟朱德海州长一起制定了五年计划。现在已经过了50多年，忘得也差不多了，只记得朱德海州长很亲切，没有大干部的架子。跟我们说话也是带着一样的农村口气。那时朱德海州长刚过40岁，村里的老人们说延边最大的领导来了，要给他磕头行礼，都被他当场制止。他说应该是晚辈先给老人磕头，哪能让老人们向他磕头呢？他还说，现在解放了，所有的人都平等了，所以坚决不让老人们向他磕头。呵呵，对此我还记忆犹新呢。那个年代，大部分乡下老人还头戴纱帽，拿着长烟杆，在家里发号施令。他们好像是顽固不化的老保守，但是，那个时候长辈和晚辈之间，亲戚之间，办事、说话都讲究礼仪，对在官厅（政府）办事的人更是毕恭毕敬。光复前，我们村里的人都认为间岛省省长李范益（1937年11月1日至1940年5月16日任间岛省省长）是世上最大的官。现在朱德海书记就是延边最大的官，老人们当然要给他行磕头礼了。呵呵呵……”说着，崔文俊老人笑了起来，“……那个年代，

只要是儿子娶了媳妇，就不管是多大的岁数，也要蓄起满脸胡子，在里屋烤着火炉，向外屋的人发号施令……”

许允哲书记接着说：

“那时，朱德海书记跟我们说，山上要多栽树，家家要栽果树，要养牛，开水田，架电线，搞水利建设，把胜地村建成富饶的村庄。之后，朱德海州长再没来过。有人说，朱德海州长如果给我们村里投资，扶持我们村的话，会导致不公平……既然他是延边最高领导人，想问题当然就要全面一些。那时，我向光新（现在的智新）乡党委书记李俊日口头汇报了建立纪念碑的问题，李俊日让我重新以书面形式提出方案，还说，建立纪念碑既有家乡的人怀念朱德海州长的意义，也能对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因此表示积极支持。以后我们去了州里。州里说，他们也要建立朱德海纪念碑，村里就不要重复建了。回到村里以后，我们决定干脆自己出资、出劳力建立纪念碑。当时，州里建朱德海纪念碑的时候，是崔锡林（原龙井市委书记）负责施工的。因为刻字的时候，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石头，就去找崔锡林书记说，能不能把州里建碑后剩下来的石头给我们，他痛快地答应了。我们把石头运回来，按当时的价格计算，那块白石头就要3000块钱。我们建碑的那块地上，原来有一户村民家，村里买下来后，他们搬到别的房子去了……我们施工的时候，在原来的地基上又加高了一米多。我们动用了三轮车和手扶拖拉机，村民都是自发地参加劳动。墙底下那块石头是以前光新乡政府盖楼时剩下来的，李俊日书记让我们拿回来的。我做党支部书记工作一直做到1992年，后来换了好几个人。龙井市市长朴虎万看到纪念碑后说，纪念碑有些破旧，与期待的有一定差距。于是，市里拿出资金重建。重建的时候，去掉了胜地村的名字，镌刻了龙井市委、市人大、市政府三家的名字。最初是我们村里出资建纪念碑，因为村里经费紧张，所以纪念碑有些破旧。可是，我们胜地村村民对朱德

海州长的一片深情是永远不会‘破旧’的。不过，也多亏了市里重建纪念碑，才有了今天的模样。纪念碑落成的时候，省民委的金副主任来过。朱德海州长的夫人后来来过数十次。当时，听说她住在长春，是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她每次到延吉来，都要来这里看朱德海州长的纪念碑。2001年，龙井市委和市政府重建纪念碑落成仪式的时候，朱德海州长的儿子来过。我那个时候是老人协会会长。他跟我们老人一起跳舞，参加庆祝活动。朱德海州长夫人最后一次来这里是1997年。她是个挺文雅的人，那次来的时候，我看她脸都瘦了，变得很憔悴。当时她是领着电影厂的人一起来的，说是要拍电影，后来又听说她去世了。去年开始，我负责管理纪念碑，夏天锄草，秋天扫落叶，清理清理。我们村里有朱德海纪念碑的消息传开以后，经常有人来，清明和中秋节来的人更多。清明节以政府机关为主，中秋节以家庭为单位来的居多。至今，延边怀念朱德海州长的人还是很多很多。”

吴英彩给笔者留下了很多对父亲的回忆。她回忆当年跟着父亲去农村的情景时说：

“上小学的时候，一到星期天或是学校放假，我就缠着父亲带我去农村。所以，农村和果园我都去过好多次。但是从来没有在农村吃过猪肉或者鸡肉。有时，农民要给我煮鸡蛋或者给好吃的，父亲和司机（那一时期的司机是许乙天）不让他们那么做。如果我有点儿特殊享受的话，不但司机要挨训，而且还要给那些农民好几倍的补偿。有一年冬天，我跟着父亲去了龙井，在一个农民家过夜。夜里，父亲跟农民说话，我跟房东一起从地窖里拿出苹果梨来吃。苹果梨虽然不大，但是很甜，我狼吞虎咽，一下子吃掉了两个。第二天早晨，我跟父亲说吃了这家两个苹果梨。父亲听了以后，严肃地对我说‘农民冬天贮藏少量的苹果梨，平时连自己都舍不得吃一个，过年时才拿出来尝尝，或者是孩子有病的时候，拿出一两个让

孩子吃，你怎么能因为你是朱德海的女儿就随便吃呢？’说完，父亲又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经过，我回答说，一共是三个苹果梨，我吃了两个。在我们离开那户人家的时候，父亲让司机留下了五块钱。父亲从来不让我们吃别人家的东西，可是我们家树上结的樱桃和葡萄等，他经常送给别人尝尝。所以，父亲陷入困境的时候，延边的长者和村里人都不声不响地伸出手帮助我们。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父亲转移到北京以后，母亲被监禁在延边宾馆，我下乡到敦化县大山嘴子塔拉站村，大弟弟阳松下乡到敦化官地，家里只剩下二弟阳春和三弟阳坚。十几岁的两个弟弟只相差一岁，不会做饭，他们还没有到自立的年龄。那个时候，很多好心人到家里来教弟弟烧火、做饭、打水。在学校，同班的同学经常把弟弟接到他们家去吃饭，或是把菜带来分给弟弟吃。我下乡的时候什么东西也没有，邻居知道后就偷偷给我打了一个木柜，我就拿着它去了敦化。正直好心的邻居们经常伸手帮助我们，给我们送来温暖。那时，他们就像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一样，暗地里给我们帮助。母亲被监禁在延边宾馆的时候，宾馆的汉族大师傅经常在母亲的饭碗里偷偷地埋上一个鸡蛋，或者是一块肉、一片鱼。后来，母亲转移到党校监禁的时候，有个心地善良的人担心母亲想不开，一天24小时不离开母亲的身边，坐在床上陪着母亲，还鼓励母亲不要失去信心。他们这些细微的帮助，在当时是要冒很大危险的。一旦发现就会立刻被戴上‘保皇派’的帽子，甚至会遭到不幸。在这样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我看到了人心的真善与丑恶。母亲到了晚年经常回忆起当年的艰难岁月。当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好心人不声不响的帮助，才使我们挺了过来。现在，为了他们也得好好活着……”

延边文化界的大师金学铁的长子金海洋<sup>10)</sup>回忆说：

10) 金海洋，1948年出生于京畿道。曾是延吉市化肥厂工人，专职工会干部、延吉市轻工业局干部、主任，延边总工会干部、宣传部长，延边工业干部学校



“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其实他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打成右派以后就已经没有了地位。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朱德海书记对此很着急。父亲生前从不与政界人士来往，但是同朱德海书记、崔采、裴克是好朋友。所以我们这几家的子女也从小凑在一起玩耍。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很多平时要好的朋友都离我远远的。但是，朱德海书记教育自己家的孩子绝对不能那么做。所以，我跟英彩、阳松他们玩得很好。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自然也连累到我。虽然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是那时我只能去念三中。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朱德海书记。他问我上中学了没有，我回答说上三中了。他说，你是金学铁的儿子，学习又不错，怎么去了三中？我说，我也不知道。第二天，教育局招生办公室的一位干部来找我，在他的过问下，我被市一中录取。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朱德海书记吩咐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朱德海书记经常私下派通讯员给我们送来大米、蔬菜等东西。但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朱德海书记不但是自己，连家人也都没保住。朱德海书记秘密去了北京，金永顺夫人也被监禁在延边宾馆。长女吴英彩和长子吴阳松下乡去了敦化，家里只留下二子阳青和三子阳坚。那时候阳青12岁，吴坚11岁，家里被抄得什么都没有。红卫兵抄家，把他们穿的衣服都拿走了。他们出门没有衣服穿，吃的和烧的当然也没有了。到了冬天，两兄弟冻得先把铺在走廊里的木板子拿来烧炕。木板子烧没了，接着把天花板揭下来烧，实在太惨了。‘文化大革命’毁了无数家庭的幸福生活，甚至使许多家庭变为了废墟。”

---

校长，延边人民出版社常务顾问。

## 第8章 令人寒心的“文化大革命”

### “打倒朱德海”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到1976年在中国掀起的一场社会政治大动荡。这是一场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大动乱。十年内乱中，延边地区与全国一样，受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冲击。十年动乱无疑是国家的一场大灾难。

朱德海也在动乱中遭遇政治迫害，从此退出了延边政治舞台。

延边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全域一样，始于1966年中共中央下达“5·16”通知以后。1966年6月20日，延边州委设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向大学、大专和各文化事业单位派出工作组，领导和开展“文化大革命”。8月，朱德海参加了党中央八届十一次会议后返回延边，传达和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10条”及“23条”，继续领导和开展文化教育领域里的“文化大革命”。

原州人大常委会主任曹龙浩回忆这段时期时说：

“延边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师生给领导和部分教员贴大字报开始拉开了序幕。1966年6月12日，延边州委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由朱德海书记任组长，姚昕和我任副组长。为了搞好‘文化大革命’，从州直属机关选拔干部进行培训后组成工作组，分别进入延边大学、延边医学院、延边农学院，以及各文化团体。7月16日，我以延边大学‘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组长的身份，带领工作组进驻延边大学。8月27日，延边大学内出现了学生自发组织的‘8·27’革命造反派和‘红旗联军’等群众组织。‘走资派’大量涌现，斗争旋风迅速地席卷到全州范围。9月1日，延边大学造反派批斗了学校党委书记李羲一和副校长林民镐，并派人来让朱德海书记和我参加批斗大会。批斗大会结束后，造反派在朱德海书记的吉普车上贴满了大字报，我只好领着朱德海书记一直走到公园小学，再打电话给州委派来了车。9月3日上午，在延吉市体育馆召开了批斗‘黑帮分子’姚昕、李挥的大会。朱德海书记怀着沉重的心情说道：‘姚昕同志在30年代初就参加了革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50年代初来延边，干过公安保卫工作，没过多久担任了州委第二书记，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带领全州各族人民建设新延边的事业，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李挥是4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来延边以后主管文化教育工作，致力于发展延边的文化教育事业。这样的干部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呢？’当时，朱德海书记坚信，到了运动后期，这些问题都会按照党的政策得到实事求是地处理。然而，到了9月中旬，形势更加混乱，州委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境地。针对朱德海书记的大字报越来越铺天盖地……此时，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和书记马明芳，以及吉林省委书记赵林等领导来延边了解情况，同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保护朱德海书记的指示。延边党史中，把这个时期称为第二届党委，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第二年一

月为止。当时，朱德海任第一书记，姚昕任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有田仁永、金明汉、冯志成、金文宝；州人委由朱德海任州长，田仁永、乔树贵、李浩源、南明学、解玉峰、吕英俊和我任副州长。那天，书记处书记和副州长都参加了会议。宋任穷强调这次到延边来是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特别组织的，并指示领导成员要紧紧团结在朱德海书记的周围进行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另外，宋任穷等领导还单独传唤了田仁永，强调保护好朱德海书记是中央的指示，并指示一定要阻止朱德海书记成为造反派的靶子，好好保护朱德海书记。接着，9月28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马明芳和朱德海一起来北京参加建国庆祝活动，并派飞机来迎接他们。《人民日报》（10月2日）在建国庆祝活动的报道中，朱德海书记也被列入了观礼台名单之中。因此，当时人们都相信中央对朱德海书记是信任的。然而，运动越来越激烈，12月初，朱德海书记被造反派组织软禁在延边大学办公大楼。造反派集中攻击朱德海，企图夺取《延边日报》的权力。但是，朱德海书记坚持认为，《延边日报》是党报，不能交给群众组织。从此，同不同意打倒朱德海成为了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分水岭。当时，延边军分区政委赵南起为保护朱德海书记做出了大量努力。1967年5月，我参加了州政府机关揭发罪行会议，造反派让我揭发朱德海书记在划分长白山界线时的‘卖国罪行’。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关于长白山界线划分问题，朱德海书记曾经召开过一次常委会，并在会上出示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签名的文件，我也曾看过那个文件。我还说，毛主席也是同意这个界线划分意见的，而且这样的国家大事只有国家领导人才能作出决定。造反派一时无语，后来又大声喊叫：‘这是替朱德海辩护。’后来，高峰又把我和金明汉叫去，让我们揭发朱德海书记是‘三反分子’、‘叛徒’的罪行，当我们表示拒绝后，竟然大骂我们是‘朱德海保皇派’、‘顽固派’……

那真是荒诞无稽的岁月。”

当年12月26日，学生组织冲入中共延边州委办公大楼，抢走了州委的公章和文件材料，破坏了州委机关和州人委机关的正常工作，使州委和州人委的领导机关及工作机关陷入了瘫痪状态，州委、州人委的领导只好转移后“进行秘密工作”。

1967年1月初，毛远新以其特殊的身份，率领一帮青年学生从哈尔滨来到延边，设立了哈尔滨军工学院驻延边联络站，提出了“越乱越好”、“打倒朱德海，解放全延边”等口号。于是，延边地区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局面。

1月25日，“延边红色联合总部”宣布“接收和管理中共延边州委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这么一来，夺权和反夺权之间的斗争更加升级，从大辩论发展到使用木棍、石头、砖头进行武斗，形势更加严峻。1967年3月11日，经沈阳军区批准，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延边地区军管会，对中共延边州委、州人委和延吉市、图们市、珲春县、和龙县、延吉县，以及延边公安局、延边日报社、延边人民广播电台、邮政局等要害部门实施了军事管制。军管会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关系，特别是对朱德海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

3月末，延边军管会负责人指出“不要脱离批斗走资派的大方向”，同时怂恿一派组织成立“朱德海专案组”，印刷发行了第四次所谓的“朱德海罪状材料”，为打倒朱德海制造舆论。4月中旬，“延边红色联合总部”把州委、州人委处级以上干部100余人集中起来，举办了所谓的“揭盖子（揭发州委阶级斗争真相）学习班”，强迫他们揭发所谓“朱德海罪状”。从那以后，州委领导干部受到了胡乱批斗，同时各派之间的武斗也步步升级。8月初发生了所谓“叛国暴动”的“8·2”、“8·4”流血事件和多次武斗事件，形势越发严重，动乱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原州政协副主席金永万说：

“‘文化大革命’爆发那年，我被任命为延边电台代理台长。当时，文教书记金文宝找我谈话，让我去电台工作。当时电台的负责人是郑龙水，不料在批判‘三家村’的时候也涉及到了他……所以，我是被紧急派去电台的。12月，我去见被软禁在延边大学的朱德海书记。软禁初期，工作人员还随时能进出汇报工作。当时，朱德海书记表情严肃，说话不多。我汇报了电台工作，并询问了今后的工作方向。朱德海书记简短地指示我：‘按照中央下发的文件精神去做，现在地方上很难说这说那。’现在看来，当时朱德海书记自身也不清楚中央如何下发什么样的精神。他当时已经经历了中国的多次政治运动，都是突如其来的……在反右斗争时期，朱德海书记已经险遭不幸，因此非常清楚中国政治运动特有的突然性和狂热方式。朱德海书记在软禁期间产生过许多苦闷。朱德海书记还吩咐我：‘以后少到这里来。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概不幸都会集中到我身上，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受到不必要的牵连。’从那以后，朱德海书记遭到了隔离。”

原州政协副主席金圣友回忆那个时期时说：

“1966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文化大革命’，我也被禁闭在延边卫生学校。非要说我有什么‘罪’的话，那就是我阻止延边艺校和延边卫校的学生坐车去北京串联。也就是说，连毛泽东都允许红卫兵去北京串联的事情，让我傻乎乎地拦下了。正应了那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俗语。当时，我担任中共延边州委‘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主任，遭到禁闭后，什么事情也做不了。有一天，田仁永副州长来学校，对学校造反派负责人说，眼下被造反派组织软禁在延边大学的朱德海书记有急事找金圣友，希望能让他去一趟。造反派负责人一口拒绝。田仁永副州长说自己愿意担保，才获得了同意。我立即赶到延边大学，向在软禁朱德海

书记房间门口站岗的红卫兵说明情况，才勉强获得了十分钟的会面时间。我刚走进房间，躺在床上的朱德海书记就站起身问我‘你知道从北京带回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在哪里吗？’我说不知道。他又马上指示说，那份文件交给了州委保密室（局），现在必须马上告诉冯志成（副书记兼秘书长），把文件精神向州党政机关中层以上领导干部紧急传达。他还嘱咐说，中央还没有表态，所以不要在感情上对抗造反派组织，而且还要理智对待红卫兵去北京串联、写大字报小字报等问题。他还再三强调，领导干部特别要注意不要随意对民族之间互相分开的造反派组织表态或表明立场，不要片面地偏向某一方，以免造成民族分裂。尽管被剥夺了自由，朱德海书记依然没有忘记延边这个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工作。后来，朱德海书记离开了延边。我也被劳动改造了五年。我怎么也没想到，那次竟然是见他最后一面！”

朱德海被软禁的消息让周恩来总理感到很震惊。“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在调节中央和地方的局面时，有时也会感到为难。但是，他始终保护着老干部和军内的将军们，关心着朱德海这样的少数民族干部。然而，在以巨大惯性发展的“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冲击下，政府功能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功能完全丧失了，朱德海也如同翅膀被折断而日益坠落。

在打倒还是保护朱德海的问题上，赵南起<sup>1)</sup>对朱德海的保护和

1) 赵南起，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上将军衔，1927年4月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1945年12月参加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解放军后勤学院指挥系。1950年10月至1952年5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参谋、运输科副科长、科长；1957年11月至1959年任志愿军后勤部司令部组织计划处计划科科长；1959年起先后担任吉林省延边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政委；1968年至1973年4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3年4月起先后担任吉林省通化军分区政委、吉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吉林省延边军分区第1政委、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兼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吉林省军区政委。1978年4月至1985年3月任中共吉林省延边自治州第一书记、州革命委员会主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吉林省副省长、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1985年3月至1992年10月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

支持旗帜鲜明而富有策略。《赵南起传》中，有一段时任延边军分区宣传干事的董华对当时的回忆：

“在保护朱德海同志的问题上，赵南起同志的立场非常坚定，头脑非常清晰。据我理解，赵南起同志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不仅是因为朱德海同志在延边这个朝鲜族聚居地区担任州委书记，而且他还是朝鲜族敬仰的一面旗帜。延边的各项建设都与他的工作分不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打倒朱德海是全盘否定我党几十年来在延边取得的成果。而且，如何对待朱德海同志也是一个与民族感情有关的问题。打倒朱德海很容易，但是真的如此的话，就会大大伤害广大朝鲜族群众的感情，也会给延边地区的安定带来严重的影响。这是原则性的是非问题。对此，赵南起同志十分清楚，因此（保护）是必然的事情。”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央分别给沈阳大军区、吉林省军区和延边驻军部队打电话，要求他们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朱德海的安全。

由赵南起担任副主任的延边军管会，根据上级指示，在1967年2月召开特别会议，研究了保护朱德海的具体措施。其中一条是当群众组织呼喊“打倒朱德海”的口号时，军人一律不许举手。军管会态度明确，使得朱德海虽然政治地位缩小，行动受到限制，但是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对朱德海的一系列保护措施，也有效地减轻了延边地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受到的社会压力。那时候，朱德海是吉林省委常委、吉林省政府副省长、中共延边州委第一书记兼州长、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即延边党政军的最高领导。

可是，当1967年初，由二十几名学生组成的哈军工驻延边联

---

部长、总后勤部党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1992年10月至1995年7月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共共产党第12届、13届、14届中央委员、第5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5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络站跟随毛远新来到延吉以后，朱德海的处境逐渐恶化。毛远新以毛泽东主席亲侄子的特殊身份来到延边，就像是拥有自行处理重大问题权力的“钦差大臣”。他的公开身份是哈军工驻延边联络站站长，内部身份是颇具威严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简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联络员。特别是他表明自己是奉周恩来和江青的特别指示来延边，立即得到延边党政军机构的支持，从而掌握了延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上将一开始对毛远新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毛远新以其特殊的影响力，尽快使延边的形势得到安定。为此，当时的赵南起政委向朱德海通报了情况，并充满希望地说：

“朱书记，请您放心。中央非常重视延边的‘文化大革命’，对您也非常关心。周总理还特别派了朱进（毛远新）联络员长期驻在延边，具体指导延边的工作。延边的局面一定会尽快得到改变。”

然而，赵南起政委的希望只是一厢情愿。毛远新的出现给延边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政治灾难，形势急转直下。延边州委、州政府及各级党政机关的建筑物贴满了铺天盖地的口号和大字报，以朱德海为首的各级领导干部统统被打倒，党政机关彻底陷入麻痹状态。

从那以后，在保护还是打倒朱德海的问题上，赵南起与毛远新的态度截然不同，开始了正面冲突。与毛远新的冲突，后来给赵南起政委带来了极大的不利。

赵南起以军管会副主任的名义与红卫兵进行交涉，让朱德海住进 222 医院加以保护。可是，群众组织在 1 月下旬再次劫持了朱德海。毛远新的势力日益壮大，因而对朱德海的实际保护越来越困难。

鉴于延边的形势已经失控，为了保护朱德海的安全，1967 年

3月9日，周恩来总理指示延边军管会立即把朱德海从延边护送到北京来，而且要求严格保密。军管会的主要负责人虽然不敢违抗周总理的指示，但是根据毛远新的意见，以群众强烈要求批斗为借口，采取了拖延的方法，同时突击组织了批斗朱德海的群众大会。

4月初，沈阳军区再次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把朱德海迅速护送至北京的指示。在这样的情况下，军管会主要负责人不得不服从命令，安排了朱德海的转移问题。赵南起政委主动承担了护送朱德海离开延边的任务。

《赵南起传》中是这样写的：

4月18日，赵南起来到关押朱德海的地方，对老领导说：

“延边的形势已经完全失控了。周总理非常关心您的安全，指示把您护送到北京去。我受军管会的委托执行这项任务。我是您的老部下，将不顾一切完成护送任务。”

朱德海十分感动，甚至流着眼泪说：

“谢谢周总理的关心。南起同志，危急见真情。由你来护送我，我同样也要对你表示感激！”

“你千万别这么说，朱书记。”赵南起也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我在您的领导下工作多年，是在您的关心下成长起来的干部。不管别人说什么，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不变的老领导。我已经周密地安排好了您离开的事情。您放心吧，不会有任何问题。您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吧，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会满足您。”

听赵南起这么说，朱德海提出：

“我没有其他要求，只是运动开始后，我妻子也因为我受到了牵连，吃了不少苦。如果我离开的话，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见面。所以，在走之前，最好能见一见我的妻子。”

赵南起有些为难。为了避免出现意外情况，这次朱德海的转移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如果安排朱德海夫妻见面的话，有可能

将来会碰到不必要的麻烦。他犹豫着思索片刻。朱德海看出赵南起的心思后说：

“南起同志，你不用为难。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难处呢？不能见的话就不见吧。”

“不。”赵南起似乎下定了决心，“我是怕走漏消息的话对您不利。尽管这件事情属于绝密……但我会马上安排你们见面的。请您等一下。”

赵南起派遣军分区可靠的干部秘密接来了朱德海的夫人，让他们夫妻俩见了面。后来，他又派遣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亲自带车，把朱德海送到离延吉100多里远的安图县一个偏远的小车站送上火车。听到朱德海安全抵达北京的消息后，赵南起才松了一口气。

《朱德海的故事》中，详细记录了朱德海与夫人金永顺见面的场面：

4月18日晚上，赵南起来到朱德海的住地告诉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他当天晚上就将去北京。过了没多久，金永顺急匆匆地赶来了。屋内只有朱德海一个人。他依然与往常一样，表现得泰然自若，有所变化的是脸上显得特别憔悴，头发也更加花白了。一般来说，心病太重的话，头发就会白得更快。由此，也能了解到这段时间以来，朱德海心中的创伤有多么深重。不过，他丝毫没有把痛苦表露出来。他低声把当天晚上即将去北京的消息告诉了妻子。

金永顺已经有所预测，所以心里很高兴。不过，她知道朱德海其实是不得已离开延边的，所以无法约定什么时候才能重逢。

“我一定会回来的。要不了几个月就会回来。”朱德海安慰着妻子，又叮嘱她照看好孩子们，别让孩子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盲目地随大流。他停了一会儿，又对妻子说：

“我在延边工作了17年，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不过，我

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群众的事情。”

听了朱德海的话，金永顺心里更加感到难过，不由得流下了眼泪。临走之前，朱德海依然为生产操心。他叮嘱赵南起，农活儿有季节性，误了农时的话会坏了一年的大事，一定要按时插秧。

那天晚上，军分区和军管会派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陈悦恭护送朱德海，一共动用了三辆小车，朱德海坐在中间的小车上，前后各有一辆车保护。原来计划在离延吉 70 公里的榆树川站上火车。陈悦恭担心发生意外，就来到 150 公里远的安图县南沟站把朱德海送上了火车。

朱德海走了，抱着一定会回来的想法走了。他丝毫没有想到，这一走将会是永远离开延边大地……

延边许许多多像赵南起这样的优秀干部，坚持认为朱德海是清白的而加以保护，然而都遭到了祸殃。朱德海秘密前往北京以后，书记处书记金文宝不堪忍受被迫揭发朱德海罪状的折磨，于 1969 年 2 月 20 日跳楼自尽，以死来证明自己和朱德海的清白。这无疑悲壮的人生抗争。另外，多年来为朱德海开车的司机许乙天坚持不交代所谓的朱德海“罪状”，被戴上“朝鲜特务”的帽子折磨致死。那个时期，延边凡是在朱德海下乡时住宿过的普通农户人家，都在当地被戴上“朱德海保皇派”的帽子，含冤被批挨打。就连位于东北边境的珲春市敬信镇防川村的农家，因朱德海在那里住宿过一周，也被拉上了批斗的舞台。

作家金学铁的长子金海洋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展览过朱德海书记家里的东西。有一天，我和朱德海书记的长女英彩，还有田仁永的女儿一起去参观展览。当时，我们都很小，不懂事。英彩马上要下乡去敦化大山嘴子，所以我们更是经常聚在一起。展览场展出了许多东西，在当时都可以算是好东西。不过，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些东西

都是从第一百货商场拿来的。英彩好奇地看着那些东西，十分委屈地说‘这哪里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 在北京的日子

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以赵南起为首的延边军管会的秘密运作下，朱德海被转移到了北京。对此，毛远新故意歪曲说：

“这次中央把朱德海转移到内地，主要是因为延边地处边防第一线，因而担心朱德海叛国，效忠于其修正主义主子。”

毛远新毫无根据的解释，误导了延边人民的感情。他们听了这样的解释后，在延边重新掀起了打倒朱德海的邪恶之风。

1967年5月14日，毛远新离开延边，被任命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跻身“可靠接班人”的行列。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沈阳军区（东北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利用特殊的身份，年纪轻轻就已经飞黄腾达。不过，随着后来“四人帮”的垮台，他也遭到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永远消失的必然命运。毛远新出生于1941年2月14日到延边来的时候，只不过是个25岁的青年。据说，毛远新现在住在上海，而他在延边的造反历史几乎已经不被人所知了。毛远新从十岁起在毛泽东膝下长大，称江青为妈妈。如果没有那样的特定家庭和特定环境，他很有可能成长为一个有名的工程技术人员。他在毛泽东严厉的管教下长大，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才能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来听好朋友叶剑英元帅的二儿子叶选宁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更有前途，就征得毛泽东和陈赓大将的同意，转学至“哈军工”。当时，“哈军工”很受青睐，吸引了许多革命第二代，因为在最困难的时期也能吃饱肚子，而且未来也有保障。毛远新学习优良，还担任了班长。然而，“文化

大革命”爆发后，他组织了“哈军工”造反团，不久就来到了延边。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他也被逮捕，以隔离保护的名义与世隔绝十年，并在1986年被判刑17年。1989年3月17日获准“保外就医”，来到南昌。据说，他的生母朱旦华给当时身居国家要职的一位老领导写了一封信，才有了“保外就医”的结果。1993年，他刑期已满，就以1965年毛泽东给他起的名字李实，就职于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2001年2月以高级工程师的身份退休。

朱德海到了北京以后，住进了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二楼西面的218室。这个机关招待所原先是为苏联专家盖建的高级宿舍，也是周恩来保护老干部的秘密场所。“文化大革命”逐渐走向无政府状态，全国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根据中央的秘密安排，老干部们陆续来到这里。一堵围墙隔断了外面的世界，找到了暂时的安定。但是，这样的安定并没能延续太久。朱德海的长女吴英彩回忆这个时期时说：

“父亲的一生本来就充满了风浪和曲折，有着许多痛苦的经历。父亲去世后，母亲终日以泪洗面，过着悲伤的日子。到了晚上，她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父亲的故事，更引起了我们对父亲的怀念。哈尔滨时期、延边时期、创立自治州时期、反右派斗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其中有我了解的事情，但是有许多事情是第一次听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延边遭到批斗的故事最为悲惨。其中，也包括了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秘密前往北京住在招待所里的那段时期。在中央有关部门的秘密安排下，父亲住进了中央直属机关的一个招待所避难。不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哪有什么合适的避难地方呢？那个招待所规模很大，内部还用间壁隔开，实行严格的管理，但是，最终还是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发现，他们接连不断地冲击招待所。这个招待所里住着许多根据中央秘密指示前来避难的干部，因此，传闻鹊起，遭到了造反派的猛烈

冲击。尽管招待所方面增强了卫兵，但是，造反派组织成员翻墙进来，打碎房门，把老干部们拉出门去的惨状依然时有发生。”

2009年1月9日，《人民政协报》以《40多年前的故事——周总理和被保护的老干部》为总题目，刊登了当时到北京“二七车辆厂”去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陈守信的回忆文章《周总理交给我们的特殊任务》。文章中第一次公开了朱德海充满悲伤的生活轶事，其内容令人内心发酸。下面的这些真实情况是笔者根据需要，从整篇文章中节选出来的：

第二年，我们根据上级指示，把“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极大打击、无法再做正常工作的几位老干部安排到北京“二七车辆厂”。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周总理经过毛主席同意后作出的秘密安排。

自从造反派在上海得势以后，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主要领导成了造反派的主要攻击对象，人身安全遭到了威胁。中央开会决定，把这些老同志接到北京秘密安排到分散的地方。这同样没能维持多长时间。获得情报的造反派仅用一个夜晚的时间就袭击了这些地方，劫持了好几个省的领导。住在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领导都没能幸免于难。周总理闻讯后，立即命令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搜寻被劫持的干部去向，全部找回来，同时又立即报告了毛主席。紧接着，周总理又下达命令，对老干部们秘密居住的各招待所加强保护措施。

后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老干部们被疏散、安置到“二七车辆厂”、“南沟车辆厂”和“新华印刷厂”保护起来。这几个地方都是中央警卫部队保护的单位（对象），能对老干部们进行彻底的保护。当时，总理办公室有三名秘书在“军宣队（军人组成的宣传队）”工作。总理通过他的秘书周家鼎（二七车辆厂军宣队领导成员，后来为了掩盖身份改名贾汀）给工厂和军宣队下达指示。第一，必须绝对保守秘密，保证老干部们的安全，不能有1名老

干部被劫持，要断绝一切外人到厂里来见老干部。第二，必须安排好老干部们饮食、住处、治病、用车等日常生活。第三，必须根据老干部们的身体条件，安排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简单劳动，改善他们与工人们的关系，让他们能够进行一定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第四，必须让老干部们能够及时向中央反映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实际要求。“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总理经常在公开场所强调：“应该对老干部一分为二，分清功绩和过失，该保护的一定要保护。我们党的革命历史传统是由他们这一代人创造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老干部的爱戴和保护就是保护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

1969年开始，以中央的名义安排在“二七车辆厂”的老干部一共有八人。他们是徐向前元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宗逊上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军训部部长）、王恩茂中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江华（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五政委）、江渭清（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省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张平化（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黄欧东（辽宁省省长、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以及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吉林省副省长、延边自治州第一书记、自治州州长、州政协主席、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朱德海。八人全都是政治巨头。其中，朱德海的级别最低，而且是唯一的少数民族。

根据周总理下达的指示，军宣队和工厂员工们始终没有泄露老干部们到厂里来的事情，确实做到了严守秘密。当时，工厂里最好的住处是上世纪50年代初为苏联专家们修建的招待所。老干部们被安排在那里居住。那是一幢雅致的二楼建筑物。徐向前

元帅拥有二楼的一个大房间，其他人都住在一楼，每人一个单间。每个房间十多平方米，与厂区相隔一段距离，环境非常幽静。住处与工人食堂很近，吃饭很方便。进出招待所的大门口设有传达室，由老员工和解放军战士日夜站岗放哨。老干部们刚到厂里时，为了保障首长们的安全，军代表们与他们一起上下班。半夜里，军代表还在他们住处周边巡逻。患病的话，小病在工厂职工医院治疗；重病的话，由军宣队派车去“301总医院”高干病房进行治疗。为了保护老干部们的人身安全和照顾他们的生活问题，军宣队领导指定陈守信（该回忆录的作者）担任通讯员。

老干部们很快就与工人们成为了好朋友。当时被安排在厂里的老干部中，年龄最大的68岁，最小的56岁，平均年龄为61岁。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建党建国的功臣。老干部们第一次在工人食堂吃饭时，多少有些不太方便。为此，食堂打算开设了老干部们的专用窗口，减轻排队的负担。但是，老干部们都表示反对，都愿意与员工们一起排队。当时吃饭时，主食需要粮票，菜肴需要菜票、油票……只有支付各种让现代人听起来像“一千零一夜”神话般的票子之后才能吃上饭。老干部们在支付票子的时候动作稍微慢一些，总会招来排在后面性急的员工的埋怨。于是，老干部们干脆把装有各种票子的纸盒一股脑儿交给炊事员，让炊事员自己挑选票子。每当这样的時候，大部分员工都会安慰他们，让他们慢慢来。不过，员工们一直弄不清像徐向前元帅等这样的高级干部们为什么会被发配到厂里来吃这些廉价的饭菜。当时，老干部们没有工资，实行供给制。不过，说是供给制，其实连一盒烟也买不起。为此，有的干部干脆戒了烟。

其中，朱德海的处境最困难，最悲惨。他像是和烟结了仇似的，吸起烟来一支接一支，而且吸的还都是最冲的烟。为了省钱，他一般都吸最便宜的烟叶。有一天，陈守信走进朱德海住的房间，

关切地问道：

“朱书记，您有什么困难吗？”

“什么困难也没有……是的，什么困难也没有。”朱德海很高兴地把陈守信迎进屋子。他们俩交谈了一会儿，朱德海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用手帕精心包着的小布包。

“这是什么？”陈守信好奇地问道。朱德海没有回答，只是把一层一层包着的手帕打开，里头露出了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

“小陈，你别小看这些钱，这是我来北京以后一分钱一分钱积攒起来的16元钱，是我女儿英彩从延边敦化大山嘴子公社到北京来看我的火车票钱。现在再积攒16元钱，她就有回去的车钱了。那时候，我就会写信让她来看我。”说着，朱德海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情，“所以说，这不是钱，是我能与女儿重逢的证券。”

有了32元钱就能让女儿来北京看望父亲！有哪个延边人能够想象得出身为中共延边州委第一书记的朱德海脸上的凄惨表情呢？

2012年4月5日，笔者在延吉白山宾馆740号客房见到了清明节到延吉来省墓的朱德海长女吴英彩和长子吴阳松（吴阳日）的妻子金太顺。当时，金学铁的长子金海洋也在座。小时候，金海洋和吴英彩、吴阳松姐弟俩十分亲密。这与他们的父亲朱德海与金学铁的亲密关系不无关联。我们在交谈中说起了很多事情，但是，当笔者问起朱德海在北京准备女儿往来车费这件事的时候，英彩如实回答说不知道。不过，她说了这样一段话：

“……那时候，我是敦化大山嘴子公社（镇）的下乡知青。我下乡之前，曾经给周总理的秘书孙基太写过一封信，询问父亲的下落，还表达了可能的话想见见父亲的心情。这封信后来转到了父亲手里，父亲的回信也是通过孙基太秘书转给我的。父亲在北京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避难的时候，我母亲先去看望了父亲。父

亲的车票故事应该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的事情。那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见到父亲的。当时，父亲的处境极其艰难，连烟都买不了。我们四个孩子中，我是唯一的女儿，从小就受到父亲的许多宠爱。当我去看望父亲的时候，他非常高兴。我去北京之前，他让我别忘了带几斤蜂蜜。蜂蜜对父亲的病很有好处。可是，那时候我上哪儿去弄蜂蜜啊？现在我只要见到蜂蜜，就会十分痛心想起那个时候。当时，尽管父亲一再询问延边的形势，但是，我作为一个身居敦化深山沟里的下乡知青，完全是一无所知……虽然生活相当艰苦，但是父亲与一起在招待所避难的老干部们相处得十分亲密。招待所出入门旁边，不知是谁栽种的枝条上结了两个苦瓜。老干部们在散步的时候，经常会议论苦瓜是湖南蔬菜、湖北蔬菜的，各地的烹调方法不一样，等等。现在想起来，在大墙内避难的老干部们失去了自由，可以想象他们都已经孤独到了什么程度。有时候，老干部们聚在父亲的房间里，经常会说起被红卫兵硬拉到舞台上坐‘喷气式飞机’的事情，被拉着游街的事情。他们在工作时曾经把时间掰开来用，而在那里却是虚度光阴。”

是的，朱德海在大墙内人身安全是有了保障，但是却失去了自由，在流水般的时间里孤独地浪费着自己的人生。下面依然是陈守信的回忆：

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听见朱德海同志的房间里传出笑声，就敲门进去，看见桌子上并排放着两个铝制饭盒，分别装着半饭盒的酒和猪头肉。盛有猪肉的饭盒上还放着一双筷子。五位老干部围坐在桌子旁边。他们正在兴致勃勃地决定由谁先喝酒。我一进屋，他们就纷纷邀请我一起喝酒……我看见只有一双筷子，就说去食堂再拿几双筷子，他们把我制止了。他们说，大家共用一双筷子，显得更加亲密，也会觉得更加心情舒畅。他们还告诉了我之所以在夜里喝酒的原由。他们推荐两名老干部分别买来了半

斤酒和一斤猪肉。张平化说，到这里已经有好几年了，而“打牙祭”（每月初或中旬吃一顿肉菜）这还是头一次。他们边喝酒边交谈着有趣的故事。我发现他们不管轮到谁喝酒，都不约而同地端着饭盒抿一小口，肉也是挑最小的吃。半斤酒和一斤肉一直转了许多圈以后才全部告罄。

住在那里的老干部们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在正常的情况下，组织上会给他们安排炊事员、警卫员、专门司机、秘书等工作人员，现在一切生活都需要他们自己解决，遇到的困难一言难尽。不过，尽管条件如此恶劣，他们还是很快适应后，互相关心和互相帮助。比如，黄欧东省长患有心脏病。住在他两侧的朱德海和张平化担心他夜里发病，经过商议，就以敲墙作为信号，一旦传来危急信号，就立即过来帮忙。他们还经过多次练习，直到没有问题了才满意。

我把老干部们的这些困难情况报告给贾汀同志。他了解了老干部们的生活实在太艰难后，表示马上向总理汇报。几天以后，贾汀同志把好消息告诉了我。贾汀同志把老干部们的生活情况向周总理汇报后，尤其是说到几个老干部共用一双筷子转着圈喝酒的情况时，周总理拍着手大笑起来。他说：“老干部们的生活已经大众化了，发生了很大变化。像江华同志以前是非常讲究规矩的，为了擦手更加方便，总是在客厅、寝室、卫生间里准备好湿毛巾。可是，现在他们能做到好几个人合用一双筷子喝酒，真是变化不小啊。”不过，听着贾汀的汇报，周总理的脸色越来越严肃，在院子里慢慢地踱着步思索了一会儿，然后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指示他们打电话给没有工资的老干部们所在地区，从第二个月起，每个月把老干部们的工资全额转到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从下个月起获得工资的老干部们都十分高兴。张平化同志说：“以前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是多少，今天一看，有300多元呢。”朱德海同志也说：“以前工资问题都由秘书和管理员负责，我也不太清楚。”

1969年10月17日，随着林彪“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一级通知”生效，徐向前、江华、江渭清、朱德海等同志匆忙离开了工厂。只知道他们被分散到外地去，可是谁也不知道被分散到哪里去了。我记得，徐向前元帅离开时，他坐的车来到军宣队门口，他没有下车，只有他的秘书下车道别后立即离开了。最后离开工厂的老干部是张宗逊和王恩茂。他们是1972年离开工厂的。（摘自陈守信的回忆录《周总理交给我们的特殊任务》）

“那时，母亲领着二弟（吴阳青）和三弟（吴坚）去北京看望父亲。他们半夜下的火车，到处打听，直到天快亮时好不容易才找到父亲避难的招待所。不料，他们如此艰辛地找到招待所，却被阻止不让见父亲。好不容易找到了父亲，竟然不让见面。不管他们如何请求，招待所方面还是一口拒绝。据母亲说，那次从离开延边时开始都是极为保密的，而且得到了延边军管会赵南起政委的支持和帮助。母亲发现坚持坐在招待所门口不走没有用，就无可奈何地领着弟弟们乘坐运货车离开了。可是，父亲对这件事情全然不知。这也不能怪招待所。因为招待所方面遵照命令，必须保障老干部们的人身安全。他们是按规定办事而已。母亲在招待所附近找到住宿的地方住了下来，试图与父亲取得联系。后来我听说……母亲去了几天以后，招待所方面为了老干部们的安全，用伪装成运货车的卡车把老干部们秘密转移到北京卫戍区南苑以东的高地。解放军有一个团的兵力在那里保护老干部们。这简直是解放后的一场游击战。不过，这也算有了暂时喘息的时间。初期胡打乱砸、任意打倒的运动达到顶峰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逐渐沉寂下来，从而使老干部们能够暂时喘口气。1968年初，父亲重新返回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父亲与母亲也总算见上了面，母亲也能留在父亲身边照料。那年，父亲已经57岁，但是依然盼望着形势尽快安定下来，能够重新返回延边。父亲有时到街上去散

步，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是，依然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以防被造反派发现。当时，北京也有许多从延边来的造反派和他们的眼线。父亲在延边的职位很高，可是在招待所里干起了义务服务员，给其他老干部跑腿买东西，可见他在老干部中间职位是最低的，年龄也是最小的。因为他是和元帅、省长、大军区司令员住在同一个招待所里。后来，父亲去了北京‘二七车辆厂’。当时去工厂的名义是调查研究，但是父亲在厂里还干过打磨什么零件的活儿。啊，我想起来了，大概是用手工打磨机车阀门的活儿。那只是象征性的劳动，目的是为了保护老同志。那里的老干部中间，父亲是唯一的少数民族干部。这也可以看出周恩来总理对少数民族干部是多么的关怀。这个时期，延边发生了震惊全国的‘8·2’、‘8·4’流血事件，还动用了枪支。后来，党的‘九大’召开，父亲对那次会议抱有很大的期待。父亲只想尽快返回延边，重新做好因‘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工作……父亲在武汉五三农场时，给我讲了许多回到延边去以后要做的工作。其中包括建设延边体育场，建设延边州内大中型水库，治理山地、发展农村地区和城市建设等。这些项目都是他在职时计划要做的，到北京避难后，这些工作构想更加成熟了。但是，无情的现实与父亲殷切的愿望背道而驰，而且是渐行渐远。1969年，中苏两国关系越发恶化，父亲必须离开北京。”

1969年，位于黑龙江省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中苏两个大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珍宝岛战斗”。两国处于爆发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击退了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的苏军，因此中国把这次战斗定性为自卫反击战。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队多次武装侵犯乌苏里江中心属于中国一侧的领土珍宝岛，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击。从3月2日到4月2日一个月间，在几次冲突和战斗中，苏军死亡230人，被击毁19辆坦克和装甲车。

中国方面死伤 92 名解放军战士，其中牺牲 71 名。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孙玉国、冷鹏飞、华玉杰等享誉全国的战斗英雄。

这场战斗差点儿引发苏联方面的核战争。苏联军部的强硬派提出了中国威胁论，打算联合美国毁灭中国的核基地，以中国的大城市为目标进行核打击，阻止中国的崛起，最终在美国的反对下没能得逞。但是，苏军为了泄愤，竟然在 1969 年 8 月 13 日，出动数百名步兵和坦克、装甲车等，又在新疆边境挑起武装冲突。在这次战斗中，中国方面有 38 名边防战士牺牲。素以强硬派著称的毛泽东在与苏联的对立中，决心不惜打一场全面战争，通过国防部长林彪下达了陆海空三军作好一级战斗准备的命令（1 号命令），加紧战前作战准备。美国通过卫星，监测中国进行战争准备的军事动向。根据 1 号命令，中国打开了特殊军基地的全部“盖子”，做好了一切准备。后来，苏联方面采取了温和外交，缓和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但是，中苏两国在后来的一段时期里依然处于敌对的关系。中国也因此持续了“广积粮、深挖洞、为打仗”的社会状态。

1969 年 9 月，根据中央准备战争的命令，朱德海被疏散至湖北省，不久又被下放到五三农场。

## 湖北五三农场

五三农场位湖北省江汉平原，农场范围涉及三个县。距离五三农场几十公里远的张屋岭，以前是李先念开展游击战的地方。五三农场是湖北省面积最大的国营农场。1952 年 10 月，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决定在这里建设国营农场。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的李先念，在 1953 年 2 月 20 日举行的农

场奠基仪式上亲自挖了第一锹土。当年10月，正式命名为“国营五三机械农场”，1956年改称为“国营五三农场”，一直所属于湖北省农垦局。

五三农场距离武汉190公里左右，坐车大约要走四个小时。

朱德海来到五三农场以后，最初被分配在农场附属机械修理厂进行劳动锻炼。两个月后的11月中旬某一天，金永顺领着老二吴阳青和老三吴坚来到五三农场。自从“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一家人从没有相聚在一个地方。这次，除了英彩和阳松下乡到敦化县农村而分离外，其他四口人终于团聚了。

农场把农场招待所东面的一间住宅分配给他们家。长江流域的晚秋到第二年初春，屋里温度与外面温度相近，因此，反而感到比东北更寒冷。这是因为屋里没有安装取暖设备的缘故。长江流域11月的气候相当寒冷，让人簌簌发抖，自然会怀念起延边暖和的火炕。金永顺在来的路上患了感冒，一连几天不见好转。

“不行，这里有砖，只要再找些其他材料就能把火炕搭起来。”朱德海领着阳青和小坚开始在屋里搭起火炕来。他找来了砖和沙子等必需的材料，然后挽起袖子干起活儿来。朱德海干起农村活儿来十分熟练。经过一天的努力，到了傍晚在灶坑里点上了火。

吴英彩在回忆父亲时，介绍得最详细的就是五三农场。

“……父亲和母亲领着阳青和小坚去了五三农场以后，我接到母亲的来信，离开敦化县大山嘴子塔拉站农村，来到遥远的湖北武汉，又从武汉乘坐四个小时长途客车，在一个叫做一家岭的车站下了车。母亲前来接我，等我刚走下车，她就边喊着‘英彩——’边跑过来，一把抱住我。我们母女俩情不自禁地哭了，做梦也没想到一家人会在湖北的一个农场里相聚。母亲跟着父亲来到这里吃了许多苦，而且还为父亲的事情操尽了心。尽管母亲当时只有40多岁，脸上却布满了倦意，看上去老了许多。不知哭了

多久，好不容易打起精神回到农场招待所东面的家里。父亲早就站在院子里等着我，高兴得直向我挥手。

“‘英彩！’

“‘爸爸！’

“我扔下行李，飞快地朝父亲跑过去。相比在北京见面的时候，父亲因为操心又老了不少，脸色黑黄黑黄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看上去十分可怕。干瘦干瘦的身子像是被一阵小风就能吹倒。在陌生的异乡土地上本来就会充满忧愁，现在一看到父亲的样子，更让我泪流如注。

“‘爸爸，你怎么会老成这个样子？’这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父亲了。父亲就像在湖北贫穷的农村路上常见的病入膏肓而勉强走动的农村老人。大概是因为我哭得实在太伤心，父亲反而慈祥地笑着说：‘毛主席派来的下乡知青同志哭什么，别哭了。外面太冷，快进屋去吧。’

“走进屋子，我觉得就像是回到了延边。在这间武汉农村的小平房里搭上了长江流域根本见不到的北方火炕，还有咸镜道式的灶台和铁锅。我仔细一看，灶台一共分三层。灶台上面是锅，锅上面又搭了炕。也就是说，应该算是汉族式的火炕。这肯定是父亲的杰作。另外，还有临时做成的饭桌、碗橱和衣柜等。说是衣柜，却没有柜门。真是一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穷人家。可是，那天我们还是因为一家人能够团聚而暂时忘却了困苦，度过了一个幸福之夜。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五三农场最开心的日子，好像就是我到农场的那天夜里。父亲甚至忘了吃饭，只顾向我询问延边的形势，而我则把自己所了解的全都告诉了父亲。父亲一口气询问了许多问题，直到母亲提醒之后，才不得不离开。他辗转反侧，一夜难眠。那天夜里，在湖北陌生的家里，我也是久久不能入眠，整整听了一夜父亲的长叹短吁，直到天亮。”

在农场里，朱德海抛弃了男人在家里的“特权”，摆脱了朝鲜族特有的家长地位。每当金永顺下地干活儿，朱德海在家的時候，也会做些家务活儿，包括烧菜做饭，还会用萝卜来腌咸菜。听说，他用萝卜腌咸菜的手艺还是在延安时期学会的。朱德海最牵挂的是妻子和儿女跟着自己吃苦的事情。

“爸爸，你是在哪里学会腌萝卜的方法的？”英彩惊讶地问道。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还有这方面的手艺。

“你不知道，爸爸没有什么事情不会做。在延安革命军政学校时期，我们都要腌制许多白菜和萝卜，尽管那时候缺乏辣椒那样的调料，但是学员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当时我担任总务处长，每天都要为学员们的饭菜操心。”朱德海像慈父一般仔细地把腌菜的手艺一一教授给站在身旁的儿。这也是在五三农场一般农户人家中常见的家庭风景。

金永顺患有严重的贫血，浑身到处疼痛，就连做饭、洗碗都会引起眩晕。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朱德海总是扶着妻子躺下，自己接手干厨房活儿。其实，朱德海从莫斯科—延安—哈尔滨到延边时期，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服药如同吃饭一样。从北京来到湖北农场以后，尽管他因患痼疾而咳嗽不止，身子也越来越瘦，但是始终先想着家里人。当时，中国的轻工业十分落后，全国生产的生活用品不是脱销就是昂贵，其中也包括布匹。买布需要用布票，但是，朱德海却没有布票。为此，他曾经嘱咐到武汉来的女儿从延边买些布带来，并让女儿尽量多弄些布票来。但是，女儿只是一个贫穷的下乡知青，哪里去弄那么多布票呢？而延边党政领导们的处境更是可怜，一个个在他乡异地连能够维持家庭的起码生活条件都无法达到。

当时，由于缺少布，朱德海和金永顺只好穿用农场进口的日本产尿素肥料包装袋做的内衣，还把小手帕连起来给阳青和小坚

做内衣穿。金永顺不愿意让年幼的孩子们穿用肥料包装袋做的内衣，就去供销合作社买了小手帕，用线缝上后做成内衣给孩子们穿。可以断言，只有在当时的中国，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根据母亲的吩咐，吴英彩来的时候买了几尺藏青色的布，还弄了一些布票。朱德海夫妇见了那几尺微不足道的布和布票后，像是捡到金块似的，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神情。金永顺立即用女儿买来的布给丈夫做了一件藏青色的内衣，一直到去世，朱德海始终穿着这件内衣。

“父亲到了农场以后，并没有人动员他干活儿。但是，他主动到场部去要求安排工作，于是被安排到小太生产队。父亲在那里种过蔬菜，也在水田里干过活儿。父亲干农活儿十分熟练。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干水田活儿和铲地等农活儿，一点儿不比农民差。当时没有脱粒机，秋天打场时全靠人工脱粒。水稻脱粒使用的是原始的脱粒工具筛子，而其他旱地作物的脱粒则使用连枷。我下乡的敦化农村给大豆、小米等旱田作物脱粒时，使用的也是连枷。父亲使用连枷相当熟练，农场里的人根本没想到父亲曾经是位高级干部。到了夏天，父亲到糖厂去干活儿。他像当地的农场工人一样，头戴草帽，肩上搭着毛巾，挽起裤腿去地里铲地除草。长江流域是中国有名的粮仓，农作物收成相当高。不过，经济作物上比其他地区耕作要迟。那里不种甘蔗，一直从外地购买白糖，有南方珠江三角洲用甘蔗制作的白糖，也有北方用甜菜制作的白糖，还有西北四川省的红糖等。父亲去糖厂的时候，糖厂还处于建设阶段，还没有正式投入生产。当时，政府拨下巨款，要在五三农场建设糖厂，并把栽种甘蔗的任务分配给了小太生产队。那时，父亲还干过管理甘蔗地的活儿。尽管父亲熟悉种水稻，熟悉种大豆和玉米等农作物，但是栽种甘蔗还是头一次。不过，父亲并没有因为不懂而退缩，经过顽强努力，终于掌握了甘蔗的生长规律，在试验性栽种的甘蔗地里生产出了糖分含量高的甘蔗。

当年晚秋和初冬，五三农场糖厂第一次生产了白糖。父亲当时流的汗水比任何人都多，现在看起来，那也许就是身患顽疾的红色信号，但在当时却没有觉察到。母亲经常嘱咐父亲干活儿别太拼命，注意休息，但是父亲只是口头上答应着，一旦到地里就忘了一切，不顾一切地干活儿。父亲就这样在农场里干了两年左右的活儿……”

当时，朱德海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他虽然作为一名政治干部，但也是每天通过收音机收听中央广播，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在长期的整治活动中，朱德海十分熟悉中国式的了解政治气候的方法，其敏感程度甚至达到了仅从播音员的声音和口气中也能感觉出来。他逐渐感觉到，中国这列巨大的“火车”沿着险峻的坡路吃力地往上爬行，终于精疲力竭，开始慢慢后退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农业第一线指挥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倡导的一系列农村政策，使得中国整个经济发展以加速度的程度飞速发展，不过也只有几年时间。刘少奇和邓小平先后倒台。对朱德海来说，这些大人物的厄运就像是自己将遭遇什么不幸的象征。所以他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没过多久，他可怕地感觉到自己的预感真的没有错。

1971年9月末，从延边来了四个人到五三农场来找朱德海。他们到的第二天早晨，就把朱德海叫到农场招待所1号房间。从那天开始，朱德海又重新遭到了审问是否是叛徒的折磨。调查组在五三农场呆了一个多月，使朱德海的身心疲惫到了极点，疾病也急剧恶化。

“有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咳嗽咳得特别厉害。母亲边敲击着父亲的后背，边让父亲服药。父亲的病依然没有任何起色，他整整咳了一夜。早晨，母亲打算陪着父亲去医院看看，父亲却了解解自己的病情，过几天就会有所好转，仍然去地里干活儿。后来，

父亲的身体经常发烧，咳嗽起来坐立不安。父亲的身体越来越瘦。母亲总觉得这不是什么一般的疾病，就强行让父亲去住院。父亲也觉得不像以前那样好转得快，就同意去住院。可是，父亲并没有去武汉的大医院，只是在五三农场的医院里治疗了一个月左右。然而，病情不但没有任何好转，反而越来越危殆。由于一直无法做出准确的诊断，在医生的建议下，父亲于1971年11月28日转院到了武汉协和医院第一附属医院，诊断结果为肺结核。于是，打了一个多月专治肺结核的链霉素注射。可是，病情却依然越来越严重。母亲认为肯定不像是单纯的肺结核，于是在1月23日把父亲转院到了武汉医学院第二医院，进行了精密的检查，被诊断为右侧上部肺腺癌……当时，我和弟弟们并不知道父亲被查出患了那样的癌症。几天后，母亲回家收拾生活用品和衣物，准备为父亲住院，但是依然没有把实情告诉我们姐弟。她只是用无力的眼神看着我们，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巨大的悲哀。我们感到非常害怕，也没有打听父亲的病情。我们的心里越来越乱，直到后来才知道父亲患了肺癌，需要做大手术。有一天，我对阳青和小坚说要到武汉去看望父亲，然后径直来到武汉东湖西岸的武汉医院（协和医院）。母亲一见到我，就问我为什么丢下阳青和小坚跑到医院来，并让我赶快回去。我恳求母亲让我和她一起待几天。当时，阳青即将中学毕业，小坚也已经上中学，完全可以在家里独立生活。他们俩在延边的时候，就习惯了那样的生活。父亲的病势看上去暂时稳定下来。父亲直到那时还不了解自己患了什么病。无论是院方还是母亲都没有告诉他。父亲只以为患了不是一两天就能痊愈的疾病。于是，有时候还领着我们去逛街，到市场去询问副食品的价格，还买些水果，显得十分高兴。在延吉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和父亲一起逛过市场。父亲逛了很多地方，打听了许多价格，而且不管是什么物品，都马上与延吉价格进行比较。

“我们延吉”、“我们延边”已经成了父亲的口头禅。他说，武汉吃的东西比延吉丰盛。他还说，武汉也有糯米糕，但吃法有很大不同，他们是在油里面炸了以后再吃，叫做糍粑。看到水果，父亲又与延边的苹果梨和苹果进行比较；看到大米，又与延边的水稻进行比较，还自豪地说延边的大米是全国最好的。在父亲的眼里，什么都比不上延边。父亲对延边的爱真的是深之又深，谁也无法比拟。怎么比喻才好呢？父亲对延边的爱是发自内心的爱。他说不上两句话，其中一定会带出延吉或延边的称呼。我敢说，迄今为止还有谁像父亲那样热爱延边，像父亲那样为延边付出全部的爱！虽然母亲有时候埋怨说，延边把你打倒，污蔑你为叛徒，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但是，父亲总是说，现在是特定时期，人心也可能出于无奈产生变化，而且这样的变化也不是出于主观，而是迫于无奈，也只有这样才能活下来，所以不要老是对此耿耿于怀，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延边老百姓更好的人了。他还说，真想回到延边去，而且还可以原谅一切。我在回忆父亲的时候，感到最痛心的是他再也没能回到延边去。父亲留下了没能再奉献延边之爱的遗憾。病情突然转危以后，父亲躺在病床上终日沉默不语，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有的时候，父亲很长时间连眼也不眨一下，死死盯着天棚和墙壁。于是我就会特意去晃动父亲的身子，把他的深思打乱。除了沉默以外，他只要一开口，话题总是离不开延边。延边的人、延边的农村、延边的工厂、延边的高山河川、延边的学校和果园、延边黄牛、延边医院、延边歌舞团、延边的矿山、延边的经济发展……父亲只要一提起延边，就会悄悄地流下眼泪。随着病势加重，父亲的身心越发憔悴，也越发容易动感情。他是多么想回到延边，多么想念延边的人民啊！每当父亲流泪，我和母亲也会跟着一起流下眼泪。虽然父亲是个极其刚毅的人，但是在病床上提起延边时，就会被感情所折磨，就会无限感慨。当时

父亲的这种感受，我直到过了60岁以后似乎才有所理解。”说到这里，吴英彩泪流满面。

啊，延边！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珲春、汪清、龙井、安图、敦化、图们、和龙……生活在这里的亲爱的兄弟民族……美丽的山水、平原……

朱德海在病床上，说到了桥头立有黄牛雕塑的河南桥、局子街、布尔哈通河、帽儿山、万亩果园、水库，还有刻骨铭心的卢基舜、金时龙、郑奎昌、崔竹松、田仁永等许许多多生活的延吉和延边！即使合上眼，死了一百次也忘不了……

“父亲曾经几十次向我打听能够去延吉的路线。他还问我，坐火车去延边要几天，自己的身体能否吃得消，如果坐飞机应该怎么去，是否先到长春再转换去延吉的火车……明明是再也回不了延边，但父亲还是让我去买列车时间表和地图。等我买回来以后，父亲整整一天用铅笔在北京、沈阳、长春、延吉地名上画上线，梦想着早日回到延边。父亲还让我有机会去武汉的话，去飞机售票口打听一下时间，再给他买铅笔和白纸。我都照办了。父亲做梦也想再回延边去看看，回到延边与农民们一起开发水田、建工厂、修水库、盖学校。对父亲来说，这个世界上第一、第二、第三……都是延边。明明知道已经回不了延边，父亲在去世的时候，还在创造回到延边去的假想世界，并在那里获取一时的满足，并且坚信被歪曲的是非必然会有纠正的那一天。”

朱德海早就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延边派朱德海专案组来审问朱德海的时候，金永顺就充满悲愤地对吴英彩说：“你爸爸一夜就吸了两盒半烟，即使肺部健康的人也难以忍受，像你爸爸那样肺部衰弱的人怎么可能受得了呢？”

一旦确诊为肺癌以后，必须尽快做手术。朱德海的手术须经

过中央的同意。中央批准后，朱德海在2月10日接受了切除右侧肺部的手术。半个月以后重新检查，手术部位已经愈合，没有发现其他异变。医生们认为手术是成功的，不过还是需要接受放射治疗。朱德海3月搬迁到高家湾医院，住进三楼的高干病房。这个期间，金永顺一直守护在朱德海身边。即使在手术后半个月特护期间，尽管护士一再劝阻，她还是在医院里陪着朱德海。手术部位愈合后，有了暂时的稳定和平静。每天早晚，金永顺都陪着朱德海在医院前面静静地散步。这时，大儿子吴阳松也从敦化赶来了。然而，这样的平静并没能维持多长时间。4月上旬的某一天，从延边来的专案组成员又一次出现在高家湾医院，依然是几个月前来过的军代表。他们还带来了金永顺的处分通知书，虽然消除了国际特务的嫌疑，但还是给予了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尽管金永顺感到冤屈，但还是觉得比较幸运的。因为她其实最担心的是不让她守护在丈夫身边，幸亏得到的不是这样的处分，真是万幸。无论是朱德海还是金永顺，处境实在是太可怜了。

“人总会有一死。不过，我现在绝对不想无缘无故地死去。为了延边，我也想活下去。我也要求恢复我的名誉。如果我现在死了，就会把不实的冤名带进棺材，所以我现在不能死。”这是朱德海在濒危之际的抗辩。

“现在想起来，当时在我们家里怎么会有什么喜悦和舒心呢？那些军代表走了以后，院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护士冷着脸走进病房，一言不发地把垫在父亲身下的毯子拿走了。即使在战场上针锋相对的敌人，一旦投降后也该受到应有的待遇。而父亲并不是敌人，可是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却采取了莫名其妙的敌对态度。护士们不再来打针，也不及时发放药物。由于院方拖延放射治疗和物理治疗，父亲的病势日益恶化。父亲的一头白发全都掉光了，脸颊瘦瘪，完全是一副皮包骨头的模样。后来才知道，

军代表竟然向院方通报说，父亲是在延边搞独立王国的叛徒……现在想起来，父亲其实早就知道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非常危急的时刻，并开始感觉到已经无法再回到如同热爱自己生命一样热爱的延吉和延边大地。为了减轻母亲独自一人看护父亲的负担，我把家托付给弟弟们，再次来到医院。父亲经常陷入昏迷状态，一旦从昏迷中醒来，就会说想回到延边去。他还自言自语说，就是死也要回到延边去死，而且回延边之前，一定要脱掉硬扣在自己头上的帽子，作出公正的结论。有一天，父亲从昏迷中醒来，向母亲索要铅笔，亲自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写信之前，父亲颤抖着手想了很长时间，最后写得十分简短，内容极为普通，就是要求中央对自己的问题尽快做出正确的结论。对父亲来说，有多少话要说，又有多么冤屈啊！可是，父亲写得极为简短。周恩来总理接到父亲的信以后，表示了无限的关注。他指示湖北省委想尽办法延长父亲的生命，同时又指示中央组织部尽快审查关于父亲的调查材料。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组织部1972年5月去延吉查阅关于父亲的全部材料。然而，父亲直到殒命之际，也不知道周恩来总理对自己的问题表示了特别的关注，而且中央已经着手进行调查。”

随着时间推移，朱德海的左侧肺部重新出现了颤栗般的疼痛。医生说这是电疗后的反应，但是，朱德海的感觉告诉他，癌细胞已经扩散了。他做好了离世而去的心理准备。

6月中旬，朱德海的病势更加恶化。他的感觉是对的，这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肝脏。他因剧痛而挣扎的样子，实在是不忍目睹。

尽管为时已晚，但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还是传达到了医院。院方的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开始对朱德海使用血球蛋白等高级药物。

但是，朱德海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再回来了。

朱德海因为被心中感受到的政治压迫感和病理性的恶性反应折磨得遍体鳞伤，其身心已经再也无法挽救。

6月30日，雨水淅沥，令人厌烦。

那天，吉林省委派省委组织部长王武沉到医院来。尽管来之前已经了解了朱德海的病势，但是王武沉亲眼见到朱德海的惨状后，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吉林省委。第二天，吉林省委打来电报，由王武沉向朱德海传达了电报内容：

“省委希望朱德海同志对治疗抱有信心，而且省委正在积极处理关于你的问题。”

此时，朱德海已经完全衰竭，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但是，直到此时此刻，朱德海依然在拼命地把延边的江河、延边辽阔的天地、延边金色稻浪滚滚的田野拉进永远不会再醒来的深眠之中。

然后，他竭尽全力，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最后一句最为庄严的遗言：

“我要回吉林（延边）。”

留下这句话后，朱德海再没有说一句话。四天后的1972年7月3日晚上9点10分，朱德海来不及回答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和讲真话的吴德、赵南起政委等延边无数党政干部及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声援，在远离延边的湖北省武汉五三农场，仅仅留下一件遗物——一套灰色中山装，溘然去世，享年61岁。

吴英彩回忆说：

“父亲在武汉不知道名称的火葬场被火化，既没有追悼仪式，也没有前来吊唁的人，完全是一次冷冷清清的告别。在火葬场，大弟弟阳松原打算在挽幛上书写‘朱德海同志永垂不朽’，被母亲制止说，为父亲写‘永垂不朽’的挽幛，可能又会给家里带来不幸，所以只写了‘朱德海千古’。在连挽幛都无法如愿书写的年月里，

追悼仪式更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了。延边有人说，当时为父亲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仪式，自己还曾参加过。这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误导。我只记得来了几个吉林省委组织部的人。父亲去世以后，我们无法再住在那里，跟着组织部干部返回延边。离开武汉以后，我们接到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想见一见朱德海遗属的通知。吴德书记接见我们后，又请我们吃了北京烤鸭。在席上，吴德书记建议我们不要再回延边，留在长春。他是位十分细心的人。当时，母亲还有些犹豫不决，但是我们四个孩子一致希望留在长春。事实上，我们很害怕把父亲打倒的延边。就这样，我们一家在返回延吉的途中，听了吴德书记的建议后，决定留在长春。我们就是在延边也没有房子，在长春怎么可能会有房子呢？所以最初住在宾馆里。我们在长春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

## 第9章 英灵返回延边

### “我要回吉林（延边）”

真正的革命家、政治家、教育行政家是谁也不会忘记的。

1978年6月10日，中共延边州委做出了《为朱德海同志平反冤案，恢复名誉的决议》。

五年以后的1984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后乘坐火车回国，临时来到延边。胡耀邦总书记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曾被中国的老百姓称赞道“要解决冤假错案，就去组织部找胡耀邦”。由此可见，他对解决全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冤假错案十分认真。

他在接见吉林省和延边主要领导时，特别对建立朱德海纪念碑作了指示：

“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听到朱德海同志去世的消息后，做出了‘他是个好同志’的高度评价。你们要在平坦的山坡上选一个好地方建立纪念碑。在纪念碑周围铺上草坪，栽树种花，使它变成一个美丽的游览地，让人们经常来缅怀朱德海同志的功绩。”

胡耀邦总书记又亲笔题写了“朱德海同志纪念碑”。

两年以后，1986年6月，坐落在延吉市公园西山坡上的纪念碑竣工。在朱德海去世十四周年的7月3日，州委、州政府隆重举行了由2000余人参加的朱德海同志纪念碑揭幕仪式。二十公尺高的纪念碑用灰白色的花岗岩建成，雄伟壮观，镌刻着胡耀邦总书记写的碑名，碑顶上雕塑党旗和松柏、金达莱花瓣等图案。党旗意味着朱德海生前是共产主义者，松柏象征着他的功绩万古流芳，金达莱花象征着延边200万各族人民的崇敬之意。

2008年4月，经过延边州委和州政府的努力和吉林省政府的批准，一直安葬在长春革命烈士陵园的朱德海骨灰，终于奉还朱德海生前寤寐思念的延边大地，安葬在朱德海纪念碑后面。这也是遗属们的心愿。

朱德海的英灵终于有了归宿。朱德海留下的遗言“我要回吉林（延边）”终于成为了现实。不过，重新回归的并非是朱德海的肉体，而是他的英灵。

2008年4月17日上午，延边州委和州政府在朱德海纪念碑前面举行了重新安葬朱德海骨灰的追悼仪式。当时许多还健在的朝鲜族元老政治家们和延边州党政领导们参加了仪式，表达了对延边首任州长的崇敬和追悼之情，并对朱德海的遗属表示了慰问。同一天，还举行了朱德海夫人金永顺的骨灰与朱德海骨灰的合葬仪式。

住在北京的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将军以朱德海的下级和战友的名义发来了悼词：

“我听到在延吉举行朱德海同志骨灰安葬仪式的消息后，既感到高兴又觉得安慰。朱德海同志的骨灰安葬在延边，不仅是其家属的愿望，也是他战友的心愿，更是延边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作为朱德海同志的下级和战友，对延边州委和州政府做了这么

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深表赞赏和由衷地感谢。朱德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主要创始者。他在担任延边主要负责人的二十几年里，为延边的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今天，朱德海同志的骨灰终于回到了他付出全部心血的延边，回到了寤寐思念的延边，终于能与如此热爱的人民相聚一起。他终于能在九泉之下安息了。”

除此以外，原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也送来了花圈。借着这次骨灰奉还的集会，延边州政府在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内开设了“朱德海事迹展览室”，供大家参观。

“从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和母亲的骨灰盒回到延边开始，我就一直在流眼泪。合葬的时候，我们姐弟全都哭了，比父亲去世时哭得更加伤心。父亲一直想回到延边来，甚至在临终时还留下了回到延边，回到吉林去的遗言。四十几年后，父亲终于回来了，而且还领着已经去世的母亲一起来了。想到父亲和母亲并排躺在延吉，呼吸故乡的空气，一方面感到有些伤感，另一方面也了却了长期纠结在心灵的遗憾。父亲和母亲虽然生前没能如愿，但是在另一个世界不还是如愿以偿了吗？但愿父亲和母亲在延边，在故乡永生不朽。”（摘自吴英彩在采访结束时说的话）

据资料称，“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立案审查的干部为230余万人，占“文化大革命”前1200万名干部的19%。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副部长级以上干部立案审查的人占75%。有6万多名干部遭迫害致死，集体遭到诬陷、处理错误的案件达两万件。在这些案件中涉及到几十万人。另外，处理“文化大革命”之前每次政治运动中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中涉及的人数达100多万人。

那么，延边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文化大革命”中，延边制造了四大冤假错案，有计划地挑起武斗，破坏民族团结，有3000

多人失去生命，5000多人负伤或致残，直接被拉出来批斗的有20000余人，受到直接牵连的人多达十几万，受到间接牵连的人更是多达几十万。当时延边的人口一共只有170万名，每四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如此严重的情况大概在全国也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

《赵南起传》中详细地讲述了朱德海恢复名誉的过程：

……赵南起以趁热打铁的方式，深入推进州委讲清楚的工作，同时为了不耽误时机开始了第二件工作，即纠正冤假错案。他与田仁永等州委主要领导交换了意见后，决定以为朱德海同志平反冤案作为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突破口。

当时，担任延边州委揭批调查办公室主任的南兴烈回忆说：“南起同志选择以为朱德海同志平反冤案的工作作为全面纠正工作的突破口，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延边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打倒朱德海开始的。当时，不管有多少群众组织，也不管他们的组织形式如何变化，最根本的就是分成打倒朱德海和保护朱德海的两大派。因此，在解决延边问题时，首先要看敢不敢为朱德海平反冤案，这是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关键。要为朱德海同志平反冤案，就必须彻底否定延边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为朱德海平反冤案的问题，处理起来非常吃力也非常复杂。有人这么说：“为朱德海平反冤案有三个难点。第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军管会以及后来产生的革委会所做的事情会被彻底否定。第二是延边几乎全部在职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喊过‘打倒朱德海’的口号，因此在干部队伍中人人都会产生畏惧心理。第三是‘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造反组织的群众，全都参加了打倒朱德海的各种活动，这样会牵连到一大批人，打击面太大，容易产生混乱。”

赵南起的态度坚定不移。他说：“为朱德海同志平反冤案绝不是为了针对谁，相反是为了解放绝大多数的干部群众，是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了填平拦在延边各族人民之间的鸿沟。一定要把这一点说清楚。干部群众的模糊认识不是一件小事情。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弄清历史真相。只要我们能拿出真实的证据，群众自然就会了解真相。毛远新及其一伙的丑恶面貌一定会大白于天下……”

1978年6月20日，中共延边州委在延边工人文化宫隆重举行了为朱德海平反冤案的纠错大会。延边以这次大会为分水岭，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延边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使用汉语、朝鲜语两种语言，对大会作了现场直播。当时在全州设置了200多个分会场，10万多延边民众通过广播收听了大会实况，流下了眼泪。省委副书记于克代表省委宣布对硬加在朱德海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全部平反，并宣布朱德海是我党的一名优秀党员，优秀的民族干部，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共产主义战士。主会场和分会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朱德海保皇派”而受到冤屈牵连的干部群众都无法抑制住眼泪，有的甚至哭出声来。

啊！朱德海同志，你这才算是真正回到了延边。

2011年是朱德海诞辰100周年。延边州委和州政府于当年4月2日（阴历为3月5日，朱德海的誕生日），在州政府大楼举行了“纪念朱德海同志诞生100周年座谈会”，缅怀朱德海同志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及延边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民族团结”而立下的丰功伟绩。省委对纪念朱德海诞生100周年的活动非常重视。省委书记孙政才说：“朱德海同志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卓越的朝鲜族领导干部。无论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始

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众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奋发努力，建立了卓绝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奋斗的一生，是为延边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生。”省委常委、州委书记邓凯（现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州委副书记、州政府州长李龙熙等州委常委、州政府领导，延边军分区、延边大学主要负责人，州直属部门有关负责人，原州级主要领导，以及与朱德海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另外，还有朱德海的长女吴英彩、女婿赫巨财、外孙赫强，长子吴阳松、大儿媳金太顺、孙女吴雅男，二子吴阳青、二儿媳申贞淑、孙女吴小丽，三子吴坚、三儿媳朴光姬、孙子吴方及其未婚妻等一共十三名遗属参加了座谈会。

2012年4月4日清明节。

通往朱德海纪念碑的石阶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牵着上幼儿园的小男孩的手，正慢慢地往上走。

“咱们去哪儿？”

“去看望朱德海爷爷。朱德海爷爷是谁？”

“您不是说朱德海爷爷是个好人吗？”小男孩抬头望着老人说：“他在延吉盖学校，还修建延吉大桥，还在延吉造汽车。”

“是啊，你说得对。朱德海爷爷是个好人，什么事情都会做。”

老人笑呵呵地牵着孙子的手，对孙子的回答十分满意。

朱德海纪念碑仙气萦绕，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下。延吉美丽的天空凝滞在纪念碑顶上，那里有朱德海在慈祥地笑着招手示意

……

## 朱德海年谱

1911年3月5日（阴历）出生于俄罗斯沿海州的某乡村，原名吴基燮，参加革命时改名为朱德海，一直沿用至逝世。

1920年3月（9岁，以下均为周岁）从沿海州经由朝鲜会宁搬迁到和龙县水洞沟（现龙井市智新乡胜地村）

1929年（18岁）参加革命

1930年8月（19岁）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

1931年5月（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担任共产党东京城特别支部书记，“9·18”事变后，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斗争

1932年8月（21岁）担任共产党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牛家屯特别支部书记、密山县全村支部书记

1933年8月（22岁）担任西大林子党支部书记

1935年2月（24岁）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抗联）第3军新编2团后方留守处党支部书记

1936年（25岁）离开东北经由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滞留6个月）准备前往莫斯科

1937年1月（26岁）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1939年9月（28岁）经由新疆到达延安，担任八路军359旅8团特务连指导员和8团供给处指导员

1941年（30岁）在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和中央海外研究班学习，参加整风运动

1943年（32岁）参加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筹备工作，担任学校党委委员兼总务科长

1945年（34岁）光复后，根据朱德的命令，编入朝鲜义勇军进军东北，同年11月到达哈尔滨，担任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政委，配合兄弟部队肃清土匪，发动群众建设后方根据地

1948年4月（37岁）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处处长

1949年3月（38岁）到达延边，同年5月22日担任中共延边地方委员会（延边州委前身）书记，7月13日兼任延边督察专员公署（延边州政府前身）专员

1952年9月（41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成立后，担任中国延边地委书记兼自治区主席

1954年（43岁）担任吉林省政府副省长

1955年12月（44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变更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担任州委第一书记、自治州州长、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州政协主席

1956年9月（45岁）中共第8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12月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三届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另外，从1949年起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6年1月（55岁）“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诬陷为“叛徒”，遭到迫害和打击

1967年4月（56岁）离开延边，秘密到达北京

1969年（58岁）在湖北“五三农场”劳动

1972年7月3日（61岁）患肺癌去世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延边州委为朱德海平反冤案，恢复名誉

1986年7月3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延吉建立朱德海纪念碑

## 参考文献

- 《朱德海的故事》（本书执笔小组）
- 《朱德海》（姜昌录、金永顺、李根全、一川）
- 《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李羲一、徐明勋主编）
- 《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全9卷，报刊杂志篇，金春善主编）
- 《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全4卷，回忆录篇，金春善主编）
- 《中国朝鲜民族教育史料集》（全4卷，许清善、姜永德、朴泰洙主编）
- 《中国朝鲜民族足迹丛书》（全8卷，延边人民出版社）
- 《吉林省政府志》（汉文，地方志编委会）
-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志》（汉文，上下册，延边地方志编委会）
- 《延吉市志》（汉文）
- 《珲春市志》（汉文）
- 《图们市志》（汉文）
- 《和龙市志》（汉文）
- 《安图县志》（汉文）
- 《汪清县志》（汉文）
- 《龙井市志》（汉文）
- 《当代中国朝鲜族人物录》（全2卷，人物录编委会）

- 《延边文史资料汇集》(全3卷, 延边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中国朝鲜族通史》(全3卷, 金春善主编、金哲洙副主编)
- 《中国朝鲜族移民史》(汉文)
- 《赵南起传》(曲爱国、黄范相著)
- 《光辉的足迹》(金成龙著, 崔龙洙编审)
- 《珲春县水利志》(汉文)
- 《和龙县水利志》(汉文)
- 《龙井果树农场志》(汉文)
- 《延吉市地名录》(汉文)
- 《太行山录》(金学铁著)
- 《扎根东北山川》(朴京玉、张世华主编)
- 《不朽的足迹》
- 《历史研究》(上, 崔文植主编)
- 《中国朝鲜族革命斗争史》(杨绍全、车哲久、金仁善、金哲洙、安春花著)
- 《延边农业科技发展史》(方钟赫主编)
- 《中国共产党90年风云史》(全2卷, 汉文)
- 《回顾1978》(董昌林编著)
- 《中国共产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组织史》(延边人民出版社)
- 《延边40年记事(1949~1989)》
- 《延边经济史》(延边人民出版社)
- 《解放哈尔滨》(全2卷, 汉文, 哈尔滨档案局编著)
- 《解放前延边经济》(金泽主编、金仁哲副主编)
- 《延吉市城市建设志》(汉文)
- 《中共延边地委延边专员公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卷、第2卷)  
(延边州档案局编著)
- 《海兰江之魂》(朴河林著)

- 《不朽的英灵——崔采》（柳燃山著）
- 《哈尔滨市朝鲜族百年史话》（徐明勋著）
- 《赵得贤表现方法论》（赵得贤著）
- 《我们民族历史》（高永一主编）
- 《中国广阔的大地上》（朝鲜义勇军足迹执笔小组）
- 《岁月的尘土》（金永万著）
- 《回忆金文宝同志》（汉文，安龙镇主编）
- 《朝鲜义勇军史》（崔强著）
- 《中国朝鲜族人物传》（韩俊光主编）
- 《与延边一起走过的60年》（许相林编著）
- 《富有意义的抒怀》（责编金胜吉外4人）
- 《延边经济地理》（全松林）
- 《延边抗日史迹研究》（金哲洙著）
- 《朝鲜族简史》（延边人民出版社）
- 《朝鲜族百年史话》（玄龙顺、李政文、许龙九编著）
- 《日本帝国主义东北侵略史》（金基峰、方永春、权立编著）
- 《延边党史事件与人物》（金东华、金哲洙、李昌亦、吴基松编著）
- 《文化山脉》（第8集，赵成日主编）
- 《延边日报社50年史》（吴泰镐著）
- 《离乡50年》（郑判龙著）
- 《白衣同胞的印象》（延边历史研究所译）
- 《龙井文史资料第1集》（龙井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回顾历史》（延边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 《东满地区革命历史文献汇集》《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编》
- 《延边大学40年》（延边大学编委会编著）
- 《延边大事记》（汉文，延边州档案局编著）
- 《吉林省编年记事》（汉文，上篇，王树平主编）

-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经济概论》（延边大学延边经济研究室编著）
- 《我的一生》（金应三著）
- 《金成辉诗集（称颂朱德海的诗“一棵松树”）》（金成辉著）
- 《四海之内皆兄弟》（金虎雄著）
- 《坚定岁月——文正一生平传记》（金亨直主编）
- 《吉林朝鲜族》（金仁泽主编、金仁哲副主编）
- 《发展路上的延边》（上、下卷，隋喜林主编外9人）
- 《延边人民抗日斗争史》（崔成春著）
- 《中国朝鲜族民间音乐集》（金凤官编著）
- 《中共党史》（全3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
- 《尚志市朝鲜民族史》（韩得洙主编）
- 《报道中看新中国60年朝鲜族变迁史（延边篇）》（上下卷，延边日报社编）
-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名录》（延边州地名编委会）
- 《中国抗日战争和朝鲜民族》（高永一主编）
- 《林彪》（延边人民出版社）
- 《东北历史》（米大伟著）
- 《冬季》（德菲特·海尔弗斯特姆著，郑允美、李恩珍译）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战斗史》（上下卷，金焕、崔洪洙、南大明、赵熙川译，延边人民出版社）
- 《东北抗战实录》（李书源、王明伟编）
- 《共和国记忆60年》（上下卷，孟云剑、杨东晓、胡腾编）
- 《中共风云九十年》（上下卷）
- 《血祭关东》（许晨著）
-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刘小艺著）
- 《解放哈尔滨》（上下卷）

## 参考文章

《延边文史资料汇编》1卷

“延边地名渊源” 39页，梁焕军

“延边人民民主大同盟的历史作用” 705页，白东活

“汪清县人民民主大同盟” 711页，姜永鹤

“延吉县人民民主大同盟” 715页，李凤久

“吉林省民主联盟的本末” 723页，张玉池

《延边文史资料汇编》2卷

“‘5·30’暴动前的私立明东学校” 21页，梁焕军

“20年代龙井的6个中学” 33页，金波

“创建延边大学的日子” 420页，金雄

“《韩民日报》成为《东北朝鲜人民报》之前” 483页，郑奎烈

“《延边文艺》创刊的日子里” 492页，天龙

“延边医院的昨天和今天” 573页，王铁、崔光浩

《延边文史资料汇编》3卷

“朝鲜义勇军与第5支队” 31页，李昌亦

“延边地委工作的日子里” 90页，柳俊洙

“金时龙互助组” 166 页，俊洙  
“五道杨车战斗” 195 页，华功  
“姜信泰的军队生涯” 321 页，李昌亦  
“抗美援朝的日子里” 493 页，朱沙  
“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施之前” 736 页

《中国朝鲜民族足迹丛书》4 卷，决战  
“关内作战的斗士们” 301 页  
“朝鲜义勇队与郭沫若” 311 页  
“朝鲜义勇军司令员武亭将军” 337 页，金淳基  
“悼念牺牲的朝鲜义勇军同志们” 371 页，叶剑英  
“走上民族解放之路” 387 页，李华林

《中国朝鲜民族足迹丛书》5 卷，胜利  
“响彻东北山野的胜利歌声” 263 页  
“土地改革，支援前线和生产建设” 399 页  
“做文化教育和艺术的主人” 485 页  
“从《韩民日报》到《东北朝鲜人民报》” 512 页，郑奎律  
“从山海关到海南岛” 606 页  
“做人民共和国的主人” 702 页  
“民族事务处与李羲一” 716 页  
“吉林省民族工作会议” 725 页，金世俊

《中国朝鲜民族足迹丛书》6 卷，创业  
“开国盛典与潘龙海、金永顺” 4 页，玄龙顺  
“中央访问团访问延边” 17 页，李文泽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77 页

“太阳升起的大地” 244 页  
“黎明集体农场的风云史” 256 页，吴泰镐  
“互助合作的带头人” 291 页，玄龙顺  
“北方水田专家崔竹松” 303 页，吴作基、玄龙顺  
“苹果梨与崔承默” 361 页，玄龙顺  
“青涩的民族工商业” 365 页  
“沈阳市朝鲜族工商业” 418 页，徐英花  
“繁荣的我们民族教育” 440 页  
“繁荣的延边大学” 485 页，玄龙顺  
“百花怒放的文学艺术” 540 页  
“延边歌舞团” 556 页，李艳芝  
“医学博士卢基舜” 690 页，玄龙顺

《中国朝鲜民族足迹丛书》7 卷，风浪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后” 1 页  
“反右派斗争和民族整风运动” 111 页  
“延边的反右派斗争” 117 页，吴泰镐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折腾” 177 页  
“延边地区人民公社的厄运” 181 页，吴泰镐  
“打通桦集岭的心脏” 196 页，李海植  
“苹果为什么飘香” 211 页，金春极、洪春植  
“‘文化大革命’与朝鲜民族” 279 页  
“动乱中建设的安图水库” 334 页，李海植  
“朝鲜民族艺术的摇篮” 557 页，金德千  
“弘扬民族自豪的激动日子” 610 页，张逸民

《朝鲜义勇军第 3 支队》

“朝鲜义勇军的诞生和活动” 徐明勋  
“朝鲜独立同盟‘特委’与第3支队” 曹敬衡  
“第3支队成立前后” 柳东浩  
“同一个信念下” 金学龙  
“肃清土匪第一仗（木兰战斗）” 李原宇、吴相运  
“安息吧，21烈士！” 柳东浩、曹敬衡  
“诸河中队” 张万联  
“担任教导队中队指导员的时候” 金明汉  
“第3支队培养干部概况”  
“感动的事情” 申德官  
“参加土改工作队” 张逸民  
“自力更生精神” 赵钟锡  
“第3支队与初建时期的护路军” 郑太日  
“卫生队成立前后” 元日宇  
“自行建立的运输队” 韩瑞龙  
“艰苦的创业（香兰根据地建设）” 曹敬衡  
“新的教育工作中” 权宁河  
“回忆宣传队活动” 金三镇  
“尊敬的政委朱德海同志” 曹敬衡  
“解放长春的日子” 张万联  
“第一个女队员（我的简短回忆）” 赵贞子  
“还需要有拿笔杆子的队伍” 张万联  
“第3支队的温暖怀抱” 李仁淑  
“教导队学习的日子” 姜成今  
“朝鲜义勇军第3支队沿革”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德海评传 / 崔国哲著; 陈雪鸿译. —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449-2424-5

I. ①朱… II. ①崔… ②陈… III. ①朱德海  
(1911~1972) — 评传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99850号

责任编辑 申明仙  
责任校对 黄灵香 李丹  
封面设计 张香姬  
技术设计 张学峰  
出版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363号  
邮 编 133000  
网 址 <http://www.ybcbs.com>, <http://www.ybcps.com>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幅面尺寸 155×227 1/16  
插 页 4  
印 张 29  
字 数 360千字  
印 数 1-700册  
ISBN 978-7-5449-2424-5  
定 价 48.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封面设计: 张香姬

# 朱德海 评传

我所认识的真正的朱德海，  
不仅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第一任党政领导，  
创建自治州的主要功臣，而且有着超乎常人的党政工作经验，  
无论做任何事都以功利性、合理性、实践性为先……  
我要做的工作就是让人们一目了然地了解具体而真实的朱德海，  
读到一部脍炙人口的朱德海励志传说。

—作者

ISBN 978-7-5449-2424-5



9 787544 924245 >

定价: 48.00元